书屋文丛

穷人经济学

卢周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书屋文丛已出书目

齐人物论	庄周
沉默的荒野	陈家琪
说文解气	周泽雄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穷人经济学	卢周来

ISBN 7-5321-2397-9
9 787532 123971 >
定价：18.00元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穷人经济学

卢周来 著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人经济学/卢周来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6
(书屋文丛)
ISBN 7 – 5321 – 2397 – 9
Ⅰ.穷… Ⅱ.卢… Ⅲ.经济学 – 随笔 – 文集 Ⅳ.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426 号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王志伟

穷人经济学
卢周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29,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50 册
ISBN 7 – 5321 – 2397 – 9/F·6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 – 64780222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目录

点评乡下姑姑来信 (1)
出租车惊魂记 (7)
“杀掉山羊,保卫北京”? (12)
经济学与乡愁 (17)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22)
向前看与向后看 (27)
穷人与富人 (32)
广告主要是为富人做的 (36)
“富人比穷人讲信用”? (41)
出生、私有制以及“教育产业化” (46)
选择 (52)
一位思想者的离去 (57)
我为什么没有捐款 (62)
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67)
文明与贫困 (71)
以贫困为耻 (76)
贫困的理由:三种经济学的解释 (80)
蛋糕的比喻 (85)
到底应该招聘谁 (90)
从鲸鱼的命运说到所谓产权 (95)
大树该不该砍 (99)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进步的代价 (104)
信上帝,还是信经济学家 (110)
人耶? 鼠耶? (115)
价格大战的背后 (120)
利益之外 (123)
歌星的身价 (127)
“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132)
知识分子的人生经济学 (137)
自由主义的真精神 (142)
我很“懒”,但我很快乐 (147)
为什么总是美英出来充当“老大”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一 (155)
“沉默的大多数”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二 (158)
俄罗斯的威胁为什么没有用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三 (161)
透视道德领域的“沉默现象”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四 (165)
打破沉默:方法在哪里?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五 (170)
常识的胜利
——信息经济学趣话之一 (174)
好东西为什么卖不出去
——信息经济学趣话之二 (179)
“科斯定理”到底说了些什么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一) (184)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二) (190)
由“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产权崇拜”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 (196)
枪炮下的繁荣
——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一 (201)
全球化不打仗?
——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二 (209)
“经济人”的盲区
——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三 (215)
“经济学眼光”与“数学眼光” (220)
再谈“眼光问题” (225)
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228)
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 (235)
中国人该如何自处
——写在“五八”事件以后 (241)
改革“冷漠症”的背后 (248)
切的忧虑 (255)
历史学家的绝望
——再读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257)
讲道德的经济学家 (261)
从威廉公爵的葬礼说起 (266)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时间 (271)
感受乡土中国
——读《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276)
中国知识界需要什么?
——再说《黄河边的中国》 (283)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草根与传统 (287)
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读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后 (293)
弱者的声音
——读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 (297)
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 (302)
何处是归程
——读汪丁丁《回家的路》 (308)
后记 (312)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点评乡下姑姑来信

乡下的姑姑来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我在此作一点评。

侄儿：你好。姑姑很久没有收到你的信了，是不是忘了老家了。

点评：我倒是没有忘。每次从老家回来，都因老家的贫穷以及乡吏的腐败增加一种很疼痛的感觉，这种感觉太重了，竟使得我不得不刻意回避它。学界流传着关于北大某经济学家的一则典故。这位青年才俊是陕西乡下放牛娃出身，但现在却以其著名的三论——“腐败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为了达到私有化不妨吐唾沫论”、“富人比穷人更讲信用论”——名噪一时。据说他每次回到陕西老家，见到故里乡民依旧不堪贫穷及官民矛盾后，不禁惊呼：不得了啦，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啦。但刚回到京城没几天，他就自嘲地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相信我的良心终不会这样使我有一天视而不见我的父老乡亲。

前年我家养了三头猪，那时猪很值钱，一斤毛猪四块多钱，年底你姑父把猪卖掉，换了两千多块钱。但去年猪不值钱了，一斤毛猪就两块多钱。我们又没别的挣钱的法子，又要应付度日，只好多养了两头，一共五头猪，到了年底卖出去，勉强维持了前年的收入。

点评：作为学经济学的，我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一般经济学供求定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一般供求定理，市场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时，供应商会增加供给；价格低时会减少供给。但我姑姑却反其道而行之，猪价格低下来了，反倒增加了供给，由原来的三头猪，增加到养五头猪。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很凑巧的是，我翻译一本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书。里面讲了同样的一个案例。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当地人惟一的生活资源是养羊，惟一可用来换成货币的也是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哪年是灾年，羊的死亡率高，当地人放养的羊头数越多；哪年羊最不值钱，当地人为了维持货币收入不下降，放养的羊也最多。

出现这种供求定理例外的情况看来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可供给的品种是初级产品，要么猪，要么羊；其次是供给者没有可替代的货币收入来源。我的姑姑与非洲放羊人都一样，只能将全部的货币收入寄托在猪或羊身上；最后，一定的货币收入对供给者不说不可或缺。如果我的姑姑与非洲牧羊人都在前现代化阶段，都生活在家族体制内，而不是生活在今日现代化之科层制社会之中，他们大概不会做这样的不可思议的事。换言之，我的姑姑与非洲放羊人也被迫并且不可逆转地裹挟进了这个被异化了的世界，才如此的。

今年更不如去年了。从城里下来的乡长组织了个养猪协会，一边要我们买由那个猪协会统一进的猪饲料，价格高得不得了，不买就强行摊派，一边要我们把猪全卖给协会，不得私自屠宰与出售，但他们收猪的价格比去年还低。最可恨的是，由于他们让联防队员看住大家不往邻乡卖猪，也不让邻乡收猪的进我们乡，而且说不听话就不收谁家的猪，又不让到市面上卖，所以大家都埋怨，当官的还说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是什么“公司＋农户”。我们没有什么方法，都把管协会的几个叫“猪头”，几个“猪头”都发了，县里省里还表彰他们，老百姓有苦不敢言。

点评：这种情况在我国农村已经屡见不鲜。我倒在这里分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明看到了国际间不公平贸易的影子。加工品价格高,初级品价格低,而且交易规则全由霸道者说了算。出口加工品者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且无论是初级产品的卖价还是加工品的卖价,实际上都是垄断价格。

尤其是结合上面的情况,似可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国际贸易体系没有什么不合理。如果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真不划算,你可以不出口或缺少供应啊。这样初级产品供给少了,产品价格不就上去了吗?现在看来真是站直了说话不腰痛。发展中国家就是我姑姑,就是非洲放羊人,他们已落入了现代化的陷阱,无一例外地急需货币,用来应付各方面开支。其中最大的开支,在我姑姑那里是交苛捐杂税,在发展中国家那里是用来还外债。所以,出现了围绕最后外汇多少组织生产的状况。以至于国际市场上价格越低供给还会越多,发达国家如果需求下降反倒会着急地"送上门找剥削"的现象。难怪有些发展经济学家给出的主意是"出口基础多样化"。挣钱的门路多了,生产可以相互替代,这种产品利润低,我就生产出口另外的产品。但只要是初级产品,怕还是摆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

这种情况下,我们百姓试着不养猪,改养蚕。因为沙地多,可种桑养蚕。但乡村两级干部都说,还是养猪划算,蚕更不值钱,同时他们还利用权力不让我们改养蚕。谁要养蚕,就要交很重的特种农业税。

点评:乡村干部不让农民转换产业,明显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

近来在讨论新经济过程中,有这样一种声音:中国不要搞什么新经济,中国还是要发展传统产业,因为传统产业利润高。我怀疑讲这话的人的屁股坐在美国人一边。即使是动机单纯,也与美国人有一种"复杂的共谋"关系。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马克思老早就论证过，只有物质经济生产才产生剩余价值，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不产生剩余价值，只参与物质经济生产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所以，传统产业利润的确高。但问题是这些利润到哪里去了呢？都到洋人与洋买办那里去了。他们在分割剩余价值。

按联合国一份出版物对新经济的定义，“新经济”，也叫做“无重量经济”、“知识经济”、“无形经济”或“非物质经济”。一般认为，新经济具有四大要素：第一，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因特网；第二，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版权、品牌、商标、广告、金融和咨询服务、金融兑换、卫生保健以及教育；第三，电子图书馆和数据库，包括新闻媒体、音像制品和广播；第四，生物技术、传统图书和数据库以及药品。新经济所有的部门都是非物质经济，都不产生剩余价值，也是参与传统物质经济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分割。美国等少数国家步人所谓新经济行业，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国家利用国际市场上统治地位，抬高非物质经济部门产品价格，压低传统物质经济部门产品价格，利用这种“利润倒逼”机制剥削传统产业。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都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代表着广大中下层经济者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代表了与国家政权力量合流的上层资本集团利益。这两种经济是矛盾与斗争的。“资本主义”为了更好地剥削世界市场，正“重振全球化旗鼓”。也就是说，正是为了巩固资本集团的利益，所以，美国等步入新经济的国家才如此急于将世界都合并人由他们主宰的秩序之内，才竭尽所能地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因为一体化后，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经济产业分工，才能更好地将传统产业部门的利润都合法地占为己有，才能继续美国经济不衰的神话，才能出更多的像比尔·盖茨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这样的“知识英雄”。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点，不去跟美国人学坏，不去发展新经济，而仍将眼光盯着纺织等部门——一火车的纺织品换不回一个光盘容量的软件——那么我们真是入了美国人的圈套，只能永远做小奴才，做下等人，永无出头之日。

这日子真有点没法过了。我与你姑父商量，因为他身体不好，我就出门去找点活。侄儿，你能在城里找点事吗？我不怕吃苦，做保姆也行。

点评：今天一大早的新闻播了这么一则消息：沈阳已经实行保姆资格等级制。想当保姆，也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设置的考试，取得资格证书以后才行。在此之前，保姆以外的其他一百多种职业，从律师、到教师、再到锅炉工、保洁工等等等等都要有国家认可的相应的从业资格才能从业。新闻报道都将这作为市场管理规范化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鼓吹应该这么做。城里人更是为此欢欣鼓舞。

可怜的姑姑，你看来只有继续呆在乡吏横行的贫穷的乡下了。城里人已经为你进城设置了一百零八道门坎。你是进不来的。

进来了又怎么样，也一样受城里人的气。在这个城市的旮旯角里，很多乡下人，和城里的下岗职工一起，在地下摊一个塑料袋，做着最廉价的买卖，艰难地糊口。但他们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城里对付不了大资本制造的污染与混乱的城管部门、以及早已与不法商人串通一气的工商部门，就以对付这些乡下人与下岗职工为能事。掀翻他们的摊子，没收他们的货物，稍不顺从，专政机器在背后虎视眈眈。

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啊。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阿瑟·刘易斯在《发展计划》一书中早就警告过。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劳动力市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场管理太严格，尤其是对自谋生路者管理太严格，就业压力将更大，民众将有可能因更少谋生门路而生活无着。我们应该听听这些大家的话，而不应只听一阔起来就变脸的城里人的话，更不应该只听那些早已越过现代化而进入高消费的暴发户们的话。

最后，祝侄儿一家人都好。乡下姑姑。

点评：也祝你好，乡下的姑姑。因为你的命运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命运，你未来的生活以及变化就表征着中国的生活以及变化。所以，你好了，中国也就好了。你就是中国！

2000 年 7 月 31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出租车惊魂记

我现在要向各位经济学同行讲叙的是昨天一次“出租车惊魂”的经历，以图引起各位思考。

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钻进车前座后，我发现车内与外面一样闷热。于是我很有礼貌地让司机打开空调。司机很不情愿地说：“你知道汽油涨到多少钱了吗？本来就挣不到什么钱，再开空调，我更亏了。”我顺口接了一句：“汽油涨价还涨得不够呢。国内油价要与国际接轨，还差一大截。”

祸由此始。司机一踩油门，说：“小子，你是搞经济学的吧。冲你这句话，我要找几个哥们与你炼炼。”北京的“炼炼”就是“打架”的意思。一看司机满身横肉、怒气冲冲的样子，我当即发怵了。我强作镇静问了一句：“你要找我炼炼，也要把理由讲清楚，我好心服口服。”

那位司机恨恨地说：“我们都听说，国内油价要与国际接轨，是一个叫×××的狗屁经济学家出的主意。这位经济学家是石油公司的什么董事，拿了人家的钱，然后给朱老板（指朱总理）出主意要涨油价。现在都涨到三块两毛多了，他还说涨得不够。我与哥们几个商量了，涨到我们活不下去时，我们就凑个份，买通黑社会，去修理修理那个经济学家。我就不爱听那话。什么与国际接轨，你有本事也让中国人活得与美国人一样好啊。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让中国人收入与美国人接轨啊。我…听你刚才那话，就知道你也是狗屁的搞经济学的，都一个德性。嘿嘿，我就先与你炼炼，出口气。”

后来的结局我最后再说。当晚回到家，我与几位朋友打电话，谁知，韩德强兄说也有类似被出租车司机骂的经历，而另一位社科院的朋友则说，就因为这次石油涨价过程中不光彩的表演，×××的确已经“臭大街”了。

我对石油产业没有什么研究，但有些道理我还是知道的。国际市场上油价上涨，国内油价也随之上涨，这在开放经济的时代，即使国内石油不是依赖进口，油价上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却因为油价上涨迁怒于我们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呢？

对于这位经济学家，我也是隐隐知道媒体报道过他是某石化公司海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而且似乎他还说过，独立董事不好做，搞不好要倾家荡产，所以，独立董事都要买保险云云。拿了人家的钱，做人家“股东”（过去叫“资本家”）们的“顾问”也罢，“帮闲”也好，“买办”也行，都必须为人家说话。在石油国际价格上涨、石油供求出现矛盾时，出于维护自己所服务的公司的利益考虑，鼓噪一下石油必须涨价，这也没有什么错，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符合作为董事的要求。按理说，出租车司机也没有理由将矛头直指这位经济学家，而不骂直接操纵着石油价格的那帮“资本家”呀？

左想右想，问题就出在这位经济学家有意无意仍将自己的观点与思想作为“天下之公器”，仍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在说话；而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客观地作为某公司独立董事、为某公司服务的“私语”；更不应该的是，他本来已经屁股坐在有着自己专门利益的某公司的董事位置上，而他还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同时作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为政府制订政策时咨询者的角色。所以，他提出石油涨价的原因时，不去刻意地说石油国际价格涨了，不去说国内石油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市场，不去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搬出一个最貌似公允的、像政府发言人说话时所说的“国内油价要与国际接轨”这样一个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啊。现在只要一提“与国际接轨”，谁也没有办法反驳。你中国不是要加入 WTO 吗？整个经济都要与世界一体化了，石油不也要“一体化”吗？

一方面，明摆着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服务；另一方面，却摆出一副“不讲价值判断”、超然物外作为“天下之公器”、甚至是为整个中华民族振兴作贡献的样子。这就是我们某位经济学家终于惹起众怒的最终原因。司机是不能怪那些惟利是图的资本家，因为他们丝毫不隐瞒他们贪婪的本性，但我们却有理由怪这些“经济学家”。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包括司机、我等在内的所有普通人，曾经还以为他们真是在“经邦济世”，以为他们立场中立，以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当我们的这种期望被他们的耳光煽醒后，感到自己被骗了，而且他们还在骗我们，我们能不感到出离的愤怒吗？所以，昨天出租车司机后来一句话虽粗，但却将这些经济学家的表演概括得十分到位：“又做婊子，又立牌坊。”

因为想这个问题，我再次翻看了弗里德曼《自由言论经济学》。在结语中，这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说得很清楚，经济学家行使自由言论的权利时，总是受制于利益，包括为他出资的政府及商人。反过来，每个人、每个阶层也都要为其言论在这个社会中的影响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是成比例的。我所敬重的樊纲先生曾公开说过的：在美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为利益集团服务。大概就是这一原因吧。

但不知我国这些经济学家有没有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与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格，所以，相应地，为各个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的声音都不相伯仲，社会影响也都差不多，所以，各种声音都可以相互制衡。政府也可以兼听则明。而中国呢？中国是这样吗？“资本”与“权力”阶层有实力买得到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但普通工人呢？普通农民呢？还有昨天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呢？谁来为他们说话？当上千万下岗工人在为不知下一顿饭在哪里而发愁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却在说“计划经济下就业体制培养了千百万懒汉”，“要想提高效益还要再下岗一千六百万”；当普通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干下来最后发现国家曾许诺过的“老有所养”不过是风雨中纸糊的房子时，我们的经济学家正忙于论证“福利社会的不经济性”。这就是我们某些大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

因此，有时我真想对这些经济学家们说一声：恳请您不妨暂时抛开你那高深莫测的“XYZ”，只需要简单地问问自己的良心吧：当初，还没有资本家来买你的时候，是我们普通纳税人的钱在养活着你。尽管与你的学问相比，我们能贡献给你的钱是远比不上现在那些暴发户们给你的钱，但那时我们比你们生活得更苦啊。当我们现在仍在贫穷，甚至衣食无着的时候，你们怎能一阔脸就变，就忘了咱们呢？甚至帮那些有钱人收拾我们这些穷人呢？

我自己，也是底层中一员，却不幸也搞了经济学。其实我很害怕有人说我是“搞经济学”的。很多的时候，当我的学生们提出要我解释由我们的大经济学家们炮制的各种奇谈怪论时，我简直无地自容。但此时倒不是我不懂他们那套大概也只有在中国才能蒙人的歪歪理，而是一方面我的学生们感到任何解释都无法掩饰那些歪歪理与现实之间如此紧张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我却出于私心或者说为饭碗计还得拼命地维护这些歪歪理。那可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呀。他们的观点都不对，你这个经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济学“后生”更没有资格讲什么经济学，还跟着瞎起哄什么“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可怜的出租车司机，原来你在任由这些大经济学家宰割的同时，我不也是在受他们摆布吗？我们都一样是受害者。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出租车惊魂”故事的结局了：尽管当时我没有想现在这么多，但我基本表达了我以上的意思。所以，那位出租车司机没有再“找我炼炼”，还说要与我建立长期联系。我则答应给他作回广告。他的出租车车牌号是：京 B×××××。欢迎大家出门时坐他的车子。

2000 年 8 月 25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杀掉山羊，保卫北京”？

朋友常与我说，你是个不容易被说服的人。其实并不尽然。在有一些问题上我还是听得进别人的意见的。但在有一些问题上我的确很听不见别人的意见，这些问题就是有违我的常识的问题。在常识与很深奥的理论之间发生冲突时，我选择常识。因为我总认为，常识是我们的先人赐给我的未经蒙蔽与雕琢的无需证明的“公理”。但因为我毕竟又经过了教化，这种教化要我“怀疑一切”，包括怀疑常识。于是，在有人精心地以很深奥的理论证明常识是错误时，为了坚定我对常识的信心，我干脆采取一种方法：不去细看这个人的证明过程，以免落入他为我设就的“逻辑陷阱”。当然，我也很清楚这不过是“鸵鸟策略”。

今天无意间在“中国新闻社”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杀掉山羊，保卫北京”，我只是看了一个标题就不想看下去。因为标题本身已严重地背离了我的常识。以畜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中国北方人，放养山羊的历史不下几千年。几千年来，人、山羊、环境都能和谐相处，人与山羊本身也构成环境的一部分，为什么现在有人竟将山羊作为北京沙尘暴的罪魁祸首？明明是人本身尤其是已无可救药地步入现代化轨道的城市工业以及城里人在制造种种环境灾难，竟迁怒于无辜的山羊及放羊人，而且还搬出一大堆似乎无可辩驳的事实与逻辑来欲盖弥彰，这是多么可悲可气的事啊。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其实，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有一次，我在新闻中看到这样一则现场报道，说是一条流经城里的河，河的上游的村庄里的村民们竟然在河的这边洗菜、洗衣服，在河的那边涮马桶，使河流受到污染。记者手持话筒时的义愤与村民们的"无知与茫然"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不知这位记者知不知道，在中国广大的乡村，村民们都是在同一个池塘中这边洗菜那边涮马桶同时还有一群小孩在池塘中间嬉闹的，没有听说过水被污染得不能吃、吃了就中毒的事。有关部门称中国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河流被污染，请问这位记者，是不是因为乡下人在里面涮了马桶的缘故？

我曾经就我的看法请教过一位科普工作者。他倒说得很明白。自然本身有一种吸纳与循环的能力。而我们又知道原始农业经济形态是以劳动力投入为基本特征，所以，人们的经济活动仅仅是自然本身一部分，由这种经济活动产生的"垃圾"与"排泄物"如动物粪便、植物燃烧后的残留物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根本不会对环境产生任何不可逆转的破坏。而工业经济则是以资源大量消耗为特征的经济，同时，工业垃圾与排泄物已经不是自然组成部分，所以，经常会发生对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那位科普工作者也认为，曾被我所居住的城市的许多媒体大肆渲染过的华北平原不少地方因烧田导致大范围空气污染，以致引起城里人愤怒并要求环保与执法部门必须一查到底"对人民有所交待"的事，纯粹是城里人的自大与无知。因为如果仅仅是烧田，是不足以形成环境污染的。

记得克尔凯郭尔曾经这样描述过人类的可笑之处："房子着大火了，我们做的却是抢救出火钳。"在环境保护上，我们是不是又在重蹈人类的可笑之处呢？更根本的事、更大的事做不了，也不愿意做，甚至因为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不仅不做，还举出各种理由将责任推脱到他者身上；更甚者因为其中有猫腻给污染制造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大户一路绿灯、而同时为了掩饰自己嘴脸的需要对非真正制污的小民高举大棒，这样真能保护好环境吗？

因为我的根是在乡村，所以，与乡土更贴近的环境遭到破坏尤其使我感到一种切肤之痛。说心里话，这二十年，我们国家的确发展很快，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这二十年，对环境破坏的程度、速度怕是中国历史上也少有的。因为我们不恰当地将曾经压抑在人心中的私欲几乎全盘调动起来了，所以，也就用不了多少年，就将自然与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消耗殆尽。北方莽原上曾经有一种叫发菜的植物，原不过是最平常也分布极广的野菜，但不幸因为有人发现了它很适合某些鸡鸭鱼肉吃多了的城里人胃口，于是不出五年工夫，这种植物与生长它的草原一起遭受灭顶之祸，使原本肥沃的草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退化；西南一种叫冬虫夏草的菌类，几千年来当地村民曾将其视为雪山的精灵，仅仅因为城里人发现它竟然可以壮阳、提神，于是，雪山的精灵也只能到煎药罐里去哀鸣；有一部电影叫《大马哈鱼档》，描述了当时东北黑龙江中大马哈鱼如何多而丰美，不过十几年工夫，据说这种鱼终于未能摆脱与沿海曾有过的“鳗鱼大战”中的鳗鱼一样几尽灭绝的命运；更有南方的青蛙，你现在去南方，根本没有“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象了，就因为已被捕杀成了城里各大菜馆饭庄里用来诱客的佳肴。更不用说，多少条河流被污染，多少原本秀美的山川因为疯狂地采矿、采煤、采金而使我们更加感到生存的艰难。但真正有多少人关心这些事呢？每年上蹿的经济发展速度、居民们日渐鼓起来的腰包更值得关心，而不知经济发展速度与渐鼓的腰包仅代表物质，而不代表我们生活境况的改善，不代表我们生活得更适意了，更不代表我们财富本身的增加。

多少年来，在经济学界，总有一些人在力主改变用单纯的数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字衡量发展的做法。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叫"国民生产净值(NNP)"的指标取代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这种国民生产净值实际上就是在刨除了国民生产总值中因环境破坏与资源消耗造成的损失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它显然更能度量我们的真实生活境况。据说现在有些国际组织已经在使用这一指标,我还亲眼看过一个德国人写的用这些指标衡量后的原西德实际经济发展速度的论文。我也强烈建议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做一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也敢肯定,如果真用国民生产净值计算,我们二十年的发展速度一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我们的生活境况的总体改善也许不值得我们骄傲。换言之,我们今天的所得不过是寅吃卯粮、爷卖崽田的结果。

所以,我其实也是个环保主义者。但我反对我们为了保护环境时采取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更反对一些城市环保主义者的矫情。他们的做法和矫情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反而有可能将中国最弱势群体——农民与他们的乡土之间维系了几千年的纽带越来越松散,使他们生活越来越手足无措;而更先进的所谓"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仅不能适应,而且城里人压根也不想让乡下人也都城市化。都成城里人了,仅城市每天生产的垃圾就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中国土地给淹没。因此,更要紧的,是让城里人转换思路,改变生活与发展的模式,才是根本之计。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乡民们总是在收获完的田地里堆起土垄烧牛粪,黄昏时望着一望无垠的平原上一缕缕轻烟袅袅升起,与天边的云连在一片,继而升成了一条条乳白色的飘逸的带子。这时,我都会发痴。进城十多年,这始终是我对故乡怀恋时最美好的部分。而几年前,环保部门竟说烧牛粪会污染环境,所以,禁止烧牛粪垄了。于是,乡民们只能靠施城里人产的化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不久前乡下的姑姑来信说，随着土地对化肥的日益增长的嗜食，土地本身也一季季地板结下去、贫瘠下去。

其实对我来说远不止于此。要知道，没有了故乡的牛粪烟，我的乡愁从此显得有些无着了。

2000年8月28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经济学与乡愁

说到乡愁无着，我又想起一件事。

我的一位研究传统文化的朋友，经常提出一些外人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所以，被不少人看作怪人。最近他对我说，他要开展一场反对铺水泥地与沥青路的“运动”。他的理由同样很怪。他说，人通过皮肤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进行新陈代谢；地球也是有生命的，也是通过地面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进行新陈代谢。如果人类无休止地在地面上铺上水泥沥青，就与大夏天将人用棉袄捆得紧紧的一样，迟早会出事的。更可怕的是，现在人类已经快将水泥与沥青铺到地球的鼻孔了，再不停止，地球会活活闷死。他说，据他研究，地球的鼻孔就在中国的西安，所以，他要赶紧去西安，让西安人明白他的道理。

但钢筋混凝土并不会因为我的朋友的“怪诞”的想法而停止生长。于是，我的朋友说，在这个城市，他的乡愁已无地可容，只好靠到故纸堆里的游历来过乡愁瘾了。

其实我也几近如此。去年，我的这位朋友的朋友将一种新出版的老书马克斯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送给我，让我也过了一把乡愁瘾，到一百年前的经济学世界去看了看。

尽管多年来治经济思想史已明白一个道理：经济学家围绕的课题无非也就是“自由市场还是国家干预”等那么几个，但看过《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以后，仍为一百年前的经济学问题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一百年后的今天经济学问题的相似之处而吃惊不小。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马克斯韦伯于1895年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演说。在此演说中，韦伯几乎花了一大半的篇幅，来痛斥当时德国主流经济学一些很流行的观点损坏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

第一个观点是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在韦伯时代，经济学也已经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成为显学，于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大行其道。一些天真的经济学家甚至将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皇后”，而政治学、法学等不过是经济学的“侍女”；人们似乎都确信，经济学已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对一切事物作出评价。但身为经济学教授的韦伯却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使得在德国社会中，“政策取代了政治而成为人们的中心关切”，国家则被看成是私人利益的反面。因此，人们已经被所谓“旨在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的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麻痹了”，因而对德国的政治与民族利益变得麻木和冷漠。

其次是所谓“经济研究不要价值判断”的观点。针对当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基于纯粹的柏拉图技术主义立场上提出的“经济研究不要价值判断”，韦伯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价值。如所有国民经济学的特有的价值尺度就是本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他还说，尽管一些德国经济学家表面上声称其研究中不含价值判断，“而事实上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到处在作出价值判断而毫无羞耻之心”，“只不过他们的自身价值混乱，并且大多是对德国本民族的经济问题不关心或作不出真正的答案罢了”。

再次是“经济发展超出国界将导致民族利己主义的观点被抛弃”的观点。十九世纪末，在资本扩张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家之间经济往来十分活跃。不少经济学家因此提出，经济政策要适应经济发展超出各界的要求，提倡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反对民族利己主义。但韦伯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使得斗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种经济全球化会“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民族国家内部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韦伯最后总结道，正是上述一些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使得德意志民族到了很危险的境地。因为这些观点会“使德国人成为政治侏儒”，以至于没有一个阶层能负担起为德意志作为一个“优等民族”传递薪火的使命。

从我个人立场上讲，我很同意韦伯的立场，而且认为这些观点对中国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下的意义。且抛开此不说，我们且一起回观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即将进入下一个世纪了，鼓噪于我们耳边的不还是这些话语吗？

“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再次在世界与中国大行其道。经济学早已越过自己的边界进入政治学、法学、人口学等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贝克尔竟能因为以经济学分析爱情婚姻家庭这样的日常行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都忙于“跑马圈地”。有位经济学家写了一篇关于文明的文章，竟被称为造就了“经济学挑战历史”之势。前年在中国大陆最红火的由斯蒂格利兹主编的《经济学》，书的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节：“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当然，反对者也不乏有人，且其中也有重量级人物。如科斯等人就声称，经济学不能通吃一切，“经济学要研究真正的经济问题”，提出要重构经济学体系；中国经济学家杨帆等人也提出，反对经济学成为“神学”。

今天更有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写专文论述“经济学就是不讲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道德”。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竟说:“从经济研究排除价值判断的角度看,为纳粹服务的经济学家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何曾看得出有立场可言?当然,同样也有反对者。何清涟女士不就撰文大批“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了吗?

至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问题,似乎一度有过一边倒的意见。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都认为,因为全球化趋势使得民族国家合并入全球分工体系,也符合经济学效益的原则,所以,民族国家就是要接受全球化,实现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一度不少人著书认为,民族国家将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消亡。一位叫福山的美国人甚至提出一个很耸人听闻的观点:“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将成为最后的人类。”但十分“不幸”的是,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分化及人群的分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左翼经济学家对全球化叫出了“不”的不和谐音,也使得韦伯时代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

都说历史会惊人地相似,但两个百年的经济学论争如此相似,的确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又是事实。难怪在 1991 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让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讨论一百年后的经济学时,有人就有这样的说法:我看不出这一百年时间经济学到底干了些什么;所以,我也不指望下一个百年经济学会变到哪里去。

但一百年毕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经济学领域总多少有些变化吧?行文至此,我无由地又想起一则与乡愁有关的故事。当年胡适之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到故乡——那也是我的故乡,母亲让他去看菜园里的竹林,并说是胡适小时候种的。胡适大惑不解:因为他记忆中并没有种过竹子。后来母亲的回忆让他哑然失笑,继而潸然泪下:原来,在胡适很小的时候,他叔叔不经意间给过胡适一根竹管让他做烟筒用,胡适因不会抽烟,就随手将竹管插在自家菜园里,不想十几年后,菜园里已满是青青茅竹。

经历了一百年的经济学何尝不是这样。一百年间,经济学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家层出不穷，经济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各种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阵地上展开激烈的厮杀……终于，经济学与百年前比更显繁荣，经济学家也因经济学日益繁荣而日益受到人们的敬仰。这大概就是经济学与一百年前相比的变化吧？然而，我们通过韦伯提供的文本到经济学的故园去看看，就会发现，如同胡适之后菜园青青茅竹不过由无意间插在地里的一节竹筒生长而来一样，今日经济学的种种繁华，也不过由一百年前几个老话题所引发，而依旧还没有脱掉一百年前那几个老话题。

当年胡适为他的发现哑然失笑继而潸然泪下，只是这时，我们那些经济学家们的表情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2000 年 8 月 29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深夜往往是很容易想起故乡的时候。这个夜晚，我又想起家乡的一些事情。

在我的印象中，故乡常有一种十分鬼魅的气氛。人在这种气氛中浸融日久，也不由不生出对乡村一些古老法则的敬畏。

我小时候，老家人常说到“福份”两字。按他们的说法，一个人生下来，其福份有多大就已经被天定了的。福份一完，人也就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因此，一个人如果太贪图享受，他的福份会提前被他用完，他可能就会早死；或者，至少他越到后来，会越活得凄凉。我的母亲就曾用吃饭的例子教导我：人的福份就好比做好了摆在桌面上的几盘菜。你如果先吃完好菜，那么后面你只能吃不好的菜；你若先吃不好吃的菜，后面你才能吃上好菜。

最忌讳的就是飞来之福了。老家人常说，飞来之福往往是祸害的先兆。一个福份浅的人是消受不起的。所以，如果你有幸突然来了一笔钱财，你一定要散尽。我至今记得我们村发生的这样一件事：一对老夫妇，女儿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位武汉有钱的经理。有钱的经理为显示阔绰，一出手寄了一千元钱给岳父母，那还是八十年代中期，一千元是个很大的数目。孰料老夫妇刚接到钱，第二天就死了一头养了多年的水牛，第三天又死了一头猪，损失差不多也有千元。第二次，女婿又寄了一千元钱，结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果，男老大病了一场，花去医药费近千元。从此老夫妇再也不敢要女儿女婿寄的大钱了。

有一度，我曾经认为，古老乡村的法则是中国自然经济与中国农民不开化甚至迷信的产物。但后来，我无意中看到弗里德曼一篇文章，在文章中这位著名经济学大师这样说："我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于我论证了这样一条经济学法则：天上不会白掉下馅饼；或者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现代经济学法则与古老乡村的法则何其相似啊。这一刻，我竟为古老的传统找到了现代经济学的阐述而激动得不能自已。

这种发现竟从此赋予了我看待现代经济学时一种几乎全新的眼光：即试图去发现现代经济学与传统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结果，我发现，现代经济学中所谓的机会成本理论，讲的就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

经济学上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指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你一旦选择了某种特定的投资方向时，所失去的投资于其他方向的收益，这种失去就是一种成本，叫做机会成本。作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比方。我只有三元钱——相当于经济学上的资源约束，我既想用它购买一本书，又想用它购买一碗面条。在反复权衡后，我觉得还是填饱肚子要紧，所以买了一碗面条。那么这碗面条的成本除了三块钱外，还应该有损失一本书的机会成本。

现在想来，这三元钱，或者说经济学上的资源约束，不正是我老家人讲的福份吗？反正你的福份就这么多，你在这方面花多了，在那方面就花少了；你现在花多了，将来就只有少花或没得花了。这个世界是没有无需付出的得到。我的纯朴的乡下人竟是如此懂得这个道理。

去年，阅读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时，发现斯蒂格利茨竟将"计算机会成本"说成是经济学家的"专利"。按斯氏的说法，经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济学家区别于普通人之处，就在于经济学家计算机会成本，而普通人不计算机会成本。我就很不服气：我的老家人尽管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机会成本，但却很早就深谙机会成本的道理。大概只有短视如西方人，眼珠子只看见鼻子底下一点蝇头小利就忘乎所以，才不知道机会成本的道理吧。

想不到同样短视的还有中国经济学家！按斯氏的说法，经济学家区别于普通人的地方恰在于他知道有一个机会成本的存在，但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却在这点上不如我的老家乡下人。

最近，美国与中国经济学家联合，选择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作为调查对象，想“全面调查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对中国经济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最后，由美国的道格拉斯·伍德沃德教授以及中国三位经济学界“顶尖级人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平新乔教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冀生教授等人发表了一份所谓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说，可口可乐自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目前已经给中国创造了41.4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可口可乐系统直接雇用了1.4万员工，可口可乐的独立供应商雇用了35万名中国员工，可口可乐的独立销售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则雇用了5万名中国员工。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注入资金8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间接创造了220亿元人民币的增加值，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300亿(!)人民币的产值。1998年可口可乐生产、经营和销售者直接和间接提供了16亿人民币的利税。此外，林毅夫先生还指出，调查中发现可口可乐通过其在全国21个省份和城市的装瓶厂网络，实现了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向高效、成功合资企业的转型。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和营销经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技术。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经营还带动了玻璃、塑料、铝罐和制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一份多么激动人心的报告啊！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古老乡村法则影响的我却对此疑窦顿生：世界上真有这么好的事吗？跨国公司真的就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得，没有失？在这种“得”的背后有没有“机会成本”？如果有，不指出这种机会成本是什么，有多大，这种调查结果算不算“全面”？会不会对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起一种误导作用？

报告还真是指出了所谓的“失”。清华大学的刘冀生先生先是轻描淡写地指出，可口可乐进人中国市场初期确实使国内的一些碳酸饮料企业陷人困境，甚至倒闭。但是刘先生话锋接着一转：应该看到正面效益大大高于负面效益。中国目前国产饮料品种今天的局面与可口可乐进人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竞争是分不开的。刘先生真是舌如鼓簧，失又成了得！

但真正的“失”呢？尽管说是要全球化了，要开放经济了，为什么各国却在为本国企业进人外国市场、同时为将外国商品阻于自己国门之外而费尽心机？为什么美国福特公司在韩国政府招买汽车过程中竟以一韩元一辆的价格出卖汽车给韩国人？关键都在于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赚回更多的钱。所以，在看到可口可乐公司给中国人带来的“福份”的同时，是不是应该看到中国人失去的更长远的“福份”？比如，据我所知，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占中国饮料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占碳酸饮料市场的三分之一。这些市场份额原来可以是我们的，或更多地是我们的。还有，可口可乐公司给中国创造了产值，它从中国拿回了多少利润？我想，这些跨国公司比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们更清楚，它所有的投人都必须要有回报的。

所以，恕我直言，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们在这份报告中的表现，一点不像个“会计算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家；甚至不如我老家的乡下人，连最简单的法则都不懂。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但我又想，如果真是仅仅没有计算机会成本，仅仅不知道“天上不会白掉下馅饼”倒还没有多大关系，最可怕的是，他们明明知道应该计算，明明也懂得应该计算，而出于别的原因不去计算，因为他们都是大经济学家呀！这就是为什么这份报告一出台，立即有人怀疑有国际资本等更深刻的背景在里面的原因。这个问题更复杂，而现在夜已经很深了，我以后再说吧。

2000年9月18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向前看与向后看

在上次的札记中我已经谈到，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在于，经济学家计算机会成本，而普通人不计算机会成本。其实，他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还有一个；即经济学家不计算沉没成本，而普通人计算沉没成本。

上周末，我陪我妻子逛街，在某个商厦花二百三十元钱买了一件秋衣。因为我生平最头痛的是在商店里挑挑拣拣，加之那件秋衣是我与妻子一眼就看中的，所以，简单地问了问价钱，看了看衣服，连试穿都没有，我就为妻子交了款拿衣服走人。回到家，妻子一试穿，问题来了：夹克秋衣的拉链竟是坏的。妻子认为是我太急才造成的后果，要我一起去退货。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到了商店。谁知售货员怎么也不认账，而且商厦中同一型号与品牌的秋衣也没有货了。最后我找到商厦经理，经协商，商厦同意我们再加一百元钱，给换一件某著名品牌的夹克，那种夹克的原价是四百元。妻子很犹豫，有些舍不得那一百元钱，想找个地方把拉链修修就凑合着行了。我则痛痛快快地说："很划算，一百元买了四百元的衣服，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啊！"最后，在我的极力怂恿下，这笔交易总算完成了。

回到家里，妻子问我，明明那件衣服花了三百三十元钱，怎么我说是一百元钱呢？我与她说：商厦不退货，所以，实际上我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们先花的二百三十元钱就等于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的口袋了，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经济学家是不会把这笔成本计入成本的，所以，在经济学家眼中，后来那件皮衣实际上就只是花了一百元钱，因此他会认为这笔交易很值得。而如果将原来的二百三十元钱也计入成本，那么，可能会因此不进行这笔交易，那么，不仅穿不上这件合意的衣服，而且实际上前面二百三十元钱也白扔了，因为凑合着穿不合意的衣服完全有可能使你的主观满足程度（即效用）变为零甚至是负数。

后来在一次研讨会上，我面对许多非专业人士讲沉没成本时，左大培先生插话说：“不计算沉没成本，体现了经济学家一种向前看的态度。”

这种概括真是很精彩！不计算沉没成本，其实就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是覆水难收了。尤其是过去所受的苦难，我们更不要去计较，不要让它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我们咬咬牙再坚持，一切都会有回报。而如果我们已经把一锅水烧到了九十九度，却因为在乎前面烧了很多的煤还不见水开就停止烧水，我们前面所有的煤才真正是白烧了；而如果我们不去计较过去烧的煤，再坚持往炉子里加几铲，那么，水很快就开了，我们付出的一切才值得。经济学从诞生之日始，就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的传统，也因此，经济学家都习惯于朝前看，而不去朝后看。

后来，我想了想我经历的一些事，发觉不计算沉没成本竟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中国普通百姓也有知道不应该计算“沉没成本”的，尤其是大事上。比如中国人常讲一句成语，叫“功亏一篑”，就是说因为最后一刻没有坚持住，以至于前面所有的付出都化为泡影。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弟弟刚考上大学时，因为学校要求二千多元学费，而当时我也在读大学也需要钱，这二千元钱将我贫穷的父母几乎逼到了绝望的边缘。曾一度，他们也想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将让我弟弟像我哥哥一样辍学，但最后他们还是挺过来了，支撑着我父母的信念竟是：好不容易已经将又一个儿子送到了大学门槛，如果现在不让他去上大学，那么不仅毁了小儿子的前途，而且过去十几年自己所吃的苦也都白吃了。所以，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小儿子去上大学。

最近，因为搞产业研究的高粱先生的推动，学界发起了一场关于“运十”飞机的讨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发展我国航空事业，“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二十一个省二百六十多家科研机构的通力合作，历经艰难险阻，我国于 1978 年完成运十飞机设计。1980 年 9 月 26 日，运十首飞上天。这种飞机客舱按经济舱布置是 178 座，混合级布置 124 座。最大起飞重量 110 吨，最大商载 25 吨，最大巡航速度 974 公里/小时，最大商载航程 3150 公里。性能及诸方面指标均可以与当时欧美先进客机一比高下。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有关方面竟将这个项目下马。最后的结果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的：不仅整个中国民航客机都依赖于国外进口，而且使中国制造大型飞机的技术、人员与企业尽遭灭顶之灾；而飞机制造业作为一个战略产业，又是直接关系一国综合国力。因此，我几次参加研讨会，发现无论是持哪派立场的独立学者，都为此“决策失误”扼腕叹息。

在使运十飞机最终折戟蓝天的诸多因素中，有关部门所搬出的理由中，经济上的考虑仍占第一位，这大概是与政治以及本部门甚至少数人狭隘的利益不便搬上桌而有关。其中有一种理由最能蒙骗人：即运十飞机研制费用已花总计 5.377 亿元人民币（而按当时欧美国家一般标准，运十这样的飞机上天要近 200 亿元人民币），要使之完善并达到定型生产的程度，还要追加资金。这笔资金又要几十亿元。成本太高，还不如直接到国外买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飞机。

我十分怀疑将这种没有任何经济学专业水准的成本计算方法上报到决策部门的人到底是真不懂经济学——他不配搞经济决策咨询,还是出于其他目的——应该给他定罪。我想,如果真懂得经济学上沉没成本概念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正因为我们前期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投入了5亿多元人民币,且已完成了前期预研工作,飞机也上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咬咬牙压缩压缩其他方面开支,再投入点钱,我们就可以真正实现自己生产干线飞机了,中国就可能有自己的类似"波音"、"麦道"、"空客"这样的大型飞机制造厂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挺住,舍不得再加上点投入,不仅已有的成果付之东流,而且先期从百姓的牙缝里省下的5亿多元的投入也等于打了水漂。

但一切都晚了。有人预测,1998－2016年,中国航空公司还要买1677架飞机,价值757.4亿美元,而整个波音公司的市场价值才380亿美元,也就是说,白花花的美元都要流到老外的腰包中去。还有,中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市场,而且也可能失去了使我们的航空产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一次好机会。

但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说,运十飞机的决策失误与我们某些经济决策部门人士有失专业水准不懂得应该计算沉没成本有关,那么,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类型的经济学家,却处处在以"不应计算沉没成本"为由在误导百姓。

其实,凡事都是有底线的。比如,正因为我还出得起一百元钱,我才给我妻子讲什么沉没成本,才完成后面的交易;也正因为我觉得最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出5亿多元钱,现在再出十几亿元几十亿元钱不存在任何问题,我才批评我们某些决策者在运十下马问题上的责任。但有一种情况,一旦追加的成本可能超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过预算约束(比如,我没有那一百元钱;中国倾其所有也没有运十后期投资所需要的十几亿几十亿元钱),那么,再讲什么沉没成本的道理就显得荒唐了。而普通百姓之所以计算沉没成本,往往与他们的"预算"特别少有关:再增一分我就受不了啦!

在改革成本的负担上,我就发现存在精英经济学家与普通百姓的认知上的差距。精英经济学家们时时要老百姓往前看,要把过去分担的改革成本(如下岗分流——即所受的苦——都当作沉没成本,再坚持把改革推进一步,"走过去就是一片蓝天",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在哪里。一旦这个底线被突破,或者老百姓发现"后期成本"还是很大,好日子仍遥遥无期时,那将会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精英经济学家们讲的"沉没成本"理论实际上也就等于真正的是经济学家自说自话的一种无稽之谈了。

但愿不会是这样。

2000年9月20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穷人与富人

不久前，回到乡下老家，与哥哥交谈。我说现在在我生活的城市中，钱越来越不值钱。有的人一顿饭就一掷万金。哥哥感慨地说：现在稻子不值钱，一担谷子就四十来元钱。一万元钱，我们要卖250担谷子才能换到，等于我十几年的收成。城里人一顿饭钱，在我们乡下，可以干多少事情啊。

同样是一万块钱，在城里富人手中，不过是一顿饭钱；而在我乡下哥哥那里，却是个惊人的数目，十几年的收成，可以干非常多的事。如果用经济学术语表达这种现象，可以这样说，同样一块钱，对于一个富裕的城里人和一个贫穷的乡下人，其边际效用是不同的。

经济学上所谓边际，就是增加的1个单位；效用，就是消费某种物品给人带来的主观满足程度。边际效用，就是增加1个单位某种物品的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的增加。1块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亿万富翁，你给多加1块钱，这增加的1块钱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增加的这1个单元的钱，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满足程度的增加；但对于一个沿门托钵的乞丐，你给他1块钱，他会高兴老半天。

假定边际效用可以用数字表达。那么，这一块钱给穷人增加的满足程度如果说是100个单位，而给富人增加的满足程度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也许就只有1个单位。我们再假设一个国家由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组成。今年国家岁人比去年多了1块钱，我们来研究这1块钱应该给谁使得社会总福利增加最多。显然，如果依上面的理论，这多收入的1块钱应该给穷人。因为给了穷人，社会总福利增加了100；而如果给了富人，社会总福利仅增加1。所以，从这个道理出发，社会收入分配应该偏向于穷人而不是富人才行。

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就是从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出发，提出收入均等政策。他认为，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钱从富人手中向穷人手中转移。因为即使是社会总收入未增加，从富人手中拿出1块钱，福利损失是1；而这块钱到了穷人手中，增加的福利是100，两相抵，社会总福利仍增加了99个单位。只有全体社会成员收入相等了，1块钱对于社会全体成员边际效用相等了，这种财富的转移才因为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变得没有意义。

但是，从1块钱对于穷人与富人效用的不同，却也可以得出与上述偏向于穷人结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切都更应该偏向于富人。

假设“人人生面平等”，都追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穷人有追求自己效用增加最多的权利，富人也有追求自己增加的效用最多的权利。因为1块钱给穷人增加100个单位的效用，而只给富人增加1个单位的效用，因此，穷人容易满足，而富人要从增加的收入中得到穷人一样的满足程度，必须收入是穷人的一百倍才行。所以，从“人人平等”的角度出发，给穷人每增加1块钱，就应该给富人增加100元钱。或者说，穷人有努力想通过增加1块钱使自己的效用增加100个单位的权利，而富人同样也有努力想通过增加100元钱使自己的效用增加100个单位的自由。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人们总以为，世界上最吝啬的是富人，且吝啬的方式不同。除了守财奴一种类型外，在古代，富人都自己豢养家丁，守住自己的钱财；而在现代，富人们一方面通过立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都反对国家干预中的再分配手段，来抑制贫富差别。现在看来，富人之所以这样做，也有他自己的逻辑：你穷人要增加 100 个单位的满足程度很容易；而我富人要增加 100 个单位的满足程度却如此难，必须一块一块的累积，多不容易啊。

就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当然十有八九是富裕家庭出身或者是被富人收买了的——认为，庇古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利己的经济人，真要讲平等，应该是满足程度的平等，也就是幸福程度的平等，而不应该是钱财上的平等。因此，富人本身就应该比穷人更多的钱，而且也应该比穷人更在乎钱。

也于是，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和稀泥”的经济学家。他们声称：效用本身就没有可比较性。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幸福与否，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社会没有办法将他们的效用进行排序，也没有办法协调他们之间的不同的利益。

社会分成了穷人与富人看来注定使经济学本身也出现了分化。即使是前提一致，最后的结论也因为有了穷人与富人也完全不同。谁还能说经济学没有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就是富人的经济学。在穷人看来，前者是对的，争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平等；而在富人看来，后者是对的，争的也是富人与穷人的平等。不过两个平等的含义各不相同而已。

能真正看清这种利益相对性以及各利益集团追求本身利益局限性的持中立立场的经济学家却不多。面在这种为数不多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经济学家中，罗宾逊夫人也许算得一个。本世纪三十年代，罗宾逊夫人因为发现了不完全竞争定理而名扬经济学界。但不久后的一天，罗宾逊夫人突然想到，同样是啤酒，其价格上涨后，对于收人很低的穷人来说，消费量的确会明显减少；而对于那些富翁来说，啤酒价格上涨对于他们的消费量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罗宾逊夫人仿佛在一时间大彻大悟：哪里有什么普适性的经济学定律啊？于是，她主动将她的书绝版了。

但可惜罗宾逊夫人这样的经济学家真是越来越少了。包括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精英经济学家们，仍在鼓吹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具有普适性。当然，持这种说法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真糊涂，另一类则是假糊涂，不过有自己所服务的那个集团的私己的利益考量而已。

无论有多少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于穷人与富人没有什么区别，但社会却一日也不可不在穷人与富人之间进行选择；而社会上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同，的确就是一万元钱对于富裕的城里人与我贫穷的乡下哥哥之间的不同。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似乎在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散文，忘了篇名与作者。文章说：黄昏时分，卖烧饼的夫妻数着一天的收人，比昨天又增加了两块钱，夫妻相视一笑，天地格外美好；而也在这个黄昏，另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仅因为所持股票面值下降了三十个百分点而饮弹自杀。其实，仅他留下的不动产折合成钱，也够那对卖烧饼的夫妻吃上几辈子。

唉，穷人与富人，真是一个无尽的话题！

2000 年 11 月 10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广告主要是为富人做的

从乡下来的母亲，一天晚上在看电视时问我："电视上那么多广告，是放给谁看的？村里几十户人家，没有一户买过广告上所说的东西。"当时我就回答："那是给城里人看的。"没有想到旁边的妻子竟然追加了一句："今天晚上电视上的广告，除了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外，那些高档酒、高档名牌衣服、家庭用小轿车等等我看我们及我们邻居也很少能买得起。可见，广告中大部分也不是给一般城里人看的，而是给城里富人看的。"

真的是这样。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 M.P.托达罗在其《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就曾用模型论证过这样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购买力，掌握在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少数人手里；而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其购买能力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其实无足轻重！在这样的境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自然会将市场开拓的重中之重放在少数富人身上。所以，那些广告自然也主要是对着富人，而与我们大多数穷人无关。

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尽管经济学有一般性的消费者理论，但对于这个世界的穷人与富人来说，此理论在各自阶层中的表现未必一样。

首先是一般需求定律。这个定律称：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成反方向变动。也就是说，这种商品价格越高，其需求量就越低；而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高。对于穷人，一分钱都难；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以，商品价格每涨一点，穷人在购买时都会多掂量掂量，只能少买一些；故这个需求定律的确对穷人管用。但富人呢？据说，当年有名的琼·罗宾逊夫人发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当啤酒价格变化时，富人对啤酒的消费量竟然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她认定根本就没有什么普适性经济学规律可言。

岂止是啤酒？其实对于任何生活必需品而言，都是穷人的消费行为在遵守一般需求定律，而这一定律对富人完全不起作用。有一个经济学名词叫“恩格尔系数”，不管经济学定义如何规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用于维持生存的钱——主要是吃饭的钱——占其总收入的比例。比如我一个月挣一百元钱，如果花了九十元用于吃饭了，我的“恩格尔系数”就是0.9。显然，如果一个社会阶层恩格尔系数高，那么这个阶层就越贫困，意味着这个阶层收入中用于维持生存的钱占了绝大部分；反之则相反。而经济学规律又说，当某种（些）商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其价格变化时，需求量变化越大；反之亦相反。这就完全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穷人的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富人，用于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越大，所以，一旦这些消费品价格上涨，穷人只能勒紧腰带过日；除非这些消费品价格下降，穷人才有可能增大需求量。但富人完全不同。因为在他每日挥金如土的过程中，用于柴米油盐的钱所占比重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他们根本可以不计较，更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需求数量。这一穷一富，正应了时下流行的那句话：穷人看着钱买东西；富人看着东西花钱！

穷人买跌不买涨，富人不问跌还是涨，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证明一般需求定律在某些领域对于富人不管用。还有一种现象值得一提。这种现象证明，一般需求定律——即价格与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求量成反方向变动——不仅在富人中不管用，而且还出现了“反需求定律”现象，即富人买涨不买跌：当某种商品价格很高时，富人趋之若鹜；而该商品价格低落时，富人理都不理。我曾到过福建某个以生产服装而闻名的小城市，一个服装厂老板告诉我，当年他那品牌的服装并不好卖，高不成低不就。穷人买不起，富人嫌档次低不愿买。后来他听从了一位海外商人的话，想出了一招，将服装价格突然从原来每套几百元一下子提高到五千多元，没有想到效果奇好：市场一下子打开了。西装还是那种西装，但愿意买的富人多了。原来几百元的西装穿在身上，富人觉得丢人；而现在五千多元一套的西装穿在身上，这些富人觉得很“派”！当然，这种西装，如果说当初几百元一套，某些穷人还有所期待的话，那么，现在则完全不会买了。他们真是买不起。

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另一个定理也很出名，那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因为我的读者未必都学过经济学，所以我还是要解释一下。所谓“边际”，就是“增加了的那部分”；“效用”，就是消费某种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边际效用递减”，就是说，消费者从不断增加的对某种商品的消费中得到的满足程度的增加是不断下降的。比如饥饿的人吃肉饼，吃第一个肉饼他一定会觉得味道好极了；增加吃一个肉饼即吃第二个肉饼时，因为有一个肉饼垫底，所以，吃第二个肉饼给他带来的满足程度肯定不如第一个肉饼；依此类推，吃第三个肉饼，他一定觉得味道不如第二个肉饼。即使是这个据说更有普适性的规律，其实对于穷人与富人来说还是有不同。比如，现在众多媒体整日价鼓噪一个名词“精神消费”，这绝对是有闲阶层或者说富人们的玩意儿，因为刚才说了，对于穷人来说，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于维持生计了。而所谓“精神消费”，恰会出现所谓“边际效用上升”。比如玩名牌，无论是车还是服装，富人们每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增加购买一套(辆),他会直觉他的身价又增加两分,因此,增加的满足程度会上升;更有玩收藏,收藏得越来越齐全,他的满足程度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不断提高。我看过这样一则报道,一位大老板,爱收藏世界各地的微型冲锋枪,当他那年终于收集到某种德国造的微冲时,竟然兴奋得心脏病突发,一命呜呼!看来,这增加了的一支微冲,其增加了的效用竟然比生命还值钱!

穷人与富人的消费行为不同,所以实际上也存在两个市场:一个穷人的市场,一个富人的市场。在穷人这边的市场上,主要是低档消费品与日用品;在富人那边的市场上,主要是高档消费品与耐用品。因为世界的购买力主要在富人手中,所以,占有世界生产份额同样百分之八十的大厂商都将质优价高的商品对着富人;穷人这边,则是小厂商负责供应。小厂商生产的商品附加值低,为了多赚一点钱,顾不了那么多。于是,假货、勾兑酒、毒米霉面都一齐上,受害的多是穷人。因为富人老早就不在小商店与集市上买东西。为了对付这些问题,政府会强制执行某些标准。但标准一高,成本上去了,穷人又消费不起。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中国中西部农村已经成为假冒伪劣商品最大集散地;在有政府部门去打假时,竟有农民出来说:"我们需要假货!我们也只买得起假货!"当然,实际中也可能有一些替代的办法产生。但无论什么样的办法,穷人都是受害者。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曾考察并研究过这样的现象:美国曾经不少嗜酒的穷人因为受劣质威士忌酒毒害而导致双目失明或死亡,于是政府规定了威士忌酒的质量标准。结果如何呢?诺斯写道:

> 高收入的饮酒者并不因为对他们所需要的威士忌酒付出更多的钱而感到特别不满和退却。大概他们在此前就已经十分乐意接受比当时价格更高的标价;与此相反,某些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收入的嗜酒者在此之前，也许正是对可接受质量的威士忌酒支付他们所能承受价格的最高限。价格的突然上升，给他们留下两种选择：要么不喝；要么不得不喝少一些，或者采用违法私酿和用浴缸储存放杜松子酒的形式。由饮用污染的威士忌酒而引起的伤害、疾病与死亡的分布，直接反映出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

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因为穷人太多富人太富，必然会出现消费断档：穷人消费不起，富人所有的消费需求都已经满足。于是，不可避免地，经济将会因消费需求不足而趋向疲软。而在政治上腐败丛生的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都将经济增长作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以及稳定政局的不二法门；如果政治上长期的腐败，再加上经济增长一乏力，危机就不远了。所以，聪明的政府，必须防止这个社会出现穷人太多富人太富的现象发生。我的朋友杨帆先生就写过一篇妙文，他用数字论证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到 1998 年，富人的消费包括黄色消费都已经饱和了，所以，有购买力的富人没有消费的欲望；而同时，我们这个社会的穷人消费水平没有跟上。他也警告政府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抑制这种穷人太多富人太富现象。当然，话题再往下深入，也许我要犯忌了。

2001 年 7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富人比穷人讲信用"?

有一位国内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他研究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资本在雇佣(支配)劳动?而不是劳动在雇佣(支配)资本?如果不怕我将学术标准降低,不怕我曲解了这位经济学家的意思,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按理说,劳动与资本都不过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平等的关系,但为什么世界上总是有资本的富人在支配有劳动的穷人,而不是有劳动的穷人在支配有资本的富人?这位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最后是一句话: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富人总比穷人讲信用。他套用中国一句古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正因为富人有财产,要承担风险,所以他只能更讲信用;而穷人没有财产,不必承担风险,所以没有信用。正因为资本有信用而劳动没有信用,因此是资本在雇佣支配劳动,而不可能是劳动雇佣与支配资本。

所谓"资本雇佣劳动"之谜,且先放一边。仅就"富人比穷人讲信用",我看也未必。我乡下一位远房表叔的女儿今年考上了一所高校,学费加生活费一年要上万余。表叔很穷,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没有办法,在亲属中凑了两三千元外,要外借六七千元钱。外借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找私人借,另一部分是找信用社贷款。找信用社贷款,信用社一定要办手续,一定要公证,不胜其烦,更绝的一招,必须要找一个信用社认为是富人的人做担保。看来,信用社倒真是与那位经济学家的看法一样:"富人比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穷人讲信用。”而找私人借，尽管数目都不大，但对于本来就属于穷人队伍的乡下人来说已是尽了最大努力。在借的过程中，我表叔仅仅只需要口头许诺什么时候还就行了。借款的人也根本不担心我表叔将来不会还钱。我曾问过其中一位：“你也不让他打个借条？他赖账怎么办？”那位老乡很憨厚地说：“都乡里乡亲，讲这话干啥？这不见外了吗？”丝毫不会出现信用问题。

最近我读傅谨先生一本名为《草根的力量》的书。这本书记录的是台州地区民间戏班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章题为《戏班的经济运作》。从该章中可看出，戏班与演出地、戏班内部戏头与演员、戏班与戏贾，他们之间的“交易”都非常有意思。比如关于戏班与演出地，文中就有这样两段有趣的记载：

戏班放戏，向来只是双方口头协议。近些年来，尤其是这三五年，合同文书的运用逐渐普及。虽然仍有相当多的戏班在放戏时只是通过电话或当面口头商谈，根少听说某地以“口说无凭”为由，经口头商谈订好的戏随便反悔，受害方因没有合同就束手无策。

合同文书的运用仍是有前提的。在许多人的心目里，签订合同的言外之意，是对双方的口头协议的有效性有所保留，这也就意味着，似乎只有在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不足以达到能让双方都毫无疑虑的场合，才需要签订书面的合同。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在戏班与地方签订合同时，需要做一番专门的解释，以表示他们之所以要签订这样的合同，是为了一些次要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双方信任感的不足。

从上述两件事看，穷人在其经济运作范围内，也是讲信用的。而且比富人更讲信用。经济学制度学派将“制度”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制度，这里边包括了具体的单个正式合同；一种是非正式制度，其中包括了非正式的口头承诺。显然，当交易双方以具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体的单个正式合同将规则确定下来时,他们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对方只要有可能,就会赖账,即经济学上讲的所谓"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必须以正式文本合同约束;而非正式的口头承诺中,交易双方则基于完全的互信。现实生活正如上述两件事所言的,是穷人多以建立在互信基础之上的非正式口头承诺进行交易;而富人多以建立在互相猜疑基础之上的正式文本合同进行交易。可见,在各自的范围内,穷人比富人更讲信用而不是富人比穷人讲信用。富人之间的猜疑最后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父子与兄弟内部都必须以正式合同确定他们的日常关系,而穷人家庭很少如此。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能说富人比穷人更讲信用?

为了保证交易双方的契约得到实施,制度学派又将保证制度实施的方法分为三种:一种是"各自实施",即契约双方各自约束自己自觉遵守已有过的承诺;第二种方法是"互相实施",即合约双方互相监督,如果一方不遵守已有约定,另外的一方可以实施报复,如退出交易或惩罚违约者;最后一种是"由第三种实施",即在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下,大家把监督合约执行的权利,包括由此而来的施加惩罚的权利都交给第三方。这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由国家以"第三方"身份出面、以暴力机器为后盾、以诸如《合同法》等法律为准绳,来保证合同履约。显然,不同的方法背后隐含的互信程度完全不同。只有当交易双方互信程度很高时,才会选择"各自实施";当交易双方都害怕对方有"机会主义行为"时,为保证合约的履行,就会选择"由第三方实施"。穷人的实施方式基本都是"各自实施",因为合约本来就是非正式口头的,所以也谈不上去进行什么"公证",更不需要由国家强力机器出面,甚至由"双方相互实施"也很少,因为在穷人中间,即便是出现某一方违约情况,另一方也没有办法甚至都很少想到过如何给对方惩罚,而且有些穷人还对对方有一种感同身受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同情：比如他知道对方所欠的稻谷不是对方不想还，的确是还不起。而富人的实施方式基本都是“由第三方实施”，随便一个细节上有分歧就法庭上见。当然也有“双方互相实施”的：那些有恶势力性质的富人之间，常因交易上的问题而相互追杀。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能说富人比穷人更讲信用？

有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说，由“各自实施”的“非正式口头承诺”，相对于由“第三方实施”的“正式文本合同”而言，前者的交易方式很低级，后者才能提高合同履约的公正与效率。这话其实还是对富人说的，因为这里头还是隐含了那个前提：人只要有可能，就会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从交易成本理论上看，恰是基于互信基础之上的各自实施的非正式口头承诺，相对于基于猜疑基础之上的由第三方实施的正式文本合同而言，前者的交易成本低得多。仅说一点，至少前者不需要费笔墨纸张，不需要交公证费与律师费。

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论证未必有用。因为“富人比穷人讲信用”以及“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已成为我们今天的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个行将饿毙的穷人，即便他声称他如何讲信用，也是没有指望能从大银行里得到一分钱的用于活命的贷款的；而一个成天混迹于各家银行，以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毫无信用可言，过着花天酒地的富人，一定是大银行的座上宾。这已经与信用不信用没有关系。

再回到那位经济学家所谓的“资本雇佣劳动”之谜。我后来听张五常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当资本家不得不跟在屁股后面用皮鞭抽打劳动者，否则劳动者就怠工时，不也同时是劳动在支配资本吗？这话其实很不“经济学”，毋宁说张先生在玩文字游戏。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马克思是认真研究过为什么劳动力会成为资本购买的商品，他认为劳动力之所以被资本雇佣，是因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为两个前提条件:"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可以卖又不得不卖,于是,劳动出卖给资本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的这一番原理,只不过被我们某些经济学家给有意忽略了。但作为穷人阶层中的人肯定会想:马克思的解释是有道理的。

资本雇佣劳动,在某些人眼里,是因为富人比穷人讲信用;因为双方是契约关系,所以是平等的交换。围绕这个话题,某些自由主义人士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是有做奴隶的自由。"资本通过契约关系去雇佣劳动,是劳动者自愿去做奴隶,所以,不应该视为恶,恰是自由主义题中之义。

的确,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得到共同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

但是,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说上述话的还是马克思。我敢打赌,这样生动形象的语言出自《资本论》中,是我们那些鼓吹"富人比穷人讲信用"的经济学家未必知道也讲不出来的。

2001年7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出生、私有制以及“教育产业化”

中国有句古话，“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一点没有错。我住筒子楼的时候，有一个邻居，夫妻俩都五十多岁，妻子单位破了产，孩子还没有找到工作，靠丈夫一点退休金度日很艰难，于是妻子就到处捡破烂。一捡破烂，筒子楼里就少有人理他们，甚至谁家掉了东西，也会怀疑是不是他们给拿去了。夫妻俩常吵架，因为是筒子楼，一吵起来大家都听得见。有一次就听妻子埋怨丈夫：“跟了你一辈子，住了一辈子筒子楼，连个热水澡也要找地方洗，这么老了还要捡破烂，看人白眼。别人还有盼头，我这辈子还盼什么？”他那老实的丈夫这时接过了话说：“我们没有盼头，但也算是把一家人带进了城，将来就看子孙后代争不争气。”

由此我产生了历史上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为此疑惑过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总是有穷人与富人之别？为什么这边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却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种贫与富差别如此之悬殊的状况能否得到改变？如果得不到改变，穷人到底有什么盼头？等等。

有一类政治经济学家比如马克思曾批判过的扎·奥斯特、施托尔希、斯杜特·特拉西、约·唐森等等，他们认为穷与富的差别是自然规律。其中的唐森不仅认为穷与富的差别与对立是社会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普遍的自然规律，而且还露骨地嘲笑穷人，批判旨在改进穷人状况的《济贫法》。他写道：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的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

唐森以及类似观点在今天的世界即便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很无耻的，罗素在其《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唐森对穷人的嘲笑——"他们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倒也道出了一个真理：即这个世界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出生时条件的差别：有人出生于豪门大户，注定这辈子享福；有人出生于寒门破户，也许这辈子就受穷。

如果再追问下去，为什么出生不同导致命运在贫穷与富裕上的立判？自然就想到了私有财产制度。历史上也有许多思想家与政治经济学家都将穷与富的差别的根源追溯到了私有制。当年法国第戎科学院曾出过这样一个征文题目：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围绕这个题目，卢梭写了一本书，即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的结论是：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总是有限度的；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子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更不用说，从欧文到马克思再到斯威齐这些左翼政治经济学家，更是将私有财产制度批得体无完肤。

我还发现有两个思想家对私有财产继承权表现出怀疑。一个是罗素，他认为，既然人们在历史上曾经怀疑政治世袭制度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合法性并取消了这一制度，那么我们今天也应该怀疑经济上的私有财产继承权并为取消这一制度而努力；还有一个是哈耶克，他曾写道：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基础必然是私有产权和（或许不是同等必要的）遗产制，从而带有它们造就的不平等。其实，很有理由要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尽量减少到先天差别所许可的限度”。我特别注意到他括号中那句话。这似乎可以说明，哈耶克对于私有财产继承权也持消极的态度。

以私有财产及其继承制度为基础的资本统治导致了社会上穷与富的差别，但由于这种统治此前打破了封建的政治世袭制，从而与封建世袭制将穷人与富人固定在不同的网格中，永世不得改变其地位相比较而言，资本统治始终会给社会上的穷人一种期望：谁都可以有机会成为富人！即使是现在不行，但通过几代的财富积累下来，总能改变处境的。所以，我那位邻居丈夫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没有盼头，但也算是把一家人带进了城，将来就看子孙后代争不争气。”

以舒尔兹为代表的现代发展经济学在解释人群为什么有穷人与富人的差别时，引进了“人力资源投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是因为他们的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收人不同；而要素禀赋不同，又在于他们之间在后天的人力资源投资上的不同。有的人出生于富裕家庭，后天能够享受到很好的教育，人力资源投资水平高，要素禀赋就高；而有的人出生于贫穷家庭，后天能够享受到的受教育条件差，人力资源投资水平低，要素禀赋就低。因此，在工作以后，回报也就不同，收人差别也就越来越大。从这种观点出发，现代经济学在微观经济政策中自然就有了这样一条：为了平抑这种因为人力资源投资水平差异导致的贫富过分悬殊，由国家投资，让穷孩子享受公立学校提供的免费教育。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应该说,这一主张迄今在经济学界并没有多少异议。有人会说,新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旨在促进公平的政府政策,但其实具体到教育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如此。的确,新自由主义者是反对诸如让越富的人按越高的税率交税的"累进的所得税"制度、以及对社会低收入者以过分的社会保障等手段来促进公平,认为这些手段有悖于效率,使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富人吃亏,而养成了穷人依靠于政府保障的惰性,但教育却是例外。因为教育不仅没有使富人吃亏,使穷人懒惰,反而在使穷人因为素质提高而富裕一些的同时,也为富人尤其是资本家提供了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也同意,提供公立教育是惟一一种既不妨碍效率又有利于公平的手段。

在这里,我想着重说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这些年来,经济学界不少人喜欢拿弗里德曼说事。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很会曲解弗氏的观点。有时甚至将自己的观点放到弗氏身上。这样竟培养了我的一种"考证癖"——总想搞清楚弗氏到底是不是这样说了。有一种观点,在国内一些主张"教育产业化"的经济学家那里很流行,即弗里德曼批判了公立教育是浪费资源。后来我查《弗里德曼文选》,不错,弗里德曼的确按自己的"惯例"批评了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政府为贫民提供免费教育是惟一可行的抑制分配差距继续拉大的手段。为了解决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与政府又必须为贫民提供免费教育之间的矛盾,弗氏发明了一种以教育券取代公立学校的方法。其基本设想是:政府不再出面办公立学校,并将已有的公立学校私有化,同时,为了防止穷人孩子上不起私立学校,政府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由各个家庭自己选择学校。诺斯对弗氏的这种思想评价很高。他说:"这一想法为那些将贫民区学校看作是一种问题的改革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向父母们提供了除了由公立学校制度所提供的劣等教育之外的选择方案。”“信奉自由市场的人们感觉到这便是答案，因为它为教育世界提供了类似于经济世界中市场制度的一种自由选择制度。”在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甚嚣尘上之时，教育券制度曾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阿乐姆洛克小区做过试点，但最后由于各方面的阻力，这一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最完备的想法”不了了之。公立学校目前仍然是西方社会中试图解决由于先天差别不同导致的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途径。

大家未必都清楚弗里德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弗氏是个非常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而且与前面所说的唐森一样，对待穷人似乎有刻骨的仇恨。他总认为福利制度使穷人变懒了，穷人收入低就是因为他们懒。为此他设计了一套“负所得税”计划，以迫使穷人变勤快提高收入。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在这个社会平均收入以下，政府要根据你收入距离平均线的远近收负所得税。收入越低，负所得税越高！穷人本来就够穷的，指望政府能够施加援手，不想这家伙竟然落井下石，要政府对越穷的人扣越多的负所得税。但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人物，还能赞成对穷人进行教育补贴，可见免费教育对于穷人的重要程度。

而今天在我国社会中一些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鼓吹“教育产业化”，其核心内容就一个：交钱上学！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启动教育消费，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考虑我们国家的穷孩子如何上得起学。而如果穷人家的穷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他们也曾经有过的赶上富裕家庭的愿望将被完全相反的事实取代。更可怕是还不在于这些经济学家这样鼓吹，而在于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也竟然信以为真了，并打算这样做。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说：“银行可以对穷孩子发放助学贷款！”而实际上，这一方面使本来应该完全是效率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取向的银行不得不承担政府赋予的社会负担而无法做到彻底商业化;另一方面即使是穷孩子可以借款,也意味着出大学门的那天起,穷孩子已经背上了数万元的债务,又与富孩子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这样的政策再不改弦更张,中国社会中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势必越拉越大,像我那位住筒子楼的邻居一样的穷人,怕是连对后代的指望也没有了。

2001 年 7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选　　择

一个多月前，我的朋友单庆老家一位乡长到北京，朋友请父母官的客，一定要我去作陪。不得已，我去了。一见面，那位高姓乡长大声大气地说："啊，你就是卢周来啊。单庆说你是搞经济的，还给我看了你那篇乡下姑姑来信。你也太厉害了吧。把我们乡村干部全都给否了。"我只有边向他点头哈腰，边解释说："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

席间，这位高乡长再次向我发感慨："小卢啊，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乡村干部可不容易啊。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对，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还有些事情，是村民们不晓理。"因为对于"不对"与"没有办法"的事我了解得比较多，所以我随口接了一句："你说说村民们有什么不晓理的事吧。"

高姓乡长还真说了一件事，情况与央视《焦点访谈》某次播出的节目很类似。皖河边上有一片滩头地，分散在各农户手中。这几年因为年年都有或大或小的洪水，滩头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收成。因此，农民也没有太在意这片地，有的农户例行性的春天播下种子，到秋天能收多少收多少，往往收下的粮食只够喂喂鸡；有的农户干脆撂荒了。后来，乡里将地全部收回，统一承包给外地过来的一个养河蟹的，并对农户进行了每亩地一百元的补偿。当时农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种多少年也收不回一百元。但仅过了三年，河滩地出效益了，外地人开始赚钱了，农民们却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红了眼，要求将已改造成池子的地收回。乡干部劝农民们说你们没有养蟹的技术，收回来也没用，农民们则说宁肯地荒掉也不能便宜了外地人。否则，要告到上面去。而承包者死活不同意，说合同期未满，如果乡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他要告到《焦点访谈》。乡里正为此事愁得不行。

其实，高乡长面临的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中还真研究过。这种两难选择可以抽象为这样一个选择过程：假设有一个方案，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是否通过。现在投票人是一百个人。此方案通过以后，对一百个人中的九十九个人来说，每个人可以增加一美元的收入；而对于一百个人中的一个人来说，方案如果通过，则会造成其二百美元的损失。因为民主的原则是多数原则，所以，此方案一定会因为有九十九个人投赞成票而被通过。

但是，对于知识界人士，问题就来了：此方案通过后，给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了一美元的收入，社会总收入增加了九十九美元；而此方案通过后，因为给一个人损失了二百美元的损失，所以社会总收入因此损失了二百美元。两相抵，方案通过后，给这个社会不仅没有增加总收入，反倒使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一百零一美元！而如果政府出于增加社会总收入的考虑，无视民主的原则，否决了此方案，那么，损失是九十九美元，增加二百美元，两相抵，社会总收入可增加一百零一美元。

因此，社会其实在此面临着一个选择是：你是遵守民主原则，还是追求效率原则？如果遵守民主原则，那么就以损失效率为代价；如果追求效率原则，那么就破坏了民主的原则。

高乡长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他照顾人数众多的农户的要求（民主的原则），那么，尽管农户可能因此受点小益，但承包人的损失更大；而如果他顶住农民们的要求，满足了承包人的愿望，那么，他显然又没有尊重民意。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家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见，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本身没有立场，只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从效率的角度，这个方案不应该被通过；一些同样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学者甚至在这里看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矛盾。他们说，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民主有时候会造成多数人（九十九个人）对少数人（一个人）的压迫，所以，民主也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当民主妨碍了自由的时候，民主应该为自由让路”，因此，这个方案也不应该被通过。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个例子说的还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民主的“一人一票”原则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所以，这种两难选择其实是无解的；或者说，通过民主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协调社会效用，要想有解，只有出现一个独裁的政府，能强行安排效用的优先秩序。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如果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一美元后增加的总体满足程度（即效用）超过二百美元给一个人增加的满足程度，那么，这个方案应该被通过，因为尽管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但用效用衡量的社会总福利还是增加了。

想到这些，我与高乡长说：“你可是真要为难了。你碰到的难题，也是我们经济学家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难题。”但高乡长显然不满意我的话，要我解释解释，我就按上面的思路给他解释了一通。显然，他听得云里雾里，有些不耐烦，最后对我说：“我就想要你自己的意见，不要管什么这个那个经济学家。”

这下轮到我为难了。因为我想，无论是收回还是不收回那片河滩地，其结果乡干部肯定考虑过，而且考虑得比我多，他们都不敢贸然决定，我一个刚了解了一些皮毛的局外人凭什么可以做选择？

好在我的朋友单庆关键时刻插话补充了一个情况，他说他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回家时了解过这个情况。其实乡亲们说只要每年再给他们补点钱，可以不要求收回地。但高乡长随即说到，当时说好了一次性补偿，而且签了合同，再找承包人要钱，于法不通。

我不得不再详细地了解了合同情况。综合高乡长所说，还有以下事实：对农户一次性补偿每亩一百元是乡里与农户口头协商后经农户同意决定的；是乡里出的钱。而承包人只是与乡政府签了合同，每年按利润多少给乡里提成。乡里当然也不会乱用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补了财政上的空缺。

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我心中有数了。从经济学上看，要满足农户与承包者双方的利益，只有一个"角解"——逼出来的惟一的办法——乡里从承包人上交的利润提成拿出一部分再补偿农户！我这么一说，高乡长不言不语了，喝了几口闷酒。我知道，这个办法他未必会采用，因为这涉及到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但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今天，单庆给我打电话，说高乡长解决了关于滩头地的问题。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继续由承包人承包，但承包人再给农户补偿点钱。据说承包人先不同意，说是法庭上见。高乡长劝他就别上法庭了，法庭也是讲民意，而且现在最讲民主了，肯定会听多数农民的意见；然后，高乡长与他算了一笔账：假设一百个人，方案不通过，其中九十九个每人损失一元钱，而另一个人因此赚两百元钱。如果按民主的原则，方案肯定要被通过，但那一个人吃亏大了；不按民主的原则，又不符合中央的精神。那么，惟一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我上面所谓的经济学上的"角解"）就是，与这九十九个人讲清楚，方案不要通过，那个因此得利两百元钱的人拿出其中九十九元，分给九十九个人每人一元，这样，九十九个人就不再坚持通过方案，而那个拿出小钱的人仍可以赚一百零一元，仍是吃小亏沾大便宜。这样，又民主了，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有效率了。高乡长这样一算账，承包人还真服了。高乡长因此让单庆告诉我，他想出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想出的好法子。但毕竟是我启发了他，下次到北京，他请我喝酒。

看来，应该是我请高乡长喝酒。他的办法的确比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高明，而且对我将来研究某些问题一定会有启迪。

2000 年 11 月 11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一位思想者的离去

我自己是搞经济学的，但我如何也接受不了像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将人所有的行为都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模式去进行一番分析，尤其是我们曾经视之为神圣与崇高的爱——包括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以及恋人之间的爱——在他眼中都成了一番精心算计后的利己的选择。他自己说：“经济学家的乐趣在于，在他眼里，没有解释不了的问题。”而我却觉得，这种经济学家自己活得太清醒，太无聊，同时还因他的理论所起的一种所谓“脱魅”作用，使得别人也少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承不承认这个世界除了利益关系以外还有其他更基础性的东西，竟成了我个人评价其他经济学家时的好恶之一。例如，汪丁丁先生曾经在我眼中也是个主张“一切都是利益关系”的学者。加之他写的东西过于哲学化，而不像经济学文章，所以，我曾经不太看他的书。但有一次无意间在书摊上翻到一本他的随笔《永远的徘徊》，在前言中，他充满了对他的妻子“小李”的誉美之辞，然后说：“如果理性不能解释，惟一能够解释她的奉献的是一种近乎神圣的爱情。爱情不能分析，爱的基本属性是盲目性。”看到此，我竟感动起来：看来，在汪先生那里，经济关系竟是有底线的，在经济关系之上，还有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一种更值得敬畏的东西在冥冥之中主宰着我们的命运。

除了爱不需要用成本—收益去进行分析之外，我还以为，理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想主义者的许多行为，也很难以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因为理想主义者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不在此所，主宰他的行为的也就很难说是世俗的收益，而往往是一种向善的理想。

这篇日记性文字，我就想记下一位理想主义者——宋晓绿女士。

知道宋晓绿女士出事，是九月六日上午韩德强兄用电子邮件通知我的。邮件中说，“宋晓绿女士不幸于我们谈话当晚得了脑溢血。为使她的见闻能使更多人所知，我将那天晚上宋的谈话作了一个回忆整理，现发给各位，希望大家补充纠正，以便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材料。”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操起电话找韩德强。不知什么缘故，我竟连拨错了三次电话号码。第三次，电话那端是一个恶女人的声音：“你神经啊！也不看清楚电话号码。”这反倒使我冷静下来，强压下心中的波澜，终于与韩兄冷静地交换了一下意见。但电话甫一放下，我的泪竟流了下来。

怎么可能呢？就在九月五日下午，我们还在一起讨论改革，讨论俄罗斯呢。我此前只是从杨帆间或转来的电子邮件以及电话中听过宋大姐的名字，知道她是一个老省委书记的女儿，知道她对转轨时期的俄罗斯很有研究；这天下午，我们大约从三点钟就开始我们例行的“思想沙龙”，我们说得正起劲时，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士推门进来，因为桌子周围已坐满了人，所以，她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我不太识衣记人的，只记得她当时上衣是鲜红下面是黑色的裙子，很庄重的样子。当时我们谈得十分热闹，因为她的进来，大家也就稍微懈了一下劲注意了她一下。她立即说：“不要因为我来了就打断你们。”一直等到我们都轮番发言完了，杨帆才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了这位此前大家都未谋过面的宋晓绿大姐，并让我们听她介绍介绍俄罗斯情况。

我记得两个细节性的东西是：当杨帆介绍说：“当时我们宋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大姐就是公社党委书记。”宋大姐当场纠正:“不是,我是大队支部书记。”另一个细节是,杨帆介绍宋大姐的时候,我与韩德强在私底下就一篇文章交换意见,杨帆说:“你们要听啊,有问题等一下再讨论。”宋大姐当时冲我们似乎是歉意地一笑,说“不要紧”。

宋大姐一开始介绍,我就感觉到她太激动。她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好久没有听到有人议论你们这样的话题了。”

杨帆事后说,她的素质非常之高,她的学问底子是《资本论》,而且在上大学之前就读过黑格尔的《小逻辑》。她是一个有哲学思想的,有信仰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思想家。她的头脑一直是高度紧张的,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思想追求,这可能也是她早晚要爆发脑出血的原因。我们的思想讨论会,她是第一次参加,她在长春生活,在商界生活,没有我们北京思想界的氛围,但她绝对是一个思想型的人,长期的思想探索,理想的破灭,思想的苦闷,使得她的思想压力日重。这次终于突然发病,则与“或许她已经不习惯思想讨论会这种类型的思想紧张和兴奋,或许她因为见到知音而激动,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讨论会引起了她思想深处的共鸣”直接相关。

然后她入了正题,依旧是十分激动:“一般地到俄罗斯呆一段时间,是不会清楚俄罗斯今日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有像我一样连续地在俄罗斯呆好几年,现在又每年很多次地去那里,才清楚它的真面目。现在国内一些媒体说俄罗斯已走出低谷,一些经济学家不允许别人说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我不想从宏观方面讲,我就从我接触到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讲。”

她的发言,谈到俄罗斯的惨状:黑手党控制经济,政治性暗杀不断,几个将军做后台操纵黑社会火并,金融寡头开会都在美国;人民倒退回自然经济,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饭碗;少女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跑遍全世界卖淫……在她的描绘中，这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尊严、人民丧失羞耻感的国家。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发言中叙述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在俄罗斯，出于生计，竟出现了丈夫争相送妻子、父母争相送女儿去学习脱衣舞的场面；另一件事是，一个著名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因为长期艰苦努力争来的一点政府补贴竟被银行截留而拔枪自杀。

每个人都清楚，宋大姐在关心俄罗斯人民的命运，但更关心的是中国人的命运。她这次应邀从吉林过来，就是因为我们与她说，在中国面临多种走向的情况下，想让她以自己的经历写一本关于俄罗斯问题的书，纳入我们的反危机丛书，于是，她竟不顾长期在200以上的高血压赶了过来。她说，她要尽一切力，使中国不至于走上俄罗斯的道路，不至于重现俄罗斯人民的悲剧。

不巧的是，当天有一位朋友约好晚上见面，所以我提前告别了大家，也告别了宋大姐。杨帆后来的回忆是这样的："她在参加完会议后到我家，说今天晚上还要继续谈，张口问我：'你们所说的超越左右翼是……'，脑还在想，口还在动，但说话竟不连贯。不久即陷入昏迷。""不能够止血，头部被迫开刀，预后不良，最好的情况是偏瘫和失语，如果醒不过来即成植物人。无论如何，她的头脑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不能够再和她讨论俄罗斯问题了。"

就这样，作为思想者宋晓绿就可能永远的走了。但也仅仅这一个下午的接触，与会者都强烈地感受到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善良的人，与那些只会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学者高下立判。因为她有悲天悯人的心怀，在她的眼里，不仅有经济规律和历史必然性，但更有普通老百姓，她关心他们每一个人的疾苦，从来不把他们看成改革理所当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牺牲品，从来也不认为“经济法则”、“历史规律”、“改革成本”、“转轨代价”等可以成为牺牲任何一个普通百姓利益的借口。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是不能够以简单的成本—收益的俗模型目之的，否则，是对宋大姐的亵渎。除非你从另外的“利益”上讲：几十年来家国，数千里地河山！中国在宋大姐那里就等同于家，中国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因而也就是我的父母兄妹的生存境况。因此，她才不惜以重病之躯，血荐轩辕。

其实，世俗的经济学不仅不能解释宋大姐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无法计算出作为思想者的宋大姐的离去给她的家庭、给她的祖国以及她的志同道合者带来的损失，更解决不了宋大姐因理想终于暴病的问题。因此，我，在此与其他所有与会者一起，都像杨帆一样祈祷：如果苍天有眼，就不应放弃宋晓绿这样的会思想同时又是善良的人！

2000年9月7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我为什么没有捐款

与父亲闲聊。一年多了，他还一直为我没有给家乡建小学校捐点钱，从而失去了在老家人面前“露脸”的机会而生我的气。事情是这样的，老家所在的村去年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村里的小学校因年久失修已成危房，所以，准备重新盖一所学校。而盖学校的钱上面根本就不给。无奈之下，只好向村民集资。全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每人交六十元钱，共三千来号人，可集资十八万，而建好一所学校需要花钱约二十五万，所以，还有近七万元的缺口要补上，只好向家乡在外地工作的人求助。而我非常不幸曾被某些报刊冠以了“经济学者”甚至“经济学家”之类的称呼，更不幸这些“荣誉”又被我从前受够了苦现在多少有些以儿子为荣的父亲——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知道我在北京吃“国家粮”——遍示乡邻。可能村吏们以为“经济学者(家)”都是很有钱的人，于是自然将我视为求助的主要对象。信上就说，捐了多少多少数目的钱，可以把名字刻在新学校建成后立的碑上。

我最后竟没有捐一分钱！为此，我的家乡的父母官们自然对我很不满意，乡邻们自然对我也不满意，感到没有为他争面子的老父亲自然对我更不满意了。

说心里话，我现在也为我自己的固执而觉得不安。因为那所小学校就是我当年的母校。我就是从那里开始接受教育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我的小学校老师一直对我很好，我也一直很感谢他们，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还在这所小学里面。况且我自觉我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自己穷尽管是一个理由，但出几百元钱也还是可以的。我却坚持没有捐，因此我想讲一下我的理由。

第一条理由：这笔钱不应该由好心人出，而应该由政府出。

经济学上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认为，市场的确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在有些领域却未必管用，就是产生所谓“失灵”现象。必须由政府的作用来消除这种“市场失灵”。

首先是公共产品领域。公共产品因其是大家都可以有免费消费的可能性——如街道边的街灯，不管是谁出钱安装的，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灯的照明；同时还因为公共产品往往是投资大而产生效益周期长的项目，所以，私人部门往往没有投资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与财力，所以，公共产品一般由国家提供，而不能由私人直接提供。也就是说，只能由国家出而，以税收的形式筹措到财政，然后以财政拨款的形式向大家提供公共产品。教育就是与国防一样最典型的公共产品之一。即使是在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美英等国，即使是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之后，公立学校仍是这些国家向公民提供教育的主要途径。特别是，小学教育因为在各国都是义务教育，办小学的钱更应该由国家掏。

其次是分配的公平。因为市场本身天然具有“嫌贫爱富”的倾向——这最明显的表现在资本市场上。富人、效益好的企业，银行主动上门找他们放贷，因为银行本身就是靠吃存贷款利息差活命，而这些富人与效益好的企业才还得起钱；而越穷的人、效益越不好的企业，上门求银行银行也未必借钱给他们，因为怕对方还不起钱自己也断了活路——所以，由市场支配的分配结果只能是越来越不平等。而个人之间在市场分配上的不平等，经济学又认为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素质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素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质不同，又主要在于人与人之间在工作前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或者用时尚的说法，是人力资源投资上的不同。所以，要抑制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的办法，就是由政府出面办公立学校，使穷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富人孩子一样的教育。

如果有行家看了我以上的文字，可能会说我只是作了很片面的陈述，即只讲了一派的观点，面没有讲另一派的观点。的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认为，公共产品也可以由私人提供，并且反对政府任何旨在促进分配公平的手段。但是，具体到教育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如此。比如，新自由主义者是反对诸如让越富的人按越高的税率交税的“累进的所得税”制度、以及对社会低收人者以过分的社会保障等手段来促进公平，认为这些手段有悖于效率，使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富人吃亏，而养成了穷人依靠于政府保障的惰性，但教育却是例外。因为教育不仅没有使富人吃亏，使穷人懒惰，反而在使穷人因为素质提高而富裕一些的同时，也为富人尤其是资本家提供了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教育是惟一一种既不妨碍效率又有利于公平的手段。也因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一方面按自己的“惯例”批评了公立学校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政府为贫民办公立学校提供免费教育是惟一可行的抑制分配差距继续拉大的手段。

所以，无论如何，我家乡建小学校的钱，应该是由政府掏，而不应该由老百姓掏。老百姓已经向政府交纳了税收，政府也应该为老百姓办免费教育。如果政府以穷为理由不出这个钱，并强行向老百姓摊派小学义务教育中建学校的费用，等于在税收以外向老百姓进行了盘剥。政府应该为此承担失职的责任。

第二条理由：腐败使我更不愿意出这笔钱。

早在七年前即 1993 年我基本停止了对教育的捐款。此前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我都会从微薄的收入拿点钱出来，捐给“希望工程”，心中本来还有一点神圣感，但一日也是很凑巧，上午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消息说希望工程实施以来筹措到社会各界捐款共一亿零几千万元，而下午却在地摊上看到一本名为《中国廉政风暴》的书，说某官员贪污公款几个亿。学经济学的总有一个本能，即进行数字上的比较，一比较使我拍案而起：几年的希望工程，像我一样的好心人从牙缝中抠出的钱，凑起来竟比不上一个官员几年的贪污。我当即写了一篇《希望工程可以休矣》，后来发表在陕西的《教师报》上。我说如果我们的官员少贪污一点，哪里还需要什么希望工程？所以，在将此篇稿子的几十元稿费最后捐出来了后，我再也没有主动为教育捐过款。

现在看来，当年某官员贪污几个亿已经又是小巫了。一个案子几百个亿已经屡见不鲜；而十几年的希望工程从好心人那里掏出的钱加起来仍不过十几个亿。有时，我见一些官员为希望工程题字、表态，心中会涌起一股十分反感的情绪。

其实，中国还真不是没有钱。除了一些钱被某些官员贪污挥霍掉以外，还有更多的钱“交了学费”。现在看类似这样的经济报道已经都麻木了：某地花几十个亿或上百个亿建起的某厂，投产之日就是破产之时。其原因如何如何。

所以，与其让好心人从牙缝中抠出一点钱办教育，不如从掌控着财政大权的官员指缝间漏出一点钱办教育。后者是前者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多。

以上两条理由，使我在犹豫了许久后，最终还是没有为我的家乡建小学校捐一分钱。

稍稍说开一些去。这两年，不少经济学家鼓吹教育改革。其核心内容就一个：交钱上学！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启动教育消费，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没有真正考虑我们国家的穷孩子如何上得起学。而如果贫穷家庭落后地区的穷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他们也曾经有过的赶上富裕家庭富裕地区的愿望将被完全相反的事实取代。更可怕的是还不在于这些经济学家这样鼓吹，而在于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也竟然信以为真了，并打算这样做。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说："银行可以对穷孩子发放助学贷款！"而实际上，这一方面使本来应该完全是效率取向的银行不得不承担政府赋予的社会负担而无法做到彻底商业化；另一方面即使是穷孩子可以借款，也意味着出大学门的那天起，穷孩子已经背上了数万元的债务，又与富孩子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我曾经在一些文章中讲了这个道理，但我们这种人，绝对是人微言轻。顶不住那些著名且身居高位可以影响甚至制订决策的经济学家们在体制内给官员与政府部门"吹风"，而且他们老拿人家"发达国家如何如何"作比较。我倒想反问一下：不也是你们，老说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吗？中国不是还没有发达吗？况且，人家美国公立大学百分之七十的费用是由国家承担，你有什么资格拿人家美国说事？

我该打住了。我很希望我这篇文章能发表。因为我后来也意识到，我说的这一切，不是我的老家的村级小吏可以左右得了的，更与我曾经就读过的母校无关，但我却因此最后没有给我家乡的小学校捐一分钱，所以，我非常想给我的父老乡亲一个交代，也借此消弭我内心深处的不安。

2000年11月2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有一位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也是我的好朋友。最近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按他本人的想法，这个世界上钱财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忠诚。但现实世界中太多的欺诈与利用，使他感觉很累，很没有意思，甚至起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他之所以与我来谈心，是因为有一次我在某个场合引用经济学家贝克尔一句话与他说：因为没有经济学家想不通的事，所以，经济学家大都在生活中比较随遇而安，不像哲学家那么累。

其实，我自己也并不是真什么都能想通。相反，家事、国事、天下事，揪心、烦心、担心的事很多，这大概是因为我根本不是个纯粹的经济学家的缘故。但是，有一点我倒可以想得通。从经济学角度看，的确这个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

我给他讲了这样一个寓言式的故事：

假设有一群人，生活在君子国中。他们彼此非常信任，关系非常好，所以，这个国家没有法律，没有国王，没有仲裁人们行为的任何中间机构，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这里指广义上的交易，指任何相互性的行为）都建立在自己绝对信守自己作出的承诺的基础之上。这在制度经济学上叫做“制度的自我实施”。显然，要保证“制度的自我实施”，必须要求这群人的每个人都有很高的道德，或者说，要求他们每个人能自律。但很不幸，有一次，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这群人中的一个发现，他用次品交换别人的产品时，别人因为信任他而不知道换来的是次品，所以，他因此占了便宜。但时间长了，他的行迹败露了，却没有办法处罚他。相反，许多人发现类似他这样的行为竟然可以赚到大钱，而且谁先使坏谁比别人更先发财。于是，大家纷纷效仿这位以次充好的小人的行为，君子国因此逐渐被瓦解了。这说明，这个世界想依靠每个人自律，是靠不住的。因为你无法保证不出现一个小人。而只要有一个小人出现，完美的世界也就不完美了。当然，在我国一些极偏远的小乡村，人们之间仍靠"自我实施"进行彼此间的交易，但想象得到，只要被商品的大潮漫过，人们之间的互信很容易因贪婪而被猜忌与疏远所取代，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以来遍地发生过的事。

君子国的人们发现靠自律不行，想出了一个办法：一报还一报。或者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谁不遵守承诺，对方可以惩罚他！比如，如果在一次交易中，你骗了我，那么，我在下一次交易中可以骗你；或者，你如果骗了我，我干脆动粗，给你肉体上的惩罚。这在制度经济学上叫"制度的相互实施"，即相互保证对方信守承诺。但要真保证能"相互实施"，又要有一个前提条件：两个人之间的交易要反复进行下去，这样才能保证一旦两个人中的一个违约，另一个有机会惩罚他。而偏偏现实生活中又不可能：很多交易是一次性的。我刚在小胡同中买了一袋米，回来发现掺了沙子，可我再回到胡同中，已经找不到那个卖米的了。保证制度相互实施还有一个前提：即可以相互实施惩罚。如果即使找到了那个卖米的，卖米的硬不退货，而且还长得比你强壮，反倒对你动粗，你也毫无办法。所以，要保证用相互牵制的办法履约仍不理想。当然，现代社会也仍有靠相互实施的办法保证履约的情况。如黑社会性质的团体，除了靠哥们义气有一些人自律外，更多的是靠团体内部对违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反团体规矩人的惩罚。

君子国里的人发现靠交易中的双方相互牵制仍不行，于是想到了成立一个机构 A，让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进入机构，专门处理违约的事。交易双方将交易行为写成文字让这个机构进行“公证”，交易中如果出现违约，一方可以将另一方告到此机构，由这个拥有暴力机器的机构找到违约方，进行仲裁，然后按正式的法律进行惩罚。这在制度经济学上叫做“制度的第三方实施”，即交易双方将保证履约的权利交与一个中间机构。人们本以为这下子可以了。但没有料到，这个机构 A 也经常发生徇私枉法的事：明明是这个对，那个错，但因为那个在私底下贿赂了机构中的人，却被裁定为那个对，这个错；而因为这个机构 A 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人们也无可奈何，于是，一个叫布坎南的经济学家说，别相信那些机构中的人道德水平就一定永远高。有时，“上帝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

君子国的人们又想出一招：再成立一个能监督机构 A 的机构 B！这样，机构 A 倒是老实了许多，但问题又来了，机构 B 却因为权力至高无上而同样会作出徇私枉法的事。不得已，君子国的人们又决定再成立一个能监督机构 B 的机构 C；再让机构 C 置于机构 A 的监督之下，于是，政治史上出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三权分立”。

但问题仍然存在。于是，人们再想到民主，以“一人一票”与“多数原则”作为民主的根本原则。人们以为问题都解决了。但偶然的一次，投票再次使他们从完美世界的梦幻中醒来。

事情是这样的，由人们民主选举出的七人委员会在三个方案中投票，按得票多少的原则选出其中得票最多的一个付诸实施。我们姑且假定这三个方案分别是甲、乙、丙。按照委员对其选民负责的原则，第一个委员最喜欢甲方案，其次是乙方案，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不喜欢的是丙方案;第二个委员最喜欢的是乙方案,其次是甲方案,最不喜欢的是丙方案;第三个委员与第一个委员喜好顺序一样;第四个委员的喜好顺序与第二个委员一样。这样也就是说,有四个委员最不喜欢丙方案。后三个委员则都最喜欢丙方案。现在对三个方案投票。结果必须是:甲方案得两票,即第一个与第三个委员对甲方案投了赞成票;乙方案得两票,即第二个与第四个委员对乙方案投了赞成票;丙方案得三票,因为后三个委员都最喜欢丙方案。按照民主的原则,七人委员会决定,通过丙方案!而人们却发现,得票最多通过的丙方案恰恰是七个人中的四个人最不喜欢的方案,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方案,在民主的原则下竟然可以被通过!可见,民主的原则原来也有不完美之处。

我讲这个故事,总结起来就是说,无论是靠个人的自律,还是靠两人的互律,或者还是靠第三方的强制,都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不出现互欺的行为;因此,过去的小国寡民式社会,今日的民主式社会,都不完美。所以,我们大可以对这个不完美的社会保持平常心;但同时,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又要有这样的想法:人类也是在与不完美作斗争的过程中使世界趋向于好。比如,民主最有缺陷,也比独裁好。因此,在保持平常心的同时我们也要与不完美斗争,这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承担起社会思想与文化批判的功能的原因之所在。而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又必须区别于经济学家乐观主义传统,不妨悲观一些好;惟其悲观,才能保证对这个不完美世界中不完善现象的警惕与敏感。

这位青年学者很认真地听了我的话。其实我心里知道,我在说服他,也在说服自己。

2000 年 12 月 11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文明与贫困

作为重读国外经济学名著计划的一部分，这半个多月，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缪尔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上。今天终于读完了。

主流经济学家们乐观主义的情绪据说来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边沁将人视为永远追求快乐的机器，由此奠定了主流经济学家们进步史观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也主宰了以研究与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几位先驱人物，鲍尔根本就不相信“贫困与停滞的恶性循环理论”，而认为发展中国家充满了经济的“快速进步”；刘易斯认为，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计划，发展中国家将很快摆脱贫困；罗斯托、辛格等人则建立了一整套的数学模型，来论证只要条件具备，发展中国家经济将会“起飞”；即使是自称经济学界的“持不同意见者”的赫希曼，也认为通过“不平衡”发展战略，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最终将成为过去。

但冈纳·缪尔达尔是个例外。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的开头，他就认为，以往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趋于成为‘外交辞令’，有节制，并且通常过于乐观”；而经济学家本不应该盲目地陷入“乐观主义的陷阱”，因为“乐观主义同悲观主义一样，只意味着一种偏见的观点”。作为学者，他本人既不愿意作波特小说中遇事过分乐观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波利安娜，也不作希腊神话中的悲观女神卡桑德拉，也应该成为“现实主义，哪怕他因此与自己职业内流行的观点相冲突”。

缪尔达尔的确是这样做的。与其他经济学家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相比，写作《世界贫困的挑战》时的他，无论是研究的依据与研究的方法都更具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他的研究全部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为了研究南亚的贫困问题，他在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呆了几年时间并直接作为联合国人员参与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尽管在数量经济学上他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同时代经济学家——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因为“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还因为“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但他对发展中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资料持怀疑的态度，并且公开宣称他不会把他的研究置于这些经验数据上。因此，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贫困阶层的民众，从他们那里获取第一手的丰富的现实，这使得他的研究比罗斯托、刘易斯等人更多地在书斋中把官方统计作为经验数据再导出所谓的“发展模型”这种经院式研究来得更接近真相。其次，正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事实性的把握，缪尔达尔选择了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缪尔达尔认为，“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总量概念就业和失业、储蓄、投资及产业，以市场和相当有效的市场为先决条件的需求、供给及价格——进行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能得出合理的推论”，“但在不发达国家就不能用这个方法，除非是以让分析离题和严重错误为代价”。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或不完全竞争”。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原因，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必须引入制度研究的方法。体现在他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缪尔达尔分析贫困的根源更多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地涉及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建构、宗教文化传统、人口及种族、教育等问题，他还开辟专章谈贪污腐败如何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也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状况。

但从现实主义出发的缪尔达尔的结论仍是乐观的。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他也相信，通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通过现代化价值观的传播，通过发展中国家彻底的政治变革以及人民自身的努力，贫困问题可以得到克服。正因此，他充满激情地给《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安了副标题——"世界反贫困大纲"，并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消除贫困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当然，他结论的乐观主义与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相比，前者是以事实与学理为依据的乐观，而后者在缪尔达尔看来是一种先人为主的乐观。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是 1969 年完成的。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十五年后的 1984 年，当世界银行将缪尔达尔视作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邀请他对自己早期思想进行回顾与评价时，缪尔达尔竟对他早期思想进行了反思。在一篇名为《国际不平等和外国援助的回顾》一文中，缪尔达尔对过去十五年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感到失望，认为这些国家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提供的数据差得多。他说，人民的穷困"现在几乎到处都在加剧，而且走向极端"。他追溯这种情况的根源认为，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掌握实际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这些国家贪污贿赂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再加之这些国家本身人口激增，有的还陷入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战争冲突，更使得发展的努力只使少数把持着工业部门的富人受益，而民众却是"日益扩大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贫困”。正是基于此，缪尔达尔对他在《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所提倡的一个主要观点——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给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项目提供各项资金及技术上的支持的所谓“发展援助”，其成果也无一例外的落入了富人的腰包，反倒不如直接给这些国家陷入贫困与灾难的下层民众的“救济援助”效果好。又因为过去十五年间的发展援助消费了许多发达国家纳税人的钱，而缪尔达尔认为这与他在《世界反贫困大纲》中不遗余力的鼓吹有关，缪尔达尔甚至在文章的开头就说，这篇文章“是对自己良心上日益加剧的痛苦进行清算”。就这样，号称基于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者的缪尔达尔，竟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且这种悲观很彻底，以至于他的同伴赫拉·怀特都认为，“缪尔达尔的看法过分悲观了”。

说“过分悲观”，仍不至于是绝望。距缪尔达尔发表《回顾》一文又十五年过去了，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要是这位毕生以追求全人类幸福与公平为己任的学者还活在今天，他心存的一丝侥幸——他仍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下决心改革国内政治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仍具备可能性——也会彻底被残酷的真相所泯灭：据联合国 1998 年一份报告透露，今天世界上最富的三个人，其财富与世界上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相当；而世界各国原本致力于维护公平所建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安全网”，却彻底地将更多的真正处于绝对贫困的百姓置于网外。世界贫困人口多了，而不是少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这就是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大纲》发表整三十年后的世界现实！

其实，乐观也罢，绝望也好，毕竟是经济学家们基于感性的感性或至多基于理性的感性的一种情绪，而要将贫困问题置于形而上层次或者说理性的理性来看待，还是历史学家来得深刻。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指出，人类的每一巨大进步在极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少数人而不是有利于最终承担了文明进步费用的多数人，因而，历史在前进，多数人依旧贫困的局面依旧不变。马歇尔·萨林斯则说得更白：贫困并不一定是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们并不穷。贫困既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如此说来，贫困是文明世界的发明。

由此，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比冈纳·缪尔达尔更平静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除非连同文明一起消灭，否则，我们将永远消灭不了贫困。

或许，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

1998 年 10 月 4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以贫困为耻

今天，我的一位经济学界友人曾到粤北山区考察，回来后感慨不已：想不到号称即将赶上“四小龙”的广东，也有如此贫困的地区！那种贫困用“赤贫”描述一点也不为过。看来，即使是中国率先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也不是没有贫困。

因此，有关贫困的话题，尽管前面的札记中已涉及过，但我仍想再说几句。

据官方的说法，中国已经基本进入小康社会，我想，这应该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与大多数家庭已经进入相对富裕的生活状态才能下这样的判断。官方还宣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原来的八千万农村处于温饱线以下的人口已经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这两个说法如果都是真的，那么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然而，事实上，中国贫困问题其实远没有到根本解决了的地步。即使还是按官方的说法，也是如此。比如，原来所说的用七年时间，使八千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实际上，七年过去了，八千万中仍有二千六百多万未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一部分原来脱贫的人口又返贫，城市中也出现了近千万贫困人口，主要是一些离退休老职工与下岗职工。

有贫困就扶贫。说到中国的扶贫，大约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国家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所以，扶贫的起始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阶段,往往是给那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民以直接的物质上的帮助。如每到过年过节,政府都会给每家发上一袋大米,一床棉被或几件棉衣,我因为出生在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小时候就曾享受过这种待遇。后来,政府见这根本就不是解决贫困的办法,提出所谓"开发性扶贫"的思路。即不再直接给贫民们发什么东西了,而是将扶贫经费统一起来集中使用,在贫困地区开发一些项目,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才是从根本上治贫。

但问题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几年前,我到译林出版社的朋友李瑞华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家是在大别山深处,全国有名的贫穷地区,就了解了有关情况。政府确定当地的扶贫项目是在荒山上种植板栗树,想靠当地个大香甜的板栗使农民脱贫。农民也以为有盼头了,结果,扶贫款被一级一级克扣,到了乡一级,已没有多少钱。乡里用这点钱建起一个板栗树苗场,由乡里某个头头的小舅子经营,规定农民每买一棵树苗要交五毛钱。农民们很气愤,说还不如当年将扶贫款直接分给我们,我们至少还可以做点用,沾点国家的光。

像扶贫款最后落入少数人的腰包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贫困地区屡见不鲜。媒体披露的就有许多起。比如,央视焦点访谈就曾报道过一个典型的案例:两百万元扶贫款,养不起一头猪。说国家为扶贫,确定用扶贫款在西北某地建一个大型的养猪场。结果。几年中共投入近两百万资金,但至今还只有几间很低矮的猪棚,且快塌了,至于猪,几年也未养一头!

其实,即使是在认真地将扶贫款用于了扶贫项目的地区,效果也不理想。因为无论穷人怎么穷,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多么强烈,但你没有钱;而对那些率先富起来了的那部分人来说,消费需求基本饱和,所以,市场是进入了商品过剩时代。你穷地方,生产的东西本来就成本高,质量差,规模小,更没有办法与现代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工业竞争，所以，扶贫项目基本上是建一个失败一个，建一个亏损一个。穷地方不仅没有脱贫，反倒又背了新债。

在这种情势下，政府被迫再次调整扶贫政策。一方面，中央政府几次下文要求扶贫款专款专用，封闭运行，直接让老百姓受益；另一方面，中央也要求政府在扶贫项目选择上尽量选择那些适应贫困地区实际情况，投资小，以农户为基础能组织生产的项目。

即便如此，贫穷仍像幽灵般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荡。

国际范围内的扶贫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被称为“经济学家良心”的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一开始对南亚的贫困十分关注，并写出了《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他还用其对贫困的切身感受到欧洲各国游说，让各国对南亚诸国进行“发展援助”，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开发式扶贫。但十年后，因为他看到“发展援助”的经费因南亚各国的腐败也少有真正用于发展，即使是建了项目最后的成果也几尽全落入少数富人的腰包里，他感到绝望，并向他自己国家的公民道歉：因为是由于他的游说，使纳税人从口袋中掏出不少钱，结果却没有产生任何效益。

克服贫困如此之难，原因到底在哪里？

看过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一书，我倒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加尔布雷斯所谓的“丰裕社会”。这还不仅仅因为我们承认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步入了小康，而且中国也已进入了由商家以广告及各种媒体来创造需求的时代，这就是加氏笔下的“丰裕社会”的特征。所以，中国社会的贫困也就是“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尤其是沿海普遍富裕起来了的地区，其中的少数贫困更是“富饶中的贫困”。而按加氏的说法，丰裕社会中的贫困，与贫困社会中的贫困根本不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同。贫困社会中的贫困，是极难以克服的现象；因为大家都贫困，所以，加氏说，“贫困的社会必须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规则”；而丰裕社会中的贫困，根本不应该再成为问题，因为即使是这部分贫困人口完全不工作，社会也可以用干脆供养起来的办法使之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且丰裕社会中的人能够而且应该“采取直截了当的救治措施来为贫穷的人们提供需要”。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丰裕社会中的“少数人极端贫困”始终是一个顽症。其原因就在于，丰裕社会中，少数人的贫困“不再成为政治家感到兴趣的对象了”，因为，“在政治上符合最底层阶级的利益虽在过去受到富有阶层的谴责，但可以获得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的好处的补偿”，而当“贫困者成为少数人后”，“为了极贫者说话的任何政治家，是代表一小撮不清楚的少数人说话的。结果，现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不再和这个社会为贫困所折磨的成员站在一起”。

针对这种现象，加氏在书的结束时说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话：政治家总认为贫困不是什么羞耻的事，而认为贫困只是一个很烦人的事。如果政治家转而认为贫困不是很烦人的事，而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时，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就能真正消除。

加氏也许是对的。如果中国的所有的官员与所有已经富裕起来的百姓，将中国仍旧存在的几千万贫困人口这一现象不是仅仅看做一件令他们烦心的事，而是将其视为中国的大耻辱，也就是说，以贫困为羞耻，那么，中国的贫困才可能真正有一天被克服，中国也有真正进入全面的小康社会的一天。

2000年10月19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贫困的理由:三种经济学的解释

有两件事促使我今天写下如下文字。

一件事是,我从一则材料上看到,据联合组教科文组织一项统计:为保证发展中国家妇女正常的生育,需要投入 120 亿美元,而欧洲和美国的妇女每年花在购买香水上的钱为 120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入 90 亿美元的资金才能确保正常用水,而美国妇女每年在美容上的花费就高达 80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解决温饱问题需要 130 亿美元,而欧洲和美国每年为饲养宠物就要用掉 170 亿美元;花 10 亿美元便可将全球疟疾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一半,世界上已有 110 万人因此病而死亡,而 1999 年全世界为购买伟哥花掉了 10 亿美元。从 1975 到 1997 年,总共发明出了 1223 种减肥和抑制食欲的药品;而同期,只有 13 种治疗疟疾、血吸虫病和其他导致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热带病的新药问世。尽管此前我已有关于世界贫富鸿沟的数据,但不及这次看到的数据更让人触目惊心。我在想,有没有人用同样的内容来展现一下中国的贫富鸿沟?

另一件事,有一位老先生在看过我的《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后说,最近他的一次思考差点动摇了他长久以来的人道信念:他突然想到,穷人之所以穷,应该是有缘由的;而且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贫穷与富裕的差距,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

关于贫穷与富裕的差别是社会发展"动力说",因为老先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是一位人文学者，他未必知道这一话题已经在经济思想史上被争论了无数遍。我也无法在一篇短文内将此线索再理一次。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涉及到这个话题，而且我已经说了，人类只要不改文明的思路，贫穷的存在将永远维持下去。当然，我现在更不愿意反驳此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被动地锁定在以少部分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为代价的轨道上，而要提出一个能使人类改变此境况的社会方案不是我的能力所及，按大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忠告：倘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努力想找寻某些改革方法而找不到的话，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没有资格说现在的结构应该改变。

我却可以说说穷人为什么穷的经济学解释。除了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剥削说”外，经济思想史上最流行的解释还有三种：

一种解释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这种说法流行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资本统治展开之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不舍昼夜地在血泪工厂中干活，所以，配合此，一个流行的做法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传统农民懒惰的斥责。对此，我在《我很“懒”，但我很快乐》一文中有论述。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在我们许多学者中间，此说法仍然很有市场，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说法在欧美等国彻底没有市场。罗素在其《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将工人阶级的穷归咎为他们懒惰，连资本家自己都觉得这种理论可耻。

第二种解释可称之为“环境决定论”。因为今天的穷人大都生活在南方国家，而且据一些“人类学者”考察，北方国家的穷人如美国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也都根源于南方国家，所以，一些经济学家与一些地理学家一起，炮制了“环境决定论”。他们说，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把赤道南北两三千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加尔布雷思)。热带地区炎热的气候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缺陷:一是炎热的天气使人工作与思考效率低,所以,热带地区的人没有温带地区人的智慧与技术;其次是炎热的气候产生出许多热带流行病,而温带地区每年的冰冻期可以将病菌冻死,所以,热带地区人的体质不如温带;再次,热带地区的降雨非常没有规律,导致要么是洪水泛滥,要么是沙漠连绵,天然条件也不如温带。正是地理环境作用的结果,北方国家成了智慧、美德、技术最集中的地方,富人自然都在北方;而南方却成了智力低下、肮脏、愚昧的穷人的集散地。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十九世纪初欧美非常流行。有意思的是,其时也正好对应资本统治从欧美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扩张,欧美拼命在南方国家开拓殖民地,进行奴隶交易。这种说法背后的种族歧视的味道今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也因此,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由于人们对于将人群划分为若干等级的做法的反感,地理环境决定论终于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使地理学跟着倒了霉。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美国哈佛、密歇根、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都因此取消了地理系,而且在做出取消决定时几乎未遭到任何反对。经济学家也不敢再散播此言论。面同样有趣的是,在中国,不久前还有人撰文认为,是内陆文明使得中国人活该受穷,所以,中国人要明智,就要去投奔“海洋文明”云云。

在“懒惰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破产之后,经济学界又开始了其他解释。其中,最有名的也许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头雁”——弗兰克·奈特。他曾是包括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的老师。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面且他着重指出,“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布坎南在其名著《公正比赛的规则:契约论者对分配正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评论》一文中，对奈特的论述又做了扩展。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除了取决于奈特所讲的三点之外，加上一个“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布坎南也认为，尽管“努力”而来的权利是最符合“公正”的价值，但在四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他仍然会穷。这也正应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往往是最穷的人在干最重最肮脏最苦的活，但他还是穷。

所以，那位老先生的话也许是对的：穷人之所以穷，的确是有缘由。但这种缘由却不是自身的原因。尤其不能归结为穷人的懒惰或愚昧。倒是有一点值得提醒，如果中国学者以及经济学家们将穷人的穷还归结为自身的理由，那么只要看看当年欧美流行这些看法是什么阶段上，中国相对于欧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们心中也就有数了。

正因为出身在决定一个人是穷还是富中占有太重要的位置，而这又最不符合“公正”与“正义”的价值，西方不少经济与人文学者都主张取消财产继承权，认为财产继承权其实与中世纪政治上的贵族世袭制一样罪恶。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没有取消财产继承权，但却对遗产征收很高的累进的遗产税，不能不说是正朝此方向的一个努力。

还需要说说的是，无论奈特还是布坎南，应该说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们至少没有对穷人的歧视，很难能可贵。更难能可贵的是，奈特由此怀疑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公平性。在他举出的四点怀疑理由中，第三点就是：“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转引自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第 25 页）。而布坎南也认为，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带着“出身”进入市场比赛，“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似乎就被破坏了”。因此，他以“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作比，认为公平的权利分配应该先于市场竞争。因为在“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中，人们在安排比赛秩序时，“就是将那些年纪较大、体格较强的孩子有意识在距离或时间上要比年纪较小体格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后一些。”

不知道今日的中国“新自由经济学家”们有没有这种见识与度量。

2002 年 3 月 12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蛋糕的比喻

下午到对面的“利客隆”连锁店买些日常用品，穿过小胡同时，一个老年乞丐跪在地上哀号。这样的冬天，他穿得如此破烂，在冷风中嗖嗖发抖。我又动了恻隐之心，跑到边上的小店，买了十个肉饼，塞到他手中，不忍再见他，扭头走了。进了商店，买好东西，往外面走，在货架之间被一正在挑货的大汉挡住了路。那大汉旁若无人，一手挑挑拣拣，一手拿着手机大声说话。我一看，他正在挑“猫食”；一听，他正不耐烦地对手机中的对方说：“我买他三十袋。意大利进口的，也就五十多元钱一袋。啊？不多。反正放在车后面。以后你也不要老出来买了。”我心中暗暗一算。三十袋，一千五百元钱。正好我一个月工资。

回来时，又路过小胡同。远远地看见那老乞丐正在狼吞虎咽般吃着肉饼。我飞也般跑过他，出了胡同。想到刚才花一千五百元钱买猫食的人，又想起经济学上讲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我记得几年前，我给一些学生进行经济学的扫盲时，常这样开头：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研究三大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其中，现代经济学着重研究前面两个问题，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因为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效率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的。至于为谁生产，实质是个分配问题，也就是公平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为了形象地说明我的意思，我常给学生这样比喻。譬如一块蛋糕，就那么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将眼光放在如何划分蛋糕上，那么，即使是蛋糕分得再均匀，每个人也还是吃不饱肚子；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将蛋糕做大，那么，只要蛋糕做大了，即使是分得不太均匀，也可以至少保证每个人填饱肚子。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观点：效率第一，兼顾公平。

我这样开始我的课一直有两年。每次讲完后，从学生们信服与满意的眼光与议论，我更觉得我讲得很在理，所以，也越发讲得理直气壮。并将这些东西写成了稿子拿去发表。

1998年夏天，我到某南方小城一朋友家。这是个以煤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当时煤矿非常不景气，下岗职工很多。我的朋友与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当地一个生产猪饲料的企业经常遭窃，但每次失窃数量不大。有一天，民警设伏，抓到了一个偷猪饲料的团伙，一审，都是煤矿的下岗工人，问为什么偷，这些人竟说偷回家当饭吃。民警不信，到其中一个家中去看，揭开锅，还剩了一小半锅的猪饲料；民警问，猪饲料人怎么能吃？一个人答：不吃我们吃什么呢？能吃，也很好吃，我们都长得白白胖胖，只是身体越来越没有力气，可能是里面含有激素的原因。在场的民警都流眼泪了。

这件事，我当时无法查证，但却使我感到震惊。我不是没有经历过贫困，且五岁时因为家中没有吃，曾用筐子装着树上刚成熟的毛桃沿门叫“卖”，但不是卖钱，面是换点米或者换碗饭吃。其实就是乞讨。所以，贫困本身不会令我吃惊的。使我吃惊的是，在经济增长数字一个劲地上蹿、“蛋糕越来越大”的今天，竟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开始怀疑自己原来关于蛋糕做大的逻辑了。我这样在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想，蛋糕做大后要保证每个人能从做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才行。如果蛋糕做大了，可是做大的部分被少数人分了，大多数人仍旧分不上，那么，还是有人填不饱肚子。这样的效率有什么用呢？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十分注意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外的西方其他激进的左翼学者的观点。

读了一些书后，我直觉上有两点：其一，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反对的都不是贫困，也就是说，并不认为蛋糕小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反对的是不平等；当然这里有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使得蛋糕已经够大的原因。马克思曾引用魏特林一个比喻，大意是说，如果大家都住茅草房，每个人都能心平气和；而如果即使是一些住茅草房的人住上了瓦房，但另一些原来也住茅草房的人却住上了高楼大厦，那么，这个社会也会因为人们心理上的失衡而变得不和谐；马克思本人也才一方面赞美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内将蛋糕增大的程度比以往人类全部历史使蛋糕增大的程度都要大，另一方面却成为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最伟大的批判者与消解者。其二，这些左翼学者还不仅仅是说蛋糕做大后一般意义上分配的不均等，因为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那还是可以忍受的。最让这些左翼学者反对的，恰是将蛋糕做大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分配蛋糕增量的范围之外。因此，被弗里德曼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都这样说，如果这个社会上干着最重最脏活的人所得却最少，那么，共产主义的一切困难与这种极度的不平等相比较，都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沙子。穆勒的矛盾几可印证另一个观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终都会走向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情。

再回到蛋糕问题上。也就是使我的思想发生转变的那一年，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因为研究贫困问题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件事在经济学界引来了许多争议。之所以引发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议，是因为这些年来，经济学诺奖几乎都是给了持效率取向的新自由主义派别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是奖给了主张将蛋糕做大的经济学家。但森却不是。森研究了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饥荒，包括印度曾发生过的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认为导致饥荒的原因并不是粮食不足，而恰在于因为分配的原因使得粮食没有到饥饿的人手中。也就是说，蛋糕其实已经够大了，只不过被少数人把持着不分给穷人而已。所以，森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主张用民主的办法来克服伴随着财富积累的贫困。

世界银行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今天的世界，不在于蛋糕不够大，而在于蛋糕划分中的极度不平均。那份报告说，今天世界上最富的三个人，其财富与世界上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相当；最富的四百四十七个富翁，其财富与最穷的三十亿人口的财富相当。也才因此，这样的现象就见怪不怪了：这一个电视台放着非洲秃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行将饿毙骨瘦如柴的孩子；而那一家电视台正放着美国人为如何科学有效地减肥而发愁。

今年七月份的一天，应《战略与管理》编辑部几位朋友之约去座谈。其间，余世存兄问我，为什么会成为新左派？我答我不承认自己是什么新左派，但是我同情并倾向于新左派的立场。我再次讲到了我在南方城市中听到的故事。而且我在讲那个听来的故事前，我又与每一次一样自己先激动起来。就在那次约会三天后，我到杨帆先生家中，与一帮经济学者交谈，我再次把这个故事讲给在座的学者朋友们听。左大培先生立即说："这个故事有多个版本。我在东北也听说过。这次葫芦岛一个矿山的工人之所以上了街，有人对我说，导火索是因为警察打了因饥饿偷猪饲料当饭吃的下岗工人。"至此，我才怀疑我当初听来的故事的真实性。但尽管这个故事当年不一定在南方小城实实在在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发生过，我的思想却更沉重了。我在想，如果中国许多城市都有类似版本的故事，这至少反映出，在我们这个国度中，也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极度不平等的事情了。

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还有许多人在用我当年的关于分蛋糕与做大蛋糕的比喻宣讲他们的道理，甚至还有人将国家制订的抑制收入差距拉大的政策定位为“平均主义与计划经济全面回潮”，更有据说早已家财过亿的某著名经济学家兼政府高官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大批特批平均主义。这不能不令我痛心，也使得我对经济学界本身越来越抱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篇文字写作很艰难，因而也写得断断续续。期间，我高中时代一位很要好的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当年你的一篇演讲曾经让我热血沸腾，你说，中国是一辆在泥泞中跋涉的大车，拉车的人吃力，车上的人嫌慢。那么，车上的人为什么不能下来，也使把力，使中国更快地向前去。而现在的情况是，车上的人下来后，使了力，车子本身也轻了，所以跑得很快，眼看着快步入现代化，但当年从车上下来使劲的人，却被车子抛下了，只得在泥泞中用双脚跋涉，并眼睁睁看着车子上带着一些并没有使力的人绝尘而去。你说，这公平吗？

我无言以对……

2000 年 10 月 12 – 16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到底应该招聘谁

在读书间隙打开电视机，正好是某电视台做的一期对话节目，名为“穷孩子上大学”。内容讲的是江西农业大学一张姓特困生，家里极为困难，妈妈有病，妹妹也在上大学，所以在大学里连基本生活费都很困难，但他不等不靠不要，而是先在一家书店打工，以其创造性工作成为该书店业务主管，一个月工资拿到五百多元；后因为看见校里特困生太多，萌生了帮助他们的念头，于是自己辞去业务主管工作，办起了该校勤工俭学服务中心，自己当总经理，招聘一帮穷孩子一起干，帮助他们解决在校生活困难问题。

应该说，张姓学生非常值得我们社会舆论的支持。尤其是他任总经理以后，所赚的利润大家均分，自己的收入由原来当业务主管时五百多元一降而为二百多元，但他无怨无悔。这样的行为在这样的年代委实难得。

但我还是从主持人与张姓学生的对话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引起我敏感的对话就发生在张姓学生招聘穷孩子这个环节。主持人问，服务中心创办的时候，是不是报名的人很多？张说有五百多人。主持人问，那有没有开后门的？张回答说：有，有些老乡与同学介绍来的。接着自己补充说：“因为我是总经理，所以，我做事要公平，要坚持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肯定要招那些能干的，不然我这个公司没有办法搞下去，总有一天要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垮台的。”

主持人对张的回答十分满意。但我这时就在想：这个勤工俭学中心招聘员工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如果是招能干的，那绝对不是那些从穷山沟里出来的最艰难困苦的学生，因为他们的能力总是相对较差。

这是可以得到理论的支持的。经济学上所谓“人力资源投资”认为，人力资源投资多少与一个人能力以及社会报酬成正比，因此，尽管不排除出现一些特例，但还是可以毫不含糊地得出这样一个一般结论：相对较为富裕、在开放环境中接受教育的孩子，其能力（注意：是能力而不是应试知识）一定强于相对较为贫困、在封闭环境中接受教育的孩子。

我自己的有限阅历也支持上述结论。当年我身边的同学中也有许多穷孩子，他们的能力尤其是适应现代化环境的能力在刚进城时是非常差的。其中有一个同学，刚上大学时随身带了三十元钱，交叉背着两个小黄帆布书包，里面就放着两条短裤及一套供换洗的夏衣。因为在老家时从来没有摸过电话，所以不知道电话怎么打。有一次有人叫他接一个电话，他竟然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办，分不清听筒与话筒，被值班的老妇人给嘲笑了一通。结果，电话没有听成，从此还患上了“电话恐惧症”：拿起电话就成了聋子与哑巴，听不到也说不清。还有一个穷同学对我说过有这样一段经历：不知道怎么坐电梯。有一次到一位老师家里去，老师家住十几层楼，硬是爬了上去。下楼时，那位老师把送他到电梯门口，他害怕极了，怕进了电梯后不知道怎么出来。好在那位多礼的老师坚持要把他送到楼下。他于是才有了一个学习控制电梯的机会。

穷孩子不仅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很差，而且心理素质也很成问题。不少穷孩子进大学后往往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能力差，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就显得自卑怯懦内向;而越是自卑怯懦内向,在能力学习方面越落伍于能力强的;于是相比较而言,能力更显差;能力更显差,心理上与穷俱来的缺陷进一步突出;心理上与穷俱来的缺陷进一步突出,与能力强的同学相对距离又进一步拉大。

所以,以一般常识,张姓学生要以能力作为招聘的标准,尽管招进来的也是穷学生(因为他说必须由学生处出具特困生证明),但绝对不是那些穷到能力在同学中很差,穷到心理素质很差,最后只能默默一人向隅而泣的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孩子。而如果我的推理成立,那么这个勤工俭学服务中心想帮助穷孩子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到我们想象的程度。

但这绝对不能将责任推到张姓学生的身上。因为张姓学生始终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尽管以能力作为选择员工的标准,并没有关照到那些最穷最需要帮助的学生,但如果真的选择最穷的孩子进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可能会因为这些穷孩子能力差而办不下去,更谈不上盈利,谈不上盈利,也就自然没有办法帮助那些穷学生;因此,最后只能是在学生处出具特困生的学生中,挑选能力最强者,而这能力最强者,毕竟也是需要帮助的特困生。也算是双方而基本兼顾到了,他本人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那么,最穷的孩子怎么办?还是只能由社会救济即学校无偿发放的助学金来帮助。

将张姓学生招聘员工的案例放大,就又回到我此前一系列札记中谈到的一个老话题: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如果张姓学生纯粹以盈利为目的、按效率原则去组建一个公司,那么更是很少能照顾到需要帮助但能力差的穷孩子;而如果张姓学生纯粹按公平原则去组建一个勤工俭学服务中心,那么他的中心可能会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孩子,但却会因为没有效率而无法坚持下去。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我们的社会也面临这样的选择：光讲公平，显然不行，蛋糕没有办法做大；只讲效率，更不行，那一定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从经济政策层面上看，兼顾的做法也只能而且必须将这个社会分成三种人分别对待：对待能力强者，任其发展，且必须收税；对有一定能力的困难者，社会帮助与个人自助相结合；对待暂时能力较弱的困难者，必须由国家出面保障起来，面且这种保障绝不应该仅仅维持他们的生存，国家还要组织对这些人的免费教育，提高他们的技能，以最终帮助这些人摆脱困难的境地。

但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即社会的强势集团中某些成员，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就以追求效率为由面漠视下层百姓的苦难；替他们说话的经济学家还搬出种种理由为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其中较有典型的一种理由就是：社会上的不平等是必然的，因为个人能力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你如果想人为地抑制这种不平等，那就是逆规律而动。

对于这样的调子我绝不敢苟同。且不去追究中国当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平等产生的历史根源——这本身又是一个大话题，仅就社会上的不平等是由人的能力不平等所造成这一观点而言，也未必成立。我记得英国学者约翰·布雷在其名作《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很辩证的话：社会的不平等，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智力和体力的不平等，恰相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否定了这种能力的不平等。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承认人与人之间智力与体力上不平等，我们就应该对社会中智力与体力相对较差的弱势阶层以帮助，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我们这个社会今天之所以不平等，就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即否定）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还有智力与体力上的不平等，因而否定这个社会中有智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力与体力上较差因而需要帮助的弱者，而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竞技场上“一视同仁”的“运动员”。

写这篇文字，我绝没有半点责备那位张姓学生的意思，更没有半点责备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意思。相反，我愿意再次说，张姓学生的行为的确非常难得；而在我们的诸多媒体以争相报道明星大款们的花边新闻为能事的时代，支持张姓学生的行为也是非常难得。

2001 年 8 月 2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从鲸鱼的命运说到所谓产权

我很少看电视剧，但一些有关自然、环境以及历史的专题片偶尔会看看。今天看《动物世界》，专门讲鲸鱼。尤其讲到了这种昔日的海洋霸主正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正面临灭绝的境地，这引起了我的思考。

其实地球上每天都有若干物种因为人类活动的扩张在消亡，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不是奇怪的事情。按照产权理论解释，因为任何人都对地球上的物种没有确定的所有权，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靠猎杀这些动物获取私人收益，而且谁猎杀得最多，谁的收益就最大，所以，导致各种动物种类因滥杀而趋于灭亡。这很像科斯所言的“公地的悲剧”：正因为是公地，谁都可以在上面放牧，因此，最后这块公地一定会因过度放牧而退化。如果要再打一个通俗的比喻：没有产权的东西对于有着追求私利最大化本能的经济人的诱惑，就像一袋无主的金子放在大路上，每个人都可以拿。

鲸鱼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历史上过度的捕捞，到了上个世纪初叶，这种曾遍布海洋各处的庞然大物中许多种类已经灭绝，剩下的种类也处在灭绝的威胁之中。在此情势下，1948 年成立了一个组织，即国际捕鲸委员会(IWC)，试图通过管理国际间捕鲸活动，来挽救鲸鱼的命运。

但这一委员会作用并没有人们当初想象的大。有资料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计，在 IWC 成立之初，海洋中的蓝鲸存量大约有上百万头，座头鲸有约 30 万头，但到现在全世界的蓝鲸数量不过 3000 头左右；座头鲸数量不过 5000 头左右。这对不少经济学圈外人来说，倒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其实，这也毫不奇怪。从经济学上分析，IWC 自成立之初就已经注定了会失败。首先，为了限制过度捕捞，IWC 采取的是一种在成员国之间进行配额的做法，即对每个成员国每年的捕鲸数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实际上，配额制订后，谁最先突破配额，谁就最先有利可图。而这种泛国际组织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对成员国遵守配额进行强制。因此最后每个成员国都会选择突破配额。这种作法颇有点像我们现在一些电视生产厂家为避免恶性价格大战搞的价格联盟。尽管最底限价制订好了，但最终也没有一个厂家会真正去遵守。其次，加入 IWC 的成员国数量也很有限，世界上还有许多未加入这个组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如果加入该组织的国家都遵守配额，那么，与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比较，从捕鲸中获利一定会少得多；不仅如此，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正好因为 IWC 成员国对自己捕鲸数量的约束而可以捕捞到更多的鲸，因此而更加放纵自己的捕捞行为。如果用前面的比喻就是：路上一袋无主的金子，所有看见的人都可以拿；其中一些人组织起来规定每个人不能拿得太多，未料这正中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人的下怀，后者正好多拿一些发更大财。两方面的因素结合，鲸鱼仍然不会因为 IWC 组织的成立而能侥幸逃脱最后灭绝的命运。

看来，只要产权不清楚，管制尤其是没有强制力的管制，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

接下来想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位学生问我的。他说看过某位大经济学家关于生态经济学的书，书中有一个讨论题：为什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濒临灭绝的总是野生动物，而家养动物如猫、狗、牛却不存在灭绝问题？我很清楚这位大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什么。即因为野生的动物没有产权，而家养动物有明确的产权。这里也不妨打一个比方：小时候，我们村里的人常常将小河沟拦起一段，将其中的水抽干，然后将其中的所有的鱼虾都抓回家，这就是“涸泽而渔”，但从来没有人会将自己家养的鱼连鱼苗一起捞起来，因为他必须考虑鱼的生存繁衍，使自己不断获取这种排他性的私人收益。

正因为产权明确对于野生动物的种群存续非常重要，因此，美国不少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的经济学家提出过这样的方案：拯救珍稀动物的惟一方法是建立私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并且规定只有富裕的猎手们付出很高的费用才有可能在保护区内旅行消遣。这样，保护区的私有者即便是出于长期维持很高的收益，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使区内的动物种群维护繁荣的局面。

这种方法的要旨是很清楚的，即通过私有化的方法，将野生动物的产权也明确起来。这与产权学派一贯的思路是一致的。我倒并不反对，因为这样做从经济学逻辑上看似乎真的有用。但我的问题是：人类有能力将所有的野生动物都私有化吗？即使有能力将所有的野生动物私有化，那么私有化过程是争夺产权的过程，也一定十二万分的惨烈吧？还有，再退一万步讲，即使将所有的野生动物都私有化了，还有正在上演“公地的悲剧”的所有人类共有的资源，人类有能力都将其私有化吗？比如我们共同呼吸的原本清洁而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感到窒息的空气！美国新新人类的领袖小布什面对世界各国记者对美国不遵守旨在限制有害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的质疑时，竟然脱口面出：“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置疑的！”此时，我都几乎感到绝望。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因此，我始终还是坚持我一贯的观点：产权明确固然重要，但既然上苍安排了那么多我们人类永远无法分割、又与我们人类存续如此密切相关的资源，这本身就是让我们人类必须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抑制自己自私的本性以及竞相争夺资源的本能，而去学会合作与共处。

写完上面这些东西，再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有一则很有意思的报道：曾在五十年代被列入四害的麻雀，如今在我国也因为数量剧减而列为保护动物。报道还说，当年毛泽东发动全民打麻雀时，并未对麻雀的数量产生质的影响，对这种种群更未产生灭绝的危险，但现在不一样了。其原因除了环境的变化外，还由于人们发现了麻雀的经济价值：每出口一只麻雀可赚一毛钱；大排档上每一只麻雀值一块钱。如此看来，经济诱因比当年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诱因对麻雀的伤害大了不知多少万倍。我不由也为老家的麻雀的命运担忧起来。小时候，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家门口小竹林中因百鸟归巢而变得异常热闹。其中麻雀简直就是一群一群，它们的叫声也是最欢的；而不久前回家，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小竹林中却依旧一片寂静，颇似那本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书中描叙的情景。而这头尾不过十几年的光景！想想我们人类如此贪婪，如果不试图从本性上改起，产权明确又有什么用呢？

2001 年 5 月 3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大树该不该砍

今天在某电视台看到一对话节目，几位环境保护人士围绕一棵树的命运展开争论。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某贫困山区一小村庄，因为长期不通公路，经济无法发展上去，后来村民们集资决定修一条进山公路。按照最经济的路线设计，这条公路经过的地方有一棵千年古树。也就是说，如果按最经济的办法修路，这棵千年古树必须砍掉；而要使古树避免被砍的命运，路只能绕着修。而这一绕绕远了。这样村民们必须从原本就很瘪的腰包中再抠出一些吃饭钱才能修好路。所以，问题就来了：是砍掉古树节省钱？还是再出点钱将路绕着修？

我注意到，城市里的几位著名环境保护人士几乎一致认为，应该从长远考虑，保护古树，绕着修路；这种说法也受到了现场观众——当然也都是城里人——的几乎一致的认可。仅有一位年纪不大的小姑娘似乎憋足了气想表达一下自己独立的见解：古树与钱相比较，钱对贫困的乡下人更重要。因此，她要是乡下人，就选择砍掉古树而不是绕着修路！但她的话一出口，我都立即感受到她这个年龄段似乎还无法承受的尴尬：因为没有一个人将她的话当真！

我却将她的话当真了。不仅当真，而且简直认为她的话比那些发表煌煌高论的所有著名环境保护人士都深刻。因为她的话更接近于经济学分析。

经济理论认为，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境地不同，因此，消费同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一物品对每个人的重要程度不同。城里人衣食无忧，早越过温饱而转向对生活质量提高的诉求，所以，北京的城里人常利用闲暇时间掏钱到乡村或山野感受大自然气氛，以至于对保护一棵古树都看得很重。但对于贫困的乡村人，钱如此拮据，将古树保护下来，其对于乡下人的环境清洁功能以及欣赏功能，与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相比较，前者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这个问题仅由贫困的乡下人选择，他们一定会选择砍掉古树而不是多出钱绕着修路。如果有关部门硬要村里的人保护古树而多出钱绕着修路，从经济学分析，其实是城市里的人要乡村里的人承担环境保护成本，是对乡村里的人变相剥夺，这是不公平的。

城市里的环境保护人士也许会说——他们也的确这么说了：村里人眼光要长远一些。尽管现在将古树保护起来需要付出一些钱，但从长远考虑是值得的。有位环境保护人士甚至举例子说：比如将来路修好后，古树对于进山的有钱人来说是投资环境；路修好后，村子富了，子孙后代都会想着留下古树的好处，等等。但他们这么说话，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确，对于出点钱来算不了什么的城市里的人来说，凡事是应该考虑得长远一些；但这话说给贫困的乡下人听，就好像是对手中捏着一个硬币的快饿死的穷人说："你不能拿着这个钱去买馒头，而应该考虑得长远一些，所以应该拿这个钱去看一本如何发财致富的书。"要知道，对于贫困乡村的乡下人，也许就因为眼下出不起因保护古树绕着修路那点钱，这条路永远也无法修好，又谈得上什么"将来路修好了以后"甚至"富裕起来以后"的事呢？当务之急就是修好路，为了修好路古树也得砍！

其实，经济学上对于所谓"长远"也是有说法的。凯恩斯就对别人说"长远"很反感。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从长远看，我们都得死！"其言下之意十分清楚：如果一味考虑长远，也许我们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到死也干不成任何事。同时经济理论还认为，同样一块钱，其远期消费的贴现率对于穷人远远高于富人。也就是说，富人完全可以将一块钱的消费往后推，使之消费得更有意义；但穷人因为钱本来就少，所以将一块钱的消费往后推的余地不大。因此，考虑长远对于富人来说也许是适合，但对于穷人来说，更注重短期收益。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这样说，是不是这棵古树一定死定了？当然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古树的价值对于城市里的人比农村里的人重要；面钱的价值对于农村人又比城市里的人重要。因此，可以考虑做一交换。即村子里的人将古树保护起来，但必须由城市里的人出那笔因为绕着修路而多支出的钱！即由城市里的人将环境保护的成本承担起来。这绝对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近来读书，知道美国五十年代也有过类似我在此文中所说的关于古树的争论的案例。说美国某地森林中有一种花斑猫头鹰，是一种快绝迹了的生物。环保人士为此呼吁政府尽快出台政策，为了保护这种花斑猫头鹰而对这片森林完全禁伐。国会也据此提出了法案。不料，这引起了当地居民以及当地城市中的较为贫困的市民的极大的不满。因为在当地居民来源于砍伐森林的收人占了绝大部分；而当地城市中较为贫困的市民，大部分还没有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屋。一旦森林禁伐，他们未来将为购买房屋付出更多的钱。面以上两项，都是富人完全不必操心的。相反，森林中的花斑猫头鹰保护下来后，富人们觉得去森林中旅游更有意思。所以，这项基于环保政策的出台，肯定是有利于富人而变相对穷人进行了剥夺。甚至有些人权组织都发出这样的疑问：“人都快穷得活不下去了，还谈什么保护几只花斑猫头鹰？”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古树与花斑猫头鹰这样的事毕竟还是个案。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环境保护问题不仅仅涉及到环境保护问题，都还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即谁来为环境保护承担成本。否则，你就想不通为什么环境保护如此之难。

我国目前的环境正处在不断恶化的过程之中。为了彻底扭转这种趋势，国家这两年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长江黄河上游采取禁伐政策，同时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退耕还林或退耕还湖。这些政策无疑对于环境保护作用巨大。但是，政策一出台，并不是只有叫好者没有叫苦者。深受风沙之苦——其实这点苦相对于直接生活在荒漠地区的贫苦农牧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的北京城里人肯定叫好，而他们未必知道，森林工业系统几百万工人、靠山吃山的贫困山区人、因被迫退出耕地当前可支配收入急剧减少的农民，这些原来就很穷的大规模人口，都在叫苦不迭。尽管国家承诺给这些人一些补偿，但这点补偿远远不足以弥补这些人因此而遭受的眼前损失。我做如是分析，绝不是说为国家出台这样的环境保护政策泼冷水，我是想，至少应该让那些养尊处优的城里人以及一些矫情的环保人士清楚，正因为许多穷人咬着牙承担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才有你们还算过得去的清洁的环境。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排序完全不同，而且发达国家本身无疑是使世界环境恶化的最大责任者。也是基于这点共识，前年在日本东京通过的旨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的责任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也就是说，总算是公正地让发达国家承担相应的环境保护成本。但美国新上任的布什总统竟然说这不公平，要求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发达国家一样的义务，这表明，美国也想做只享受环境保护好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而不愿意承担环境保护成本的富人;那些穷国家势必不会愿意。因此,除非美国尽快改弦更张,否则我们也就别指望国际间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政策会成功。

看来,要解决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需要解决的,还是我们人类内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2001 年 7 月 23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进步的代价

妻子的一位女友到我们家，向妻子展示手臂上的花纹：一只色彩鲜艳的大蝴蝶。妻子对女友大呼小叫：你竟然文了身？你不怕痛？不怕人家笑话？她的女友解释说：这不是文身，这是一种贴纸，贴上去有文身的效果，如果怕人家笑话，你还可以洗掉它，非常方便，免去了文身造成的许多麻烦。妻子感慨不已：现在的人真是聪明，连这样的事情也想到了。

其实，这不是现在的人聪明，而是市场需求的力量太大。经济学家庞洛葛在《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开宗明义地写道，厚厚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原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确，只要市场上有一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又能够给商家圈来钱，就一定会有这种供给。即使这种需求未必文明，这种供给未必合法。比如由对毒品的需求导致的对毒品的供给就是较极端的例子。即便是文明社会用尽各种办法包括很残酷的肉身的惩罚，但因为满足对毒品的需求的供给可以导致暴利，毒品供给者就是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也要生产并贩卖毒品。惩罚至多只是抬高了毒品的生产与销售成本，但生产者与贩卖者转而又将这种风险成本以提高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毒品消费者了。这就是需求的力量！

因为市场需求的力量太大，总能够创造供给，因此，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只要有钱，一切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即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便某种产品供给因为资源约束成为不可能，但相关的替代品立即会涌现。于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人类的增长与发展也就似乎因此没有极限。所有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悲观主义在市场需求力量面前都显得很可笑了。

看待人类使用与开发能源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罗马俱乐部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其中的主要观点是：因为能源几尽枯竭，为了不给人类带来这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必须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零增长。这份报告一出台，便遭到自由主义经济学乐观派的攻击，他们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视为“痴人的呓语”，认为这份报告一点也不“经济学”。乐观派认为，人类利用与开发能源的历史表明，只要有需求，可供人类利用的能源永远都会有。

乐观派的观点，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就在《能源经济学》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

十九世纪以前，美国人在使用煤油作为照明供给之前，照明的主要来源是鲸鱼油。美国内战期间，一方面鲸鱼油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鲸鱼数量大幅度减少，尤其是捕鲸船只被征作运输船只后，使鲸鱼油的供应相对于不断增加的需求空前紧张。将鲸鱼油作为能源的危机显现出来了。鲸鱼油从 1823 年的 43 美分一加仑猛增到 1866 年的 2.55 美元一加仑的天价。于是，为用不起鲸鱼油而发愁的人们到处寻找可替代品，这构成了企业家开发替代品最强大的利润动力。很快，有人发明了从煤里提炼出煤油的技术，使煤油成为鲸鱼油的一种廉价替代物并迅速得到普及。这时，鲸鱼油的价格也应声而落，到 1896 年，鲸鱼油的价格已跌入几十年来的最低谷，仅值 40 美分一加仑。

石油时代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危机，世界经历了一次石油价格在短期内成十倍上涨，也使人们意识到石油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巨大稀缺的威胁。《增长的极限》也是应此背景而生。然而，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对利用核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相关替代能源的探索也到了最高峰。与此同时，高涨的石油价格使得人们探测石油的积极性高涨，使得随后的十年世界石油新探明储量比生产增加得更快。

科学家还发现，这个星球上可以利用的碳水能源的储量超过相当于20兆桶石油的能量，这相当于以现行速度可供五个世纪消费的能源。

以上一切似乎都足以证明，没有理由对能源的前景悲观。

果真如此吗？的确，从人类可利用能源的角度看，似乎还没有什么限制。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已经够大的了。

鲸鱼油的使用以及后来的匮乏，没有难倒人类，但却使鲸鱼几近灭顶之灾；煤的使用以及匮乏，没有难倒人类，却把一个好端端的地球挖得百孔千疮，地质构造的变形引发了无穷的地质灾害；石油的利用与最终可能的匮乏，也许还难不倒人类，但其后果除了地质灾害外，人类将更贪婪地扑向下一种可能出现的替代品……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所谓没有极限的增长，目前只发生于这个世界上的少数中心国家。而支撑这些国家没有极限的增长的假象的，却是大量的外围国家日益面临实质性枯竭的资源。

还是石油。美国本土的石油储量占世界份额并不低，然而，美国却大量使用国外廉价石油；为了维护国外廉价石油源，美国不惜在海湾地区大量屯兵，并且最近又出兵中亚。而中东地区作为美国等主要石油输出国，尽管暂时可以凭藉石油维系经济增长，但美国却从来没有策划过当有朝一日中东石油开采尽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阿拉伯世界的未来。而对于美国仅将阿拉伯世界作为其廉价能源供应地的愤怒，以及对阿拉伯世界未来的绝望，是产生“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森林是另外一个例子。1980 年到 1995 年，世界森林的面积减少了大约 1.8 亿公顷，其中发展中国家损失了将近 2 亿公顷的天然林，发达国家的森林面积却增加了大约 2000 万公顷。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每增加一公顷森林，其他国家就要损失十公顷森林。而对森林制品最大的需求者就是发达国家。

有人还算了这样一笔账：占世界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美国，耗费着世界三分之一的资源。即使将全世界可能开发的资源都利用起来，并且重新分配资源，全世界人也不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

看来，需求的力量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断创造着供给；但也是一种毁灭性力量，使人类在表面进步的同时正面临因资源的最终匮乏导致的大崩溃。

其实，我一直怀疑西方那些鼓吹“没有极限的增长”的学者并不是真的乐观，而是想给支撑着西方高速发展的外围国家人民制造一种乐观的假想，从而使中心国家更好地剥夺外围国家的能源。而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则早已在准备退路：寻找另外的“地球”！对此，我的朋友张祥平先生在其《制度对话》一书中有很好的揭露。

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太空探索；一直到去年国际舆论爆炒美国富翁出资数千万美元进行人类首次太空旅游，这是给全世界一个强烈的暗示：我们这些地球上的“高贵生命”，在掠夺完地球后，我们可以去掠夺更广大的宇宙！1984 年，美国政府投资进行“生物圈二号”计划：建造一个能自循环的封闭系统，让人住进去。也就是说，地球在他们看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是“生物圈一号”，为了给这个世界上的富人们准备退路，他们自己再造一个小地球，也就是“生物圈二号”。他们公开的宣传口号是拓展人类生存空间，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绝不可能造出一个能使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口生活的其他星球住所，有权利住进去的肯定是富人。该计划进行了九年，但失败了。1996 年 9 月，进行该项实验的科学家们宣布：“目前的人类还无法用人工方法保持地球的活力”，“地球是人类的惟一家园。”

在这种情势下，西方的富人们只能继续维持乐观的说法，以此欺骗地球上为进步付出代价的大多数人。比如有一个未来学家叫托夫勒，就对大家说：这一次产业升级不会增加能源消耗，因为信息业是一种无污染低能耗的工业。这种说法很诱人，但绝对是误导。因为信息业作为一种服务业，其利润是通过压迫下游产业得来的；而下游产业却因信息业对利润的越来越大的追求而制造更大的污染与能耗。同时，那些凭着信息业发了财的富翁的消费，都是来源于物质生产：轿车别墅、高级家具、仿制古董、高级服装、室内木制化装修、山珍海味、高级野生动植物滋补及治疗品……使地球上的资源更少了。更有力的证据是：“最大规模的森林毁损，不是发生在工业时代，而是发生在信息时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是出现在第二次浪潮（工业），而是出现于第三次浪潮（信息业与服务业）……”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最近一则报道说：云南某原始森林中长有一种树，其树皮被日本人发现有极强的治癌作用，日本人出高价收购这种树皮，不出三年，森林中的这种树几乎都因被剥皮而死！需求的力量如此之大，却又如此之酷烈！但日本人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搞好环保，而国内舆论竟一致谴责生活在森林边上的当地人贪婪，而不去谴责制造需求力量的日本人。

还有这样的事：当草原上的一种山羊因被过度放牧而导致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草原沙化、流沙被北风一吹就到了北京城时，北京城里穿高档羊毛羊绒制物、吃羊鞭涮羊肉的绅士们竟磨刀霍霍，叫嚣要“杀掉山羊，保卫北京”，仿佛山羊以及养羊人是北京沙尘暴的罪魁祸首，这与上面日本人一样。对此我的朋友张广天说得好：“真正的元凶是从来不直接杀人的，而且他慈眉善目。往往是饱食终日的人要求失去土地的人保护环境。”

但能像这样思考的清醒者太少了太少了。哲人罗素说：人类将在学会思考前灭绝。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2001 年 11 月 21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信上帝，还是信经济学家

在接触美国科学伦理学家安德鲁·金柏利《克隆——人的设计和销售》一书之前，经济学家对克隆技术的态度，我一直不甚了了。这除了在国内经济学界的确鲜有人就克隆技术的诞生发表看法外，我还一直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克隆技术的诞生本身是科学界的事，而由此引发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家的事。经济学是在既定的价值判断下面工作，用樊纲先生的话讲，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所以，经济学家对于克隆技术想必不会有多大兴趣。

然而看过安氏著作，其间透露出的事实让我吃惊不小：在国外，克隆技术刚诞生，经济学界就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从权威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期刊到市场分析专家都无一例外地对这项技术的诞生持赞成态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针对伦理学家对克隆技术的责难，冷冷地说："不要钻牛角尖，管他呢，干起来再说。"英国《经济学家》发表评论认为："人体商业化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无与伦比的成就。毫无疑问，克隆技术的出现将为世人创造一个广泛和深远的市场。"而 CNN 电台则援引一位市场分析专家的话说："人体的技术化和商业化，标志着延续了五百年之久，对地球上许多生态共有财产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发展到了最后阶段。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可以断言，十年之内，所有的人体基因图谱都将成为专利，并成为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制药公司、化学公司和生物公司的摇钱树。”

如果说社会对经济学家的意见仅仅采取“坐而论道，不足与谋”的态度也就罢了，问题就出在还有更让人吃惊的事。安德鲁·金柏利在书中列举了经济学家赞成克隆技术所产生的莫大影响力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可预计对于克隆技术最终被应用与推广的并不是科学的因素，而是经济的因素！对道德最终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科学家，而是经济学家！

一门号称不关心价值判断的学科为何恰恰是对道德威胁最甚的学科？个中理由不能不让人深思，因而也有必要循着安德鲁金柏利在书中提供的思路作一番梳理。

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经济，而是几千年来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论断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早期的市场交换活动并不构成社会解决基本经济问题的手段，市场真正成为基本经济手段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十八世纪中叶始。而市场意识则滥觞与勃兴于此前作为思想先导的启蒙运动。在市场意识勃兴的背景下，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市场运作中人的行为的规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森在仔细研究经济后认为，人类行为的规律不是建立在宗教信条或古老的戒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利原则的基础上。这一发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不啻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但真正完成宗教神学向世俗神学的革命性转变的却不是哈奇森，而是他的学生亚当斯密。斯密提出，经济秩序建立的准则是人类自身利益。正是因为每个自利的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加与人民福利的改善。宗教与权力所强加给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妨害市场的有效运作。这就是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由此原理引申出一个重要的哲学信条：每个人都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是“经济人”,“经济人”在选择自身行为时,没有任何道德的或宗教的神圣标准,而只有最大限度符合私利的实利主义判断。宗教不是救世主,以人的自利的品格所推动的市场调节是人类世俗救世主。由此,斯密以其自由市场理论完成了神学和伦理学上的一场革命。因而,尽管后世经济学家有人主张经济研究不谈价值判断,不讲道德,而实质上,自斯密始,经济学已经僭越其本分,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整个社会意识产生深厚的影响。

斯密之后的二百年,总体上看,是自由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二百年。自由市场体系的社会中,巨大的技术成就以及巨大的财富积累使人们似乎比此前任何意识形态或宗教神学更能看到人间天堂;而进入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倒戈转而选择市场经济,更使斯密信徒们得出这种结论:二十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场,最终证明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最完美因而也是最后一种制度安排,历史已经走向终结。在此情势下,斯密学说在伦理学上的革命更进一步深入,以至于经济的准则终于逐渐取代了宗教或神学的法则成为惟一的法则。纳尔逊就说:“如果就旧时的祭司通常询问每个行为是否符合上帝设计世界的准则,那么在当代经济学的学说中,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的准则取代了神的计划。”“经济学已不再是神学的一个次要的分支;相反地,现代神学接纳了经济学的内容。”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用甚至接近宗教的措辞来谈论他们所从事的学科。如弗里德曼就曾用上帝对子民般的语言承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保证人的自由——在这里,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代名词。另一位也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赫伯特西蒙则评论说:“建立在个人私利间相互影响基础上的经济学之经典理论,能产生无所不知的观点,并且惊人地简明和完美。这一特性原来只为上帝所有。”还有更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几千年来,人类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一直梦想一个没有人受苦受难没有人挨饿的黄金时代，早先的哲学与宗教曾将这一时代假设在遥远的过去或未来的天堂，而现在看来，当自由市场经济终于摆脱一切桎梏，这一时代已经指日可待。

世俗经济学取代宗教神学，经济学家于是也几乎成了上帝。1936年凯恩斯在写作《通论》时就认为，统治世界的实际上是经济学家的思想，“事业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金柏利本人在书中也说，今天，当统治者们在公共利益准则方面遇到困难时，不管是就业政策，还是环境保护，当然也包括克隆技术的应用与推广问题，他们都要求助于现代神使——经济学家。

问题在于，这些所谓世俗神使的经济学家在精心构想他们自己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时，他们不依赖于任何宗教的神示或道德的信条，而只有一个经济法则。具体到克隆技术的态度上，克隆技术将生产出各种“人体商品”；由这种新技术与新产品，进而开辟出一个全新的人体市场；由此，将引发世界范围内一场新的“创新浪潮”。因而，在全球经济发展普遍缺乏推动力的背景下，由克隆技术引发的创新浪潮无疑可以成为诱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风暴眼”。因此，经济学家对克隆技术的赞成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幸也恰恰出现在这里：“斯密传统”下的经济学法则与宗教神学以及道德信条存在对抗与分裂的一面。因为任何宗教都建立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宗教；道德的核心又恰是维护人的尊严。而在“斯密传统”下的“经济人”是不依赖于任何他人或社会，且没有任何道德关怀可言。可见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鸿沟。如果说早期世俗经济学家与宗教神学对抗与分裂的性质还不明显的话，那么随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触及的范围日益扩大，这种对抗与分裂的性质也会日益突显，并最终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作为一种有着无限商业冲动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赋予了人的自由的同时，也不断地消解着人的神圣与尊严，并最终以克隆技术作为消解人的神圣与尊严的最后篇章；面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还在为这样一个被金柏利称为“将人类灵魂与肉体彻底分开，并将人类赤裸裸地放在拍卖台上”的技术大唱赞歌。于是，一度几乎以经济法则替代宗教神示与道德信条的经济学，终于快接近与宗教、道德、人文科学真正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

就这样，今天的人类看来终于将意识到他们其实很久以前就一直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信上帝，还是信经济学家？

1999 年 1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人耶？鼠耶？

有一家媒体想安排我与青年作家陈彤围绕其新著《我能动谁的奶酪》作一次对话。后来我因故未能应约，但还是花了一个晚上读完了《我能动谁的奶酪》这本书。

陈彤这本书，被称为“是一本颠覆之作”。在这本书之前，一本由名叫迈克尔的老外写作的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在中国大陆热销，据说发行量上百万册。对于畅销书，我一向不热心，所以我是没有读过。但据陈彤书中转述，老外这本书是以两只小老鼠作寓言，讲了一个核心道理：当属于你的奶酪不见时，不要问是谁抢走了你的奶酪，而要赶紧像小老鼠一样穿上跑鞋，去寻找下一个奶酪。陈彤认为迈克尔提供的是一套虚伪的奶酪理论。她的书讲了这样一个相反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是拿走了别人奶酪的人对被拿走了奶酪的人说：你的奶酪被我拿走是天经地义的，去找你的新奶酪吧。陈彤的书中的主人公也是三只小老鼠，但加上了三个小矮人。

书读完后，我脑袋里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人，还是老鼠？尤其是读到陈彤书中对专门讲授如何寻找奶酪的奶酪学院的描述时，恕我不恭，我脑海中出现的竟是门口停满了富人的私家车的“某大 MBA”班的情景：那些人与奶酪学院的老鼠有没有区别？台上正把所谓“成功案例”讲得唾沫横飞的“青年才俊”，不就是书中那个喁喁院长吗？人类与老鼠的异同到底是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么？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科斯、布坎南等著名经济学家眼中，人与老鼠最大的共同点也许就在于：二者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也就是说，人与老鼠，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达到最大的满足程度。这里的约束条件，就是社会学上讲的生存环境，它决定了你行为的最大可能范围。就好像我口袋里仅有十元钱，我只能在十元钱的各种可能用途之间选择：五斤苹果还是三斤梨子或者两听可乐……，但绝对不可能是一台电脑或者一栋楼房。心理学家将经济学家这句话转化成心理学语言就是，人与动物一样，都有追求快乐的本能。

指出这一点现在看来并不难，但在经济思想史上，却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我们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到现代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却成了“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行为选择问题”。即现代经济学认为，因为相对于人的无限需求（只要有可能，我想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资源总是稀缺的（如我口袋里就只有十元钱），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有限资源的各种用途之间进行选择（我到底是用十元钱来买一本书，还是买两个烧饼），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我现在肚子很饿，再不吃点东西我都要死了，所以我要买两个烧饼去，去它妈的“精神食粮”）。这种说法迄今为止仍充斥于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

科斯是第一个对此提出异议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就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一点来说，其实人与老鼠、狗和章鱼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举例说：草原上的饥饿的狐狸追赶一只野兔，如果狐狸不以自己最大速度拼命地跑，它会失去食物源，长久下去肯定活不成；如果野兔不以自己最大速度拼命地跑，它就要被狐狸吃掉，也活不成。所以，狐狸与野兔在这里也是“最大化行为”者，这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点与人的行为无异。还有，老鼠有许多偷食物的小窍门，懂得为冬天储存粮食，也就是说它还懂得如何放弃短期收益而着眼于长期，这些行为，都是“经济人行为”。因此，科斯总结说：如果把“最大化选择”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那是把人等同于老鼠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学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

那人与鼠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就在于“如何才能够满足自己”这一过程之中。老鼠以及整个动物世界，被安排在各自的“小生态圈”中，比如一百只老虎共有一片林地，所以，它们满足自己的行为准则就是“丛林法则”：依靠实力抢夺，强者胜出。而人不一样，在科斯、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眼中，人不是靠“丛林法则”满足自己，人学会了用“交易”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生产粮食的知道拿出多余的粮食去与生产布匹的人交换。斯密就提出，人类进步的根源恰就在于人学会了“以物易物、物物交换和把一件东西换来另一件东西”，他同时特别举例子说：“从来没有人看到狗赶集市和仔细考虑与另一条狗用一块骨头交换另外一块。”基于此，科斯、布坎南等人都认为，现代经济学要转而将“交易行为”作为研究的核心。

无须说，交易行为是一种“契约”行为，是双方在讨价还价后自愿进行的，所以至少建立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之上，这显然已经摆脱了“丛林法则”。所以，动物取“财”，往往是“取之无道”，而人爱“财”，应该是“取之有道”。同时，交易还是一种合作行为，而非动物世界中的竞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有经济学家说，人类的进步恰不是由于竞争，而是由于为了避免残酷的竞争转而学会了合作。

当然，我自己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对于“交易”的偏爱也有些过分，或者毋宁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人类还是在用“丛林法则”解决满足自己的问题。这不仅仅表现在战争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绵延不绝，而战争奉行的仍是典型的强者法则；也甚至表现在交易领域：因为大量的表面平等的交易背后，都是强力的作用。正如经济学家杰克·赫什利弗所说的：他们之所以交易，是因为他们害怕不交易的后果。但反过来，这也恰证明人类离彻底摆脱兽性还很远，人在许多时候还会降低到老鼠的水平。

《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如果说内容真是鼓吹被拿了奶酪的人不要问谁拿了我的奶酪，就是典型地将人降低到了老鼠的世界。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读这本书，但我通过陈彪的转述，还是想起十七世纪中叶为海盗行为辩护而流传在荷兰人以及英国人中间的歌谣："自古以来的好规矩/明白又简单：/谁有实力就该谁拿/谁有本事就该谁占"（参见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第171页）。时间过去了几个世纪，看来法则还没有变，有所变化的仅是当年的海盗摇身一变成了今日的绅士，将"丛林"从昔日的海盗船搬到了今天的"国际市场"上而已。

因此，陈彪对迈克尔的颠覆，其实就是对鼓吹"丛林法则"以及"海盗行为"的颠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迈克尔的书在今日世界如此风行？在今日中国如此风行？最合理的解释也许就是：在今日的世界上，正有一些富国在不断从穷国那里抢走奶酪；在今日中国，也有许多抢别人的奶酪以及许多人的奶酪被抢的故事在不断发生。这一切，使得抢者与被抢者都需要"给我一个理由"：抢者需要有人证明抢得有理；被抢者需要有人证明活该被抢！从这个意义上看，迈克尔的书算是将许多隐晦的东西尤其是被表面公正所蒙蔽的东西再次给挑明了，因而"生命力持久"；而陈彪的书则仍不过是充满了一个人文作家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是小白兔在丛林中给大灰狼上课，最终给人的仍是"心向往之却不能之"的东西；更何况，已经适应了"丛林法则"里的人还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在想：谁知道这小女子是不是想通过这本书，最后成为一个能拿别人奶酪的成功“老鼠”呢？嗅一嗅她的书，也许有这种味道？

很凑巧，我从刚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发表了好几篇有分量的学者书评。其中就有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迈克尔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用老鼠与奶酪来比喻我们人类的追求，是对人类的侮辱！看来不愿把人降低到老鼠世界水平的人，除了陈彤，还有不少人。

也因此，我们对人类，还要有一点信心。

2002 年 3 月 24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价格大战的背后

妻子对我说，听说29英寸的彩电已跌破3000元大关了，家里的旧电视机一共才三十六个频道，而闭路电视台提供的频道就有五十九个，正好去买一台新的。我正想出门，一位经济类刊物主编从重庆打来电话，要我写一篇文字，谈一谈彩电价格大战问题。以下文字就是应此约而写的。

彩电价格大战，商家其实是想采取西方经济学中所谓“掠夺性定价”战略。其基本做法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某有实力的厂商会有意不断压低商品的价格，以至于价格低到该厂商及其竞争对手都不能得到利润的程度。支配着这家厂商采取放弃短期利润做法的动机是：在该商品价格低到无法获利的时候，实力稍逊的竞争对手将要么被迫放弃市场而转产其他商品，要么而临破产。这样，采取掠夺性定价策略的厂商就可以如愿以偿地扩大市场份额，并在竞争对手消失的情况下通过自己获得的垄断地位再提高商品价格，从而达到长期获利的目的。

近年来，国内市场上不断爆发“价格大战”，从彩电、微波炉到VCD，再到今年的小轿车。这其中，就不乏有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厂家采取掠夺性定价策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产微波炉的某厂家在率先大幅度降价——降价幅度一度达50%以上——并确实抢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后，最近宣布将大幅度提高自己生产的同类产品价格。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其实,对于掠夺性定价,西方经济学界很早就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早期一些研究者也确实认为,掠夺性定价有利于巩固托拉斯及垄断者在市场上的地位,所以,美国反垄断法曾明确地将这种定价策略视为非法予以阻止。1911 年由美国政府起诉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是作为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即反垄断法)的第一个成功的实例,政府起诉的理由之一,就是标准石油公司曾使用掠夺性定价策略以消除行业的局部竞争,并在竞争对手消失后再提高石油价格获取垄断利润。

但情况后来起了变化。自本世纪五十年代起,对掠夺性定价的更深入研究表明,掠夺性定价策略对于策略方来说未必是最优策略,因为策略方并非总是有利可图。且这种观点目前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主流,得到了公认。掠夺性定价之所以是一种失败策略的理由主要有:首先,在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竞争对手之间的实力差别不会很大。在策略方挑起价格之战时,竞争对手明白,策略方其实也在一起蒙受损失,而且预期只要渡过暂时的难关后,价格会回升到一个获利的水平,所以,竞争对手也会想办法渡过艰难但不会长久的受掠夺时期;其次,实力很强、本来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厂商,如果使用掠夺性定价策略,会得不偿失。举例来说,假设已经拥有 70%以上市场份额的厂商通过掠夺性定价策略来驱走占市场份额 30%以下的其他厂商时,它是在以牺牲 70%市场上的大量收入为代价来获取只有 30%的利润;再次,即使某厂商通过掠夺性定价策略暂时达到了抢占市场的目的,但一旦它想提高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时,很快就有新的市场进入者。这种进入者有两种,一种是在掠夺性定价中还未被完全挤垮的厂商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卷土重来,另一种是被迫转产甚至在竞争中败北后被其他厂商并购的厂商此时也会因进入的成本很低且潜在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益大而再次参与到竞争行列。

当然,事情总有它的另外一面。尽管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使用掠夺性定价策略的厂商未必能得到多少好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的角度看,掠夺性定价策略能刺激厂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能促进资源向更高效率处配置,还能增进消费者福利。所以,政府对于掠夺性定价策略不必进行干预,这也是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麦克吉等人对1911年的"洛克菲勒案"提出质疑的原因之一。

再回观国内市场上不断爆发的"价格大战",我的意思是,各厂家要头脑冷静,千万不要做表面上似乎很可行而实际上得不偿失的事;作为政府,大可不必强加干涉,但也不要推波助澜;而作为消费者,则只等渔翁得利,乐享其成就行了。

总而言之,一切任其自由。倒是有一种现象必须引起重视:近来,听说一些厂家为了防止恶性竞争,公开联合起来制订所谓"价格联盟",规定最低价格。这是有违市场运行准则的,舆论不仅不应该支持,反而应该提醒与批评。

2001年4月27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利 益 之 外

作为搞经济学的，本来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对文学界的事进行评判。但既然来了，我就说两句。

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先想到利益二字。比如说，对于舒芜与胡风之间的恩怨，刚才人文学者谈背后的人文关怀问题，谈背后的道德底线问题，谈背后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性问题，而如果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一切都无非是利益。

舒芜当初为什么会背叛并出卖自己的师长胡风，有人说是一时糊涂，有人说是以求自保，从经济学角度，都不是。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事，完全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他比较了当时条件下背叛与出卖自己师长所有付出的代价——比如失去了朋友与信誉，也就是经济学上的成本，以及背叛与出卖自己师长后预期所得——比如能调到北京，能得到政治上的好处，也就是经济学上的收益，觉得两相抵后最后是净收益，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事。为什么“胡风集团”的人不能原谅他？也很简单，因为与这种人交往，预期收益没有了，相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如不交往。而为什么祝勇与余世存等年轻一代的学人现在提出为舒芜辩护？有人说是“隔代理解”，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作为局外人，首先没有吃过舒芜的亏，相反在他们进入知识界过程中受到了舒芜的支持。况且，提出为舒芜辩护还可以“得眼球之惠”，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以,他们这样做也就毫不奇怪。

经济学就这么庸俗,经济学家也都这么庸俗。但经济学却也是解释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海尔布鲁纳叫经济学家是"世俗哲人"。加里.S.贝克尔用经济学解释爱情与家庭。结论很简单:你选择这个人结婚而不选择那个人结婚,是因为选择这个人比选择那个人比较收益要高。什么爱情,都是扯淡。你选择生几个孩子,在孩子身上投人多少,取决于你预期将来可以从孩子身上得到多少回报。什么亲情,"你丫装孙子"。人文学者受不了这样的庸俗,但贝克尔却就是凭这几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不要不服气,更不要生气。尽管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

撇开经济学,我倒希望我们的知识分子能超脱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我记得是孟子说过这样的话,"无恒产则无恒心",这是对于一般人性的观察;但孟子还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不同要求的。但非常可惜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太少。从我手头这本《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看,并非如我以及大家想象的,当时乃至今日名重一时的知识精英们,大多数都不是出于自保的表态,而是落井下石。还有后来的"文革",现在更多的人几乎都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在"受迫害者",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光彩的记录。现在我们老说彻底否定,以为自己自觉了,但从许多人的文字中看出,他们之所以彻底否定,不过也是利益两字。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使知识分子原本优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损害,所以,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一说到彻底否定,就搬出当初知识分子在 1949 年以前、在"文革"以前,也曾经"阔过"。当然,承认利益两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字，并不是什么低下的事，并不是说就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将自己扮成先知先觉，认为自己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排除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恰也不是现在“争相撩起自己的衣襟数伤疤，仿佛谁的伤疤少谁就不好意思”的知识分子们。

再回到舒芜这件事上，祝勇先生说他的考虑是将人们的眼光从舒芜这个人身上转移开，投向造成这个悲剧的更广阔的制度背景。在讨论“文革”时，许多知识分子也说自己没有责任，一切过错都是我们这样的体制造成的，所以个人不应该忏悔。我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制度是一回事，我专门研究过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所以我也许比大家都清楚其重要性。但具体到每件事如胡风事件上，局中人该负什么责任就应负什么责任。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比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淑世情怀与宗教情怀的群体，都不去为自己在胡风冤案中以及“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中的表现进行忏悔，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为政者为“文革”忏悔。至于制度，不过是人的行为的载体，说整个制度要忏悔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这个制度中的行为主体忏悔才对。也只有行为主体忏悔了，才能对制度从边际开始进行一点点的改进。

说到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刚才丁东先生说得很好，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舒芜之所以不能得到原谅，而其他人得到了原谅，就是因为他突破了这个底线。所以，丁东先生提出的要坚守这个底线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这个道德底线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有最基本的信用；在人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要有最起码的认同。但就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在我们思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想界偏有一些人还在不自觉地做消解道德底线的工作。过去的一年中，有两件事我认为有标志性意义：一件是余世存、祝勇等先生为舒芜的辩护。其实，无论你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如何口似莲花，你无非是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师友的；另一件是朱学勤批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朝遗老的不降清，认为是受到民族主义的毒害。他原来批狭隘民族主义，我认为有理，可他一直批到文化民族主义了，批顾炎武、黄宗羲了，就彻底地解构了中国人对作为一种文化的中国的认同，就太过分了。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知识界多做建构的事，少做解构的事。不然，我们也许可以掀翻旧的铁皮屋子，但却永远找不到新的遮风雨之所。那时，我们面临的仍是尴尬的处境。

2001 年 1 月 13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歌星的身价

在单位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午饭后大家总爱凑到值班室看看报纸，而且边看边议论。今天又是如此。期间，王教授手里举着报纸，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你看，一位歌星，出场唱一首歌，就三十多万，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惯了。”我边笑着拿开王教授的手边说：“王教授，你已经落伍了。前几天我看报纸，说这个歌星做了三十秒广告，开出了三百万的价格。三十万算什么？”不想王教授不依不饶地较起真来：“不行，我就要你说说，凭什么这个歌星一首歌值三十多万元钱？”

我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拿出“需求定律”。这个歌星歌唱得很好，人又长得很甜美，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少男少女们，都视听到她的歌声看到她的形象为一种享受，据说她在中国拥有成百万的铁杆歌迷。据报道，其中有不少歌迷对她痴到如此之程度：在全国范围内跟踪听她的现场演唱会，倾已所有也在所不惜。既然对她的歌声以及她本人形象的消费需求如此之大，而供给方却只有她一个，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她拥有完全垄断地位，具备操纵价格的能力，所以，她的出场费之高就不难理解了。

我将此道理讲给王教授听，王教授琢磨了片刻，点点头说：“我似乎懂了，你说得也许是对的。但我总觉得难以接受。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在这里生活，单位还常会组织一些演员来演出，这些演员中也有非常出名的演员，我们也常有看看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演出的机会，门票价格很低；到了九十年代初，单位组织演出少了，即便是慰问演出，来的也都是些不怎么有名的演员，我掏钱看演出的时候也少了，因为票价上去了；而到了现在，除非特殊情况，单位基本不再组织演出，节日里只有找些地方单位不知名的文艺团体搞一搞联欢；至于自己掏钱看演出，基本不会，因为一场至少也得百八十元的。所以，从这一件事，我很怀念演员国有制时代啊。”

这个问题真有意思。于是我在想，如果现在仍然是演员国有制时代，会有什么情况？第一，会出现“供给短缺”。因为演员国有制时代，演员拿的也是国家规定的几级工资，身价很低，相当于在商品市场上国家进行了限价。既然长期使得商品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演员提供演出的积极性也就不高，所以，谈不上演出市场的繁荣，很可能仍是“全国八亿人就八部样板戏”的时代；第二，因“供给短缺”而出现“明星走穴”现象。一方面观众听众能看的能听的东西很少，而他们原本想看到听到更精彩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国家“限制演员的价格”，所以，必定会出现“黑市交易”，即“明星走穴”现象。而且因为在“黑市”上盛行的规则是“市场交易”，所以，明星出场费会远远高于其“指定价格”。这种情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很普遍；尽管舆论指责得很厉害，但那时明星走一次穴挣万八千元的事不仅不因舆论指责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当然，这种“明星走穴”现象却很少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在那个全民批“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如果偷偷私下出去搞以挣钱为目的的演出，被发现的可能性极高，惩罚的手段又极重，在进行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后，是没有多少人敢去冒这个险的。

我把我以上意思表达给了王教授。王教授不断点头称是。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但听完后，他似乎还是有一些东西不明白，但他似乎又不想再“麻烦”我，于是边低头看报纸边咕哝：“我还是不服气。凭什么她一首歌就几十万元？都是那些演出中介给捧的吧。不听她的歌还不行吗？别人不一样唱？”

我主动与王教授说，这怕是错怪了中介。中介组织演唱会，其收入来自于门票。门票的市场价格以及销售数量，又取决于歌迷对所请歌星的认可程度。一场没有任何可称得起歌坛“大姐大”“大哥大”的名演员参加的演出，吸引不了什么人，中介也就赚不了什么钱，所以，中介本身也活不下去。于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盈利，必定会出现所有的演出中介都用高价争抢中国圈内有限的一些名演员的现象。而且，请到谁出场，还真是不一样。因为除了大家都数得上的几十位名演员之间，具备相互替代的可能性（他们互为替代商品），换了没有名气的演员上场，歌迷就是不买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断有报道说，某单位组织某演出，票已售出，但请的歌星临时没有来，最后导致组织演出单位与歌迷之间冲突，就是这个原因。

我以为这样一来，在歌星的身价问题上，王教授再也没有疑问了。没有想到王教授再次发问：“那你说，中国十二亿人，就找不出像她这样的第二人吗？有人歌唱得比她还好，长得比她还漂亮十倍，只不过没有人去发现就是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即明星是如何产生的。我记得经济学家穆什·阿德勒作过这样的结论：“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具体地说，人们进行任何一项消费，是需求知识的。以听歌为例，我们是如何了解歌曲以及歌手的呢？为了节约知识的成本，我们大多只能是通过与那些听了更多音乐，更懂得音乐的人交谈，所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多数人相互通过交流接受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这少数歌曲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及少数歌手就成为流行歌曲以及歌星;而且更进一步,一旦当这些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进入多数人视野时,人们再在交流有关歌曲以及歌手的知识时,为了节约交流的成本,不得不对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予以更深入的关注,少数歌曲以及歌手进一步被带入一种多元对话的格局之中,于是,这个过程反复下去,围绕这少数歌曲以及歌手,一种"知识谱系"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不断强化他们的明星地位,而后来的歌曲以及歌手要再进入明星行列,因为听歌者必须付出新的"学习成本",而一般的听歌者不愿轻易付出这种新的"学习成本",所以,后来者要成为明星,必定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也是不少音乐经纪人抱怨"要包装一个新歌星,成本越来越高"的基本原因。

这样看来,歌星产生的过程,就是制度学派所言的"路径依赖"。一项技术在发展的初期,也许仅仅因为相对于其他技术,它最先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决定了人们在以后的日子中对这种技术有一种不断累积的依赖;而一旦人们被锁定在这一特定的技术标准内,这项技术可能出现报酬不断递增的趋势。虽然现实世界中不是没有更好的其他技术可供选择,但人们还是不愿意去做这种选择。这里最显著的例子是微软开发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因为拥有个人电脑的人一开始便多是应用微软开发的操作系统,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习惯于这种操作系统,而且后来的其他软件开发商,也都将应用软件的开发建立在微软开发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平台上,所以,尽管后来传出消息说,另一公司开发的"LINUX"操作系统比微软的"WINDOWS"系列在安全性上更胜一筹,但响应前者的人数仍很少。这就是因为,让众多的个人电脑用户再去学习使用一种新的操作系统,然后让其他软件开发商转而将应用软件的开发建立在另一种新的陌生的平台上,这种因转换导致的"学习成本"实在太高!于是,便出现了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度学派所谓的“锁定”现象。

可以说，是人们的“懒性”促成的有缺陷的筛选程序，使得明星现象产生了。

但我讲这些，王教授未必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接受。于是，我就讲了一句话：“在茫茫人海中再去找一位歌星，这笔费用谁去付？还要让大家由接受别的歌星再转而接受这位歌星，这过程也太困难了吧？”

王教授终于不再说什么了。他一沉默，我就视为我说服他了。

2001 年 11 月 12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看到这句话,你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回想起马克思那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后你也许会问我:你小子想干什么?

请别误会,我不是在煽动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造反。

海外一友人来信,与我说到这样的事:在西方社会,搞人文与社会学的学者即知识分子大多是左翼,反对资本统治的市场体制与企业制度;而搞经济学的人即经济学专门家(或简称经济学家)大多是右翼,他们中不少人是坚定的自由市场制度维护者。此前,我的另一位友人黄纪苏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有人问起他何以成为新左翼人物时,他回答的理由中有一条就是:在美国接受的是社会学训练,而美国的社会学是左翼的大本营。

而且知识分子批评市场经济、工业社会这一传统十分古老,斯蒂格勒说:“几千年来知识分子都轻视商业活动。”面对汹涌的工业文明与商业大潮,知识分子本能的表现是迷茫、恐惧与反感,并形诸于批评,同时还表达出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几近病态的留恋。

我相信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不同领域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社会与人文学者自己认为,商业社会中盛行的实利主义,破坏了人类社会中本来就存在的美好的伦理价值,同时还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但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因为实利主义是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所怀有的伦理价值观的敌人,而恰在于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中,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利益,从而有失落感。

简单的解释是这样的。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一般来说,他们的私利主要在于政府,他们主张靠为政府公共活动工作而谋生,他们的职业活动在于政府的活动之中。而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私人部门的扩张与政府部门的相对萎缩,同时,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远远超过对于靠搞意识形态为生的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是说,在彻底的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的私人利益的实现可能是没有着落,所以,对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的私利造成了威胁,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本能地反对私人经济的扩张,而支持政府公共经济的扩张,自然也就对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充满了反感与批评。

西方社会的发展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斯蒂格勒在其《竞争伦理学:不友好的批评》一文中举例说,仅就美国高等教育部门,公立教育就养活着近五十万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而倘若真像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将公立学校全部转化为私人性质,学费都由学生支付而不是主要由政府补贴,那么,美国教育部门将大大萎缩:这是因为,预算约束将使学校更讲节约,更讲规模经济。从而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五十万人中将近有一大半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让人文与社会知识分子赞成会砸掉其饭碗的彻底自由市场经济吗?

其实,发出"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种耸人听闻的呼吁,就有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与工业社会不断压迫其生存空间这样的背景。发出呼吁的人不是我,而是美国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位著名学者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据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4年6月5日报道,这位历史上曾参与过美国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曾在其竞选宣传中大声呼吁:“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我们惟一可以失去的是头上的学位帽。”意思是说:全体博士们应该把他们的博士帽集合起来,保卫他们的职业机会,保卫他们的生存空间。《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随着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博士的就业状况日益糟糕。一方面是高校培养的博士数量一直上升,一方面是社会对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博士需求量越来越少,比如哲学专业博士,供给与需求之比为2:1,也就是说,一半的博士将要失业,英语与现代语言专业的学术岗位也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因而,包括史蒂文森在内的那些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认为,如果政府不能马上改变这一形势,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学者们将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毕业的那些博士生们之后,成为第二代“失落的一代”。

西方如此,东西何尝不是这样。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怀有“学而优则仕”的情结,也就是说,他们学习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谋得在体制内的一官半职,他们自己利益的实现也是依托于政府公共部门,所以,与主张“小政府”的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天然不和。因此,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对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空间的压挤,他们不能不发出“哲学的贫困”、“文学的贫困”、“人文精神的失落”这样的感叹,不能不对这样的现实做出反抗。于是,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竟有如此多的批评。

尽管我以上主要介绍的是别人的观点,但经由我的笔下写出,我自己有一种负疚感。我的学界朋友绝大多数就是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字也大多是对于当下的批评;我自己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学者，至多因为专业领域在经济，算个经济学者，我自己的文字也完全相悖于经济学乐观主义传统，也是充满了对于这个时代的不满、愤懑与解构，所以，经由我的笔写出这些文字，其实是说我的朋友以及我并没有超越一己私利。而如果真没有超出自己的私利，那又算一个“无恒产也有恒心”的知识分子吗？

有矛盾，再看书。无意中再次翻看李书磊的《大学之道》，其中竟然也点出了中国历史情境中的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的心灵上的困境。李书磊指出，其实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被我们批评的商业化时代，恰是“五四”那些启蒙知识分子——自然也是以人文与社会知识分子为主体——所呼唤的那个时代，或者说是通向那个时代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的启蒙主义是胜利了。但是这种胜利也就意味着终结。即以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启蒙知识分子步入穷途，知识分子必须放弃师位，退居一隅。但知识分子愿意作这种退居吗？

李书磊这种人文化的表述，换成经济学话语其实与我上而所讲的那些相差不远。

同样是经济学家，也许约瑟夫·熊彼特对于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批评的看法最具“形而上”性质。尽管他也指出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市场前景也是使得知识分子充满了批评的原因之一，但他更认为，批评是知识分子固有的社会作用。他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写道：“知识分子集团不得不吹毛求疵，因为它依靠批判为生，它的整个地位有赖于鳌人的批判。”但这种表面上最具“形而上”性质的论述实质对于“知识分子”神圣性同样进行了最有力的解构：“别以为自己是社会的良心，你批评不过是你的职业，就像牙医为别人洗牙一样。”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大概还能令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聊以自慰的是：无论经济学家如何讽喻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但到今天为止，社会与人文知识分子还是存在的，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制度与资本统治的扩张而消失，尽管数千年来这个群体从来就没有对时代表达出满意过。这如果从经济学的需求原理来说，证明以社会思想文化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始终还是有市场的，还是被健全的社会某一层面所需要的。正如我的朋友、青年学者程亚文所言：我相信我的文字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因此，我不妨再呼吁，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把批判进行到底！

2002 年 1 月 7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知识分子的人生经济学

易中天先生出了一本新书《书生意气》，书一如易先生此前的著述，仍很好读，尤其适合休闲时读。按易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本书的核心讲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做人的问题”。于是，我想到了这么个题目：知识分子如何做人最符合经济学的道理。即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生如何做到收益与成本相抵后的净收益最大。

提到经济学分析人生，就不能不提到加里·S·贝克尔。他写了一本名为《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的书，其主要内容就是说，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即都是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后的结果。只有有利可图的事，人们才会去做。贝克尔的分析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符合经济学规范，否则他也不会因此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我对贝克尔的分析总有看法。一者，贝克尔讲的行为都是短期！即局限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所以，他所讲的净收益，都必须是生前享受得到的净收益。比如，如果一对夫妇决定提高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必定是考虑到自己活着时就能享受到孩子更高的回报。二者，贝克尔所讲的成本与收益，都是可以用价值即美元来衡量的成本与收益。正因为有这两条，如果局限于用贝克尔方法计算人生的成本与收益，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易中天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人生的选择：如顾准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人生、陈寅恪的人生、甚至李泽厚的人生。

其实,这也不能怪贝克尔一个人。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就是这样来算计人生的。在他们看来,当下的即时的选择于己有利,那么,也就对一生有利。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短期机制最佳化就能创造出最佳的未来。"所以,他们拒绝考虑长期,更拒绝考虑"身后事"。用凯恩斯一句很经典的话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大家都死了!"也因此,尽管他们所信仰的教宗《圣经》中一再警告他们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丝毫无碍于他们不择手段急于富起来的做法。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弗里德曼就说过:"在追求私利方面,上帝与圣徒并不亚于撒旦!"既然上帝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我只要有了钱买通了上帝,就可以将那个针眼做得比骆驼还大!

相比较而言,一直被西方人认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计算人生的成本——收益方面反而更多"终极关怀"的东西。数千年前的孔夫子教导说,做文人,讲究立言;做武人,讲究立功;做平常人,也要讲究立德。这"三立",绝不是西方经济学主流中的"短期"以及美元简单衡量的,而更多地关注"身后"即一辈子后收获了些什么。我小时候,乡人常说两句俗语:"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文天祥有两句诗也很明白地表达了这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这很有趣,一个前提,但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人与西方人都认为,我们都是要死的;一到结论,中国人认为,正因为我们都要死,所以要求死后能留下一个好名声;而西方人则认为,正因为我们都要死,所以要及时行乐。

易中天先生书中写的是知识分子做人的问题。易先生在写李泽厚先生时,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的算计写得非常清楚。易先生写道: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这其实与孔夫子所言的文人要"立言"一个意思。如果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什么样的人生是知识分子最经济的人生,就看是否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有意义的话,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行。这个"言"就是人生的净收益!

为了求得净收益,中国传统士人即知识分子往往不计算"短期"成本——收益。相反,从"短期"看,往往还是"失大于得"。陈寅恪,他只要稍稍低一低头,而不是执着于他那"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生信条,他的晚景绝对不会让后人做起文章来时描绘得那么凄凉;顾准更是如此,他如果装一装糊涂,也许就会像某些"官学"那样左右逢源,而不至于会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所以,如果以西学贝克尔之类的短期成本收益分析,陈寅恪与顾准肯定不是理性人,而是疯子。但事实上,我们再设想一下,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如果陈寅恪低了头,如果顾准装了糊涂,也就没有今天被中国知识界一再高抬、奉为楷模的陈与顾了,他们也就没有什么"言"可言。没有立言,对于中国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也就是没有交待,没有"净收益"。既然没有净收益,这样的人生,就谈不上是经济的人生!

当然,最经济的人生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种人生:既不必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又能"立"了很多对后世有意义的"言",这样的人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我说过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样的人生于士人来说不可得。知识分子要想说些真话,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代价多少而已。有一种知识分子,凭其对世道人心的深刻透悟,或能避之一二。如易中天书中所论钱钟书先生,视其一生,与同辈学人相比较,尤其是与顾准先生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先生属于所费成本相对较小,而收益相对更大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那类人。所以，或许他的人生，比顾准先生更“经济”一些。但反过来又想，也正因为有人以钱先生表现出的对罪恶的沉默而诟病于钱先生，其人格上的“净收益”还是要稍逊于顾准先生。

话稍稍说开去。在中国，即便没有类似“文字狱”这样的事，知识分子要想过一种有“净收益”的人生，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要求就很高：即首先做人，然后才谈得上“立言”。用古人的话讲就是：先要“格物、致知、修身”，然后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因此，能“立”一些“言”的知识分子，即有些人生净收益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长的苦苦进行道德修行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甚至只有成本的付出，而没有即时的任何收益可言。他们只有在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后，才能最终留下一些“言”。这也与西方知识分子不一样。在西方，比如大知识分子的培根，其实是一个道德恶棍，但他们首先就没有做人之累。而在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易中天先生在其书的《后记》中说：“我们可以不读书，不做学问，不做知识分子，却不能不做人。做人，才是最根本的。”足见易先生对于人生的算计也仍很传统很传统。

其实，不能超脱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对于人生的成本收益独特的算法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我没有，我的几位挚友也没有。其中有一位朋友，十足文人心性，却因境遇不济而迟迟未见在“立言”上有收获，后来他想放弃他的文字生涯，回到老家鄱阳湖边去承包一片一望无际的农场。走前对我说：“这辈子立不了言，但总要给地球留下点什么，种些树，盖几幢房子，都是标记，我也就没有白活一辈子。”还有一位朋友，在一个深夜给我打来电话，反反复复就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活得这么艰难，到底是为了什么？言到某处，已泣不成声。但收泪后第一句话仍是：“我很珍惜我的这些文字，我相信它们对于世界的意义。”这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两位朋友，过去为文现在放弃，或者现在还在为文的，都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的算计。

但还是有人“超脱”了。越来越多的人宣称：“传统文人将做学问当作追求，当作信仰；而我们仅将写文字当作饭碗！”一旦文字成了纯粹的“饭碗”的考量，我们便看见了其热闹：本来应该以社会与文化批评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就成了跟潮流凑热闹的“英雄”。比如，最近，当美国人以仅次于原子弹当量的重达七千磅的滚地炸弹轰炸他们所谓的“恐怖分子”时，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们表达出与美国人一样的快意。其实他们知道，在时下的世界，他们如此酣快淋漓地表达这种快意，绝不仅仅只会讨美国人高兴！于是，他们的即时收益也就达到了最佳值。这何尝不是一种更经济的人生？

在这时候，我反倒重新觉得从更长远看待人生的成本与收益的知识分子很可贵。也因此，在文字的最后，我要借机表达对于远在千山万山之外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周非女士的敬意。此前我们并不相识，她不辞辛苦地打听到我的联系方法，又几次给我寄来并力荐易中天先生的著述，她其实知道我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所以这样做自然是没有短期的回报的。但从她的作为，我分明看到了我所钟情的传统的影子。

2001 年 12 月 21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自由主义的真精神

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自由主义的真精神应该是宽容，尤其是尊重异见。因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在于坚持某种特定的价值，而在于反对把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的企图”。因为历史表明，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学说或理论，一旦成为整个社会主宰性主导性的“潮流”，那就几乎必然同时会压制排斥其他不同的声音，几乎都会号称自己是惟一正确。这时，就需要自由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对其进行纠偏与制衡。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其全部价值也就在于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权力话语进行持续的批判与消解，以防止其对其他话语造成压制与霸权。西方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在于进行社会、思想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先驱之一的伊赛尔·伯林主张彻底的多元价值论，其理由都在于此。

这也符合哈耶克的思想。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转而从事哲学及政治学研究，并成为与伯林、罗尔斯等齐名的自由主义先驱，其动因不在于他天然地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于他自觉到他所处时代自由遭到了“威胁”。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主张经济计划化以及社会主义化的话语正冲击原有的“自由话语谱系”，并的确对其他声音尤其是对主张自由市场的声音造成压制。或者说，主张经济计划化本身正试图使自己成为一种新的霸权话语，这时，哈耶克才站出来，坚决主张“自然秩序本身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就是一种最好的自由规定”，与凯恩斯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家们的主张构成一种对峙的态势。对此，哈耶克本人说得很清楚，他在他领导的“朝圣山学社”第一次大会致开幕辞时说：“西方人最宝贵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因下述教条的广为扩散而深遭威胁。这些教条……力图确立一种权势的位置，以压制和扼杀除了它们自己观点之外的其他所有观点。”（哈耶克《自由与交流》，邓正来译。收入邓本人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自由与秩序》一书附录。下同）。也正因此，决定了哈耶克本人所构造的一套自由主义理论存在的全部合法性之所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出来发挥另一套理论的制衡与纠偏作用，世界面临着被“计划经济化”与“共产主义化”话语一统天下的危险。

但对一种处于主流位置的权力话语进行纠偏与制衡决不意味着可以用新的话语霸权取而代之，否则就是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而作为旧的权力话语的对立而，新话语本身是取一种对旧话语批评与消解的积极姿态，因而，新的话语成为新的权力话语又是完全可能的。应该说，早年的哈耶克没有丧失这种警惕，即防止自由主义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教条。因此，他在给他领导的朝圣山学社制定“目标声明”时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想进行宣传，也不试图确立任何精致且具有障碍性的正统教条。我们不与任何特定的党派结盟，我们的惟一目的就在于：通过增进那些信奉相同的理想和重大观念的人士之间的交流观点的方式，而为维护和改善自由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他还在大会开幕辞中特别提醒：要使自由有任何复兴机会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着手进行一项巨大的知识工作。这项工作关涉到两个方面的努力：……二是要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问题。因为那些问题是那种过分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所躲避回答的问题，或者说它们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是一些只有在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相当明确而又刚性的信条时才显现出来的问题”。

尽管有人区分开所谓早期的哈耶克与晚期的哈耶克，但我以为，将宽容与尊重异见作为自由主义的真精神，在哈耶克晚期也仍有体现。在其《自由宪章》以及《法律、立法与自由》等著作中，在讨论个人自由时，哈耶克始终强调“人的无知”的观点，并将承认无知的不可避免性作为个人自由的基础。哈耶克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对他人的认识总是有限度的。没有一个人“智慧惊人，能够选择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目标等级序列”。这正如经济学上的效用。效用是消费者对消费某种商品的主观满足程度。因为效用是纯主观的，因而，除非消费者自己通过购买行为可以向外界显示其偏好，否则，每个消费者的效用是其他人无法知道的。用中国人的俗语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脚知道。正因为每个人不可能知道其他所有人的效用函数，所以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对他人构成侵犯，任何人都有自己选择自己认为合意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将自己的效用函数强加于别人，包括国家在内。因而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尊重个人自主选择，这就是自由。而要尊重个人自主选择，宽容与尊重异见又是最基本的准则。

哈耶克本人到底有没有将他自己确立的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贯彻到底姑且不论。但如果遵循自由主义的真精神，或者说遵循哈耶克本人的逻辑，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显然应该不断地根据环境进行话语转换，这尤其应该包括哈耶克本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开始作为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时至二十世纪末，人类历史上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局。今天人类面临的危险并不是那时的共产主义化与计划经济化，恰恰是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世界被资本主义化与自由市场化。所以，在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新自由主义者如果开口闭口仍在讲政府如何如何失灵，仍在讲计划经济消灭了人的自由，仍在讲共产主义如何搞红色恐怖，仍在讲警惕民主被滥用以至于出现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那么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专门通过喊“狼来了”来确认其存在仍有合法性。所以，在新自由主义凯歌猛进的当下，自由主义到了今天这个份上，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由主义本身。自由主义者为维护自由的真义，需要做的是与自由主义教条化导致的自由滥用作斗争。否则，仍靠批判自由主义以外的其他非主流话语谱系过日子，自由主义理论也快到了山穷水尽处。

西方不少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伯林。尽管他主张消极自由，但他在哈耶克等批判罗斯福新政时，却坚决认为新政是本世纪最好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与经济保障之间取得的最富建设性的妥协”。再比如葛雷，作为牛津大学著名的保守派自由主义哲学家，早期对哈耶克的理论十分支持，并对其理论作出过很好的阐释。但近年来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尽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是主张消极自由，批评积极自由会导致激进，会导致“建构理性”，最后会导致“通往奴役的道路”，但其主张消极自由却用的是积极的姿态。因为他是反对罗斯福新政，反对计划经济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后者越来越取一种全面进攻而非当初的保守态势。所以，葛雷近年来一直说，如果哈耶克指责积极的自由导致了“计划乌托邦”，那么，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也可能导致一种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哈耶克曾指责前者是“左派毛主义”，那么，哈耶克自身也是在搞“右派毛主义”。

如果遵循自由主义的真精神，或者说领会了哈耶克自由哲学的真义，中国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对待自由主义及哈耶克的态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度就有可检讨之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界引进、接受并鼓吹自由主义，为过去视为“最顽固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哈耶克翻案，与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自由主义的真精神都十分契合。因为那时我们迫切需要从“左”的桎梏下解放，而“左”最大的特征在我看来就是拒绝个性解放、抗拒世界潮流，所以，在“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位置时，中国知识分子高举“自由市场”与“个性解放”的大旗，当然是应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的自由市场取向的改革功不可没。但中国知识分子也应该及时根据环境进行话语转换，因为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始，“左”的意识尽管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已经不是主流位置；至少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远不如想象的大。用民间的话说，市场经济已经是决了堤的水，想回流已经不可能。现在实际处于主流话语地位的恰就是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由主义话语，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此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要做的也恰应该是对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本身进行深刻反省与批判，防止自由主义本身成为一新的霸权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尤其防止因此而在实践中的僭妄。我们一些知识分子的确这么做了。但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进行这种转换，反而去试图将新自由主义确证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言必称“自由主义”，言必称“哈耶克”，进而发展到将“自由主义”与“哈耶克”作为手中的大棒压制他人。他们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么做时，已经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违背了哈耶克的逻辑，更违背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使命。

2000 年 3 月 12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我很"懒",但我很快乐

今年暑期我回了一趟老家。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来到村头晒谷场上,场上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而在我小时候的夏夜,天还没有黑,村里男女老少都陆陆续续来到这里纳凉,拉家常,小孩子听大人讲故事,大人听小孩子唱白天从小学校里学来的歌。到了冬天,只要出太阳,大人小孩挨着谷场上金黄色的草堆或蹲或坐,边晒太阳,边继续扯怎么也扯不完的家长里短,太阳的光和着从草堆中散发出的稻草暖烘烘的气味,十分惬意。然而,现在再也无法看到这样的景象了。在月光下,我突然发现自己非常怀念那些日子。后来我与乡亲们谈这想法,得到了极广泛的共鸣。

其实我的怀念很是"虚伪"。我不得不承认,在若干年前,我也参加到了谴责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行列。我也接受由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这样的观点:中国农村农民生产效率极低,他们是三个月干活,三个月串门,三个月打牌,三个月过年。也惟其生产效率低,所以,农村就贫困。而且,这种生产效率低下,又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恰是因为农民们不愿意去寻找新的"致富门路",说白了,就是农民懒惰。我记得我上学时,听学校里一位至今仍在浪尖上的大腕经济学家做报告,他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叙西部某地农民在冬天挨着墙根拢着袖子晒太阳的情景,然后又讲到当地政府为了帮助他们脱贫,组织劳务输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出，结果好容易说动了百来号人，送上车子，车出阳泉，所有的人都跑走了。经济学家的报告做到这里，我边上的一位城里学生就叫："这些懒人，饿死不足惜！"我当时竟然也觉得很在理。那段时间，谴责农民懒惰，以及后来进一步谴责计划经济下工人的懒惰，在经济学界是如此之流行，以至于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都被这种观点"洗脑"了。

对这种观点的警惕首先来自于阅读《资本论》。马克思引用了当时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英国失去土地的农民，在一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劳动雇佣制度所必需的纪律"，而这些所谓"古怪的恐怖的法律"，就是惩治当时统治者认为懒惰的流浪者的法律。比如，1572 年伊丽沙白执政时期英国颁布的法令规定，十四岁以上的流浪者，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他再度行乞而且年过十八，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懒惰"竟然可以成为被剥夺生命的理由，而且针对的恰是失去了与土地关联的农民，使我不由心里发悚。于是，对谴责农民的生活方式的懒惰，我也产生了怀疑。

对"农民懒惰"的观点产生颠覆性怀疑，则来自于阅读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的《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一书。迈克尔·佩罗曼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资本主义诞生》这部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所谓"资本雇佣劳动"之谜，或者按他自己的话讲，要解决"资本是如何控制劳动力这一问题"。作者认可并且吸收了马克思已有的关于原始积累理论的成果，同时还讲了马克思没有讲过的新的东西。书中专门有一节名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向懒惰开战》。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按佩罗曼的说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为了为新生资本集团服务，有意掩盖了原始积累问题。在"资本集团残暴地将人们同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分离开来"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随即"加入了谴责懒惰的穷人和游手好闲者的行列"。即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他们游手好闲。

为了对他们所谓的"懒惰者"进行惩治，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了不少主意。除了坚决支持政府惩治懒惰者的立法之外，他们提出，必须"让穷人在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工作"，"当农夫晚上回家，从扬场和耕地中脱身出来，他们可以梳理羊毛、纺线、编织"（约瑟夫·汤森）；他们提出，孩子们四岁的时候就应该投身工作，而不是十四岁（约翰·洛克），"这样可以避免消耗十年的宝贵时光，而这十年中他们无所事事，对工业毫无价值，对道德和智力的提高毫无用处"（边沁）；边沁甚至还提出与其圆形监狱设计媲美的《改进了的穷人管理》，主张工业资本家应该"对穷人拥有绝对的权威"，"对这些穷人进行教化"，以"制造一个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等等。

可以说，正是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穷人懒惰"的理由，为资本家集团在残暴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后，又以残暴的手段将失去土地的农民赶进工厂成为雇佣工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真在为穷人摆脱他们贫穷的处境出主意，那就完全错了。因为包括十八世纪大经济学家扎·奥特斯在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同时提出，为了使这些"懒惰"的穷人"屈从于雇佣"，必须使他们保持贫困的状态。让这些穷人"除了不断从事各种生计活动外，没有别的财产和生存手段"。为此，他们赤裸裸地说："贫困是社会中一个必需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缺少了它，国家和社区就不能以一种文明的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态存在。这就是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财富的源泉。因为没有了贫困，就不会有劳动力的存在，就不会有财富，不会有文雅，不会有舒适，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就不会有利益。”（帕特里·考克豪恩）“除了白痴外，每个人都知道，必须给那些乡村里的穷人人为制造不足，使他们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变得勤快。”（阿瑟·扬）在这里，他们终于露出了对穷人的狰狞面目。

了解了这样的一段政治经济学史，我终于彻底地对“农民懒惰”的理论产生了怀疑。我意识到，这可能是资本社会所制造出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所有的社会在进入资本统治社会之前，大概都会制造这种意识形态。君不闻，有人在总结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时就说：“因为前苏联制度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懒汉最多的国家”；面以前惯于称赞中国人民自古勤劳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始，突然转而说“中国农民懒惰”、以及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制度养懒了工人阶级”，这与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资本社会发轫时说“穷人懒惰”，难道就没有什么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其实，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生活方式中的中国农民，一年就算只有三个月时间在干活，也不能说他们是懒惰，因为这是前资本社会中所有的农民几乎都共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十七世纪之前的欧洲，农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据乔安·约斯克估计，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当时北欧居民三分之一的工作日是在闲散中度过的，卡尔·考茨基则认为，在中世纪的下巴伐利亚地区，农民每年要过 204 个节日。这都与当时的中国农民生活类似。

尽管农民用于真正干活的时间较少，但农民的生产效率相对于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并不低，相反还生产出巨大的剩余价值。佩罗曼说，在英国的封建社会，尽管强大的贵族每年从农民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手中掠夺50%的产出,农民仍然活得下去;就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初期,一半土地已经被夺走,大多数农民仍然可以得以在很少的土地上维持生存;而且如果不是后期原始积累过程越来越残酷,大多数农民也仍会选择以土里刨食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在中国,如果不是"人祸"导致,如果不是政府向城市集团一边倒的政策,谁也不会怀疑,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民,也完全可以凭三分之一的时间生产维持自己较好的生活。

农民们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去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享受去了!佩罗曼说,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欧洲农民,就是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劳动,剩下的时间里,"虽然生活标准可能不会过于奢侈",但农民"从空闲时光中得到了极大的享受"。而那些数不清的宗教节日,也是农民们为了享受闲暇,打断工作节奏有意发明并保留下来的。我想,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农民,他们尽管生活上比较清贫,但他们的确也从夏夜纳凉、冬天晒太阳,没有事情家家户户串门、闲谈中体会到了生活的乐趣吧。尽管以今天资本社会的眼光看,他们是"懒",但这种"懒"一定程度上是这些农民们的自愿选择。因为他们能从这种"懒"中享受到快乐!

可惜这种生活方式被结束了。资本统治的展开不仅打断了农民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以其单向度的标准,赋予了这种生活方式以"懒惰"的称谓。新兴的资本集团与统治集团合谋,倒是让农民们勤快了,但农民们得到了什么呢?1803年的英国工人司彭斯说:"我们不是每星期工作六天,而是被迫承担八天或九天的工作量,但还是难以糊口……老板不断叫着:干活,干活,你们太闲散了……上帝保佑我们,我们落入了自古以来最狠心的雇主手中!"一百九十年后的1993年,一位从中国四川农村到深圳某玩具厂当雇工的叫拥华的小姑娘在被大火烧死前写给女友的信中说:"老板要我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要工作到十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点。我快撑不住了，我担心明天我就会累死在车间里……来了两个多月，分文没发，也不给厂牌，身份证也扣下不给，现在我处在痛苦之中。我每天发段子烧，烧得我想死，想蹦想跳，又贫血。”(《遇难打工妹书信一束》，见《天涯》2000 年第 5 期)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西方经济学家却一个劲鼓吹所谓“劳动力供给的向后弯曲曲线”。他们说，当工资水平高过一定点后，劳动力对闲暇享受的需求超过对工资的需求，所以，劳动力就选择闲暇而不是选择工作！于是，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日的确在不断缩短，但广大外围国家劳动力工作日却正在延长；在中国，城里人的工作日也已在几年前由六天变为五天，但被裹挟进现代化的进城农民却不分白天黑夜在劳作。

“即便他们进城是当奴隶，但也是他们自愿的！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农民并没有被剥夺土地。”中国某些言必称“自由”的学界精英们如是说。的确，切断中国农民与土地脐带关系的过程，表面上看，绝对不是马克思以及佩罗曼笔下残酷的原始积累。而且也因此，我自己一向认为，政治领导人始终说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里。但这仍然无碍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农民也是被迫进城的，他们已经不能指望从越来越少的土地维持生活，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利用政府公开的统计资料都不难算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从农业中挣的那点钱，在刨去不断抬高的工业制造出的成本，刨去农业税，刨去乡村官吏们的工资，已经成了负数，这种情势下，农民不进工厂还能选择什么道路？在马克思与佩罗曼那里，其实就论述了这样一种温和的“原始积累”过程：“不是用武器，而是用巧妙的税收和明智的条例”，即由威克菲尔德提出过的，由国家出面，使自耕农因不堪重负而放弃自耕地！当然，在中国还有另外的两种：一种干脆是由政府出面强制征地，搞开发项目；还有一种是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相对温和的"收买",前面我所说的那位浪尖上的大腕经济学家兼经济立法过程中的核心人物最近又放出高论:我保证能让农民致富。只要他们都把土地卖给我,搞集中经营!

尽管我本人一向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学家,但我仍不满于我以上文字还有太多的经济学意味。乔安·瑟斯克在其《圈地与独占》一书中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尽管不少经济学家都谈论圈地运动的经济上意义,但"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衡量出我们失掉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完全意义"。的确,为了某种需要,今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也与佩罗曼笔下的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仅仅用可换算的价值,来判断"勤劳"还是"懒惰",判断"先进"还是"落后"。佩罗曼就说,富人们更游手好闲,但经济学家不仅不谴责他们的懒惰,还"为富人的消遣欢呼"。由此可见,"懒惰"这个词在资本统治的社会中,与类似"自由主义"这个词一样,其本来的面目完全被颠倒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无由地觉得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家"让-萨伊竟然有几分可爱。因为他提出,"效用",即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时的满足程度,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就拿生活方式来说,是"懒惰"地过一种低水平但却能充分享受闲暇以及交往的生活,还是"勤劳"地过一种可以换来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金钱但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任何自由的生活,哪种生活幸福,不在于可换算的金钱有多少,而在于主观感受。就人的本性来说,"只要有可能,就不愿意被强制",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前一种生活方式。佩罗曼就说,爱尔兰妇女"厌恶在工厂工作。她们不愿放弃她们假想中的独立,情愿选择贫困,而不愿选择被工厂雇佣禁锢和忍受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爱德蒙·摩根也注意到,在殖民地弗吉尼亚,尽管经常存在饥饿和营养不良,人们宁愿选择更悠闲的经济方式来维持生计。这样看来,十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七世纪之前的欧洲农民，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农民，以及被我们那位大经济学家批评过的不愿进城打工的中国西部农民，他们愿意选择“懒惰”、低水平但有享受的生活，作为鼓吹市场给人带来选择的自由、鼓吹崇尚个性的经济学家与学界精英们，似乎不应该群起而谴责，相反还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让－萨伊在这点上做得很好。他在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针对后者谴责“穷人的懒惰是一种本性”时说：“先生，我不想指出您的国家的一部分图景……但是，如果社会生活像一条苦役奴隶船，人们一天 24 小时中的 16 小时都在竭力划船，那也难怪他们不喜欢社会生活了。”

即便没有人性的标准，仅就生活方式给生活中的人的“效用”而言，也只有生活中的人自己知道。而经济学家不是都认为经济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吗？所以，经济学家也应该尊重农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因为你无法知道他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的主观满足程度，更不能先验地以资本社会的标准认为，前资本社会的农民生活方式很“懒惰”，很落后。除非他们有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目的。

两千年前，中国有一位叫庄周的智者就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不快乐呢？我之所以怀念小时候的农村生活，也恰是因为：我们很“懒”，我们也穷，但我们就是很快乐。

2001 年 10 月 2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为什么总是美英出来充当"老大"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一

今天我给学生开关于中国加入 WTO 问题的讲座，有人当场提问：按理说，WTO 是个世界性贸易组织，但为何中国想加入进去，独独与美国、欧盟等谈判这么艰难，且对方要价如此之高？其他已经是此组织的成员国为什么都作壁上观？难道他们不想从对中国要价高中得到好处吗？

这位学生提出的现象，其实不仅在国际经济领域存在，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普遍存在。比如科索沃战争。尽管发动这场战争是北约集体决策的一种结果，实则不然。在北约内部，美国与英国对发动科索沃战争最感兴趣，而其他北约成员国积极性不大。但在美国与英国的怂恿下，其他北约成员国也做了"跟屁虫"。这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何独美国与英国首先要求并成为战争的始作俑者，而其他北约成员国积极性不大，但却不仅不反对美国英国操纵北约，反而也跟着上了呢？

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案例，叫做"聪明的猪"。说一个猪圈里生活着一头大猪与一头小猪，但这两头猪是聪明的猪，其聪明就体现在它们各自能根据对方的行为有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现在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安装一个进食按钮，按一下按钮就会有 10 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谁按按钮就要付出 2 个单位猪食的成本，并且成为后一个进食者。若大猪先进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能吃9个单位，小猪只能吃一个单位；若同时到，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若小猪先到，大猪吃6个单位，小猪吃4个单位。在此情况下，给出两猪不同行为选择后的支付水平如下：

		小猪	
		按	等待
大猪	按	5,1	4,4
	等待	9,-1	0,0

第一格表示两猪都去按按钮因而同时进食，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但因为都要付出按按钮的2个单位成本，因而，大猪吃5个单位，小猪吃1个单位，其他情形可以类推。

显然，无论大猪是选择按按钮，还是选择等待在槽边，小猪的最优策略都是选择等待。因为小猪会想，如果大猪去按按钮，我选择等待，可以进4个单位猪食；而我如果也去按按钮了，只能进1个单位猪食，因而，我要等待。如果大猪不去按按钮，我更要选择等待，这样我至少保证不亏1个单位猪食。因此，聪明的小猪无论大猪进行什么选择，它都会稳待在槽边，等着搭大猪的便车。

而大猪的最优选择则必然是去按按钮。因为它知道，聪明的小猪一定会选择等待，而若它也等待，则它什么也吃不到；它若去按按钮，尽管自己有2个单位损失，也尽管被小猪搭了便车沾了便宜，但毕竟还可以吃到4个单位猪食。

在中国入世及科索沃问题上，美国与欧盟（英国）就相当于这个案例中的大猪，而其他北约国家则相当于小猪。尽管美国与欧盟（英国）都知道，由它们出头与中国这样一个对手谈判中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更知道它们积极怂恿对南联盟动武会付出一定的成本（2单位猪食），但因为它们更知道它们不出头没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人会出头，而它们出头整体上看对它们还是有所得的，所以，它们还是会不厌其烦地与中国人坐上谈判桌，它们还是去按动了科索沃战争的按钮；而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些国家知道，一旦美国、欧盟与中国谈妥了，中国担当的义务同时会使这些国家受惠；而美国、英国决定动武也可以使北约其他国家"分一勺羹"。但这种受惠、这"一勺羹"，又还不到值得它们自己去与中国要价、去按动战争按钮的份上，因而它们很消极，但它们决不会反对美英充当"老大"，因为它们也乐得"搭便车"。而且，与此同时，它们很清楚"冤有头，债有主"，中国与南联盟会把账算在"大猪"身上，而它们不过是"小猪"，所以，它们还不忘记在媒体上"作秀"，常说些与美、英观点"不尽一致"的"风凉话"。

由此，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为什么美国喜欢搞霸权，而西方主要国家却愿意美国充当他们的"领导者"？其实美国人也十分清楚，搞霸权是要付出代价的。但由于关涉到美国的利益很大，大到扣除代价后仍有剩余。所以它还是要搞霸权；而其他国家知道，可以从美国的霸权行为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但这种好处还没有大到超过自己亲自去搞霸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它们也就默认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2000年9月3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沉默的大多数”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二

我曾经很“放肆”地在课堂上说过，在既有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中，不要指望“正义”与“真理”能占上风；实际情况往往是强权压过前者。而一些弱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想得到他国的同情却越来越困难。

这话很快不幸言中。北约对科索沃动武的第二天，应俄罗斯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通过俄罗斯提出的“关于要求北约立即停止对南斯拉夫轰炸”的议案。结果，与会十五国中，除俄罗斯与中国投了赞成票外，其他十三国竟都投了反对票，一时成了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少见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这不仅进一步为北约轰炸南联盟制造了藉口，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使人们彻底地对联合国是否可以主持正义产生了怀疑，甚至使人们对进步史观产生了动摇。这里的问题是，“沉默的大多数”现象是如何出现的？

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戈登·塔洛克专门研究过“沉默现象”。按他的说法，要使经济主体打破沉默，选择“革命性反应”，必须使它认为选择“革命性反应”的收益大于“保持沉默”时的收益。现在假设一辆行驶的汽车上有一个强盗，有两个旅客。两个旅客间没有任何事先联手对付强盗的契约安排，且本来就相互不信任。因为强盗足够强大，在实施抢劫中如果任何一个旅客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择"革命性反应",意味着他不仅会失去财物,还有可能失去生命,其收益是-8,而选择沉默的旅客从选择斗争的旅客的斗争中获益(如趁机跑走了),收益为6;而如果两个旅客都表示沉默,尽管有财物损失,但无生命之虞,其收益是-2;但如果两个旅客共同选择"革命性反应",都有一定损失,但可以对付强盗,但收益是1。收益支付表如下:

		旅客A	
		斗争	沉默
旅客B	斗争	1,1	-8,6
	沉默	6,-8	-2,-2

按理说,两个旅客都同时选择斗争是最好的。但结果是两个旅客都会选择沉默。因为A旅客会想,另一旅客B的选择无非有两种,要么沉默,要么斗争。如果B沉默我斗争,我的损失是8个单位,如果B沉默我也沉默,我的损失仅2个单位,所以我要沉默;如果B斗争我沉默,我会得6个单位的利,如果B斗争我斗争,我也才得1个单位的利,因此,我还要选择沉默。因而,无论对方选择斗争还是沉默,我的最优选择都是沉默。另一旅客B也是理性经济人,因而,也会有A同样的策略选择过程,也会选择沉默。于是,面对强盗抢劫,两个旅客竟都示以沉默。

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停止轰炸议案时,美、英等北约国家就相当于大强盗,而安理会其他国家就相当于上述案例中的旅客,一方面又没有事先达成团结起来反对霸权的默契,相反都以本国利益为重,打自己的小算盘;另一方面更惧怕如果贸然与北约斗争,可能会因势单力薄不仅达不到斗争的效果,相反还使本国利益受更大损失。因此,出现联合国历史上少有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倒是我们要清醒：不要认为这个世界一定在向着善；恰相反，至少现在还要狼。生活在有狼的世界，又不能指望有猎人打狼，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学会狼叫”（列宁语）。

2000年9月10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俄罗斯的威胁为什么没有用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三

当下的大国关系中，俄罗斯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其孱弱的国力已经使它实际上失去了支撑大国地位的最重要的财力，所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眼中，俄罗斯绝对继承不了原苏联在国际问题上讲话的份量；但另一方面，当俄罗斯真正出来表态时，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又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怕不仅仅用俄罗斯是有核国家就可以解释的。

我们仍来分析科索沃战争。自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以来，俄罗斯的态度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一开始坚定反对，甚至发出“有可能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警告；但在北约不理会警告的情况下，俄罗斯竟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再后来，俄罗斯主动在南联盟与北约之间进行斡旋，实则是让南联盟接受北约的条件；而八国外长刚通过和平方案，俄罗斯军队却又出人意外地抢先进入南联盟并占领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机场，而此时，北约又被迫默认了俄这一行动，并另外找地点设立指挥部。这一切，该如何很好地解释呢？

在产业组织经济学中有一个博弈案例。设想有一个垄断企业已经占领了某一产品市场（称为“在位者”），另一个企业虎视眈眈想进入这一市场（称为“进入者”），在位者想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就要阻止进入者进入。进入者有两种选择：进入或者不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进入;在位者也有两种选择:默认还是斗争。假定进入者进入之前在位者垄断利润为300,进入者进入后寡头利润共100,二企业各得50,进入者进入成本为10。各种战略组合下支付矩阵如下所示。

		在位者	
		默认	斗争
进入者	进入	40,50	-10,0
	不进入	0,300	0,300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对于在位者来说,策略选择变得十分微妙。如果进入者选择进入,在位者只能选择默认,因为如果它选择斗争将一无所获,而选择默认犹能保持50个单位的寡头利润;而如果进入者选择不进入,在位者最优选择是斗争,因为可以保持300个单位垄断利润。而对于进入者来说,最优策略就是进入,因为他知道,在位者的斗争只有在进入者不进入时才有意义,而在进入者下定决心进入时,在位者一定会采取默认的态度,因而,在位者的斗争在博弈论中称为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

在科索沃问题上,南联盟过去是俄罗斯势力范围,俄罗斯相当于"在位者"。北约想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俄罗斯的地盘上,相当于"进入者"。北约在制造动武的舆论以及动武之初,俄罗斯态度十分强烈,其实这种强烈仅仅是在北约还未真正动手时的一种斗争,是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所以,北约并未理睬这种威胁,终于动武。而"与叶利钦的身体状态相类似的俄罗斯"此时也只得咽下这口气,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俄罗斯其实十分清楚,如果它在北约已经动武的情况下继续斗争,结果不仅保不住自己所有的既得利益,最后恐怕连"别人吃肉我喝汤"的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格也没有。因为此时的俄罗斯国力太孱弱，且有求于西方的太多了。至于它主动在北约与南联盟之间斡旋，就是为了保留“喝汤”的资格。

但在八国外长达成和平协议时，俄罗斯出人意料地首先出兵科索沃并占领其首府机场，而北约也被迫接受这个现实，则用博弈论另一个案例“斗鸡博弈”可以解释。

设想两个对手 A 与 B 从独木桥两端走向桥的中央，在相遇时每个人都有两种战略选择：继续前进，或退下阵来。若两人都继续前进，则两败俱伤；若一方前进另一方退下阵来，前进者取得胜利，退下来的丢了面子。若两人都退下来，两人都丢面子。支付矩阵如下

		A	
		进	退
B	进	-3, -3	2,0
	退	0,2	0,0

显然，对于 A 来说，如果 B 执意要进，它的最优策略是退下来苟全自己；对于 B 来说，如果 A 执意要进，其最优策略也是退下来。但最后究竟哪一方执意要进，哪一方退下来，则很有讲究。在现实中，往往是事先已经丢过面子的一方进，并首先将威胁付诸于实践。

冷战时期，俄美是对峙的双方，但却从未直接交手。并且如果一方已经抢占了一块地盘，另一方也设法在其他地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与对手抢同一块地盘，就是因为一方进、另一方必退是斗鸡博弈中的均衡点。但在科索沃问题上，北约坚持动武并逐渐升级使俄罗斯觉得丢了面子，所以，在八国外长刚达到和平协议，它抢先进驻科索沃并占领机场，就是要挣回面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子;而且,进驻及占领本身是将原来"不可置信的威胁"变为一种"承诺行动"(当事人使自己的威胁战略变成可置信的行动),即摆出了"我一定要先过独木桥"的态势与准备,此时,北约的最优策略自然是退下来,默认了俄罗斯的行动。因为北约也清楚,孱弱的俄罗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给逼急了,"狗也会跳墙"。

2000 年 9 月 17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透视道德领域的"沉默现象"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四

翻看早上的《晨报》,有报道说某公园湖边一小孩落水,围观者众,却没有人去救;最后是一个老者下了水……

道德领域的"沉默现象",是指在某种公众场合,需要有人出来维持正常道德秩序时,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哪怕是说一句话。

这种现象在今日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公共汽车上,歹徒公然抢劫,没有人出来抗争;游人如织的公园内,一小孩不慎滑入湖中,没有人救助;甚至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一军人与罪犯进行殊死搏斗,围观者众,却没有人援手……

这种现象在今日中国社会道德领域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媒介每报道一次"沉默现象",总能在社会上引发不小的反响;而每一提到道德体系重建的必要,都又提起"沉默现象"。

而问题的微妙之处还在于,每次由"沉默现象"引发的反响,痛心也好,激愤也好,"沉默现象"在中国仍此起彼伏。

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沉默现象",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承认个人道德行为动机的功利性。即一个人在选择某种道德行为时他存在追求收益最大化倾向。只不过这里的收益不纯粹是价值收益,还包括名利、地位等非价值收益。

这种假设对于"沉默现象"作经济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否就亵渎了道德行为动机的纯洁性呢?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确，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都十分重视个体道德行为动机的纯洁性。康德认为，惟有遵从道德法则动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才能体现人性的崇高与伟大；黑格尔也认为，从理性上讲，道德行为的动机就是我们称之为道德的东西。但不幸的是，尽管我们一方面要追求道德动机的纯洁如彼，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至少今日世界人们的道德行为动机仍很复杂。恩格斯也说："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个人的怪癖。"

退一步讲，如果个体道德行为动机真纯洁如彼，受这种发乎自然性情的动机支配，所有的"沉默现象"都不复存在了。可惜的是，事实不是这样。

我们先讨论一个最简单情况。

假设一辆行驶的公共汽车内，只有两个乘客，乘客 A 与乘客 B，两个人道德动机的纯洁程度均等，无事先性契约，即事先未就旅行安全问题达成某种合作约定，两个人对彼此不抱有信心，并且不是军、警等特殊职业者。现在一个歹徒要抢劫财物。

我们引人"革命性反应"一词，表示对歹徒抢劫行为的抵抗性反应。

我们用 R 表示乘客进行革命性反应的可能性大小，B 表示乘客革命性反应成功后收益，可以是正值，表示成功后得到诸如表彰、领取"见义勇为奖金"等等；但也可能是负值，即成功后反而陷人媒体报道过的所谓"英雄流血还流泪"的处境。用 P 表示革命性反应成功的概率，即有效制止歹徒的概率，D 表示从革命性反应中得到的收益，如对个人已有财产、名誉、地位等的保护程度，用 C 表示革命性反应中付出的私人成本，不仅仅指价值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形态的损失,还包括生存权的可能失去。

我们引人与用以解释投票者行为相同的戈登·塔洛克模型:

$R = BP + D - C$

R 的大小便决定了乘客对歹徒行为进行革命性反应程度的大小。

我们再假设两个乘客中只有一个乘客进行革命性反应时,其中有革命性反应的乘客与示以沉默的乘客收益分别为 R1、R2;假设两个乘客都进行革命性反应时,两乘客收益均为 R3;假设两个乘客均示以沉默时,两乘客收益均为 R4。以下我们确定 R1、R2、R3、R4 大小关系。

以下两个结论应该是大家都认同的公理:

结论一:两个人都进行革命性反应时的成功概率 P 最高,且私人成本 C 最低,对个人已有收益保护程度 D 最高。故收益最高。

结论二:当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进行革命性反应,而另一人示以沉默时,因歹徒注意力集中在进行革命性反应的人身上,所以,对进行革命性反应的人来说,P 最低,C 最高,D 最低,故收益最低;而对示以沉默者来说,因 C 较低,故收益比前者高,且比两个人都示以沉默时的收益高。(因两人示以沉默时,没有人会因为歹徒注意力转移而使其 C 降低。)

于是有以下关系存在:

$R1 < R4 < R2 < R3$

这样,两乘客实际上进行了一场博弈。无论是 A 还是 B 都知道他自己以及对方的战略选择空间,要么进行革命性反应,要么沉默;且无论是 A 还是 B 都知道以上两条公理,即知道各种选择与收益间因果关系。

以下我们用标准型表示此博弈过程。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A	
		反应	沉默
B	反应	（R3　R3）	（R1　R2）
	沉默	（R2　R1）	（R4　R4）

以上四个方格表示四种不同的战略组合，方格括号内左面表示 A 乘客收益，右面表示 B 乘客收益。

现在我们检查四组战略组合的稳定性。

（1）A 进行革命性反应，B 也进行革命性反应，两人收益均为 R3，最大。但这个组合存在不稳定性。因为在无事先性契约、对彼此又不抱有信心情况下无论是 A 还是 B 都害怕对方选择沉默战略，导致自己收益为 R1 最小，所以 A 与 B 都存在转移战略的可能性；

（2）A 示以沉默，B 进行革命性反应，此时 A 收益为 R2，B 收益为 R1，也属不稳定性组合。因为 B 与 A 无事先性契约，又对 A 无信心，所以想转移战略到“沉默”，这样他的收益至少可改善到 R4；

（3）A 进行革命性反应，B 示以沉默。这种情况与（2）同，是不稳定组合；

（4）A、B 都选择沉默，此时其收益都为 R4，这是一种稳定性组合，因为两人都知道，如果转移战略选择，其收益可能会由 R4 降到 R1。所以没有人会单方面转移战略选择。

对博弈论稍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囚犯难题”。

也就这样，“沉默－沉默”便成为此次博弈过程的纳什均衡点，“沉默现象”理所当然地发生了。

现在我们再将汽车内乘客数增加，其他条件不变，结果又会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如何呢?

对于汽车内任一乘客来说,此时的思维方式也是"二分法",他在这种博弈场合考虑的是"别人怎样,我怎样",而不是将汽车内每一个人可能的战略选择都思考一遍。这样,他本身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成了参与博弈的另一方,与上文中 A 与 B 两人参与博弈没有不同,只不过这里的 B 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合体而已。所以,多人汽车内,当歹徒抢劫时,最后出现的也是"沉默现象"。

现在我们将博弈的次数增加,如果条件不变,显然,"沉默现象"一直会延续下去。这样,"沉默现象"在没有外在的强制性力量存在时,是一种与无政府状态下霍布斯自然状态相同的自然状态。一旦陷入其中,想摆脱这个困境远非易事。尽管这种结论是很令人灰心的。在媒体讨论"沉默现象"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沉默者心灵麻木、感情冷漠,否则他们应该打破沉默;但通过以上对沉默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其实,所有的沉默者都十分清醒,不是他们要任凭摆布,也是他们在经过精心的算计后,不能不任凭摆布。他们的沉默对他们个人来说,在那种环境下都是最理智最经济的一种选择。

话题稍远些。有人说,经济学最重大的成就在于证明了抱有纯合理利己动机的个人,能够通过自发的交易来共同获利;但博弈论在经济学界亮相后,还道出了另一面:纯利己动机的个人,也会因追求哪怕是合理的自利而对整体造成危害。在需要有人出来维护正常道德秩序的时候,仅因每个人都想损失小些,收益大些,而造成"沉默现象",给道德以致命伤害。

2001 年 5 月 14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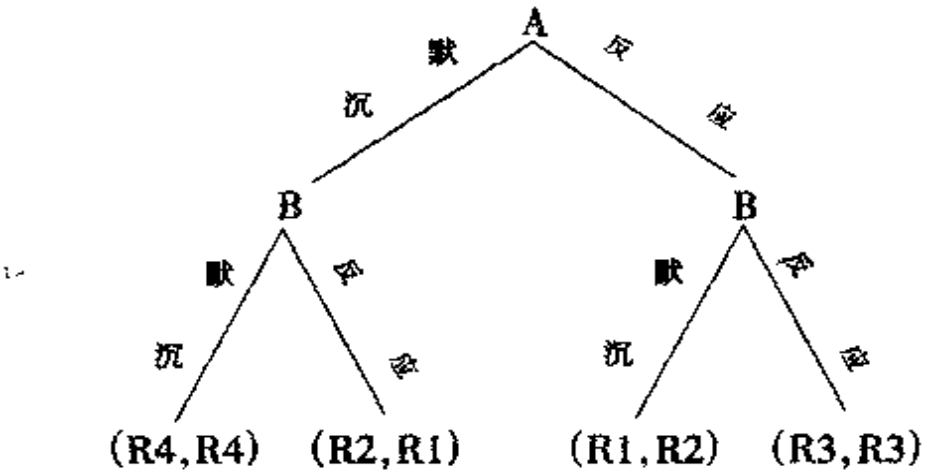
打破沉默:方法在哪里?
——博弈论应用趣话之五

接着上次的话题。对只要具备一点判断能力的人来说,都希望能达成"反应 - 反应"这样的战略组合,因为对双方收益都最大。从经济学角度看,从"沉默 - 沉默"向"反应 - 反应"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我们再从最简单的汽车上只有两个乘客开始讨论。

博弈开始。

我们首先假设这是一次有先后选择秩序的过程,即一个乘客也作选择,轮到另一个乘客选择时,他是理性的。假设是 A 先选择,则有下图:



图上有两个均衡点。当 A 选沉默时,B 也只能选择沉默;当 A 选择进行革命性反应时,此时,B 如果是理智的,他也将选择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进行革命性反应以达到收益最大。

问题在于如何剔除第一个均衡点,让 A 先选择进行革命性反应呢? 假设 A 与 B 其他条件均等,且无外部强制力存在,我们则只能期望:

(1) A 的道德行为动机纯洁性高于 B,这样,在战略选择与收益组合不变的情况下,A 可能会因道德行为动机纯洁性高而出于自然性情先进行革命性反应。

由此,可以看出,在"沉默现象"此起彼伏的今日中国社会,需要有英雄存在;由这些道德行为动机相对纯洁的英雄先来打破沉默,然后一呼百应。

在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中,一些知识分子说这个时代不需要救世精神与英雄主义,应再慎思之。

(2) A 对 B 抱有信心,认为 B 无论先后总之是一定会进行革命性反应的,所以他就先进行反应。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今日中国社会,重新营造百姓与百姓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再假设存在一种事先性契约,使战略选择与收益之间的组合改变。

有这样几种情况可以讨论:

(1) 建立一种奖励与惩罚制度。这种奖励与惩罚制度就成为博弈规则。假设汽车内的人受到这种事先性契约约束,一旦有谁选择进行革命性反应,所有损失的私人成本将得到补偿,无论成功与否,反应后收益都超过反应者原有价值与非价值财产;而一旦有谁选择沉默,他将受到严惩。且惩罚使其蒙受的损失超过他选择沉默时的收益。这样,从理论上讲,乘客都会选择进行革命性反应。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需要重奖见义勇为者。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但至今中国社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惩罚“沉默”者。

要制定奖励与惩罚制度，即制定博弈规则，只能靠公共机构发挥作用。因此，政府在道德体系重构中是要有所作为的。这也符合公共选择理论。缪勒在其著作《公共选择》的一开头就论证，正因为需要走出“囚犯难题”，摆脱霍布斯自然状态，所以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以“建立每个人的财产权和行为约束的‘宪法契约’”。

(2) 建立小团体内部契约。如果 A 与 B 之间事先商定，在遇到歹徒抢劫时，都选择“反应 - 反应”这样的战略组合关系，并且假设 A 与 B 组成的小团体有时延性，即类似情况下的博弈可能在今后要多次重复，则建立起小团体内部的契约是有效的。因为此时无论是谁，尽管他可能会因破坏契约而暂时达到了趋利避害目的，但在以后博弈时，就有因被团体抛弃而导致收益更低的可能。

由此，在需要重建道德体系的中国社会，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提倡团队精神，是极其必要的。这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参与者都有集体感，哪怕这种集体是非工作联系性质的临时集体。

(3) 发挥特殊职业者作用。在中国，从事军、警、党、政等职业人员，一方面，其受约束程度远高于其他职业者。比如，军队与警察都有规定，在遇到歹徒做坏事时，必须挺身而出，否则，他会受到相应处分。这样，他在不挺身而出时，个人已有的主要是非价值形式(主要是名誉、地位等)损失反而更大，所以他们在权衡收益的基础上，会打破沉默；二是这些特殊职业者道德行为动机纯洁程度从理论上讲应该高于普通百姓，所以，受自然性情支配后打破沉默可能性也大。

最近，政府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搞好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党风；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军队与警察要走在全社会前列。对打破沉默现象是很有益的。

写此文时，恰逢中国新文学大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笔者总想着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要先使中国由无声变为有声，这样中国才有希望。在道德体系重构过程中，我们是否也先应想办法消灭沉默现象，在应当有人出来维护正常道德秩序时就有人出来发第一声，这样，新的道德体系也便在这许多的第一声中得已逐渐确立。这也是笔者煞费苦心从经济学角度讨论“沉默现象”主旨所在。

2001 年 5 月 22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常识的胜利
——信息经济学趣话之一

去年六月中旬，原《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先生给我寄来了两本由他主编的《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备忘录》一书，其中一本是给我的，另一本是托我转给海外崔之元先生的，因为其中收录了我们两位的一些文字。不久以后，两本样书皆被友人借走，借走时都说好不久就会归还，而真到之元兄快回国，我向友人催要还书时，两位友人都说被他们自己的朋友借走，并又被朋友的朋友借走……如此这般，书已不知传到了谁手中去了。我很着急：自己的书不见了好说，之元兄的样书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了啊。于是，我便想赶快买一本补上。几天内，我几乎遍访了北京的各大书店，却怎么也没有找到这本书；我再托我在南京的朋友在南京给我找一找，南京的朋友跑了数家书店，也没有找到。我又在京城几家认识的书店老板那里做了登记，让他们务必赶快进这本书，奇怪的是，他们说在批发市场上没有见到这本书。这样，之元回国时，我还是没有找到这本书。我只好将稿费先给了他，并答应以后再将样书给他。之元走后，我每次逛书店都会留心这本书，但一直寻觅而不得。我几乎都绝望了。

去年十一月五日晚，朋友张广天导演的《红心美女》举行首演，请我们去看。因为怕遇到堵车，我出门很早，但一路出奇地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顺利，话剧七点十五分开演，而我六点四十分便到了人艺。为了打发中间的时间，我便到了首都剧院斜对面不远的一家小书店闲逛。逛了很久，并没有什么中意的书，正打算离开，目光在最后一个角落的书架上溜过，这一溜不要紧，我突然发现十分熟悉的灰蓝色封面的《精神档案》。我几乎是扑了过去将书抽出来，真正体会了一次"独上层楼，望断天涯路"之后"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兴奋；或者用另外两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寻找一本书的故事，足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现实的市场上，有人想买，有人想卖，但因为想买的人不知道想卖的人在哪里，想卖的人也不知道想买的人在哪里，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信息不对称，这笔交易未必会成功。正如我买那本书，那个小书店主人进那种书一定是想找到买主，但我这个买主到处在寻找这本书，竟然长久以来不知道它就躺在首都剧院斜对面的小书店里，如果不是去看广天的话剧，想卖这本书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我正想买这本书；想买这本书的我也不知道有人正要卖这本书。

这道理够简单的吧，简直是常识！但就这么一个常识，在经济学上却被蒙蔽了许多年。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学界流行的理论一直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说，买者知道所有关于卖者及其商品的所有相关信息，卖者也知道所有与买者相关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买卖能否成功，全看价格是否合理。而在买者与卖者都是理性的情况下，总存在一套买者与卖者接受的价格体系，使买卖顺利实现。说白了，就是说，这个社会中，想买的人总能买得到，想卖的人总能卖出去。买卖既然能顺利完成，资源配置也就最有效。这就是由经济学家阿罗与德布勒合作发明的所谓"阿罗-德布勒定律"。阿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此有关。

率先向阿罗-德布勒定理挑战的是斯蒂格勒。他申辩说，现实世界中，信息不可能是完全的。正因为信息不完全，所以，消费者在买东西时，要去多个商店，对价格与质量进行充分的比较后才会买。而厂商为了让信息不完全的消费者在众多商品中买自己的产品，也会以广告宣传促销造势等各种方式来提供信息——甚至有的伪造虚假信息。应该说，斯蒂格勒所讲的也是常识，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阿罗-德布勒定理。

真正将颠倒了常识的阿罗-德布勒定理再进行彻底颠倒的经济学家是斯蒂格利兹。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斯蒂格利兹写作了一系列的论文与著作，论述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交易行为，从而形成了以信息不完全为基本前提的另一经济学体系，称为“信息经济学”。使经济学获得重大进展，他本人也因此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他的三大贡献中，第一条就是揭示了我上述的常识：有人想买，有人想卖，但因为信息不完全，买卖未必能成。所以，我以为，斯蒂格利兹的获奖，其实是常识的胜利。

真要说起来，斯蒂格利兹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另外两大“洞见”其实也都是常识。其中一条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底细，所以在交易中占弱势的一方要想办法防止吃亏。斯蒂格利茨研究的是保险市场。他发现，由于保险公司不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往往会造成保险公司因为居高不下的赔付率而陷入困境。比如，有人可能会为自己的一辆车买上多份保险，而保险公司不知情，然后车主在开车时漫不经心，使车辆受到损失，而车主因为多家保险公司很高的赔付率而没有任何损失，损失的是保险公司；再比如，有人可能会有意隐瞒自己真实的健康状况骗取高额人寿保险。这些都是因为相对于投保人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说，保险公司拥有的信息不完美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蒂格利兹认为，可以在设计合同上下功夫，防止吃亏。即保险公司可以设计两种合同供投保人自己去选择。一种合同是让投保者交纳很高的保险费，以换取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较高的赔付率；另一种合同是让投保者交纳较低的保险费，在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支付较低的赔付费。

斯蒂格利兹在信息经济学上另外一个洞见仍然是个常识性问题：即尽管未必会更好，有时也许还会更坏，但当人们遇到正常的市场上解决不了的交易问题时，还是会求助市场以外的手段。比如，在我们老家农村信用社常有这样的事，按道理，信用社放贷都有特定的项目上的规定，但经常会发生两种违规的事：一种情况是有的乡下人特别困难，比如孩子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或者家中有亲人生病看不起城里的医院，看在乡里乡亲面子上，村里的信贷员会私下放贷以解急；另一种情况则是村里的信贷员有时会私下为一些超规定的项目放高于国家规定的利息的高利贷，一方面救了别人的急，另一方面也赚了自己的钱。这里也都有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在其中。即有人知情，有人不知情。

但就是这么几条常识性东西，为什么在经济学界想树立起来之前如此之难，而现在却能因此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除了经济学本身一些规范性因素在其中外，还有非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阿罗－德布勒定理，尽管使常识受到了蒙蔽，但却用一套非常雅致的经济学方法，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从而论证了自由市场机制会将社会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整个保守主义思潮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意识形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前期，主流经济学界以及整个西方政界鼓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建立在此一基础之上。人们认为，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完全彻底的自由市场制度是这个世界最好的因而也是最后的制度选择。因此,要想颠倒阿罗－德布勒定律,实际上不是与颠倒了的常识斗争,而是与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斗争。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日益动荡的世界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使知识界从鼓吹"历史终结论"的梦幻中醒来,尤其是美国面对经济衰退再度被迫采用凯恩斯政策时,人们也不得不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省,这种情况下,斯蒂格利兹不失时机提出"后华盛顿共识",自然是适得其时。而"后华盛顿共识"中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涵义就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市场机能未必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而相对于私人而言,政府可能拥有更强的信息优势,所以,政府完全可以以政策改善资源运用的效率。因而政府在市场机制下不应该没有作为,而是大有作为。

按道理说,斯蒂格利兹因为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将阿罗－德布勒定理进行了颠倒,并因此获得了经济学界最高奖项,也就是说已经得到了认可,阿罗－德布勒定理应该算是错误的吧?但事实并非如此。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其导论部分仍将信息完全化作为微观经济学一个基本假设,仍然将阿罗－德布勒定律作为福利经济学一个基本定律在讲授,只是在讲经济学的新进展时,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个重要的论题放在其中。这样奇怪的现象在真正的自然科学领域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但却存在于经济学。可见,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待,是很荒谬的;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那一天,也许永远都不会到来。

2002年1月2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好东西为什么卖不出去
——信息经济学趣话之二

在我居住的大院中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生活服务中心，中心内卖水果的共有四家，平时卖水果在品种与价格上都差不多，所以我去买水果时几乎没有什么挑的，很随意，有时仅仅因为北边水果摊上摊主的小孩对我很可爱地一笑，我就会买这家的水果。明天仅仅因为南边水果摊上摊主率先向我打了一个招呼，我会买那家的水果。

十月底的一天，北边靠东那个水果摊的主人见我在买菜，向我打招呼说："你过来看看吧，我这里有一种不一样的柚子，新加坡产的，很好吃，买一点吧。"我便走过去看，发现那种柚子除了在底部贴了一个"产地新加坡"外，与其他摊子上的柚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再一问价格，是其他摊子上柚子的几倍。于是我十分怀疑地说："这柚子真是新加坡产的？为什么会这么贵？比国产柚子好吃在哪里？"面对我的一连串的问题，精明的摊主有些急了："我真不骗你。这真是新加坡产的，比国产柚子汁水多，口感细腻得多。"我又问："你能不能打开一个给大家尝尝？"摊主为难了半天说："我今天早上就进了这么十几个，一个就两三斤，打开一个，损失几十元，我全白进了。"我又说："那你定价是不是也太离谱了？比国产的高好几倍？"摊主涨红了脸："进的时候成本就高。再说，一分钱一分货啊。"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我终究没有买他的进口柚子，而是买了南边靠西那家摊上的国产便宜柚子。在买国产柚子时，国产柚子的摊主压低嗓子极神秘地对我说："这国产的进口的，怎么分啊？"尽管我一下子认定这个摊主对于竞争对手很不地道，但却坚定了我不买进口柚子的想法。

几天后，我又去买菜，顺便就看看那家卖进口柚子的水果摊。摊主很热情地招呼说："买柚子吗？国产的！"我奇怪地问了他："你那进口柚子卖得怎么样？怎么也卖起国产的来啦？"摊主无奈地摆摆手："进口柚子没有人买，不是嫌价高，就是怕假货。所以，我退货了，现在还卖国产的，与大家一样。真是的，这年头，好东西竟然不好卖！"

听摊主这一说，我脑袋里立即冒出一句经济学行话："劣币驱逐良币！"

2001年度与斯蒂格利兹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名著名经济学家是阿克尔洛夫，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有趣的是，他所研究的就是我在服务社小水果摊上遇到的类似现象。在美国，二手车市场叫"柠檬市场"，在这一市场中经常出现"市场失败"。即劣等车反倒比质量好的车更好卖。阿克尔洛夫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认为，因为在旧车市场中，卖车的人比买车的人更了解产品的质量——这种卖者比买者更了解商品质量、性能与成本的现象在经济学上叫"信息不对称"，而如果卖旧车的人知道车的质量，买车的人不知道，买车的人为了防止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吃亏，只能照市场平均价格来支付车的价钱。也就是说，即便卖车的人声称自己所卖的车质量与性能高于平均水平，但买者也不会相信，更不会付出比平均价钱高的价位。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真正卖好车的人就觉得不划算，不愿意卖他的好车，所以，他会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退出市场，最后只有那些出卖质量与性能低于平均水平的劣质车的人才卖车，所以，导致劣质车泛滥。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买主也知道这是坏车，所以也不大愿意买，于是这个旧车市场在较富裕的阶层可能会消失，仅存在于低收人阶层。这种二手车市场的失败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

回到我在水果摊上遇到的事，也完全是这个道理：作为买方，我以及其他工薪消费者并不知道那个卖主的柚子是否真是进口货，是否真的比国产柚好吃，所以，我们不会轻易付出高出国产柚几倍的价钱去买。我们最好的策略就是以国产柚子价格买对方声称是好吃的进口柚子，但对方如果真是进口柚子，卖国产柚子的价格肯定要赔，所以，他一定不会卖，结果，在一个以工薪阶层为主的大院服务社中，就出现了国产柚子驱逐进口柚子的现象。

阿克尔洛夫研究“柠檬市场”后得出的结论与斯蒂格利兹类似：即自由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现实中的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对于“自由市场乌托邦”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因为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自由市场天然有优胜劣汰的功能，这种功能会将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中的一切安排得最有效率，并并有条。但阿克尔洛夫恰恰揭示出：“自由市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往往还会发生劣胜优汰的事！这不能不说是市场严重失败。

在人才市场上有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单位自前年开始就想招进一位经济学博士。单位领导对应聘者的要求很高：在科研上要有突出成果，在教学上也要有所建树。也就是说，要求对方脑袋好，笔头好，口才也要好。但我们单位是个计划体制下的单位：不变的级别工资制，每月除了一千多元工资外别无其他收入。结果，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前来应聘者如果声称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自己各方面都很优秀，领导就会奇怪地问：如果你真的很优秀，你一个经济学博士，为什么愿意到我们这种待遇很低的地方？这一问题真难倒了应聘者，但也难倒了领导自己。因为领导想：这样的条件，优秀者不愿意来应聘，来应聘的人肯定又是不优秀的，我又不愿意要。于是，直到现在，我们单位也没有招到一个新进的经济学博士。这种现象与阿克尔洛夫所研究的“柠檬市场”最终消失何其相似。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败呢？当然是买者拥有卖者尽量多的信息，即买者与卖者能够拥有足够多的“共同信息”。假设我真知道那个水果摊主卖的的确是比国产货好吃的进口柚，我或许会掏出较国产货更高的价格去买；假设旧车市场上买者的确能很好地分辨出质量相对好的车，他也许不会将真正好车的价格也压到平均价格甚至以下；假设我们单位领导对前来应聘者真是知根知底，也不至于到现在两年过去了还没有招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是如何能使买者与卖者拥有足够多的“共同信息”。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种解决方案：一种方法是买者与卖者相互之间的有效沟通，卖者主动向买者传达出关于产品的相关信息。比如，不久前我带我爱人去买一件羊毛衫，导购小姐不厌其烦地教会我们识别真羊毛与假羊毛的方法，然后让我们用此法检验她所卖的羊毛衫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一招很管用，我们最后决定买她的货。面 2001 年度与斯蒂格利兹、阿克尔洛夫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司彭斯教授就论证了此种市场现象，即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第二种方法是找一个识货的“行家”，由他帮助对商品的质量与性能进行识别。但这两种情况都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之上：即买者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与卖者之间在信息沟通时，以及买者与“行家”在信息沟通时，都必须是诚实、互信的。而这种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也很难得，因为现实市场上拥有完全信息的卖者往往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欺骗不拥有完全信息的买者。这时，便又导出政府的作用了：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败，需要政府帮助公众获得更多的信息。比如，我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有一个小栏目叫“质检报告”，定期发布国家质检局等机构关于某些消费品的质量检查信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写到这里，又不免要回到那个“政府还是市场”的经济学最大的“意识形态”老话题。在此之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成功地使“好人政府”的神话“脱魅”的同时，却在不断强化“市场万能”这个既新又古老的神话，而后一个神话却是建立在“信息完全化”这一沙滩上的空中楼阁，但没有多少人指出过。正是由斯蒂格利兹、阿克尔洛夫以及司彭斯等经济学家，以他们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动摇了“信息完全化”这个基础，从而也就成功地挑战了传统经济学“市场万能”的理论，并暗示为了改善市场功能，政府或其他机构有时可能需要出手干预市场，从而为政府在市场中重新找到了位置。

似乎要再次“感谢”美国近来的经济萧条。如果不是这种萧条的背景，使得美国政府重新大力推行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那一套，我甚至怀疑，2001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还会不会落到这些人头上？

2002 年 1 月 3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科斯定理”到底说了些什么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一)

××先生：

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信中说，你直觉经济学界某些人言必称“科斯定理”，这背后隐含着某种动机，但你想批评却无从下手，因为自己并不了解什么是科斯定理，为此，你再次要求我用你一个从未接受过经济学教育的学者都能懂的语言介绍一下“科斯定理”。

说心里话，你的要求让我颇为难。我很了解一个人文学者批评经济学界自由主义迷信时的困难；但也请你了解我的困难。“科斯定理”与其他已经很成熟的经济学原理有些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就是很难表述清楚。在经济学界，最早将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的思想概括成“科斯定理”的是斯蒂格勒，但科斯本人在《社会成本问题注释》一文中表达出对斯蒂格勒的概括都未必满意；另一经济学家库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写作“科斯定理”这一词条时特别说明：“科斯从来没有写下这条定理，当其他人试图表述时，很有可能是谬误的，或者是一种同义反复。”我见到国内较早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科斯定理”的是樊纲先生，在《读书》杂志 1992 年第四期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人间的扯皮与“科斯定理”》，他也许抓住了“科斯定理”的要旨，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但介绍却也未必准确。对此,我在《"科斯定理"与"产权明确"》一文中有议论。

但是我现在准备接受这种挑战了。昨晚,我们一起看过我们的朋友张广天先生的戏剧。剧中女主人公用诗意的语言说她"看见秋风和月光里的国家像一场大雪。永无尽头的路,永不天明的夜,而工业和农业在前面空阔的地带悲伤地展开……",此时,我准备帮助你与这种困难挑战,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先与你说一个经济学名词:"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生产之外的所有成本"。如果对此不理解,你不妨作如下通俗理解:"交易"就是市场上双方的"买卖",包括即时的买卖,更包括签订合约这样的买卖;"成本"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交易成本"就是达到一笔交易需要的成本,比如要达成一笔交易,要花费时间,要花费精力尽可能了解清楚各种信息,还要谈判,谈完后还要签约,签约还要公证……当然,还要冒被欺诈、或者找不到合适的目标的风险。如此等等,都是"交易成本"。

我想再解释一个名词"产权"。这个名词尽管在我国经济学界被用滥了,甚至在中国整个官僚系列也被用滥了,但"科斯定理"中"产权"的意义却绝不限于财产权利,而是泛指一切法律所界定的权利。比如,法律规定每个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也是一种"产权规定"。在某些场合,甚至由自然发展起来的权利也是"产权"。

我现在介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由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的解释。他写道:"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以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

请你拿出笔沿我的思路算一笔十分简单的账。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假定一个工厂周围有五户居民户。因为工厂的烟囱排放的烟尘使居民户晒在户外的衣物受到污染而使每户损失 75 美元，五户居民总共损失 375 美元。

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有三种：

一是在工厂的烟囱上安装一个防尘罩，费用为 150 美元；

二是每户买一台除尘机，除尘机价格为 50 元，总费用是 250 美元；

第三种是每户居民户有 75 美元的损失补偿。补偿方是工厂或者是居民户自身。

假定五户居民户之间，以及居民户与工厂之间达到某种约定的成本为零，即交易成本为零。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这就是一种产权规定），那么，居民户会选择每户出资 30 美元共同购买一个防尘罩安装在工厂的烟囱上，因为相对于每户拿出 50 元钱买除尘机，或者自认了 75 美元的损失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的办法。

如果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这也是一种产权规定），那么，工厂也会选择出资 150 美元购买一个防尘罩安装在工厂的烟囱上，因为相对于出资 250 美元给每户居民户配备一个除尘机，或者拿出 375 美元给每户居民户赔偿 75 美元的损失，购买防尘罩也是最经济的办法。

因此，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法律是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还是相反的规定即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最后解决烟尘污染衣物导致 375 美元损失的成本都是最低的，即 150 美元，这样的解决办法效率最高。

通过以上例子就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产权如何规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总能达到最优。这就是“科斯定理”。

从“科斯定理”本身也许你看不出中国经济学家成天鼓噪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产权"有多重要,相反,在"科斯定理"中你甚至看出,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它根本不影响效率。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就对了。因为张五常也这么说: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根本就不必要。

但是,你要知道,现实世界中,从来都存在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为零,是一个假设出的静态的理想化世界。而一旦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产权界定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效率高低。

再请你拿起笔沿我的思路算一笔账。

还是上述的例子。现在假定五户居民户要达到集体购买防尘罩的契约,需要 125 美元的交易成本,暂不考虑其他交易成本。

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那么居民户会选择每户自掏 50 美元为自己的家庭购买除尘机;不再会选择共同出资 150 美元购买防尘罩了。因为集体购买防尘罩还需要 125 美元的交易成本,意味着每户要分担 30 美元(买防尘罩)+ 25 美元(交易成本)= 55 美元,高于 50 美元。

如果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那么,工厂仍会选择出资 150 美元给烟囱安排一个防尘罩。

由此可看出,在存在 125 美元的居民户之间的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权利如何界定直接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界定工厂享有排污权,消除外部性的总成本为 250 美元(即每户居民选择自买除尘机);而如果界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消除外部性的总成本仅为 150 美元。在这个例子中,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

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如何界定的重要性通过上述例子就清楚了。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产权界定的功能是节约交易成本。上述例子中，产权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就可以节省下125美元的交易成本。当然，你可以将上述例子做各种变通。比如，你假定那是一个国有工厂，因为官僚与腐败十分严重，买一个150美元的防尘罩，需要到各种政府衙门盖一百个以上的图章，交易成本极其昂贵，远高于居民户之间达成买防尘罩合约所需要的125美元的交易成本，这种情况下，产权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相比较产权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更能节省交易成本，因而也有助于提高效率。

产权规定越清楚，节省的交易成本可能会越多。比如，一个残疾人考上了大学但大学却以其身体有缺陷为理由不录取他，如果法律本身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产权不清楚”，那么，这个残疾人为了能上大学也许就要与这所大学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之中，但现在法律有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个青年就可以凭此“说法”与高校“谈判”；如果法律有更清楚的规定“只要是生活能够自理，任何高校都不得拒收已符合其他录取条件的残疾人”，这个青年就根本无需与大学扯皮。所以，产权规定得越清楚，扯皮的必要性就越小，交易成本也就越低。

我不知道你通过我的介绍是否清楚了“科斯定理”。我已经尽力了，只能如此。

你信中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在产权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到底是“科斯定理”的问题，还是中国某部分经济学家在介绍与应用“科斯定理”中有问题。我自己对此的看法是：似乎不应该怪罪于“科斯定理”本身。我常在给学生讲课时说：如果“科斯定理”真的像中国某些搞意识形态而不做实证的“理论家”所批判的一无是处，科斯本人何以能成为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得主？即便“科斯定理”真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如果像某些中国批判者所批判的那样如此经不起琢磨，那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资本主义也太低能了。所以,我宁愿相信中国产权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中国另外那些言必称"科斯定理"的经济学家在将这一经济学规律用于中国特定语境下时出了偏差。对此,我正在做些疏理,但目前还没有很明白,我暂时还不想多说,否则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关于广天的《红星美女》一剧,我同意你的看法:红星与红军战士不是代表向这个世界尤其是向剧中女主人公周萱的父亲、母亲、情人索命的"无常"或"女吊",而恰是代表像周萱以及她的所有的亲人与爱人们这样的底层人的理想以及出路。周萱只要戴上红星,就有好运;失却了红星,就连遭恶运;而剧的最后,红军战士又出现了,将失去了的红星重新给了周萱,并送了她一程。所以,在我看来,剧情还是很清楚的。

下次再谈。

卢周来

2001 年 11 月 8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二)

××先生：

你好。

收到你的回信。你说自己大概搞清楚了“科斯定理”的含意，并已经能由此引起自己“无尽的遐想”，我很高兴。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些更多的解释“科斯定理”的版本。

你问到，如何从“科斯定理”发展起“制度决定论”，进而发展起“制度与产权学派”，又要我做答，你真是一个很懂经济的人，因为你这样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学习成本”。其实你原本可以找一些书自己读去，只不过你认为，读经济学书对于你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学习成本”可能会比我的通俗介绍要高得多。但我再次提醒你：你在节约了学习成本的同时，提高了风险成本。因为我介绍的仅仅是我的看法。

上次信中与你已经谈到，从“科斯定理”中已经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产权规定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我就由此谈起。

产权规定至关重要，那么，产权又是由什么东西在规定呢？就是由制度。经济学上讲的制度，意义较为宽泛(就其意义宽泛这点类似于“产权”)。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是这样解释制度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制度是人类设计的一种强制，用以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化。它是由正式强制，非正式强制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构成的。

我对诺斯的话向你做些解释。从诺斯的话中可看出，制度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正式强制"。我们又叫其"成文法"，即写在纸面上、由立法机关或行政部门制订的、有据可查的各种规则、章程及宪法、法律；第二部分是"非正式强制"，又叫习惯法，包括道德、习俗、一个民族的传统、信仰等等；第三部分是"制度的实施特征"，其实就是保证成文法以及习惯法能在一个社会中被遵守与尊重所采取的方法。比如，成文法要被遵守，往往依靠的是国家作为第三方的力量或者说国家暴力机器；而习惯法被尊重则往往依靠个人的自觉。

从制度的内容看，制度无非是一个社会对个人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这正是制度与产权学派所言的"制度的功能"。而社会对个人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中，产权又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正如我上封信中所说，"科斯定理"中"产权"的意义却绝不限于财产权利，而是泛指一切法律所界定的权利。在某些场合，甚至由自然发展起来的权利也是"产权"。可见我们也可以将"制度的功能"概括为"界定产权"。

产权如何界定直接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故产权至关重要；而产权如何界定又恰是制度的基本功能，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至关重要！因为最终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就是制度。

科斯以及其他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就是这么认为的。这里也就显示了制度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歧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总认为：现代经济学是研究人对经济行为的选择以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这里隐含着一种假设：个人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源配置达到了最优。而科斯等制度学派人物则认为:个人总是力图使效用最大化,但能否达到最大化,则不是个人能够决定得了的,得取决于制度安排。

科斯论证说:每个人都想将最少的钱用得最值,都想在买东西时价格最便宜而买到的东西却最好。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草原上快饿死的狼,追赶一只兔子。狼与兔子都得尽最大努力奔跑。因为如果狼追不到兔子,狼要饿死;而兔子如果被狼追到了,兔子要被狼吃掉。这时的狼与兔子其实就是在与交易中的人一样"使自己效用最大化"。因此,科斯总结说,"要知道,在动物界,人全然不是惟一面临选择的必要性的。可以想象,在研究老鼠、猫和章鱼时,同样适用这种方法。毫无疑问,这些动物基本和人一样,也力图使自己的行为达到最大化。"

"使自己的行为最大化"没有什么意义,那么,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制度。制度最后决定交易双方最大化行为是否真正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说到这里,我想到中国有一句俗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个人使自己行为最大化,是求尽心,但最后能否成事,则不在人,在天,这里的"天"就是制度。

有一家西方刊物称,科斯及制度学派说出了一个道理,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个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活动的范围一样,制度也决定了人的行为的选择余地。一只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狗,总会使自己活动半径最大;但无论它如何努力,它的活动半径就是拴它的绳子的长度。而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也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边界范围,使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化。但正如活动的范围取决于绳子的长度一样,个人行为选择所达到的资源配置优化程度也不依赖于人本身,而是取决于制度。所以,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制度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设置，也就是研究"拴狗的绳子"。因为在原有的基础上，将拴狗的绳子尽量做长一些，狗的活动范围就更大些。而在现有条件下，制度设置更合理一些，制度建设更好一些，人的经济行为达到的效用也就更大一些。

后来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讲了与科斯同样的道理，但表达远不如科斯来得明白，而是摆出了纯粹经济学而孔。一个是布坎南，他提出了这样两个命题：一是"在行为受约束的既定制度下，交易者在法定市场秩序中的自愿交换活动趋向于保证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人总是很努力使其行为最大化。二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利用取决于自愿交换得以进行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最大化行为的人最终能否有效配置资源取决于制度。另一个持同样观点的是诺思，他说过这样一段很好的话："制度至关重要……与经济学的标准约束一道，制度界定了行为的选择集，进而决定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从而决定了参与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是否赢利、是否可行。"

总之，科斯、布坎南、诺斯等制度与产权学派人物都认为：是制度而不是行为决定了效率。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了，所以，制度功能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眼里到底是怎样的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作为当代人物的邓小平对制度功能认识很深刻。他说过这样的话：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干坏事；制度好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

你询问我对于"制度决定论"的看法。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知识界以及思想界一些被指称为"新左翼"的人士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滥用"制度决定论"很是反感，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而且这也影响了舆论对我的看法。《经济观察报》最近在介绍我的一篇文字中说我也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制度决定论"。我认为这多少有些打混仗的样子。批判主流学家滥用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度与产权学派的观点是一回事，批判制度与产权学派本身的观点是另一回事。我自己对于用“制度决定论”来概括制度与产权学派的观点有所保留，因为“决定论”这个词已经有了形而上甚至意识形态的味道。但对于制度与产权学派具有的对制度安排的重视程度，我并没有批评，相反是深有同感的。

抛开经济学上对于制度功能的解释，仅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制度的功能也是基础性的。比如在一个制度安排是法治的社会中，法治会给全社会划定一条“底线”。即通过一系列的产权规定，使人们知道犯规后面临的惩罚而知道不能干什么。有了这条底线，就可以保证社会运行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秩序。而这是任何人治及道德提升所不具备的功能，因为人治及道德提升是主张人们应该去干什么，但没有划定底线，所以，在“上帝与魔鬼一样追求私利”的社会中，人治与道德提升的风险远高于法治的风险。西方社会有一种俗语：“阿猫阿狗也可以做总统”，其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对于管理者的要求并不太高，因为制度安排已经使社会在一条平稳的轨道上运行。克林顿可以被反复提审，政府可以因财政预算未被通过关门一周，但社会秩序没有乱，就是因为有“底线”在。这样的境况，在一个人治及强调道德提升的社会目前还是不可想象。

但制度安排不是人为的过程，而是“演进”的过程。因此，首先是要照顾到传统。这也是制度学派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了使中国早日建成他们想象中的自由王国，不惜破坏传统，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们已经不择手段。比如在一个以“关怀弱者”作为传统文化之本、在“不患寡患不均”仍是这个农业社会中主导思想、在一个原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可言的国度中，他们却设计出一条由弱者承担改革成本、以拉大分配差距作为改革动力、以削弱社会保障作为手段的改革路径。在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收人分配状况已经恶化到国际范围内少有的地步的时候，在以权力为后盾的裙带资本与官僚资本肆虐市场的时候，他们仍在反复发表他们的"高调"："改革是为了工人阶级长远利益考虑"、"平均主义仍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铁饭碗养了一大批懒汉"、"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论证他们这些观点时，都拿出制度与产权学派的说法。因此，他们的行径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制度与产权学派在中国知识界的形象。

广天的《红心美女》一剧，可能对于追求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小资"情调的观众更有看头，也比他此前的剧更富美感。这就对了。就是要让它成为"糖衣炮弹"，使一些人在接受其美感的同时不自觉接受其价值。广天自己说：美是一种战斗力！

下次再谈。

卢周来

2001 年 11 月 16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由“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产权崇拜”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

××先生:

收到你的回信。

你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这是很正常的。

但我得向你再做解释。我说产权清晰了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种说法很中性。在此我倒真是没有作任何价值判断。你对我信中引用的一个小例子颇不以为然。的确,我是这样说的:如果官僚体制导致工厂买一个防尘罩交易成本太高,那么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更有利于效率。但我也仅仅是作为一个例子。我也很清楚: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肯定是不利于居民户的;而往往居民户相对于投资者,更是这个社会的弱者。而就立场而言,我也反对因为官僚体制而将排除工厂“外部性”的成本由居民户承担。

资源配置有效率,未必有利于各个阶层;更多情况下,还可能导致不利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总有“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许多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大矛盾而前都显得很无奈。你应该还记得我们谈过马克思。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血淋淋的肮脏的东西”;但他又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描述得最充分最到位,甚至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掠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夺殖民地财富,他还认为从历史上看有积极作用:因为向古老的东西输出了现代化,改变了传统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都有这种局限性,何况我辈?

话说远了。回过头来再说"产权清晰"。如果有人说产权越清晰,越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从而越有利于提高效率;我倒不反对,我劝你也别盲目反对:请千万不要先让立场影响了你的理性,而是在理性之后再讲立场。但有一种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要反对:逢"产权清晰"就叫好!说"产权清晰"对谁都好!他们这样做,或出于想误导舆论、误导政策,或出于无知就想捧场。

我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一位赵姓博士在《经济茶座》2000 年第六期上有一篇文字《问世间情为何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爱情与婚姻。文章由十六个自问自答题构成。其中有这样一段:

"十一、婚前财产公证只对有钱人有利吗?否。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而不是某一方。"

赵文没有任何论证,就断言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而不是某一方,胆子真够大的。尽管他的立论是"科斯定理"。但看来他要么在滥用"科斯定理",要么并没有真正了解"科斯定理"。

先还是从常识说起。现实世界中,搞婚前财产公证的,就是有钱人一方,而不是没有钱的一方。因为婚姻法规定婚后财产共享。如果婚前没有搞财产公证,离婚时就有一个财产分割问题。许多"有财产目的"的婚姻,比如老夫少妻型婚姻、贫女大款型婚姻,婚前没有钱的一方就是想利用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的界定不明确,在离婚时能分割到更多的财产。如果婚前财产公证,那么,这种"有财产目的的婚姻"就无法达到。所以,婚前财产公证绝对不利于没有钱的一方。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再稍微将眼光放开一些。如果产权清晰真是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国有资产管理者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晰这一条大搞腐败了。显然，在这里，产权清晰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者，而有利于国有资产所有者。如果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中国那么多造污工厂也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晰大搞污染了。显然，在这里，产权清晰不利于造污者，而有利于想享受清洁环境的人；如果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太湖流域的治理过程中上游省份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而不愿负担应有的责任。显然，在这里，产权真清晰了不利于上游省份而有利于下游省份。

但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产权清晰了，国有资产经营效率高了；环境清洁了；太湖流域治理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真正的结论是，产权清晰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有利于交易的双方。

赵姓博士的问题就在于，他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科斯定理"的落脚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交易双方本身，就妄下结论说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

这一点上，樊纲先生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却很正确：产权清晰后，因其节省了交易成本，就不会出现扯皮现象。也就是说，婚前搞了财产公证，如果说对双方有好处，惟一的好处是双方离婚时省心。不必为财产分割而对簿公堂，也就是说，节约了诉讼成本。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的产权清晰过程，都是权利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必定是有利于某些人、某个利益集团；而不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也因此，通过"科斯定理"断言产权清晰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本身，就引起了经济学界激烈的争论。这一点，可以仍由"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解释。"产权清晰"是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再三再四漠视社会公平，严重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两极分化最终回过头来会损坏社会的良性运行,从而有可能产生不利于效率的后果。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就认为:建立一系列的财产权可能会因为受损者众反而导致低效率;澳洲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也认为:产权清晰的过程是对财产权的再分配过程。而财产权的不同不仅能够引起分配结果的不同,还能导致不同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这是不可忽视的。

也是基于此,我曾在多篇文字中提到中国经济学界要反思关于产权改革的理论。产权清晰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产权清晰过程中不注意公正性,甚至在"产权明晰"的幌子下,普遍发生少数有权者变相转移侵吞国有资产行为,那么,这样的产权即使清晰了也未必有效率。因为产权不是简单的法律上和财务上的规定,它是有道德含义的,如果所有者获得的产权缺乏社会认可的道义性,或者说根本就被社会多数人认为是对他们的劫掠,那么这样的产权是不可能构成对所有者权威的足够支撑的,这样,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如果说在改革初期,由于产权明晰所减少的交易成本,高于因产权变迁过程中缺乏道德(公平)而增加的交易成本,这样的改革尤可以推进;那么到了现在,随着矛盾的积累,尤其是两极分化日益突出,由不道德的产权明晰过程所减少的交易成本,已不足以抵消由此增加的交易成本,所以,改革推进起来就十分困难,产权改革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

甚至在个别企业都有表现。河南某地有一个造纸厂,产权改革前尽管也存在种种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导致的不适应新环境的症状,但职工尤能按时领到工资;后来政府出面要求进行产权改革,由一家私企对造纸厂进行控股。"公有产权"一夜成了"私有产权",产权不可谓不清楚了,但后果呢?由于在产权变更过程中,职工普遍认为存在资产被低估、被转移等严重问题,加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之私企一进入就想将为工厂工作几十年、所有的积累都在工厂里的老工人“下岗”,这种种行径激起了职工们的愤怒:私企每派驻一个管理者进厂,就被职工拦在门外;最后发展到私企老板雇用社会黑势力强行进厂搬走机器,与职工发生流血冲突……最终,法院慑于群体性愤怒宣布这起产权变更无效,但此时工厂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开工,发展到彻底破产。

再回到赵博士的论点那里,赵博士逢“产权清晰”就说好。但究竟好在哪里,是好在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还是好在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收益,不知道他到底清不清楚;而产权清晰的过程中竟然还存在“坏”,他好像更是闻所未闻吧。

以上仅是我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还很多。由于他们强大的话语霸权,已经在经济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造就了一种“产权崇拜”:大家不去具体分析产权改革有得于谁、不利于谁,而是一听到“产权改革”,就莫名其妙地跟着叫起好来。而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如此之快,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社会底层如此弱势的时候,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任何一项具体改革都不会是利益均沾,而是有人得利,有人失利;有人多得,有人付出。在此情势下,经济学家以及整个知识界如何选择的确很重要。也因此,我可以理解你信中表露出的情绪。但我想我以上的解释应该可以让兄放心。

广天的《红心美女》28日公演结束,我想带几位学生再去看一次。尽管我与广天是朋友,但我照例会自己掏钱买票。不为别的,只是想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左翼文艺。

下次再谈。

卢周来

2001年11月26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枪炮下的繁荣
——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一

友人黄钟来电话，先是将我奉为“战争经济学专家”，然后就要我为其《新财经》杂志写一篇文章，就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作一个综述。综述写完后，我感觉到意犹未尽，还想说点什么。

战争在每个善良人的心目中是非常可憎恨的。但在某些利益集团眼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战争给了他们以发大财的机会。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就是对这种机会的一个生动表述。对于美国来说，尤其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西林写过一本《通货紧缩》的书，书本的第二页就有一幅很有意思的插图：1800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周期。这幅插图与普通表格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之处在于它很形象地表明了战争与美国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每当经济线出现萧条快于谷底时，线条上就出现了一个头戴钢盔、手里端着步枪的美国大兵，无论是巧合或者有意，这都意味着每当经济处于萧条时刻，美国总会有战争；而大兵的枪尖所指之处，恰好是经济线已因为战争而从谷底爬升到巅峰时的峰尖。活脱脱的枪炮下的繁荣！

为什么对于美国来说，战争不仅不是坏事，还是促进其从萧条走向繁荣呢？

我们都知道，经济萧条的原因是生产相对过剩，也就是说，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因为社会上的需求相对不足，东西卖不出去，供过于求，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这时一般的做法是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中一项就是政府花钱进行大量采购以弥补市场需求不足。所以，在萧条时期政府通过战争形式增加国防费开支、扩大武器装备的采购，无疑有助于使经济走出萧条。所以，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在其《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说，每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危机的时刻，资本主义总会凭借政府的力量，利用战争使自己走出危机。美国经济评论家弗里德曼则说："只要国家不遭到大规模破坏，战争和衰退是不会并存的。历史告诉我们，国防开支会刺激经济发展。是二战、而不是新政结束了大萧条。越战期间盛行的观点认为，美国的繁荣完全依赖于国防开支。"

战争费用的流向也有助于挽救濒于危机中的经济。战争费用主要用于采购武器装备，所以，主要是流向制造业部门。而制造业部门是关联性很强的部门。也就是说，制造业部门繁荣可以有力地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繁荣。比如采购一架战斗机，绝不仅仅是战斗机生产厂家受益，还会带动生产战斗机电子与火控系统的下游厂家受益，带动为生产战斗机提供优质原材料的下游厂家受益。所以，在制造业部门每一美元投资，其产生的最终结果绝不只是一美元。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投资乘数"，指的就是每一单位的投入产生的最终产出。另外一个名词叫"就业乘数"，指的是每一单位投入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的比例。美国当代国防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盖文·肯尼迪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的军工行业集中了美国制造业最优秀的企业，大的军工—工业综合体都是世界五百强成员。其中通用电气还列在世界五十强的第二十几位。军工企业就业人数一百三十多万，产值占制造业百分之三十以上，占工业产值百分之十七以上。因此，军工行业在战争中发财，完全有可能成为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国经济振兴的启动器。从而带动了美国的就业。美国每增加10亿美元的国防费投入,以其乘数效应,从长期看会新增加1.5－2.5万个就业岗位。

如果战争仅仅能使国家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而战争对于参战者来说要血流成河,极端残酷,道义的力量也许会压倒经济的理由,美国仍然不会随意发动战争。但恰对于美国这样的军事技术强国来说,战争的代价十分小:在弱小敌国的几万米高空上,美军飞行员悠闲地操纵着电脑向地面目标发起攻击,就如同小朋友在游戏机前进行假想的杀戮一样安全与快意,面且避免了看见地面上血淋淋的场面。所以,发动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在短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们再回头看美国的所谓反恐怖主义战争。战前美国经济已经走向了萧条,"九一一"不过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面已。为了重振经济,美国政府自"九一一"以来先后两次减息,使联邦基金利率创下自1961年肯尼迪总统执政以来最低利率水准。同时美国众议院还通过由乔治·布什总统提出的总值一千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透过在未来十年宽减公司税项,鼓励商人作出更多投资,协助美国经济从"九一一"恐怖袭击中恢复过来。

仅此是不足以振兴美国经济的!于是,2001年10月7日,憋足了劲的美国终于对中亚小国阿富汗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行动。这场战争不仅仅打击恐怖主义,同时美国人也期望这场战争能成为美国经济重新启动的推进器。

战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布什总统提交的总额为3435亿美元的200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这一预算额比2001年度增加了279亿美元。而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采购武器装备。紧接着,因"九一一"事件美国国会批准了400亿美元紧急基金,其中约200亿用于反恐怖战争。如果按照肯尼迪的"就业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乘数”一算，美国新增近500亿的战争开支，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两百万余，这对于美国三百多万失业人口是一个不小的福音。的确如此，从目前美国的情况看，尽管航空运输业、旅游业不断裁员，但国防工业部门正有相当大的空位等着有人去补缺。

美国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对宏观经济的振兴作用，最突出地表现在军工行业上。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许多投资者预计美国政府将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于是纷纷购买军火公司的股票，使股价一路攀升。这些投资者希望从中受益，而军火企业则加紧行动希望再赚上一把。

9月17日，纽约股市关闭一周后复市。与大盘整体急剧下挫的情况相反，作为世界第三大军工企业的美国雷声公司的股价当天就上涨了27%，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巡航导弹、雷达监测设备和夜视系统，在海湾战争中曾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军装备供应商之一的阿莱恩特公司的股价涨幅达20%，而另一家军火企业通用动力公司的股价则上扬9%。

美国10月7日开始对阿富汗进行代号为“持久自由”的军事行动，更让美国的军火企业“喜上眉梢”。

生产远程隐形轰炸机的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票当天以107·60美元收盘，创下三年来的最高纪录；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上涨了2·39美元，创下了94·99美元的新高；而雷声公司的股价收盘时为36·30美元，涨幅高达3·8%。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各军工企业争相招兵买马，尤其是对高级军事科技人才的争夺。从世界第一大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到专门从事卫星图片分析和导航系统开发的小公司，最近纷纷在美国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表示有1000个职位虚位以待，重点招聘的是软件工程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雷声公司准备今年再招聘1400名大学生毕业生和研究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则在招聘一些高级导弹技师。

尤其是到11月上旬,随着美国反恐怖战场摆脱胶着相持局面,北方联盟宣布夺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塔利班部队弃城南逃,体现美国民众信心的股指开始上场,并很快超过了"九一一"以前的水平。特别是北方联盟夺回喀布尔消息传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举突破两个半月最高点,收报9750.95点,全天上升196.58点,升幅为百分之二点一。投资者大量购买零售、金融、生物和周期性股票,航空公司股票在遭受12日美洲航空公司坠机事件重压之后,13日重新回升。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美铝公司(AlcoaInc.)和AOL时代华纳(AOLTime Warner Inc.)在一派乐观的气氛中股指也都直线上升。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升幅度高达百分之二点八,以1892.11点收盘,上升51.98点。这是技术股指数过去七天来的第六次上扬。美元兑欧元登上三个月制高点,国库券价格回落。美元对欧元达到87.92分,兑日元达到1:127.55。11月初的一些经济数据已经显示,随着战事的顺利,消费信心也有出人意外的反弹,而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却又比原来预期为少。

目前,美国国防部正在向世界第二大军工企业波音公司订购能将坦克运送到世界各地的C-17大型运输机,估计数量为60架;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已经得到五角大楼采购"全球鹰"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新订单;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则把财力和人力放在无人驾驶隐形战斗机的电子系统研制上,并与国防部签订了合同,尤其在10月底,该公司得到美国第四代战斗机——联合攻击战斗机的订单,据悉,该合同总量为3000架,价值高达2000亿。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军火合同。

战争中巨大的采购刺激军工企业的利润,而也因此受到军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工欢迎;同时,经济学家还预计,战争对某些特定的与战争相关的地区带来经济增长的刺激。

《华盛顿邮报》10 月 1 日就刊登了彼得·贝尔和雷尼·马尔莱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建设华盛顿,每次都有一场战争》,文章说,在历史上,战争和危机刺激了华盛顿地区的经济。在此次反恐怖战争运动中,华盛顿又面临一次建设的机遇。其原因是,华盛顿地区是反恐怖斗争的指挥中心。首先,这场时间很长的战争将为在数十年里促进该地区发展和繁荣的智囊团增加更多成员——政府和国会工作人员、咨询人员和顾问、院外活动集团成员和评论员。其次,为反恐怖战争的需要,将使华盛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大笔资金。比如,从弗吉尼亚北部至蒙哥马利县修建一条公路 Techway 的提案,以及修建穿过蒙哥马利县和乔治王子县的县际公路(ICC)计划会迅速重新提到日程上来。最后,大批战争相关费用投入反恐怖、情报和军事领域,对该地区的经济也有重大影响。比如总部设在阿灵顿的 CACI 国际公司的职位空缺自袭击事件以来已经增加了 10%。

因此,很难说"九一一"给美国人带来的全都是恐怖,如果抓住机会大搞战争经济,"九一一"何尝不是给美国经济进入下一轮增长创造了机会? 美国企业政府政策研究所《问题》杂志 10 月一期刊登该研究所专职研究员詹姆斯·格拉斯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战争与股市》,就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该文写道,"9 月份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乎肯定会造成消费者信心下降和油价上扬,使经济陷入衰退。但从长远看,对美国的恐怖战争正引起早就该实行的重要政策变革——为重大经济复苏创造条件的变革,最早也许在今年年底"。许多人将以反恐怖主义名义进行的战争与当年的海湾战争相比。日本《读卖新闻》9 月 25 日刊登的一篇报道,题为《恐怖袭击对美经济的影响——与海湾危机比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较》,文章认为,“九一一”以前的美国经济形势与海湾危机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十分相似。因信息技术方面的不景气引发生产活动收缩,经济增长日益减速,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的那个季度,即今年4月到6月的经济增长率同发生海湾危机时完全一样,也是跌到0.2%。文章进而认为,“九一一”与海湾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十分相似。海湾危机中,因战争的前景不明,给投资家和消费者心理造成了影响,并导致股价下跌和个人消费萎缩。但文章最后估计,反恐怖战争与海湾战争相比较,也可能有相同的后果。海湾战争时的经济后退局面到1991年3月达到了“谷底”,经济不景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其后美国经济持续了十年的空前繁荣。而“九一一”之后的反恐怖战争,也完全有可能结束美国经济衰退局面,使美国经济步入下一次由枪炮导演下的繁荣。

更权威的说法来自于美国两位大牌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社会和经济学教授贝克(Gary S.Becker)和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墨菲(Kevin M.Murphy)。两位经济学家联名于2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繁荣将在(世贸大厦)灰烬上升起”(Prosperity Will Rise Out of the Ashes)的文章,指出恐怖袭击无法撼动美国经济底座,繁荣将再次降临美国。

尽管枪炮下的繁荣也许很快将降临美国,但是,这种枪炮下的繁荣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从二战以后,美国每隔几年就会找一个很堂而皇之的借口在海外打一次仗,以此不断刺激其经济的发展,这已经成为历史的惯例,这也使得美国对于战争似乎上了瘾。于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世界也没有长久的和平可言。海湾战争结束后也曾有那么一段时期,美国试图压缩军费、实行军事工业军转民,但因为军转民遇到了困难,相反使得军事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工业复合体的地区失业率上升，经济萎缩，因此这种压缩军费的政策在实行不到五年后很快在国内军事工业复合体集团的压力下转向，并很快有了科索沃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所以，我在纪念“五八”事件两周年时就说过：“只要有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存在，只要美国想长期维系其经济的发展，就不要指望有长久的和平。”

善良的人们，你们不能不警惕啊！

2002 年 1 月 6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全球化不打仗？
——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二

参加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会上，某位学者放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并将所有的国家组织成一个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世界共同体，那时，将没有战争。"然后，特别将脑袋转向在座的一位军人半带挑衅地说："全球化了，不打仗了，你也就可以回家种田了。"

其实，说经济全球化就可以消灭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据我所知，早在十七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说："商业的自然结果是导致和平。两个互通贸易的国家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国对买感兴趣，另一国对卖感兴趣，一切联盟便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这大概是"全球化不打仗"的较早版本。而较新近的版本，当属美国上届总统克林顿，他也在二十世纪结束时以几乎带有诗意的语言鼓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就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将使民族国家放弃战争和征服"。

"全球化不打仗"论者的经济学逻辑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极端的比方：两个国家，本来都既能生产粮食又能生产布匹，但其中一个国家生产粮食的技术与成本低于另一个国家，而另一个国家生产布匹的技术与成本高于前一个国家。两个国家开展贸易后，各自发觉以自己所长生产的东西去换取自己所短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产的东西而是对方所长生产的东西，比自己去生产自己所短生产的东西更有利于发展，于是，贸易的最终结果是分工与专业化，即一个国家专门生产布匹而不生产粮食，一个国家专门生产粮食而不生产布匹。于是，生产布匹越来越多地拿布匹换取对方的粮食，而生产粮食的也越来越多地拿粮食去换取另一方的布匹，这样两个国家在经济上构成了互补的关系，相互对对方都有了需要，谁也离不了谁。这样的两个国家之间肯定不会打仗，否则对双方的发展都不利。我想，孟德斯鸠讲的“全球化不打仗”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如果“全球化不打仗”的逻辑真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倒真应该认可并尊重这种逻辑。因为在这里是两个完全平等的国家，双方的分工是水平而不是垂直，因而交换是真正自愿并互利的，不存在谁剥削了谁的问题。

问题恰在于，今天的“全球化不打仗”是另外一种逻辑，即克林顿与美国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两个国家，一个强国，一个弱国，强国依靠强力推行一套不合理价格体系的自由贸易政策，并进而控制了弱国的经济命脉。这种时候，弱国要想发展，被迫仰仗强国的鼻息，否则要被强国制裁。因此，这种情况下，弱国就不敢再对强国说“不”，因而战争也就变得不可能。克林顿以及美国政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别的国家，甚至完全依赖于别的国家时，它几乎已经不可能对别的国家尤其是维系其发展的国家说“不”，所以，当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因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而被合并入美国与其盟国主导的发展轨道时，美国与其盟友就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在由美国等大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越来越取决于外部因素。也正因为看出了这点，美国及其盟友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已经不再视战争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惟一手段；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制裁已经成为战争之外的又一重要手段。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制裁，使敌手或潜在敌手的发展因可能失去或失去外部条件而变得不可能时，敌手或潜在敌手自然就会俯首称臣；或者即便暂时忍受了制裁，时间长了，敌手国或潜在敌手国政府也将会因为发展经济无望而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维护国家安全也就无从谈起。

以上分析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据支持。以美国及其盟友对前苏联、古巴、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为例，美国及其盟友对前苏联的制裁在七十年代以前基本没有任何效果，就在于前苏联当时作为一个大国，其发展基本建立在内生性因素上，独立于欧美资本全球化浪潮之外；而其对外贸易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所以，美国后来除战略物资外，基本放弃了对前苏联的经济制裁。前苏联的国家安全也由此很稳定。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合并入国际经济轨道，并在这一过程中过分依赖于由美国与欧盟的外援以及其操纵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以，俄罗斯变得不敢打仗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约对南联盟的动武。南联盟本来是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也想保住这个势力范围，以使自己的国家安全相对于北约有一个缓冲地带，但当俄罗斯试图为保住这个势力范围做点什么的时候，甚至在南联盟议会通过决议，想加入独联体与俄白联盟的时候，由于害怕因此缺少了外部发展条件，俄罗斯只能忍声吞气。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时间已有三十多年。一方面，古巴经济仍保持了增长，但另一方面，古巴经济越来越面临结构性危机。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古巴实施制裁时，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尚未成气候，古巴经济发展的进出口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很低；在长期面对制裁中，古巴基本建立了自己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独立产业发展体系，同时，在进出口方面，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起部分替代作用，所以，经济制裁起不了很大作用。但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条件都起了变化，所以，古巴经济发展越来越困难。也因此，美国不仅不放松其制裁，反而变本加厉，以促其变。伊拉克的情况是，海湾战争前，其进出口总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率为44%，伊拉克的各个经济部门都要依靠进口组织生产，尤其是其石油开采与加工设备几乎全部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从1991年开始，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2/3。伊拉克的人均收入直线下降，从1980年的5500美元降到1988年(同德黑兰的战争结束时)的4000美元，到1995年则降到不足300美元。由于经济发展崩溃，伊拉克国内局势也很不稳定，美国新任总统布什说，很有信心将制裁延续到萨达姆因为国内的反对派而不是因为美国的战争而垮台的那一天。

除了使他国的发展日益变得依附于美国及其他国际资本外，美国还在全球化过程中试图整合其他国家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不仅如此，还帮助他国上层统治者即既得利益者有效地实施其统治，对付下层百姓，这也使得统治者对美国百依百顺，从而也可以有效地避免他国统治者与美国出现战争形式的对抗，这就是美国在做“全球化不打仗”这事时的另一种考虑。

关于这一招，早在1961年英国历史学大家阿诺德·汤因比在美国所作的一次演讲中就直言不讳地说：“……今天美国是全世界范围内保护既得利益的反革命运动的领袖。它现在所扮演的正是昔日罗马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罗马在它势力所及的一切外国中，一贯地支持富人、反对穷人。”

的确，我们不能不承认，全球化使得广大外围国家的发展更依赖于欧美等中心宗主国，也使得广大外围国家出现了利益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实依附于宗主国因而实质上是宗主国代理人的统治者，所以，国家之间尤其是美国与他国之间的战争会越来越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不公正的全球化最终造成了南北鸿沟，以及所有民族出现共同的富人与穷人对峙这一现实，使得其他形式的冲突更趋激烈，这种冲突激烈的程度就是战争。

“九一一事件”也许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事件发生后，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主编扎卡若(Fareed Zakaria)，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仇恨的根源”(“The Roots of Rage”)，文中细细分析了阿拉伯人仇美情结的由来。其中就写道：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对我们在海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报以感激之情，因为我们拯救了科威特和沙特。可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我们只是帮助了沙特和科威特的王室家族。真是天壤之别。

那些海湾的酋长们挥金如土，糜费的金钱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仅举一例，一个受宠的沙特公主，只有25岁，就在利雅得建造了一个价值3亿美元的宫殿。作为赏赐，还被委以该国与AT&T的电话工程合同。不仅根本不能带来政治进步，财富已经造成了很多的负面效应。它使海湾国家富裕并强大起来，由此，像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一样，对下层的压制随着时间流逝日益加深。他们之下的游牧社会已经变成了牢笼，充满了失望、伤心和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住在阿富汗并同本·拉登一起工作。直到1980年代末期，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在注视从莫斯科、布拉格到汉城、约翰内斯堡的垮台，阿拉伯世界却被老迈的独裁者和腐败的国王所困扰。那些或许曾在1960年代风光一时的政权都变得疲弱不堪，蜕变为窃国政治，为人民所憎恶，彻头彻尾地丧失了合法性。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一点不得不提，他们中的很多政权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

（《NEWSWEEK》2001 年 10 月 15 日）

因此，今天的美国人，也包括研讨会上那位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国学者必须清楚，全球化不打仗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不能将全球化的利益由少数国家以及这个世界上少数上层统治者独占，要让所有的百姓分享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2002 年 1 月 7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经济人"的盲区
——战争经济学札记之三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刺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强秦已经攻到赵国都城邯郸外时，秦王看在昔日情人的面子上，要求赵国向他投降，俯首称臣，开门延敌，这样可免遭杀戮之苦。赵姬也劝告赵王：为了避免人民遭受杀戮，干脆投降了事。但赵王与赵国百姓都宁死不降，最后城被攻破，城内男女全被残暴的秦王杀光，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宗寺内的小孩，作为赵国人的后代，也被暴秦残忍地一个不留被坑杀。陈凯歌是一个煽情高手，电影中对这个细节的处理很到位，包括战场上赵国官兵的视死如归，尤其是手拿拨浪鼓的可爱的小孩活生生地死亡的场面，硬是让观看者泪下。战争的悲壮、凄美与残酷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有人很自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赵国人不投降？如果投降了，尽管做了人家的臣子，但忍一时之气，却能换取未来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不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么？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赵国人是不是很蠢啊？为逞一时英雄之气，讲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落了个亡国灭种！

如果以经济学的眼光看，赵国人的"愚蠢"也许更看得清楚。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计算了成本与收益后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他决定做某一件事，是因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为他认为做这件事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最后有净收益，并且净收益最大时，他才去做。张五常认为经济学中真正有用的两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此一条（还有一条是需求曲线总是向下倾斜的，在此不论），即“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以此衡量，赵国人的理性选择一定是投降：因为明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打赢强大的秦国，而且秦王为了雪小时候在赵国所受的屈辱，已经明说了如果不投降就要屠城，这个时候，赵国人应该很清楚：如果投降了，成本是做臣子，但有收益，即可以苟活，而且有卷土重来的希望；如果抵抗，成本是“亡国灭种”，即时收益没有。如果真是聪明者，要追求收益最大化，当然是选择投降！

但赵国人没有，他们选择了战死。他们的行为不符合“理性经济人”行为，他们违背了张五常所说的“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说法。张五常也许会说他们蠢，但我内心中却充满了对他们的尊敬。

其实，战争史上，类似赵国人的行为很多很多。弱小民族不屈服于强敌淫威，明知抵抗强敌，不过是以卵击石，但仍然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正是他们的行为使人类的历史平添了许多壮美。

这是为什么？看来，号称可以解释一切的“经济人”理论出现了盲区？我为此很迷惑。

后来，我在翻译美国人写的《防务经济学手册》时，发现美国人同样迷惑。在这本书的第 131 页，防务经济学家布利托等认为，布埃诺·德梅斯基塔（1981）对战争的“理性经济人”解释表面上是令人信服的。因为自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以来，一共打了 58 场战争，而战争的首先发动者胜了 42 场。由此看来，战争是理性事件，是在发动战争者计算了成本/收益比率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战争发动者认为他可以在一场战争中获取利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益才决定发起战争。但接下来布利托写道:"*He did not, however, explain why wars occur. Wars are usually Pareto inferior outcome of a conflict, in that both parties would be better off if the expected loser compensated the expected victor by means of a transfer of resources without actually going to war. Thus, while the Bueno de Mesquita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wars are usually consistent with rational behavior on part of the aggressors, his model does not explain why wars actually occur since it does not explain why the loser fought.*"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大段引用原始英文,是为了证实我此说不谬。这段话大略可翻译如下:"然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战争会发生。战争通常是冲突的帕累托劣等产出,如果预期的失败者通过转移其资源来补偿预期的胜利者而不是实际走向战争,那么双方都会更好。因此,尽管德梅斯基塔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战争通常与侵略者一方的理性行为相一致,但由于他的模型并没有解释失败者参战的原因,因而实际上也就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战争。"

就美国人这段话,我还想做通俗的解释。布利托是说,用"理性经济人"眼光看来,如果一个弱小的国家,已经知道自己打不过对手,还不如直接将自己的领土或资源拱手送给对方,而且是对方想通过战争获取什么,你就送什么。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至少免去了战争真打起来时的双方损失。所以,相对于不打仗直接转移资源的所谓最优结果(经济学上叫"帕累托最优"),通过打仗的办法重新配置资源,是一种劣等结果(经济学上叫"帕累托次优")。而如果弱小的国家真这么做了,想发动战争的国家也就不需要打仗,仗也就打不起来。而现实历史中却还是有战争,因此,仅解释战争发动者是理性经济人行为,而无法用这一理论解释弱小国家为什么迎战,等于还是没有讲清楚战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为什么会产生。

为了维护经济学“包讲百事”的声誉，有一些经济学试图引进所谓“不对称信息”来做解释。按他们的说法，弱小国家可能事先并不知道对手到底有多么强大，他们或许还认为对手其实比自己更弱小。由于这种信息的非对称性，因此，将决策建立在所谓“对对方错误的理解”上，作出了抵抗的决定。但这种说法一是实在经不起任何实证：文章开头所说的赵国与秦国，赵国并非不知道秦国的强大与秦王的凶残！二是也经不起经济学自身的追问：博弈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时，不知情方可以通过多阶段与对手交手来修正对对方的认识。也就是说，即使退一万步讲，如果真有弱小国家一开始不了解对手的强大，但只要试探着交一交手，就可以知道对手的底细，然后再采取投降策略，至少也可以免去后面的战争之苦。但现实仍然并非如此。

这条路解释不通，又有的经济学家引进了“恶意偏好”这一说。“偏好”也是经济学上一个概念，我喜欢吃苹果胜过吃梨子，而你喜欢吃梨子胜过吃苹果，这就是你我的“偏好”不同。持“恶意偏好”说的经济学家认为，弱小的国家之所以还不主动投降，“这实质上意味着，出于仇恨的心理或好斗的本性，为了减少敌手的收益，哪怕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也在所不惜”(《防务经济学手册》第 187 页)。这种说法简直是颠倒黑白：因为它不去谴责发动战争者与侵略者的好斗与仇恨，反而谴责抵抗侵略者心理有问题，这是哪门子逻辑？

但我倒发现了用“偏好”解释的惟一一个合理之处：因为经济学认为偏好是与生俱来的，与现实成本/收益没有更大纠葛，也就是说，在此，“偏好”说实际上承认了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先验的东西)可能会压倒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考量，所以，也等于间接承认了经济学并不能包打天下，“经济人”并非万能说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条。

至此,我也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弱国会选择抵抗。我也没有打算自己能提供什么经济学解释。但我想起一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信仰就是信仰的事!对于现实利益考量解释不清楚的现象,不妨作如是观。而此时经济学可以休矣。

2002 年 2 月 27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经济学眼光”与“数学眼光”

写这篇文字，得益于赵汀阳先生的启发。赵先生为论证其“一种文化首先意味着一种眼光”的观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赵汀阳，1997)：有个老师问学生鸵鸟有几条腿，一个学生回答说有一条腿，其他学生回答说有四条腿，结果，老师判定回答鸵鸟有一条腿的学生比较正确，其他学生都回答错误。其理由是，尽管所有的回答都没有道出鸵鸟两条腿的事实，也尽管从“生物学眼光”看回答四条腿更接近生物学规律，而从“数学眼光”看，一条腿比四条腿更接近鸵鸟两条腿的事实，所以，应该判定答鸵鸟一条腿的学生比较正确，而其他学生错误。

美国经济学家代尔－卡维勒曾认为(代尔－卡维勒，1992)：在经济学方法中，隐喻是一种很重要的分析方法。从亚当·斯密以“看不见的手”说明市场的运作(斯密，1776)，到科斯利用火车头烟囱冒出的火星和走错了牧场乱吃牧草的牛群来说明他的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1960)，都是一种很典型的隐喻。而从赵先生的“鸵鸟有几条腿”的例子看来，作为哲学家的赵先生也深谙隐喻之道。

由赵先生例子中“生物学眼光”与“数学眼光”，我联想到近来中西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分析数学化的论争。

假设将“鸵鸟有几条腿”这一例子应用到经济学上，隐喻经济学上“如何达到均衡”问题，则这个在哲学上很能说明问题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例子同样很能说明经济学问题。尽管无论是回答"鸵鸟一条腿"还是回答"鸵鸟四条腿"的学生都没有道出鸵鸟两条腿的事实，但从"经济学眼光"看，以是否达到所谓均衡状态来衡量，则回答"四条腿"要比回答"一条腿"较正确。因为"一条腿"即一个支点显然是不稳定的，而"四条腿"即四个支点则达到了某种均衡；而从"数学眼光"来看，仍是回答"一条腿"的比回答"四条腿"的较正确，原因仍是"一条腿"比"四条腿"更逼近鸵鸟两条腿的真相。

可见，本来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以"经济学眼光"看与以"数学眼光"看，其判断也是不同的。但问题在于，在赵先生的例子中，无论学生回答鸵鸟是几条腿，也无论老师是如何判定的，对于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的后果很小；而一旦类似的事出现在经济领域，则结果就严重多了：以"一条腿"来指导经济实践，会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用"四条腿"来指导经济实践，尽管不是最经济的办法——浪费了"两条腿"，但至少达到了某种均衡，可以保证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所以，我认为，经济问题首先要以"经济学眼光"来看待。数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工具尽管很重要，但决不能以"数学眼光"来代替"经济学眼光"。即，一定要把"数学眼光"的边界限定在"经济学眼光"的边界范围内。否则，以"数学眼光"研究出的结论，有时尽管在逻辑上最接近真相，但一旦以其指导实践，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大损失。曾担负过国际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对经济分析数学化一开始曾抱以极大热情，并曾积极参与推进过这一工作的熊彼特，后来警告全体会员说"各位先生，拿着玩具步枪跳进战壕是很危险的"(转引伊东光晴，1987)，其理由大概就在于此。

中国经济学界"集团冲锋式"地引进数学，是近十几年才有的事。这自然对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用，并且这种作用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这种作用不限于引进了一种工具，而且还在于它终于为经济学在中国本土上的发展赋予了世界性意义。从此，西方经济学大踏步进军中国，而中国经济学也因分析工具的一致性而得以与西方沟通，并逐渐走向世界。所以，中国经济学引进数学工具其意义不可低估。

但这里要提醒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人"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少人将经济分析的数学化推崇到不恰当的地步。其结果，也不仅仅是盛洪所指出的"使经济学的研究走上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的死胡同"（盛洪，1998），而且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即，以"数学眼光"来代替"经济学眼光"，以及以"数学眼光"来压制、歧视"经济学眼光"。尤其一些新生代经济学人，这种表现更明显。"鸵鸟有几条腿"例子中的老师，明明是一个生物学问题，他以"数学眼光"来作判断，结果判定"一条腿"对而"四条腿"错；一些新生代经济学人，就像这位老师：明明是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却一定要以"数学眼光"对研究的结果进行臧否。由这些新生代经济学人以及一些他们把持的经济学刊物，正致力推进一场经济分析数学化以及基于此的所谓经济学论文"规范化"运动，俨然端出一副宁要"以'数学眼光'看待经济问题的草"，也不要"以'经济学眼光'看待经济问题的苗"的架式，使得几乎所有的未加入由他们掀起的这股潮流者的其他经济学人——这其中包括一些老经济学家——的思想因无发表意见的阵地而遭扼杀。这种状态如继续下去，将给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以致命伤。

相比较而言，西方经济学界比我们成熟得多，宽容得多。西方经济学界不乏致力于推进经济学数学化的人，也不乏想以"数学眼光"代替"经济学眼光"的人；同时西方经济学界也有各种学派，学派之间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但整体上看，学派与学派之间，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学者与学者之间能平等相待,也没有以"数学眼光"来歧视、压制"经济学眼光"的事。这从历年来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情况可见一斑。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既有致力于推进经济分析数学化、并在其中作出极大贡献的丁伯根、里昂惕夫、克莱因、德布罗、福盖尔、萨缪尔森等人,也有极力反对经济分析数学化,且从来很少以"数学眼光"来研究经济问题的缪尔达尔、哈耶克、布坎南、科斯等人。且从当前情况看,后者的深远影响与前者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想就科斯多说几句。其经济研究方法及行文的独特性,以至于一开始萨缪尔森等人嘲笑他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不是什么经济学论文,而是一篇散文(转引帕森纳,1993)。而科斯仍我行我素,不仅不理会嘲笑,反过来,他也嘲笑致力于推进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和统计学运动的美国对手说,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眼里,"亚当·斯密的论述粗陋,文体欠优雅,如果让这些经济学家生活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就无存在的必要。"西方经济学界的宽容恰表现在不仅让科斯这种表面上不入流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给了其发表意见的阵地,并以"经济学眼光"而不是以"数学眼光"对其作出如实的评价。

我在这里也作这样一个猜测,假设科斯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学界没有什么影响,没有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不会被人称为"斯密、凯恩斯之后又一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帕森纳,1993),那么,今天中国经济学界那些用"数学眼光"来代替甚至歧视"经济学眼光"的人,一定会对科斯研究经济的方法以及其论文的非规范性不屑一顾,更谈不上要给他发表出来,然后还评上诺贝尔奖。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在以"数学眼光"代替甚至歧视"经济学眼光"的中国经济学界,仅仅因为其研究方法中没有数学的位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置,或者论文在一些人看来不规范,谁能保证不会埋没几个或更多的中国科斯呢?

1998 年 10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再谈"眼光问题"

朋友见到我发表在《中国改革报》上《"经济学眼光"与"数学眼光"》一文,说我似乎是意犹未尽,还想说点什么。

的确,我想再探讨一下"经济学眼光"与"数学眼光"的边界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眼光"应该是通行无阻的,因而它的边界也就是经济学的边界。然而,现在也存在一个"经济学眼光"的泛滥问题,即"经济学眼光"的边界越过经济学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在国外,不少人将经济学本身看作为一种工具,他们不仅用"经济学眼光"来分析社会学问题,而且用来分析法学领域、政治学领域、史学领域的问题。更有人因此大获成功,如加里·S·贝克尔竟因此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更助长了"经济学眼光"的泛滥。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一些新生代经济学人也仿效这种做法,其中汪丁丁、盛洪等更为典型。"经济学眼光"的超越边界行为是否是好事,这与经济分析数学化一样存在争论。我在此不想做评论。但值得指出的是,科斯是反对这么做的。对于"经济学眼光"应用于诸如教育、家庭、政治程序、国民保健以及法律的经济学等许多"非市场行为的经济学的范畴",科斯认为"这些工作很少或没有一个属于真正的经济学",他对"经济学眼光"的泛滥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并呼吁经济学要来一个"完全的变革"(科斯,1982)。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数学眼光",在经济学领域,其边界必须限定在"经济学眼光"的边界之内,这是一个前提,上文也已经说过。但还要对"数学眼光"的边界作进一步限定。这里,我想以科斯关于企业与市场两种交易组织边界的划分作为理论框架,对此作一探讨。

科斯认为(科斯,1937),企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企业在内化市场交易过程中节省了交易费用。或者说,节省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代替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那么,企业为什么又不将生产要素由市场购买全部内化呢?这是因为企业存在尽管节省了市场交易费用,但又产生了新的交易费用,即管理成本。如劳动力,需要有人指挥与管理,而雇佣管理人员,购买办公用品等,都需要企业出资。企业规模越大,管理成本越高。当以扩大企业内化一笔额外交易费用所节省的费用刚好被管理费用的增长所抵消时,企业就停止扩大规模。这也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经济学之所以要引进数学作为工具,其理由是要使经济问题的分析更精确、更简洁,使论证更显得"科学"些,以减少研究成果参与交流及发生效用(即被接受)的"成本"——这种"成本"我姑且称之为"被接受成本"。但经济研究通过数学化在节约了一笔"被接受的成本"的同时,也要付出另一笔"被接受成本"。且数学化程度越高,节约的"被接受成本"越多,同时付出的"被接受成本"也随之越多。因为表面上看,经济研究的数学化程度越高,分析过程就越精密,越接近科学,被接受者更少歧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经济研究数学化程度越高,其假设的前提条件就越多,被抛弃的事实也就越多,不能被检验的东西一律被排除在外,这样,经济研究离丰富的现实相距越远,其结果也越被接受者所怀疑。凯恩斯就曾说:"目前过多的'数理'经济学……它和它所依赖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精确……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依存性却视而不见。"(凯恩斯,1936)

就这样,当经济研究的数学化程度所节约的"被接受成本"与随之要付出的"被接受成本"相等时,就是"数学眼光"的边界所在。

越过边界,"数学眼光"的泛滥将直接造成与经济分析数学化初衷正相反的后果。三年前,我曾利用很复杂的随机方程对区域间资本流动问题进行论证,因为自己把握不准,故请教于原南京大学一位在概率论研究上有一定影响的数学教授。老教授以其"数学眼光"不客气地批评了我在此论文中"数学眼光"所造成的复杂结果。他说,譬如从 A 地到 B 地,本来直线距离只有 100 公里,结果你从 A 地先绕到 C 地,再绕到 D 地,然后再折回 B 地,走了整整 1000 公里,然后还自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条新的路径,并以此得意。这番话至今让我汗颜。所以,现在每当我想论证一个经济问题时,我都会想起这些话。

十年前,科斯曾以他惯有的英国式的尖刻,嘲讽他的那些致力于推进经济分析数学化的对手们说,拙于言的才唱,拙于现代经济学的才求助于数学(科斯,1988)。我不是那么认为的。相反,我认为,说得好的就是唱,经济学研究很高深的就用数学。所以,我是将经济学领域中使用数学当作与歌唱一样的一门艺术看,在经济学领域中数学用得好的人就是经济学界的艺术家。但回过头来再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艺术是不可少的,艺术家也值得人尊敬,但歌唱得再好也只能供人欣赏,经济学中数学化程度再高也只能给人以"科学"的外表。而真正在经济思想史上起大作用,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的,仍是以最平朴的语言,最简单也最纯粹的"经济学眼光",来研究并表达经济问题的人,如亚当·斯密。

1998 年 11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一、“海尔布鲁纳难题”的“中国版”

李约瑟博士在其七卷本二十册洋洋数百万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记载了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辉煌成就。但在此书的最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中国在科技史上曾经有过如此惊人成就，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所谓“李约瑟难题”。

在经济思想史上存在着一个同样有意思的难题，即“海尔布鲁纳难题”。海尔布鲁纳在其被西方不少大学称为“经济学说史方面的标准著作”的《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译本见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 6000 年，然面（在亚当·斯密之前）没有出现过一位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家。奇怪的是，远在法老时代之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

一个是“李约瑟难题”，一个是“海尔布鲁纳难题”。同样是难题，在中国学术界的遭遇却大相径庭。前者在学术界几乎耳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熟能详，求解“李约瑟难题”谜底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后者除极少数治经济思想史的人知道外，迄今为止尚未引起经济理论界足够的重视。当然，有人为“海尔布鲁纳难题”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找到了如下理由：“海尔布鲁纳难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而“李约瑟难题”却是一个纯粹的中国课题。

这种理由其实是很短见的，因为它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看似世界性的课题的“中国版本”。中国化了的“海尔布鲁纳难题”将是一个更富挑战性的问题，即：中国作为一个有着 5000 年文明史的大国，为什么迄今为止——无论是在斯密前还是在斯密后——没有为世界贡献出一个经济学大师，以至于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到今天仍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史上为世界贡献了几位顶尖级的思想家，如作为哲学家的孔子、老子与作为兵家的孙子，但却始终未能贡献出一位堪称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如果说西方经济思想在亚当·斯密前始终未成气候，但从亚当·斯密往后，西方经济理论发展一日千里，各种学派精彩纷呈，代表经济理论最高成就奖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一律是老外的面孔；而中国经济思想在此方面则相形见绌，至今未有世界级的成就。尽管近来有的中国人著书说法国重农学派的老祖宗在中国，甚至有的中国人写文章说亚当·斯密可能有剽窃中国道家经济思想的嫌疑，但究其实只不过是“文化宗主的中央大国”的观念仍残存在中国人思想上的一种反映，而且这种说法进不了世界公认的经济思想史，是中国人自己一厢情愿而已。

所以，承认“海尔布鲁纳难题”的“中国版”，探究中国化了的“海尔布鲁纳难题”的谜底，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当务之急。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对症下药，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并最终对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一个大国应有的贡献。否则，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味从故纸堆中去挖掘所谓有世界水平的中国经济思想，或者去过早地奢谈建立足以与世界各经济学派相抗衡的经济研究的“中国学派”，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可能让外国人笑掉大牙。

二、制度的解释

求解中国化了的“海尔布鲁纳难题”，学者大可见仁见智。在“文化热”方兴未艾的今天，许多人尤其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人手。而在海尔布鲁纳本人看来，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经济思想自古以来的贫乏，也就可以从经济制度方面去寻找理由。

在海尔布鲁纳看来，人类社会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其经济运行时刻面临崩溃的可能。海氏设想了这样一种场景：农民不愿种庄稼，铁路职工想当簿记员，而簿记员想当工程学学位候补人……因此，“每日每时，社会都面临着崩溃的可能；这不是由于自然界的力量，而是完全由于人的意向所在之难以预测。”

要避免社会经济秩序崩溃，在海氏看来，有三种手段。这三种手段，其实就是三种经济制度。尽管三种经济制度都可以保持社会经济秩序，但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却面临不同的命运。

首先可以利用传统来安排经济秩序。这是一种自然经济秩序，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人们“利用传统观念来组织社会，对各种不同的和必要的工作，都得按照向有的风俗习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儿子得仿效其父亲之所为，样板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这种经济制度在农业文明阶段占主导地位。亚当·斯密曾以古埃及为例，在那里，“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如果另辟蹊径，就是犯了最可怕的渎职罪。”正因为一个人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生下来时就这样被锁定在传统的经济秩序安排中，所以，社会经济得以正常运行。

其次可以利用有专政机器的政府的命令来组织社会经济秩序。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秩序，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最高当局“用高压手段使社会所需要进行的事务得以完成”。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说，计划经济下，经济秩序是以统治者的法令得以延续与保持的，谁违背最高当局的计划，是要受到统治者任意处罚。在前苏联尤其如此，所以有人说，苏联的计划经济下，不劳动者不得食之外，还有一条，“不听话者也不得食”。但无论计划经济成功与否，计划却是人类社会保持经济秩序正常的手段之一。

在海氏看来，自然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制度下，只要经济问题“是用‘传统’或‘命令’的方法来处理，就决不会产生所谓‘经济学’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就不需要经济学家从旁帮助”。正因为亚当·斯密以前的社会，是靠“传统”或“命令”来安排经济秩序，所以，产生不了经济学及经济学家，这就是海氏自己为“海尔布鲁纳难题”寻找到的谜底。

撇开自然经济不说，关于计划经济制度下产生不了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名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海氏同样的思想。他认为，计划经济制度下，经济目标单一，要素价格既定，社会需要的重要程度政府也已经排好了秩序，所以，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而只需要关心技术问题的经济的“工程师”。

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则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卢森贝尔一句话，也可以作为计划经济下不需要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最好证明。卢氏说：“工人阶级的胜利将是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最后一幕。”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反观中国几千年经济制度史。中国先是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经济制度时代，除了少数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书生常做着改变自身在传统经济秩序中的位置的春秋大梦并只有更少数人成功之外，中国经济秩序的确呈现出超稳定运行态势，自然也就产生不了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自然经济制度半瓦解后，中国又引进了计划经济制度，于是中国进行经济计划与管理计划实施的部门日益庞大，而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不仅未能走向繁荣，反倒日渐式微。到改革开放前，几乎没有什么纯粹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由自然经济，转而又是计划经济，中国经济思想的几千年的贫乏的制度原因就在这里，这也就是“中国版”的“海尔布鲁纳难题”的制度解释。

三、机遇与挑战

海尔布鲁纳认为，人类社会保持经济秩序的第三种手段，也就是第三种经济制度，就是市场制度。

这种制度让人感到大惑不解的地方是：一方面是其规则出奇的简单，“每个人做他认为对他说来最适合的那种工作”，“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是最大的个人金钱上的利益”；而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仅井然有序，“社会上的一切工作——肮脏的以及舒适的——都可以完成”，而且社会福利还能持续改进。

海氏认为，促使经济学产生的，“正是对生存问题这种似是而非的、微妙而困难的解决方式”；面承担解释市场之谜的正是经济学家。所以，经济学与经济学家完全是应市场经济制度之时而生的。亚当·斯密也是受市场之谜的吸引而写作《国富论》，而《国富论》就是说明市场（“看不见的手”）制度是“怎样形成，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怎样逐步演进的”。

哈耶克的观点与海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资源是有限的，在市场制度下每个经济人都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竞争有限的资源，竞争性的市场制度居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需求，于是产生了经济问题与经济学。

所以，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与市场经济制度与生俱来的，而经济学的繁荣，也是在经济学家受到市场制度运行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挑战时不断应战的结果。总之，说经济学、经济学家与市场经济制度“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不为过的。西方经济学界有人就开过这种玩笑：为什么经济思想史上维护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学家多，“就是因为谁要是真破坏了这种制度，谁就是砸了经济学家们的饭碗”。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决定性影响。又因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繁荣终于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也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自此后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经济学家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事实也已证明，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带来了中国经济学的春天。二十年来，中国老百姓逐渐经历了市场经济学的启蒙，中国经济学界各种思潮、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已渐成气候，时下报章炒作的所谓“京城四少”、“改革七贤”、“进京三杰”等就是中国经济学人中姣姣者。

但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也同样面临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与完善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改革还存在着因路径选择不当而出现挫折的可能性，而一旦市场取向的改革出现大的停顿甚至倒退，与中国市场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经济同命运的经济学与经济学人自然也面临大的挫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发展要想汇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潮流,并能对世界经济思想史作出大的贡献,面临双重任务,即首先是继续对国人进行经济学启蒙,并消化与吸收西方经济思想,然后才是超越其理路。而这一切都是要在西方经济思想仍在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再回到所谓"海尔布鲁纳难题"上。中国经济学家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正视"海尔布鲁纳难题"的"中国版",也就是正视历史上中国经济学的贫乏的事实,而且要揭开中国化了的"海氏难题"的谜底;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力争使"海氏难题"的"中国版"内容进行如下变更:有一天,世界将被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所惊诧,并视这种发展为一个新的"海氏难题"。

1999 年 3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

哲学家姜国柱先生今天告诉我，最近一次在怀柔召开的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研讨会，与会者竟不约而同地讨论起"官德"问题。他询问我对此有什么看法。

当初提出要讨论"官德"的人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在一个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政治体制中，靠什么来约束当官者呢？于是，好心人也是苦心人提出，要以道德对当官者进行自律。

但结果却是令人失望：一方面是"官德"两字在众多媒体中日益泛滥；另一方面却是腐败的日益公开化、社会化、透明化。严酷的事实需要我们对"官德"进行反思。

一、"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心"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提出"官德"，便意味着经济学上出现了双重标准：

一重标准是对着平民。在讨论这些非当官者的行为时，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即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些人的行为都是为着自己的私利的，而且他们都各自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己私利。同时，经济学家们认为，也正是因为他们都去追求自己的私利，达到了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这其中，就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即斯密所说的最著名的一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段话:“每个人只想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其本意要达到的目的。”

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不讨论平民的道德问题。但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市民社会中的道德与其说是发自人心的性情,毋宁说是由于经济交往中的多次博弈、天长日久后形成的游戏规则。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指出,是市场经济要求人们诚实、守信、敬业,而不是诚实、守信、敬业造就了市场经济;是日益完善的市场规则而不是先天道德把欺诈行为挤出市场经济。说得更白一些,经济人之所以讲道德,说到底,也仍是为着自己私利。而正是都为着自己的私利,促进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道德的产生。

但提出了“官德”,意味着存在另一重标准,对着政府官员的标准。我们似乎认为,政府官员与平民百姓不一样,他应该是无私的,他们受这种无私的道德所支配,无条件地献身于公共利益。即,调节他们行为的是“看不见的心”,正是受这种看不见的心——当官者比平民百姓应该要高的道德,引导着他们为公共利益服务,从而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他们之中有人出现与他们为之服务的公共利益相悖的行为,也就应该从加强道德入手。

这样的双重标准结合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背景是不难理解的。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的就是“内圣外王”四个字。即一个人只有首先搞好了自身道德修养,然后才有资格做官。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修己以安人”,或者说先“修身齐家”,再谈“治国平天下”。这里都在讲,当官者道德必须超过一般人才行,传统文化对为官者与一般平民百姓道德上的要求采取了双重标准。

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双重标准”在文化传统与中国迥异的西方经济理论界一开始也是存在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曾回忆说,几乎从斯密到布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南以前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遵循双重标准"。向来就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针对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经济的责难,认为"问题并不在经济计划的改变……而甚至是计划的扩大",但"我们需要的是(计划者)正确的道德思想的恢复——回复我们社会哲学的正统道德价值观"。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包括哈耶克在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一开始也认为,"政府官员(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任命的)都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因而,经济学家们所要做的,只是告诉"那些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的政府官员们"如何去做才是正确的。

二、神话的破灭

"双重标准"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结束,是由詹姆斯·布坎南以及戈登·塔洛克等人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这种理论将政府官员首次作为经济人看待,他们与民众之间存在交易:民众以纳税的方式赋予他们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保障,他们则利用自身资源为民众公共利益服务。他们也追求自己的私利;公共选择的过程也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而非"看不见的心",引导着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们最终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他们必须忠诚于公共事业,因为他们实质上是民众雇佣过来的管理全社会的"经理",他们不称职,民众可以炒他们的鱿鱼。

公共选择理论的问世,很好地解释了社会运行方式,同时很好地解释了政府官员们各种行为。弗里德曼认为,这一理论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即这种理论终于将私人决策与公共决策两个看似不同的决策过程统一起来了。如同物理学中统一场理论的建立一样。弗里德曼还认为,这一理论还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公共选择理论将蒙在官员身上的一层“圣洁”的道德面纱揭开，使为官者具有更高的道德这一神话终于破灭。但西方人并不认为失去了什么，反而从中受到启发：看来，要保证为官者忠诚于公共利益的最好方法仍要借助于外部制衡结构；且这种外部制衡结构能真正触动为官者的私利。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有了后来西方吏治中的一方面的“高薪养廉”，另一方面的对不合格的官员依据法律进行的最严厉的经济上处罚。S·贝克尔等人行为经济学更是主张，对官员抱道德幻想是不行的，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要使他们清楚，无效率与腐败，将会使他们一无所有。

看来，中国人也要从“官德”二字的泛滥无助于减少腐败的事实中吸取教训了。我们也只有承认中国当官者也有自己的私利，并求诸于以威胁使用或使用更严厉的彻底触及他们私利的办法来对他们进行约束，才有可能真正减少腐败。而一味强调用道德约束当官者，其结果不仅不能消除腐败，而且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也就是霍尔伯特·金蒂斯所警告的，会因“使人忽略更重要的用以制约领导者的外部制衡结构”，耽误了以政府廉洁、高效为目标之一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所幸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中已经有人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茅于轼先生就多次提出这样的观点，仅从当官者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这一点看，当官者也应该尽心尽责。这就是以经济人的眼光在看待我们的政府官员。

三、公仆意识与纳税意识

这里想涉及到另一个相关话题：关于纳税意识问题。

许多人都抱怨中国人纳税意识比西方人差。如果说只是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商行政管理及执法部门这样说也还罢了，奇怪的是经济学界也有许多人这样说，包括茅于轼先生曾在《经济学消息报》上也载文谈中国人纳税意识问题。但公正地说，中国人与西方人比，远算不上刁民。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百姓无不认为种地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反倒到了现在，纳税意识差了呢？笔者倒以为，中国当官者"公仆意识"差是重要原因之一。

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说，仅从所有的政府都具有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上谈问题。西方纳税人纳税意识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政府官员包括一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都清楚他们是以纳税人所纳的税来养家糊口的，是民众雇佣了他们。拿了主人的钱，也就自然应该为主人效命。这就是真正的"公仆意识"；而纳税人也很清楚他们纳税，是用于购买公共服务了。他们以自己的钱供养了政府官员，同时从政府官员那里，他们也应该得到相应的体而的回报，事实上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所以，正因为官员们公仆意识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强。经常在西方电影上看到这样的场而：百姓对着管理者或执法者说："我是纳税人，我有权利这样做。"或是"你要清楚，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养活你的"。

换句话说，只有无论是纳税人还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当官者，他们都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纳税意识与公仆意识才都能具备。中国现在一些百姓纳税意识不强，与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官员们"公仆意识"不强是相关的。因为官员们公仆意识不强，纳税人行使不到纳税者应有的权利，自然也就不想尽这份义务。在中国，如果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胆敢对交通警察大吼："我是纳税人，你是靠我们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一定被看做精神病人或中西方流毒太深。而另一种现象已屡见不鲜：对纳税人来说，靠他们所纳税养活的公仆们，脸难看，门难进；不少当官者还如是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说，我手中的权力是政府或党交给我的。

再回到所谓“官德”上，我们将官员也当作经济人看待，绝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讲“官德”。但我们所讲的“官德”，是与平民百姓一个标准的道德——最低限度：别人出了钱，你就要好好为别人办事。或者说，他们也只要遵守市场经济最低规则就行了。脱离开这个“最低限度”去奢谈什么“官德”，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让我们找不准用于约束当官者的真正办法。

斯密曾说过：“我们对餐桌上佳肴的期待并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求他们博爱，只望他们自爱，因而，我们也决不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只说他们可获得哪些好处。”在此笔者就将这段话稍作变通，以结束本文：

我们对当官者的期待并不是要求他们有多么高的道德标准，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求他们博爱，只望他们自爱。因而，我们也决不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面只要对他们说他们可能获得哪些好处，以及他们在可能面临的惩罚中失去哪些好处。

1999 年 3 月 13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中国人该如何自处
——写在“五八”事件以后

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五八”事件以来，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该如何自处。

（一）

一般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都笃信自然的演进的进步史观。

英国哲学家边沁认为“人是追求快乐的机器”，据称由此奠定了经济学乐观主义传统，而这种乐观主义传统又与经济学自由主义的自然的演进的进步史观相联系。经济自由主义老祖宗亚当·斯密就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上自发的交易行为以及随市场发展而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将促进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或者说，自然自由制度可以使社会不断地进步，这就是自然的进步观。

新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一方面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他说：“由于我们能从错误中学习，我们的知识在增长，尽管我们决不可能知道——即决不确实地知道。既然我们的知识能够增长，就没有任何理由对理性感到失望。”他还说：“人能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够认识，因而他就能是自由的。这就是解释认识论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之间的联系的公式。”(1961)在这里，波普尔是认为，因为人的理性是演进的，即人的知识是在批判中不断增长，因而，社会也会随之演进地进步，这就是演进的进步观。

作为新自由主义重要一支的产权与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1966)，通过对西方世界历史的分析，认为资源价格在自由市场制度下的变动是制度变迁的动力，而人可以通过“在时间中学习”，使得制度不断演进，这也是一种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也持斯密同样的观点，他们相信凭借自由市场 本身的力量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尤其是他们都强调了自由市场具有的优胜劣汰功能——即“弗里德曼假说”中所言，市场的自然选择可以淘汰非利润率最大化者，是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

由于对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的信奉，新自由主义者从来都不主张用骤风暴雨的方式来强制推行“抽象的善”，而主张以“逐渐和平地消除具体的恶”的方式渐进地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波普尔语)。

中国经济学界知识分子往往都很善良很单纯地接受了以上观点，因此，在世纪末他们都尽情地憧憬着下世纪的世界更美好。

(二)

然而中国经济学界知识分子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其实世界的发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空间，即因小人的存在而存在退化的可能性。

同样也作为自由主义阵营中重要的一员，经济学家阿曼塔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诺发现(1972):假设有两家企业签订了规定价格与限制产量的卡特尔协议,其中一家企业很好地遵守了这个协议,而另一家企业却私自突破限制提高产量,显然,一段时间后,不遵守协议的企业会在竞争中打败遵守协议的企业,而从利润率看,遵守协议的企业高于不遵守协议的企业。这就出现了劣胜优汰的现象。除非遵守协议的企业发现此情况后也不遵守协议才能避免破产的命运。

由此推及到社会进步。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秩序越好的社会中,骗子得逞的机会越大,因而会导致一种效应:好人会因为觉得吃亏,会因为觉得当坏人的人收益更多而去效仿坏人,从而不是使整个社会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而是退步。这就像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君子国,因为有一个惟利是图的小人进入该国,使君子国公民道德水准逐渐下降,最终使君子国瓦解。因此,要警惕社会发展因存在小人而存在着退化的可能。

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五八"事件的爆发,更验证了上述说法,更说明社会的退步的可能性已经现实地存在于今日之世界。

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退一万步讲,即使认为它的价值观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是值得推广的,按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应该是在与其他各国的和平交往中使其价值观自然地渐进地得到认同与普遍化,这才是符合其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但它恰违反了这一点,硬要以武力强制推行其抽象的"自由"、"人道"观念。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武力侵犯南斯拉夫,更公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是撇开了联合国,公然违反了它自己参与制订并参加了的多项国际公约,其行为就像不遵守协议的那家企业,就是君子国里的小人。一旦它武力侵犯南斯拉夫成功,一旦它没有因袭击一个主权国家的使馆受到足够的回击,从而达到了它独霸天下的目的,或者要么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倒退，是典型的强权压倒了公理，用新自由主义者的话讲，世界的“治安权在一个杀人犯手里”（勒帕日，1977）；或者要么因其在世界上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而又因此得利，而使得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无视联合国存在，无视国际公约的存在，从而使这个世界又回到一个没有秩序、没有和平，充满暴力、仇视与战争的世界（君不见科索沃战事正紧时印度政府声称“看来我们发展核武器没有错”，而发展核武器本来也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这同样也是人类社会一个大倒退。

（三）

其实，从黄仁宇先生所谓“大历史”观来看，对人类社会持进步史观的乐观看法也值得怀疑。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孕育出的东方文明是一个满怀善意的文明。她有着天下主义的情愫，对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一向抱有宽容感与同情心。因而，她一向是与世无争，一向是与人为善，一向是尚义轻利。也因此，她从来缺乏将技术应用于暴力的动力，更没有将技术用于暴力再用来向其他文明施暴的意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用来航海与周围国家友好交往，因此，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造纸与印刷术用来传播文化，使得悠远绵长的中华文化以浩如烟海的典籍形式使更多人共享并得以传承；火药的发明则更显示了这个民族恬淡无为的性格，因为这种最有可能直接用于暴力目的的发明在古老的中国最大的用途却是增加喜庆的气氛。同时，东方文明的善意还体现在她对弱者的同情与对强者的抑制。孟子把“仁”就解释为“恻隐之心”，并说因为“人之初，性本善”之故，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谓大丈夫”。所以,这个文明是充满善意同时还充满正义的。

但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个好的文明却在近代开始逐渐衰落,其主流地位被另外一种充 满了“恶意”的西方文明所替代。西方文明把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用于炮舰,并以此在不大的地球上四处游弋,游到哪里就把掠夺与奴役带到哪里,包括带到了指南针的发明地中国;西方文明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用于制造枪支弹药,并且想尽办法提高其杀人效率,更以此来推行其掠夺与奴役;西方文明还将印刷术与造纸术用作其舆论工具,鼓吹其文明的先进性,为其掠夺与奴役加上“自由”或“人权”的外衣……

可见,历史这种“劣胜优汰”可能性的现象是早已存在了的。只不过一个长的历史进程很少有人进行反思,而科索沃及“五八”事件血淋淋的死亡离我们这么切近,我们才更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而已。

(四)

由此,中国经济学界的知识分子应该清醒了: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不断向着善的世界, 一定程度上,我们仍生活在有狼的世界上,且这些狼随时都有可能使这个世界倒退回去;生活在有狼的世界上,我们又一时还无法消灭狼,那么中国人自处的原则是什么? 我以为,可以用列宁的一句话表达:“和狼在一起,就要学会狼叫。”(新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615 页)亦即,要有让敌手害怕的一套本领。否则,你就会面临被狼咬甚至被狼吃的命运。

要“学会狼叫”,我们就不能只讲“公理”,只讲“正义”,因为这种善意甚至被狼看成是软弱可欺,我们还得有维护“公理”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正义”之剑。说得更白些，我们要有实力。这种实力并不取决于国家财富的多少，有一定的财富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然无法解释五六十年代仍旧贫穷的中国足可以让美国人望而生畏；也不取决于你仅有几件核武器，不然就无法解释“五八”事件其实是自核武器诞生以来一个有核国家首次对另一个有核国家直接进行导弹攻击。这种实力就是主流话语中所言的“综合国力”，而这种综合国力在当代又主要以科学技术为后盾。只有我们把经济、军事、政治、文化都搞好了，尤其是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了，我们的综合国力真正强大起来，我们不是处处受制于人，我们就不怕狼来，狼也就不敢来；或者即使来了，我们也有放手打狼的一套本领。

要“学会狼叫”，我们就要不断推进我们的改革。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更好更快地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二十年改革使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但科索沃战争与“五八”事件却提醒我们不宜对自己估计过高，我们的相对国力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完善改革，使得改革的成果的的确确不是单纯体现在某些经济指标的上升上，而是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增强上。因此，要把发展与安全、经济与国防、经济与政治等各项改革更好地兼顾起来。同时，要确保自己不能乱，以理性与平和的心态对待改革中成本的负担与利益格局的调整。

要“学会狼叫”，还有一个“向狼学”的问题。1918 年列宁在新生苏维埃政权被迫与德国签订耻辱的《布列斯特条约》后说：“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新版《列宁选集》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第三卷第 473 页)今天我们对于侵略我们的对手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愤怒影响我们的理智,要更加扩大开放程度,要向一切文明成果学习。对手比我们强大,证明它们自有一套比我们强的地方,所以更要向对手学习。学习好了,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才有"与狼共舞"的资格。

1999 年 6 月 10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改革"冷漠症"的背后

曾向朱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民真穷"的李昌平先生,现在是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当编辑。几天前,他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写一篇稿子,讨论"改革冷漠症"现象。

再前几天,一位政治学者在我的信箱中投了一封信,也谈的是这个问题。他说,就近期中国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热情的急剧下降,甚至都可以用原来的经历作比。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以为共产主义是一条洒满阳光和鲜花的坦途,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突然被告知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我们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幻灭。到了七八十年代,另一个金色的理想填补了思想的真空,那就是改革的黄金梦。以为改革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不二之路,而且是整合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新的"意识形态",但进入九十年代后,我们痛苦地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相反,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使社会环境空前紧张。这也是一次精神的打击。

的确,与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热情相比,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相对冷淡。这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其实是内在一致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改革是一种自发式改革,来自普通民众的热情构成了改革的基本动力;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几乎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其原因也正是由于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本身持观望态度,改革由此缺乏动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力。

要分析民众对待改革态度上的差异，制度经济学或许能提供某些思路。

改革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从经济学原则看，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对于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支持改革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用戴维斯与诺斯的话讲，"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 274 页）。

但是，一方面，对于制度整体性变迁这样的长时间段，因为其中不确定性太大，人们对于改革导致的收入预期在不断变化，因此，社会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是不断修正的。这就是诺斯所言："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会导致它们对建立新制度安排的态度的全面修正。"（同上，第 299 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各阶层中成员有着相对于制度"现期消费"而言不同的内含贴现率，因此，社会中各阶层成员对于制度的"预期净收益"中"预期"的时间期限也不相同。对此，戴维斯与诺斯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基本结论是，"如果某个社会阶层所面临的贴现率越高，该社会阶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倾向于当前报酬流量的安排"（同上，第 315 页）；反之则反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中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中成员更看重改革过程中每一项即时举措给他造成的即时成本与即时收益，并根据这种即时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自己对改革的态度；而并不太看重较长时期的"预期"。社会中收入较高的阶层则较为看中时滞相对较长的预期。

总之，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是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相关的。他们对于改革热情很高，往往是因为他们对于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预期收入怀有很高的期望，面他们对于改革态度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冷漠甚至反对时，则是因为他们对于下一步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收入预期很低甚至为负数。

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变化，也要从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的变化谈起。

1984年以前，中国改革局限于农村，农村改革又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举措。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权力集团中极少数人感到利益相对受损以外，其他社会阶层都直接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劳动力集团中的农民阶层收入大大增加；城镇居民不仅从做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而且最直接的实感是自1949年以来农副产品的供应从来没有如此丰富过；权力阶层也因此重新找到了统治合法性：即用经济发展重拾人心。如果用福利经济学中的所谓帕累托判别标准，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是使得各阶层都是过去境遇的“帕累托改进”，因此，这种改革会受到社会各阶层普遍的支持，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自然很高。那也是中国改革的最黄金年代。由于先期改革使人们看到了改革将给自己带来好处，人们对于下一步改革的社会预期仍然很高，因此，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末期。

描述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改革进程很复杂。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对中国民众改革热情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人们首次认识到：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1992年，改革重新被启动时，尽管国企改革已经被名义上摆在中心位置，但由于改革的难度很大，在操作层面，改革仍旧做的是“培植增量”的工作。即在存量基本不动时对增量的改革；而对增量进行改革，改革先入者明显受到激励，得到更多的好处。而由于增量一块当时很小，存量较大，所以，分配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了，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即权力阶层及新兴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无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论合法与否，其从改革中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大；而增量改革的成本基本由存量一块承担，但此时由于类似"拨改贷"等各种政策的出台，支持存量的财政支撑基本断流，同时不仅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反对于作为依附在存量上的那些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进行足够的补偿，且没有兑现以前有过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承诺。这使得其与增量一块之间的利益差别更大。还有一块，增量改革市场化进程，这是一种借助于政治框架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上的规范，发生了较为普遍的权力资本化现象，特别是有权者非法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民间称之为"掌勺者多吃多占"——实际上也是在侵害存量一块的利益，使本来相对利益已经受损的存量与增量一块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改革中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预期不同，因此，对于改革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整体上讲，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抱以热情的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新兴的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按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所言，因为，"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又因为政府在将经济效率作为中心发展目标后，新兴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得到政府强力支持"，"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强助权力"。所以，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很好，而且既有改革使他们成为得利者，因此，他们对于改革的热情成为九十年代改革的主动力。

但附着在存量上的劳动阶层对于改革的热情却日益下降。这也是因为既有改革使其相对利益受损使得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不好。正如陆学艺等人在《报告》中所称，历经二十年改革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工人阶层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强助权力逐渐减弱，几乎只剩下由自身资源产生的自助权利”；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民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正由于自觉处于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位置，所以，附着在存量上的社会阶层对于改革的热情越来越低。尽管政府常常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说教：“改革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较远预期的净收益到底有没有，对于社会贫困阶层来说无关紧要，所以，以一种远期的预期净收益来试图说服以劳动集团为主的利益受损阶层提高对待改革的热情，效果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增量改革的受益者对于改革的热情也在下降。其原因则在于，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在成为社会富裕阶层后，比较看重继续改革的预期。而在下一步由增量带动存量的改革中，可能会轮到他们更多地分担改革成本，因而，预期收益未必会超过预期成本，也就是说未必有净收益，因而他们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因而变得保守起来，对于继续改革的积极性自然也会下降。

透过改革“冷漠症”的分析，我想到了最近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改革是否已经过了大关？如果没有过大关，下一步如何过关？

比喻一：如果用旧房子比喻存量，用新房子比喻增量。那么，中国的改革是旧房子不动的情况下盖新房子（这完全不同于前苏联的改革。前苏联的改革是从存量开始，相当于先拆旧房子，在空地上盖新房子）。盖新房子的成本是由居住在旧房子里的人承担的。但新房子不断盖起来的同时，旧房子却失去了维修的经费来源。更有甚者，有人为了盖自己的新房子，甚至干起了偷拆旧房子砖瓦的勾当，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如果新房子足以使所有住旧房子的人迁出来住进去倒也可以，但问题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在于,承担了建房成本原来住在旧房子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够住进新房子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仍住在已经不堪风雨的旧房子里。所以,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矛盾是累积性的(而非前苏联爆发式的),这也决定了改革热情随着矛盾的累积而不断下降。同时也说明,中国改革还没有过大关!

比喻之二:假设这个社会共有一百个人,如果改革得以继续进行,可以给其中一个人增加三百元钱;但却让其中九十九个人每人损失一元钱。现在要求这个社会做出选择:改革到底是继续进行还是不进行?如果按照民主的简单多数原则,显然,其中九十九票反对,而只有一票赞成,所以,改革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以希克斯标准衡量,继续进行下去的改革应该又是"可容许的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是可以补偿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相抵,净收益为(300 - 99 = 201)元。因此,政府应该清楚,这样的改革应该进行下去。而要使改革进行下去,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使另外九十九个人也成为改革的热情支持者。而要使另外九十九个人也有改革的热情,又必须使其对于改革有预期净收益。因此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就是由改革受益者对改革受损者进行补偿:即如果在民主投票前,政府要求受益者做出承诺:改革如果继续进行下去,他将从增加的三百元钱收益中拿出 198 元钱,给其他九十九个人每人补偿两元钱,那么,这项改革其实就成了每个人都能改善其状况的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其中九十九人每人增加一元钱收入,而另一个人增加 102 元的收入。也因此,改革一定会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先生一开始也是这种思路。他说,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以先富带后富。他还特别讲到所谓"两个大局":内地先要支持沿海,无条件富的人要支持有条件富的人;称"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题”;“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并称“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显然隐含了一种政府策略:让改革即时受益者与即时受损者都进行相互的承诺——受损者先投票支持改革,受益者在受益后对受损者进行补偿。

因此,我愿再次强调我在其他场合反复表达过的意思:要重新燃起中国社会最广大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要过改革大关,就必须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2002 年 3 月 18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切的忧虑

当年的“中国同志”,应该对切·格瓦拉——人们更习惯于就称他为“切”——这个古巴同行者的名字不感到陌生;恐怕让他们感到陌生的是,对这个人的怀念今天竟会成为东西方共同的情绪。不久前美国的《时代》周刊一则消息说,有关切的书籍,对美国青年的吸引力竟超过了“克林顿丑闻”。

最近,我再次将切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读了一遍,印象中挥之不去的除了切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以及“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革命意志”(切语),还有切在与一些同志的通信中所表露出的思想。而这些思想,过去还鲜有人提及。

切在一封写给一位名为阿图罗·唐巴罗纳博士的信中说:“无论如何,我对你不隐瞒我的忧虑,因为比起私人生产者来,国家往往是一个效力较差的管理者。”切还劝这位对农地问题感兴趣并向切提出报告的博士:“也许你去参加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可以加强那个机构。……一切全靠你掌握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时代的意义和正义尺度的能力;因而,也是以批判眼光估价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所犯的许多错误的能力。”

此前,切在另一封信中说:“首先,请允许我承认我国的官僚机器还是很强大的,而且根深蒂固。它把报纸吞到大肚皮里,好像孵小鸡似的,到时候才设法把这些报纸送到目的地。”

切的这两信都写于 1963 年,古巴革命刚胜利不久。人们还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处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所带来的梦幻般的激情中。而这时的切，已经看到了这种新社会制度可能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低效率与官僚主义，并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1964年，也就是切给他一生中最亲爱的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信，首次要求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并放弃其古巴国籍准备到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的那一年，切在另外一封给梅斯特雷的信中说：“不幸的是，在我国大多数人的眼里，而且在我自己的眼里，认为对一个制度的赞扬胜过对这一制度的科学分析。这种看法对于澄清我们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切的意思很明白，光有对新制度的热情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能理性地分析这种新生的制度。

这是号称“最纯粹的革命者”的切最后一次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要知道，切一生中甚至都没有为自己常面临死亡而担心过。

还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提及的这些信件，在切的所有著作中，是我所仅能见到的切对新的社会制度的经济问题给予关注。

切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中曾自比为唐·吉诃德，并让“两位老人”“不要忘记二十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现在想来，二十世纪是没有忘记他。但从最近东西方关于切的纪念文章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只注意到了切近乎宗教狂热般的革命热情。而从以上切的信件看来，这如果不是对切的误读，至少也是未能真正读懂切的全部所思所想。

问题就在于，激情与想象力的缺乏，正是东西方社会重新关注切的时代诱因，因而，谁又会愿意再去深挖作为一位充满激情与理想的革命者理智与冷性的一面呢？

1999年4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历史学家的绝望

——再读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认为市场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存在对立的实质，无疑是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动力》一书的最大贡献。但布罗代尔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还试图给人们找一条通往更自由和谐的社会的道路。因为他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历史学家不应该只是提出他思考的验证，而应提出别的东西”。他将此称为“历史学家的责任”。

布罗代尔首先不愿意对任何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妥协。他说：“在西方，对于抨击资本主义恶行的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回答道，相比之下，此乃小害，是自由经营和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负面。我对此全然不信。”不妥协之后布罗代尔自然想到了斗争，即处于下层的、分散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向处于上层的、与国家合流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本身看上去是一场争取经济平等的斗争，而实质上，因为资本主义垄断经济是与国家合流的，是与政权勾结在一起的，是依靠统治机器对下层的自由市场进行压制，因面，这种争取经济平等的斗争又是一种争取政治平等以及文化平等的斗争。同时，垄断压制的又是自由，“它在经济角斗场上否定了自由”，因而，这种争取经济平等的斗争又是全面争取经济、政治与文化自由的斗争。所以，布罗代尔的知己、美国纽约大学“布罗代尔研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中心”主任、著名学者华勒斯坦指出，在布罗代尔那里，“反对政治不平等的斗争，反对经济不平等的斗争和反对文化不平等的斗争不正是同一场斗争吗？”“参与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世界就是意味着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争，即为人类的自由与博爱而斗争，因为，这场斗争的逻辑不允许世界上存在着人下人。”

但斗争的前景是什么？人们试图建立的更自由和谐的社会是什么？在此问题上，布罗代尔却陷入了空前的绝望之中。

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比一般人更明白，逻辑与历史不仅应当是一致的，而且还应该互证。但历史却给了他当头棒喝：“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500年的历史乃是这个市场屡屡失败的历史”；而资本主义本身不仅没有失败，反倒越过国别、民族与宗教的界限，“向全世界伸展”，而且，“它当前的大目标是：重整全球主义的旗鼓”。在此情势下，很难说这种斗争还有什么前途，因而，布罗代尔的理论所能够给予人们的也仅仅是有这样惟一的希望：“这个市场，或者更确切地说，组成这个市场的人，从未认输。”但问题还在于，在长久的斗争与失败所交织的困顿与绝望中，说不定某一天，这些人会认输。这不能不使得布罗代尔对前景感到绝望。

然而，使布罗代尔更感到绝望的还不是这场斗争似乎注定要失败，而是这场斗争如果取得了胜利以后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因为按照历史的逻辑以及理论本身的逻辑，斗争的结果自然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资本主义的失败，又应该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表征”。但恰恰布罗代尔时代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自由市场的任何空间，相反却是比垄断资本主义更加集中的彻底与政权及国家融为一体的全面国有制计划经济，人们不仅没有消费的自由、没有交换的自由、没有流动的自由，甚至连寻找自己合意的工作的自由也全然被剥夺。既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不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自由感到愤怒并提出要斗争，斗争的结果却可能是更不平等更不自由的当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布罗代尔就这样陷入了由自己的理论与现实的历史所设就的“两难”处境。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的末尾，布罗代尔不得不以迷惘的口气自言自语：“然而，我心中的理想社会能有吗？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它在世界上会有许多信徒！”

绝望的布罗代尔终于被迫承认无法给人类指出更加自由和谐的社会之所在。而且，他转而认为，根本也就没有这样一个自由和谐的社会存在。所以，在他临终前最后一次讲话中，他一方面要求人们原谅他，另一方面又试图让人们理解他之所以无法给人类指路，原因就在于人类本无路可走。他在应听众要求对人类未来进行“预测”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的立场是不认为人类有广阔的自由的，这也是我最大的悲伤之一。每当我就此思索之时，（我看到）人类的自由越来越狭窄。很不幸，恐怕我没有看错。”

但布罗代尔到底还是未能忘怀自己的责任。他深知，“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奇特的食粮”，以填补理想幻灭后“造成的一个可怕的真空”。于是，在他认为现实社会找不到理想之所后，布罗代尔转而让人们到文化中去寻找，即让人们回归到文化的乌托邦中，由这种文化的乌托邦来制造一种虚幻的幸福以满足人们求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他说：“人不可能停止虚构，不可能停止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只要有人在，社会就有幸福的需求，就会有理想主义的要求。谁来提供幸福呢？由社会本身、由文化来制造。让我们信赖文化吧。”

今天，布罗代尔的绝望，因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的绝望，与其主张的回归文化乌托邦观点一起，遭到某些理论家的诟病。而事实上，我倒以为，在涉及到人类前途命运这样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大问题上，坦率地表示自己的绝望倒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绝望与不自信，往往是基于对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的透彻了解；同时，文化乌托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并没有走出知识分子以笔进行思想文化批判的本分。而相反，一切乐观地、自信地声称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彻底解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理论与理论家，往往被证明不过是“理性的致命自负”的产物，并有可能因这种理论的僭妄力图将乌托邦付诸于现实，结果在自由或幸福的名义下导致人类自由与幸福更大的灾难。

当下世界上任何不怀偏见的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将布罗代尔的“终天之见”——“人类的自由将越来越狭窄”——视为“乌鸦之咒语”，反而说成是“天鹅的绝唱”，大概就因为此吧?!

（注 1：此前我已发表《对市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读[资本主义的动力]》一文，见《书与人》1999 年第 3 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讲道德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讲不讲“道德”问题，说到底就是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要不要价值判断。这个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颇富争议性，迄今为止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在国内学术界，总有一种倾向性的看法：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学派是主张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其中，有的学者在搬出弗里德曼的观点外，还搬出哈耶克作为例子。

把哈耶克与弗里德曼都归入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行列没有错，但把二人同归为主张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行列，其实是个误会。因为弗里德曼专文论述过经济研究（不是经济学家）原则上应该排除价值判断，而哈耶克则反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尽管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一样对自由市场、私有化的维护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哈耶克在经济研究究竟要不要价值判断问题上的看法则十分明确：即经济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价值判断，且经济学家的责任就在于认真探求社会的价值准则。

那么，对哈耶克的误会从何而来？笔者以为，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的讨论有关。

在哈耶克另外一本取名《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出来的。因为理想主义者越是忠实于自己理想中的那些目标，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他们就越是尽力干预和损坏在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自发力量，而这些自发力量越是受到限制与破坏，越可能给人类种下恶果。他写道："必须理解到，现在世界上许多最有害力量的根源往往不是坏人，而是高尚的理想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残暴行为与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种下的恶果。"

众所周知，国内关于经济研究要不要价值判断的这一问题的论争与当时学术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有联系的。而在讨论中，其中一方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放弃"救世"的理想与英雄主义精神，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哈耶克在以上所说的。所以，在一些人看来，主张经济研究应该有价值判断的人，就是哈耶克所指的理想主义者，也只能对客观的经济规律产生坏作用。而哈耶克又反对这些人，因此据此可认为，哈耶克也是主张经济研究应该排除价值判断的。

但与这些人的推断恰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一书中，明确地谈到了经济研究的价值判断问题。他说，经济研究要讲价值判断。经济学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它告诉人们应当争取什么、不应当争取什么，应当维护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反对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借口经济学中立而不管研究结果在实践中影响，在哈耶克看来是"以别人的牺牲来博得自己不自私的美名"。经济学家必须对自己作为人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后果负责，是哈耶克称之的"经济学家的责任"。

在此书中，哈耶克还认为，经济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一样，经济研究不能类似自然科学那样展开，但包括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所强调的经济研究数学化正在将这个学科引向绝境；因为经济研究的一味数学化将会导致空洞的结果，而不可能对实际经济问题作出任何有益的解答。经济学和经济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学家的任务是认真探求社会价值准则。他认为,人类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前提是摆脱"当代蒙昧主义"的束缚,"解放"人的思想和人的创造力,把政府的权力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因此,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任务中,对价值准则的探讨显然要比数学的演算重要得不可比拟。

就哈耶克本人来说,他坦率地承认,经济研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他从事经济研究的目的是要维护自由这一社会的基本价值;并通过这种研究告诉世人,自由作为一种目的本身的价值所在。他之所以反对计划经济,其理由是,计划经济将使"个人一切听命于管理经济体系的当局","使个人完全屈服于国家的专制之下,没有选择的余地",因而,计划经济使个人自由丧失,是"通往奴役的道路"。而他之所以维护私有财产制度,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或是属于独裁者,谁有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管制我们。"因此,私有制的最大好处是它保证了个人自由。甚至对无产者,因其在私有制下有选择雇主的权利,它也是无产阶级个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证。

这里还值得指出的是,国内力主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樊纲先生(最近又在《读书》1998 年第 4 期发表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常引用这样一个例证来说明其观点——也同时一度是受到许多人倍加推崇的"惊世骇俗"之语——即从经济研究排除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为纳粹德国服务的经济学家不仅无罪,反而有功。笔者曾怀疑这话有来头。其实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也花了不小篇幅论述关于为纳粹服务的经济学家问题。但意思却与樊纲先生完全相反。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哈耶克认为，一个科学家、学者、作家，必须是首先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自由”含义的人。有些科学家、学者、作家却不是这样，他们尽管在职业领域有成绩，但没有政治理想，没有做人的原则，以至于被统治者所利用。接下来他举例说，纳粹党人统治期间的一些德国经济学家就是例子。他认为，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相比，不是整天在实验室里，对纳粹的纲领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本不应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被纳粹所拉拢。对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不能像那些背叛原则的国社党经济学家那样去为专制、暴政编造谎言，甚至也不能像一个埋头于实验室内只知道数学推演的易于被纳粹所利用的自然科学家。

应该看到，自从罗宾斯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科学以来，经济学作为在给定的价值判断之下一种工具，日益将价值判断本身排除在视野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定程度上也保证经济研究工作的客观性。但经济学家则是另一回事。尽管说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但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他不仅仅在既有的价值判断下面工作，他还负有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甄别社会价值、赋予社会价值的功能。所以，经济学家不能不讲道德。哈耶克就是这样一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并为经济学界树立了榜样。

不幸的是，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不是很清醒。他们把经济学不讲道德误会成经济学家也不讲道德，并且日益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所以，还在两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必须有超越职业本身之外的求真精神与节操。这种求真精神与节操会引导他去关怀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如果我们今天撇开一切社会文化价值，撇开对社会公平、自由与理性的关注，去做一种超乎社会现实之上的学问，那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成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为知识分子，中国人所盼望的好日子也会因缺少真正知识分子的维系与奋斗而遥遥无期。

1999 年 2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从威廉公爵的葬礼说起

我要讲的，并非我自己的观点。我不过是将西方经济学界某些人的观点串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成长，源于西方现代企业的成长；而在我们中国不少经济学人眼中，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成长，是因为他们对企业的定位很合适：即企业就是赚取利润的，它们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也不需要考虑社会道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人给了企业几乎是绝对的权利。这与西方经济学的品质一致，即经济学也不讲道德，只研究如何提高效率。这恰与中国传统国有企业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凯恩斯在《访俄印象》中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资本主义的成功，就在于将企业与道德的事相分离；而社会主义企业的低效率，却在于社会主义总想将企业与道德这两个领域合并在一起，尤其想让后者统治前者。但事实却似乎并非全然如此。

先从一个故事讲起。

英格兰的征服王、诺曼第公爵威廉在卢昂逝世，正准备下葬。官员、士兵与百姓集合在圣卡恩的一座教堂外，向他们尊敬的国王做最后的告别。主持葬礼的官员已经说完话，执绋人正着手将老公爵的遗体抬进事先准备好的墓穴中。

正在这时，人群中跑出一个名叫阿塞林的老百姓，高声喊了一声“哈罗！”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葬礼当场停止下来。所有的官员都倾听阿塞林申诉他的苦衷。原来，公爵下葬的这块地原来就是阿塞林家的土地，后来被威廉公爵不付任何代价强占了。官员与主教经过短暂的商量，当场付出六十个苏作为收购安葬威廉公爵的那几尺平方土地的象征性费用，并答应事后将公爵所占全部土地作价赔偿。葬礼得以继续进行。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征服王，占了一块地，能算什么呢？一个普通百姓，喊一声"哈罗"就可以让征服王的葬礼停止，这是什么原因？且听我的解释。威廉王的先人北欧人罗洛公爵在以强权攻城掠地的同时，试图使强权与正义并行不悖。于是，他亲自游遍诺曼第各地，以公示他提出的一项奇怪的法令：凡是觉得自己被迫害的人都可以大喊一声"哈罗！罗洛！"，他就会停下来倾听这个受迫害者的申诉，并按照上帝和天良的准则而非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解决。后来，以"哈罗"作为向上帝和天良呼吁的手段就成为诺曼第人的一个惯例。阿塞林也是以此解决了他的土地被占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国王良心的故事。在美欧都很经典。其用意就在于说明，西方世界从来没有过绝对的权力，因为在权力之上始终有一个道德与正义，即使是国王也不能超然于它们之上。阿道夫·贝利在其《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一书中，就引用这个例子说明，道德与正义在权力之上，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基本精神。

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就有限制权力的道德与正义。西方的企业也是如此。贝利认为，在早期，西方企业的权力曾经有些肆无忌惮，但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中，"抑制、间接地影响、并在某种场合能够削弱企业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的抵销力量已开始表现出来"，这也正是促使资本主义再次走向中兴的一个重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要原因。作为二十世纪资本主义革命后占统治地位的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哲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作为典型的机构的企业必须解决两个互相结合的属于政治性的谜：即实现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机能协调，实现企业活动和流行的伦理观念之间的协调。

有一个与上述故事同样经典的企业的故事。

二战结束后不久，纽约一家实力雄厚的人寿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与董事长，决定同一个小商号签订一个广告和宣传的巨额合同，这个小商号是由公司的总经理的年轻的儿子所创办的。合同执行得很顺利，小商号做得非常出色，公司给小商号的费用也完全符合当时该行业中通行的规则。同时，按照纽约州的法律，法院也支持公司与小商号之间的这笔交易。因为虽然其中带有董事和职员的私人利益关系，但合同的条件公平，事实完全公开，没有任何问题。然而，纽约州的保险业监督局却对此事提出了异议，并坚决要求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必须辞退总经理。

公司的董事会在保险业监督局的要求之下，立即就老老实实地辞退了为公司工作了二十五年之久、创造了辉煌业绩的总经理。他们本来有其他选择：比如可以请求法庭支持这项合同，也可以将此事公诸于报刊引发“政府还是市场”的准政治问题讨论。但公司董事会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明白，即使可以援引法律证明那项合同合法性，但像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更应该小心翼翼地使用权力。这是一个良心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所有的法律上没有错误但在良心上有些说不过去的问题，以不去争论为妙，直接听凭于良心！

以上例子也出自贝利的名著《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

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尽管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我的理解是，这决不是意味着经济学可以不要道德，而是将道德作为一个更遥远的背景，看成一个既定的前提，在做实证研究时不必要专门再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考虑道德即价值判断的因素。从一定意义上看，道德还是在先，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始终高于经济学。

这里也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福格尔通过其实证研究认为，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条件下产权是清晰的，因而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这一结论出来后引起了经济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左翼人士据此以为福格尔在为早就臭名昭著的奴隶制辩护，而一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勒帕日等则从中看出了所谓“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他们说，福格尔与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在年轻时，并不掩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同情，福格尔甚至曾经对马克思主义表示过好感”，但“经过科学的思考后，他们转而信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了。”福格尔一系列经济史著作，开创了“新历史经济学”的时代，旨在强调政府以促进经济公平的努力——包括对奴隶制的摧毁，包括修建铁路等——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降低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但福格尔本人的看法是什么呢？1993 年，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一位记者就问他：“既然奴隶制如此有效率，那么为什么还是会灭亡？”福格尔凛然作答说：“如果有效率的进程同时又是道德的，那么便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我并不认为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而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种被称作道德的东西，它高于经济学。”福格尔的意思很清楚：尽管奴隶制有效率，但因为这种制度不道德，因而必须灭亡。在产权清晰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即公平。同时，从经济学研究看，道德始终高于经济学。

我再重申我的观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之所以步入其黄金时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较妥帖地处理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如果说以上还是个别性例子的话，那么，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等则可以作为在全社会范围内试图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协调效率与公平、经济与伦理的有力证据。

但是，这也不妨碍我的另外的观点：二十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尽管在国内越来越有道德，但这种道德一方面建立在它们可以从外围国家获取足够剩余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更没有将这种有道德推己及人。所以，一方面是他们国内的人民生活越来越舒适、悠雅，工作环境也越来越文明与轻松，并富有创造性，面另一方面，他们在广大外围国家建立的“血汗工厂”也越来越多。而在这些“血汗工厂”中，丝毫没有道德可言。也正因此，左翼运动所倡导、被凯恩斯批评为可能导致低效率的将企业与道德结合在一起，从其全球性意义上看，至今仍没有过时。

回到中国现实，在改革我国企业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都强调企业以利润为惟一目的的重要性，这在中国传统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的背景下提出，不是没有意义。但我们如果考虑得更长远一些，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前期有过的“血淋淋的和肮脏的东西”，我们是否转而提倡兼顾效率与伦理更为合适？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无视类似这样的报道：广东东莞地区，因为工伤被切下的民工的手指头足足可以装上几箩筐！

的确，改革以前我们重视经济不够，但同时我们要知道一个健全的社会决不是仅有经济或金钱当道的社会。了解了这一点，各位经济学家在对中国改革献计建言时，万不可再做矫枉过正的事啊！

2001 年 11 月 13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时间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诞生之前，以新古典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从来不重视时间的。新古典理论研究的对象都是“瞬间交易”，并不研究跨时间的契约问题；新古典理论研究的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将个人视作独立于时间以外的自我存在，拥有给定的偏好，而与其存在的制度背景（也就是时间背景）没有任何关联；新古典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市场的运作，而不关心市场如何发展，也不关心经济制度如何在时间的维度内演化。因此，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讲演中批评新古典理论说：“纯粹的新古典理论具有数学的精确和雅致，塑造了一片无冲突的、静态的天地。但是……在分析时间推移过程中的经济绩效时，新古典理论包含两个错误假定：一是制度无关紧要；二是时间无关紧要。”

其实，从时间哲学上看，新古典理论并不是不考虑时间，而是在方法论上将时间视作“牛顿时间”，即时间是无意义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是对称的、可逆的。与物理实验一样，只要条件相同，交易可以反复发生，经济绩效也不会有多少差异，这突出地表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中概率论的迷信上。正因为时间是无意义的、对称的、可逆的，因而，时间只是一张外存于经济行为的永远同质的“网”，并不是与经济行为相关——更谈不上决定经济行为——的内生变量，或者说，经济行为游离于时间之“网”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外，所以，经济分析也就无须将其纳入视野之中，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一种“存在的经济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与勃兴，也带来了经济学家们对时间的不同看法。还是按诺斯的说法，“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是对新古典理论的一种修正，它保留了新古典理论中稀缺性这一基本假设，它所修改的是理性假定，增加的是时间因素。”

首先从理性假定来看。新制度学派将新古典理论的理性假定作了修改，就表现在它认为人不仅仅是“经济人”，而且是“制度人”。即给经济人加上了制度的背景，而制度又是时间的产物，因而实质就是给经济人加上了“时间之纬”。经济人决定了经济人行为选择的目的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在这一点上，新制度学派与新古典学派并不存在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人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并能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实现其“偏好最大化”；而新制度学派则认为，经济人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满足程度，并不取决于经济人本身，是受其制度环境所影响，而这种制度环境所影响的主要是经济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神话、教条、偏见”；而这一切，都是人们“通过在时间中学习”而形成的；理解它们在时间中的演变方式，对于进一步了解经济人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所谓“增加的是时间因素”，除了在理解理性经济人假定上已经增加了时间因素以外，将时间视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突出地表现在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上。

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演进的。这包括双重含义。其一是制度总是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如果制度瞬息万变，“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经济人就无法做出任何符合理性的行为选择，也就无法建立起契约关系。正是因为制度有其稳定性一面，跨时间的契约关系才成为可能。至于制度为什么保持相对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稳定，新制度学派认为，主要是因为构成制度的非正式规则或曰习惯法（不成文法）变化缓慢上；这些非正式规则包括民族心理积淀、社会习俗、道德规范、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等等。诺斯认为，构成制度的正式规则经常在变，但由于“支配原理”就是快变量受慢变量支配，因此，制度因非正式规则变化缓慢也维持其稳定。其二才是变化，制度一方面保持相对稳定，但又是在缓慢地变化。而这种变化之源首先在于资源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经由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推动着制度随之发生变迁。无论是相对稳定还是缓慢变迁，总之，制度是动态的，有时间作为其坐标。“演进”一词就是“时间”的意义，制度是演进的，意味着制度是时间的函数。时间之“网格”此时经由制度的演进过程来进行填充，时间在经济学上就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制度变迁理论还有另外两个更重要方面，即诺斯所谓“制度——认知”模型以及“路径依赖”理论，更表明了时间在制度演进中的意义之所在。“制度——认知”模型是指，在时间的进程中，人的学习过程决定了制度的演进方式，也就是说，决定选择的个人、群体和社会所持的信仰是在时间——不仅仅指个人一生的时间或社会一代人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而且，体现于个人、群体、社会身上的学习是随时间而累加的，并借助于社会文化代代相传。因此，诺斯总结说，“时间对于制度演进至关重要”。“路径依赖”理论则强调，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会将制度的演进引入特定的路径，而尽管初始条件也许相同，但经由不同路径最后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要么是良性循环，加速优化，要么是被动地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可见，过去对现在和未来、此时对彼时有着决定性的强大的影响，或者说，在制度的演进中，时间是连续的，前者决定后者。

如果上升到时间哲学层次看，在新制度学派那里，时间是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意义的，同时是不对称的、不可逆的。诺斯宣称新制度学派全部命题是两个：一是制度至关重要；二是时间至关重要。而第一个命题“制度至关重要”，其实也因制度是时间的函数而成为为证实第二个命题“时间至关重要”服务。因此，新制度学派全部命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时间至关重要”。而“至关重要”显然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求善）而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判断（求真）。这说明了时间是有意义的，存在一种主观的时间。同时，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实质上是说，一旦制度演进被导入某种特定的路径，就是“前脚迈出大门，后脚就再也不能迈进大门”，制度也就踏上了“不归路”：要么进入良性互动，要么进入长期停滞，二者必据其一。在此，时间显然是不对称的、不可逆的。正因为对时间持这样的看法，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一种“演进的经济学”。

有学者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具备了与哲学对话的资格，这肯定不是专指制度经济学将时间纳入研究的视野。但从制度经济学家对时间的重视与阐释来看，都涉及到了所谓“终极关怀”问题。比如：

由制度的演进，人与制度的关系，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问题：“过去的我们是什么样子？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明天的我们又将是什么样子？”由此再深一层，其实就是对“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诘问。

构成制度内容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是人们在时间中长期学习的结果，是人们在充分的集体交流后构成的非正式约束，也是任何一个个体在某一时间点上行动的知识背景。因此，新制度学派认为，传统永远是我们无法抛弃的沉重行囊，个体的人只能尊重传统，而无法改变传统。这实质意味着人在无限的时间面前的无能为力，在无限的时间面前怀有的本能的巨大惊怵。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制度演进的结果对初始条件以及各种偶然性和细小事件的依赖，这实质上是对“规律论”、“决定论”的一种挑战。这又与近年来哲学界再度关注的所谓“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联系在一起。

况且，时间的对称与非对称、可逆与不可逆；时间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还是经由“意义的网络”而建构成的一种主观性质；时间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时间是可测度的还是存在多种不同的时间；等等，本身也都是现代哲学关注的前沿重大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的确赋予了经济学某种形而上的特质，使得经济学也就不再是“庸俗的学问”，经济学家也就不再是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 R·L·海尔布鲁纳所言的“只知道与金钱打交道的俗人”。

1999 年 2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感受乡土中国

——读《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我向我的一位朋友推荐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时，了解我的朋友反问我："作为从乡村中走出至今根仍在乡村的一个人，难道你对于农村状况的了解还要求助于一本城里人写的书吗？"我竟无言以对。因为此前我总以为，我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与学界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一样，正是曹先生在《序》中所表达的，以"从内向外看"、"从下往上看"的全新视角，"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换言之，就是这本书未加任何雕琢地赤裸裸地展现了中原农村与农民生活的"场景"。但朋友的话使我对我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而且想来其实我在读这本书中我确实未被书中描绘的"场景"本身所"感动"。那么，我对这本书的钟爱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去年春节夜，我是在城里度过的。午夜，在仅只有很遥远的几声鞭炮声中（因为城里禁放鞭炮），无意中再翻翻手边《黄河边的中国》，我竟完全凭记忆去重新体验了一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乡村那种原初的祝贺新年的气氛。于是，我开始懂得，这本书一定是牵动了我及许多有我类似经历的人某根最敏感的神经，这根最敏感的神经，就是我们作为从乡村中出走的一员，与乡村以及城市有着如何的关系；以及所有的中国人作为乡土中国的一员，在今日之世界如何自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这几代人都共有的一种情绪与痛楚，就是曹先生在书中也有所表达的：农业文明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曾经辉煌过；但自近代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资本与工业世界竟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感觉尤其因为曾有过的辉煌而使我们这个现代化后来者感到耻辱。于是，由当初的被动地裹挟进现代化进程，到主动地选择现代化。而且那种迫切之心也因当初的被动尤为炽烈。也就是曹先生所说的“穷而急富”。而在赶超过程中，我们又一次以西方世界的标准，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象征，所以，这五十年中的几代人，就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作为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就好像“农业社会”是中国的穷根子，我们急于以工业化来刨掉这个穷根子。从当初的“大跃进”，倾举国之力大炼钢铁以赶英超美；到后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洋跃进”；一直到现在我们以为终于找到了市场作为追逐财富的不二法门……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成功了吗？的确，如果套用“译语”中提供的标准，仅以 GDP 构成看，因为农业以外的产业产值在其中所占比重已经占到 80% 以上，所以，我们算得上是“工业化国家”。但是因为农业人口仍占到中国总人口比重的 70% 以上，因此，我们仍处于农业社会，仍是不折不扣的“乡土中国”，仍没有摆脱“农”字的根。就好像野火蔓过的原野，草好像没有了，但根都在泥土中活着。这种“工业国家”与“农业社会”，也就是“译语”中所谓的“扭曲的二元结构”。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个现代化后来者，乡土中国如果要在今日之世界不沦落，甚至还想复兴，我自己觉得必须被迫面对两个“悖论”，而这却不是我们选择什么战略、我们的为官者道德如何等等问题可以解决得了的。这方面我可能犯了曹先生的忌，因为我可能套用了“译语世界”提供的思路。但又一想，曹先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本人在书中所谓“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何尝不是面对这两个“悖论”时的沉重。其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资本统治的世界的当下,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几乎面临“要么发展,要么灭亡”选择的当下,中国要想生存不沦落,要在与世界强国落差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至少现在能保持平行的发展,怕只能选择西方关于现代化的成套价值目标;而中国一旦选择了这一成套的价值目标,“黄河边的中国”之状如曹先生书中所述就不可避免。反之,我们如果自己放弃“赶超战略”,保持自己的发展理路,可能面临的是更严峻的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这个悖论,马克思很早就有揭示,所以尽管他是对资本统治最深刻的批判者,但他还是认为任何一个不想灭亡的民族都只能接受资本的统治。其二,现代化的逻辑中,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高速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资本积累;而农业社会中农业人口仅能生产稍许超过他们再生产所需的小额剩余,所以,农业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试图用“提靴带”的办法来进行,即抑制农业人口的消费,将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夺过来用于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装备,而且,从农民那里夺取得越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现代化速度就越快;于是,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使资本尽快积聚到国家(计划经济下)或少数人(市场经济下)手中,以达到“起飞”的临界点。所以,农业、农村与农民是注定要为现代化付出代价;除非这个国家放弃现代化的努力,而一旦放弃这个努力,这个国家又如何能在今日之世界自处呢?

两个“悖论”最后可能会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导向这样的局面:为了国家发展,只能走现代化的路子;为了走现代化的路子,只能实现资本积累;而穷国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只能以“三农”为代价。我相信不少有点现代知识,同时深谙中国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国情的学者都思考过以上我提出的两个“悖论”。但人与人不一样。有一些学者以整个国家的效率为取向，以这个国家中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者利益为取向，加之他们本身也是现代化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可以将“悖论”视为“结论”，可以无视在现代化与资本化统治展开过程中受害者的现实的苦难；而另一些学者因为心存不忍之心，较有人文关怀，因此，注定要在这样的“悖论”的求解中受折磨。然而，“悖论”似乎真的无解，于是他们宁肯有愧于真理也不想有愧于良心，选择了回避的方法，转而注重现代化进程中受害者具体的处境，并为改善这种处境而尽绵薄之力，以求“庶几无悔”。曹锦清先生其实就是后面这种学者。也正因此，书中仍存在的“场景”之外的宏论——包括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很勉强的见解——在行家眼里就不无矛盾与落俗套之处。

现代化过程中“三农”的代价最后具体都落实在农民身上。于是，与追赶现代化思路合拍的是，中国农民们普通的心理是想尽快摆脱农民的身份。这种心情与整个国家急于现代化的情绪相合拍。但现代化过程却如上文所说的注定是少数人先富的过程，所以，城里人为农民进城早就设置了各种障碍。也因此，出现了曹先生在书中所说的“农家子弟对城市既羡慕又怨恨”的复杂心理。其实，已经取得了城里人资格的农民子弟也有这样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总试图去掉城里人称谓的“农民意识”、“小农意识”，想彻底融入现代化生活，为此，他们中不少人甚至都以付出自己的尊严与个性为代价，这其中包括我接触过的一些已进入思想界或知识界的农民子弟；而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却总也无法真正切断与乡村有过的血脉关系，而且在城里人的另眼中他们总感觉到生活在别人的城市中。这种个人矛盾的心境又造就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从农村中生长、现在在城市里“发了迹”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反而不言农事，反而更倾向于推进中国既有的以“三农”为代价的现代化路径。表面上他们是“一阔起来脸就变”，但他们内心的隐秘我是很清楚的。如果仅是个别现象倒也没有什么，我最担心的是这种矛盾而隐秘的心境会成为我们这个乡土国家集体潜意识中一部分，因为正如有一位学者朋友曾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在中国，任何一个人上溯三代，祖宗都是农民。今日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三农”的利润倒逼，也许就与这些农民的后代对农民身份与地位的排斥有关呢。因此，与仅随祖母在农村呆过五年，就说“农民的冷热痛痒与我血脉相关”、“将终生关注农村”，并身体力行写出了《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先生相比较，包括我在内都应该感到有愧。所以，我说我钟爱此书的一个原因是它又再度勾起了我思考我们作为从乡村走出的一代人与城市与乡村应该有的关系。其实，作为乡土中国的农民后代，我们都必须坦然地面对“三农”问题，而不能将其作为我们的心灵的包袱。

再回到中国现代化问题。曹先生在书中以这样的言语来比喻农业中国的单纯超赶现代化战略：“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资源而已。”我相信是曹先生行走过黄河边的中国后一个总体印象。而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与曹先生的结论略有差别：我以为，中国如果仍然选择超赶型现代化的路径一直走下去，倒不是不可以进入现代化，但那一定是拉美式现代化：为了轻装前进被迫抛下了大量的农业人口。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札记中也以车子作比，大意是说，中国是一辆在泥泞中跋涉的大车，拉车的人吃力，车上的人嫌慢。后来有人出主意说，让车上一部分人下来使把力，使中国更快地向前去。结果，车上一部分人下来后，使了力，车子本身也轻了，所以跑得很快，眼看着快步入现代化，但当年从车上下来使劲的人，却被车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子抛下了，只得在泥泞中用双脚跋涉，并眼睁睁看着车子上带着一些并没有使多大力的人绝尘而去。这就是少了“三农”现代化的现代化过程。

但面对黄河边的中国，面对我的父老乡亲，对于如何彻底解决他们的苦难，我与曹先生一样很困惑；原因仍在于上文所提的两个“悖论”。于是，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十分敬佩曹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对一个大的社会过程的认识，要等到这个过程差不多完成之后才开始”，“说一个大的社会运动可以在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完成，我总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指望而且也不相信有任何关于乡土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惟一可以指望而且也应该做到的是：有什么具体问题就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比如，农民负担重，就想尽各种方法给他们减负；乡村干部腐败，就想尽办法遏制他们的腐败……如此这般，若干年若干代后，不定可以走出一条较妥帖的成本较小的路子。而在此，《黄河边的中国》以其第一手的现场资料，也算是给我们各级政府提供了一个寻找农村具体问题及其根源的线路图。这也应该算是此书的另一个贡献。

我知道我这篇仍很显理性、且带有许多“译语”眼光的东西，在曹先生以及许多《黄河边的中国》读者那里可能得不到共鸣，因此，在结束我的文字前我缀上一点感性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故乡迎接新年时的景象：平日神秘而阴森的祠堂里，此时被一盏大瓦数的灯泡映得通明，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准时带着女人们精心准备好的祭品来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接年”仪式。第一挂鞭炮燃响时，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无比虔诚地跪下了。由于后续燃放鞭炮太密太大，强烈的气浪在祠堂小小的空间里将一年中结挂的蛛网灰尘一扫而光，空气中充满了鞭炮味的浓香。跪着的人们尤其是老人们口中念念有辞，无疑是在祈求另一年的好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运，鞭炮声停，三声极清脆的铙钹声似天籁般鸣响，祈福的人们的情绪大概也到了高潮，不少中年人与老年人眼角都挂满了因激动而流下的浑浊的泪，仿佛他们的生活自今晚后会真的变得十分美好。然而，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人们看到小小的村落依旧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在地上撒满了鞭炮燃放后留下的无数的碎纸末，并已经沾上了泥泞……

2001 年 2 月 13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中国知识界需要什么？
——再说《黄河边的中国》

此前，我曾就《黄河边的中国》写过一篇文字。不久后，一位旅美学者在接到我寄给他的《黄河边的中国》并读了我写的文字后来信问我：这本书目前在中国内地到底反响如何？有没有引起有关方面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我竟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应该说是有些反响吧。我所知道的，在北方，有一家很不错的老牌读书类杂志为该书做了一个讨论专辑；在南方，另一家同样很不错的新锐知识界杂志也为该书做了一个讨论专辑。但我总是失望。因为与那位旅美学者以及我自己对中国知识界的期望相比较，相差实在太辽远了。这大概是当下知识界的时弊的又一次表现：总热衷于跟风为一些“形面上”问题争论，却绝不肯俯下身子正视自己立足的土地上存在的诸多具体问题。所以，这些年，讨论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有学者笑称“哈哈哈”，又有人戏称“哈总”）的文字已经汗牛充栋，而对于《黄河边的中国》有反应者却如此寥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在《黄河边的中国》之前，其实也还是有讨论“三农”问题的文字。但这样的讨论也是凭官方的统计资料据以对农村的情况作出主观判断。然而，关于“三农”问题的具体情况却很少是从第一手材料中得到的。在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转型期，中国农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民的真实生活处境，他们的个性、心理与态度，我们并不了解多少。就在这种不甚了了的境况下，一方面，不少知识分子将中国“三农”问题简单地等同于一个先富后所遗留下的后富问题，期待现代化的洪水总有一天自然而然地漫过这片区域，而不知道这片区域仅有的可能的富源仍在逆向地被先富的区域所攫走，以至于一位号称中国泰斗级经济学大师说出了这样幼稚的话：“把土地卖给我，我会让你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急于提出许多一揽子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总认为用了他这套方案，“三农”问题一定会解决好。而实际上，在如此复杂的中国“三农”问题面前，任何未与具体的情境及历史相协调、缺乏对农民生活处境感同身受，这样的方案都不免失之于浅薄。闹不好，只会使农民处境更糟。就像《黄河边的中国》中所透露的：曾由某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家出的所谓“官逼民富”的主意，在黄河边的中国农村发展成为一出不折不扣的扰民坑民闹剧。

本来，《黄河边的中国》及其作者给知识界履践“紧贴现实的学术”应该有一种示范作用。但不料“紧贴现实”却成了可以冷落《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理由。我们不少知识界人士仍认为：这本书充其量零碎地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而问题本身也没有系统化抽象化”。他们看不上这样的“不成体系”的书。还有人说：“是一部记实或报告文学，不是学术著作。”据说私下里，某些“博导”还警告其门生，“作论文时是不能引这样的书作为参考文献的”。既然不是他们所说的“学术著作”，自然也就进不了他们的视野。如此这般，《黄河边的中国》在知识界最终遭到冷落也就是注定的了。

我总认为，知识界对“三农”问题的如此态度，是与他们的一种“错觉”有关。这种错觉就在于，他们总以为“三农”问题充其量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说到底又无碍于自身的生活境地。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在人均生活水平都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的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其他中国的中心城市，生活在“九天之上”的某些知识界人士，本身是这个国家抑农重工追赶型现代化战略的既得利益者，加之二元结构体制使他们长久疏离于农村与农民，所以，他们不去理会“另一个中国”处于“九天之下”的同胞的切身的疾苦，而专注于自己在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圈子中的言说空间以及话语权力多大。偶有关怀，也仅出自一种“悲悯”或“不忍之心”。而没有想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其实是多少代知识分子所欲求的现代性社会到来的关键；更没有想到，“三农”问题如果累积起来，最终会影响到知识分子本身的生存处境。有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证据是：这几年，不少知识分子撰文说“教授当年”，言下之意，与后来的际遇相比较，1949 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得未必差；但撰文者却未曾想过，后来爆发的“扰了自由知识分子清梦”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与那个时代由也有知识界参与（或至少有着“复杂的共谋”关系）的强势集团最终使得农民“做奴隶而不得”有没有关系呢？

至于有关部门有没有因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而更加注意“三农”问题，我是不敢妄自揣测的。但我注意到，《黄河边的中国》记录的是 1996 年的农村情况；自此后，中国“三农”问题一日比一日突出，以至于今天已成为中国能否维持社会稳定、能否最终实现顺利转型的最大的隐患。而就在我写作此文时，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说，某乡政府利用“严打”造势，出动专政机器到村中收起原来不合理的税费。看来，期望一本民间学者的书可以影响“有关部门”注意解决什么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也终归是不切实际的想象。

近日，我无意中在旧书坊间觅得一本老书《贫困的印度农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版）。该书是由印度学者库苏姆·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奈尔所写。十分巧合的是，这也是奈尔在印度农村连续行走了一年的调查笔记。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奈尔写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总是事前不作通知便来到一个村，然后开始同一群人或单个人长谈。我当场作笔记，把所有谈话的内容逐字逐句记录下来。"这与曹锦清先生成书《黄河边的中国》过程如此类似。更有意思的是，看来该书及其作者在印度也未必能受到欢迎。因为它"不符合印度的知识界和政界领袖们心目中关于印度的理想和形象这个较大的远景"，于是奈尔近乎悲伤地写道："不能期待虫蚁的视界会和造物者的视界相符合。"但奈尔又在书的最后借用著名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不无自嘲地说："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必须害怕人们的赞许，当所有的人都说他好的时候，邪恶必然和他在一起。"

看来，曹锦清先生及其《黄河边的中国》至少会因有这样的同路人而不寂寞了。

2001 年 7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草根与传统

我是在西南地区搞田野调查的二十来天的时间中，利用间隙粗读完傅谨先生《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一书的，故整体的印象显得零碎；但我却认为这是我继《黄河边的中国》之后又读到的一本田野调查方面的好书。再之前，我曾读过一本留过洋的学者写的一本对福建某地客家村落调查的书，因其中充满了用搬过来的西方"译语"对中国古老乡村现象的极为冗长的解释，几使我卒不忍读。但傅谨先生如此真实地记载台州戏班的状态，甚至除了在引言部分之外都很少加上自己的评论，在我看来，除了体现了写家对"一个知识自洽体的内在构成"的尊重外，也体现了不对读者强加意愿的尊重。

因为专业的原因，我读傅谨先生这本书，又是从《戏班的经济运作》一章开始。从该章中可看出，戏班与演出地、戏班内部戏头与演员、戏班与戏贾，他们之间的"交易"都非常有意思。比如关于戏班与演出地，文中就有这样两段有趣的记载：

> 戏班放戏，向来只是双方口头协议。近些年来，尤其是这三五年，合同文书的运用逐渐普及。虽然仍有相当多的戏班在放戏时只是通过电话或当面口头商谈，很少听说某地以"口说无凭"为由，经口头商谈订好的戏随便反悔，受害方因没有合同就束手无策。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合同文书的运用仍是有前提的。在许多人的心目里，签订合同的言外之意，是对双方的口头协议的有效性有所保留，这也就意味着，似乎只有在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不足以达到能让双方都毫无疑虑的场合，才需要签订书面的合同。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在戏班与地方签订合同时，需要做一番专门的解释，以表示他们之所以要签订这样的合同，是为了一些次要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双方信任感的不足。

从经济学制度学派的角度看，上述这种交易方式，是一种很原初的交易方式：首先，交易双方之间的“契约”多是一种口头承诺，相对于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延期交易都以正式的文字合同来说，这种口头承诺就显得很“低级”；其次，保证契约的履行方式是“各自实施”，即契约双方自觉遵守承诺，而不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中由国家以“第三方”身份出面，以暴力机器为后盾，以诸如《合同法》等法律为准绳，来保证合同履约的所谓“第三方实施”，甚至都不是同样也是较“低级”的“双方相互实施”，因为从书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出现某一方违约情况，另一方也没有办法甚至都很少想到过如何给对方惩罚。

于是，我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即将被接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证明中国目前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而傅谨先生所描述的台州，历史上就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祥地，现在又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以西方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常理论，这一地区的交易方式也应该早就进入“由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契约”阶段，但为什么偏偏这一地区的戏班的经济运作仍旧保留了“由各自实施”的“非正式的私下口头承诺”这一最原始的交易方式呢？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由此我又联想到这几年国际经济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对这样一种现象感兴趣:在某种经济规模下,中国大陆乡镇企业以及世界华人企业的运作,都无不例外地呈现出产权模糊化特征,但这种在西方制度学派看来注定会出现低效率、注定生命周期不会太长的企业,在华人社会中却除了"很难做大"这一条外,其效率并不低,其生命力更是出奇地长久。这一现象与台州戏班的经济运作方式竟如此原初颇有相似之处。

其实如果经济学家能摆脱数理模型化的限制,而将眼光拓展至社会经济学领域,这些现象解释起来并不难。傅谨先生在书中说:"台州民众的信誉观念,并不涉及到事先有所约定的双方是否签有成文的合同,在一般人的心目里,言语和文字有着大致同样的努力——即使有差别那也只表达了双方对此事认真的程度的差异,而不是双方都应信守诺言的要求的差异。"如果将这一说法用社会经济学的视界加以提升,再综合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中国企业产权模糊化的解释,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中国人受千余年传统儒教伦理的教化与熏陶,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家族以及"鸡犬之声相闻"的相互熟识的小范围人群之中,都习惯于以东方式的伦理而不是西方式的法治作为处理一切关系的基本模式,而这一基本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诚信为本;另一方面,在义利之间,仍旧以义为先,即便双方明明是以利为目的的经济交易,也不愿使"利"赤裸裸地呈现出其"狰狞"的面目。两方面的结合,台州戏班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运作方式才是今天这种形式。

带着这一问题我回过头来再看全书,发现这一问题绝非仅限于经济运作中,而是台州戏班的整个运作仍未摆脱这个古老民族最原初的最传统的气息。比如:戏的主要剧目仍是今天稍上了点年纪的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诸如《孟丽君》、《玉堂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春》、《思凡》等等老段子；每到一个新的台基，大衣师傅（这个对负责服装与道具的人的称呼本身就富含民俗与民间特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戏祖唐明皇烧香；戏班演戏如果演错了或演员台词唱错了，仍要被罚戏；等等。除此之外，就我个人来说，使我阅读时顿起会心的是两处记载：一处记载是，今天的台州戏班，仍然会面临一些“缘于风俗的纠纷”，“有的戏班在演出时不拘小节，将换下的旧服装、道具等物品随意丢在戏台的附近，当地村民发现后认为是不吉利的，给村里留下了晦气，就要扣除戏班的全部戏金”；第二处记载是，演员有时可以向村里讨要红包，如“做寿踏八仙”、“龙灯包”、“讨饭包”、“开口包”、“赤脚包”、“扫台”等；而在讨要红包的场合中，“开口包”与“扫台包”非常古老。傅谨先生对前者的解释是：“凡是舞台上出现鬼魂的场合，都要给演员开口包。开口包的意思，是说人死了后本来不能再开口说话的，否则就不吉利；而在台上，死去的人变成鬼魂后，必须重新开口。”对于后者，傅谨先生写道：“每个台口演出结束后，要由大面扮演关公扫台。意为扫去舞台上的晦气，舞台上演戏，剧中难免出现死人的情节，演过这类剧的舞台必须扫台还地方以清洁。”对于这两处我之所以会在阅读时起会心，就是因为前年我在按理说与台州风土人情相去甚远的安徽西部大别山处的农村调查时，在当地见识过此种情景（虽然叫法不同）。可见，只要是受同一文化传统脉传，尽管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但那千江里的千轮月亮，其实就是那亘古不变的一轮月亮的影子！传统是传统，但传统就不可以改变吗？近五十年来，中国的精英们孜孜以求的就是改造这些传统。我上述的所谓“最传统的气息”，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及政治精英们那里，是不折不扣的“封建糟粕”，所以，也就免不了想用“强力”去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破四旧”的重点对象。即便是上述“非正式口头承诺”式的交易方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式以及“产权模糊化”的企业运作模式，也被我们那些言必称“科斯定律”、言必称“成熟的市场经济应该如何如何”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瞧不起看不上，并也正在“规范市场”的名义下被改造，但为何这样的传统仍旧不死呢？

傅谨先生对此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在书的引言中，他说：“五十年代开始的‘戏改’，就是一群自信满满的文化人利用他们的话语霸权，对各地戏班所进行的试图让它们变得更‘好’的制度化改造。看来并不成功”，也惟其不成功，我们才有幸看到傅谨先生笔下非常原生态地存在着的台州戏班。所以，傅谨先生充满激情地又写道：“我越来越坚信，对民间戏班越少干涉，就越是有利于它的生存发展。我甚至觉得一个充分自由发展、自然发育的市场，它内在地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足以萌发出对它整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那些秩序与规范，在这里充分体现出草根阶层的智慧。而且，我确确实实感到，草根阶层的精神需求与信仰是一种如同水一样既柔且刚的力量，而对强权它似乎很容易被摧毁，但事实上它真是像白居易那首名诗所写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总是能找到合适的机会，倔强地重新回到它的原生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以其本真的面目，展现自身。”

傅谨先生的这番话是点题之笔，我自然是非常赞同，并又想到了经济学的解释。同样是在经济学的制度学派那里，所谓的“制度”主体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成文法，即宪法以及其他各种人为制订的法律；另一种是不成文法，或叫习惯法，即一个民族的传统。相应地，制度变迁的内容也就有两项：一是成文法的变动，一是习惯法的变动。成文法好变，人为制订的法律规章甚至都可以朝令夕改，但习惯法不好变，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传统不好变，人们只有经历了在漫长的“时间中学习”，才有可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能从边际上将传统一丁点一丁点地改。而任何人为地想在短时期内强制改变传统，一方面本身就只能是在用传统反传统(如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传统至多可能由表面转而潜存于更深处的民间，并不会消失，相反时机一到会迅速反弹。因面制度学派将成文法视为“快变量”，将“习惯法”称为“慢变量”，认为制度变迁最终由“慢变量”即由传统而不是由“快变量”决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思想家的哈耶克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并将制度变迁的过程视为“自然演进”的过程。

所以，傅谨先生所谓的“神秘的力量”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传统本身。因为传统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是没有办法被人为地强制改造的，因而这种传统的力量就是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的草根的力量。

2001 年 6 月 21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读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后

厉以宁先生是我一向十分敬重的经济学界前辈。其新著《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出版后，赢得学术界一片叫好声。但我在读完这本书后，却想斗胆说几句也许不合时宜的话。

论者在赞扬厉以宁先生的书时，多说这本书具有开拓意义，即将道德调节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有论者还"言之凿凿"地说，经济学发展历史上，还没有人提出在市场与政府调节之外有一个"道德调节"。厉以宁先生本人也多次在书中提到，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引起经济学界对研究道德如何调节经济问题的重视，这也隐含着此前经济学界没有人重视此问题研究的意思。

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道德问题是有传统的。且不说斯密当初是把经济学放在道德哲学领域来讲授，也且不说老制度经济学如何将文化——其中尤其强调了习惯与道德的力量——作为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来看待。只说这几年正冲击主流地位的新制度学派，对道德调节经济的作用研究就十分深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也就是说，资源配置和利用，与所谓帕累托境界的靠近程度，不是取决于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而是取决于制度。而对于制度的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分析中，诺斯明确地区分了两种制度约束：一是正式约束，即宪法与法律，也就是成文法；另外一个就是非正式约束，又称“非成文法”，也就是厉以宁先生在书中念念不忘的“习惯与道德”，还包括民族传统、习俗等。两种约束，再加上其“实施特征”一起，构成了制度的内涵。而既然制度决定了经济绩效，那么，在诺斯那里，作为制度内涵重要方面的“习惯、道德、民族传统、习俗”等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已经不证自明了。所以，厉以宁先生绝不是最早发现道德在调节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第一人。相反，厉以宁先生对道德调节经济的作用的认识程度怕不及诺斯来得深刻，至少，他没有将“习惯与道德”提升到制度的层面上认识。

诺斯不仅证明了道德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重要。更重要的是，他还说明了这种调节的作用重要之所在。这种作用重要之所在，在诺斯、科斯及其他新制度学派学者那里，可以“一言以蔽之”，即“降低交易成本”。而厉以宁先生在书中却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谈道德如何影响经济效率，但我相信，只要是不怀成见、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熟悉的经济学界人士，恐怕都不会否认我这种看法：厉以宁先生大篇大篇的论述，尽管也讲清楚了问题，但全书中，连“交易成本”这个关键性字眼都没有出现，使得这本书的经济学底蕴，为此大打折扣。

道德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新制度学派那里，还表现在决定着制度演进的方向与速度上。在诺斯看来，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相比，即习惯、道德、民族传统以及习俗等与成文法相比较，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它是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中学习”后形成的共同的知识背景，是一种在经历了“充分的集体交流”后认可的一套规则。因此，与成文法或者说正式约束可以“朝令夕改”相比较，道德、习俗等变化其实非常缓慢。而制度的变迁又是受慢变量所支配，由此决定了制度只能是一个渐进的演进过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程。经济制度的转轨也就比一些政治家以及一些政府经济学家确定的目标或预想的要艰难得多。正是出于此考虑，诺斯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讲演中，对前苏联与东欧的所谓“休克疗法”颇不以为然，而对中国渐进式改革赞赏有加。在此，也可见新制度学派对包括道德习俗在内的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刻了。

遍翻厉以宁先生著作，尽管也提到诸如希克斯等经济学家对道德调节的研究，但对新制度学派对此问题的研究闭口不谈，所引文献中无一文献为新制度学派人物著述。而我们又知道，恰是新制度学派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最成功、最深刻。厉以宁先生恰避开了它，我不知道这是厉以宁先生有意为之，还是其他原因。我想说的是，任何研究经济运行中的道德问题，想无视新制度学派已有的成果，而另起炉灶，从头说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浪费，是一种不经济。

而且，我以为，新制度学派研究道德问题，是真正从经济运行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即看道德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与利用，因此，仍是将道德研究置于经济学视野之内；而厉以宁先生的研究，将现代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与孤独感等一大堆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话题都写进书内，是否算是对经济学主题的一种偏离，或者说是否是僭越了一个经济学家及一本经济学著作的本份？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不是不可以再研究道德问题。应该说，的确研究得还不够。但这种不够怕也不是说对道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是对这样一个话题研究不足，即：与构建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如何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从此意义上讲，我以为，同样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一书更加切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题，而且，其书中提出的构建一种“自利但不损人”、“诚实、敬业、守信”的市场经济道德底线，更有其理论与现实上的意义。

最后说明一点。我无意于否定厉以宁先生《超越》一书的意义之所在。但我想，厉以宁先生其实不缺表扬，而且，中国学术界“锦上添花”的功夫与其历史上“落井下石”的功夫一样精湛。因此，我在此壮着胆子说了些听起来不那么顺耳的话，以求教于方家。

2000 年 6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弱者的声音

——读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

我终于能理清自己的思路使自己坐下来为韩德强的书写点什么。我要做的，并不涉及到书中的学术问题。一方面，胡代光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已经就学术问题发表了高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并不同意书中诸多观点。因此，我准备作一番“价值判断”，或者说，讲一番“道德”；尽管我知道，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的精英经济学家们是反对这么做的。

我的一个总体感觉是，韩德强是站在弱者的角度说话，且本身也是作为弱者在说话。所以，我将韩德强此书中的言说称为“弱者的声音”。

在当今世界的经济竞技场上，中国还是个弱者，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全球化过程作为一种大势，将席卷今天地球村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当下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加入全球化进程的问题——因为在此问题上我们其实别无选择——而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加入全球化进程的问题。换言之，即使全球化过程真是充满了陷阱的过程，我们也只能在接受这个现实下面争取次优。所以，在民族国家目前还是本民族族人利益载体的时候，以中国利益为诉求的学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弱者在全球化陷阱面前的现实选择。而韩德强书中所破的正是这个题。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一些视韩德强为“新左派”的学界人物认为，韩德强就是要反对中国加入 WTO；在没有接触此书前，我也曾受此说影响。但公正地通观全书后，我才发现这实在是误解了韩德强的意思。其实韩德强本意在寻找一种两全的方法：一方面，中国不可能不汇入全球化潮流；另一方面，也正因此，中国必须学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奉行更高明的贸易保护主义。在韩德强看来，这就是弱者同时作为智者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当有的姿态。

为了达到变被动为主动的目的，韩德强在此书的最后提出，必须开展公共政策辩论，增强民族凝聚力。一本论述经济问题的书，却以提出与政治关涉更紧密的题目收尾，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因此我将这看成是韩德强过人之处。不少学者在讨论全球化及人世问题时，总以为这是在讨论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而韩德强却敏感地觉察到，弱国要在全球化过程中避开陷阱，首先需要做的是进行国内各种力量的整合，尤其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整合。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事先进行这种整合，弱国将因为内部本身经济结构的不连贯、政治上的离心离德等在竞争中更加不堪一击。在国内力量整合过程中，又尤其要注意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有人为弱势阶层说话。否则，与弱势群体相联系的弱势产业将成为对手最先突破的对象。我尤其提请大家注意，这里的弱势产业不仅仅指国家专营的产业，更应该包括目前连全球化的始作俑者都在保护的农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国有经济较为普遍的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作为弱国，在与强国进行谈判时，往往注意保护汽车、通信等未充分发展起来面又是由国家专营的产业，面对农业的保护往往不够。因为在这些国家，农业往往是由农民户分散耕作，而只能是“在时代的怀抱中跳舞”。“循自己本性生活”的农民阶层，却因信息的缺乏、对全球化的无知以及组织起来的费用很高，既没有可能表达自己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正的利益之所在，也缺少表达自己权利的机会。所以，包括中国经济学界在内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真正的势弱阶层说话，以达到实现国内各种力量整合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德强曾当着我的面说，站在弱势阶层的立场上说话，其实就是站在整个民族的利益上说话。作为经济学家中难得的“讲道德”者，韩德强道出了全球化过程中弱国的声音，也为这一过程中弱国中的弱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对中国农业问题的分析是很能发人深省的。

其实，韩德强本身也是个弱者。在市场浪漫主义几近一统天下的时候，韩竟声称自己要拆解竞争神话，破除市场迷信，无疑是经济学界的少数者。美国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鲁纳最近说，在今天的经济学界，“政府永远处于守势，而市场却始终被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当然，经济学家知道，为市场辩护比较对人胃口，而为政府辩护则不讨人喜欢。为此，他们大谈自由”。世界是这样，中国也如此。中国经济学界精英经济学家们，也在孜孜不倦地以自由竞争的种种好处为全球化趋势大唱赞歌，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将中国人世作为推动中国下一步大发展的契机，鼓吹一旦中国人世后，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这些经济学家，目前都处在占据着中国经济学界话语霸权的地位，并正热心于为整个经济学界订矩制规。谁要是不符合他们设定的“学术规范”，谁就可能被逐出经济学界。在此情势下，韩德强要站出来，说出与他们完全相反的话，并且在书中矛头直指一些当今正处于浪潮尖上的大腕级经济学家，的确是需要有勇气的。正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他是冒着被“开除学籍”的危险在说话，仅此一点，我要对他表示敬意。因为他恪守了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在我看来，就是进行社会思想文化的批判，对处于主流权力话语地位的思想进行纠偏与制衡，防止它对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其他思想尤其是暂处于弱势的话语进行压制。所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新的霸权话语的今天，就需要有韩德强这样的人出现，这甚至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本身正确与否无关。

据我所知，少数精英经济学家对韩德强的书表示出蔑视，认为韩德强及其他反全球化论者不过在“搞噱头”，他们的书不过是以“一些耸人听闻的论调与炒作在制造卖点”。这种论调不但令我失望——因为它违背了“不应该怀疑对方的动机”的学术讨论规则——而且令我愤怒。因为当我亲耳听见韩德强、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作者）们在如何率直激越地表达他们的观点时，亲眼看见韩德强、王小东们因想与自由论者的思想沟通的不得而痛心不已时，尽管我并不全然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我相信这些人的人格，与相信他们在从事学术时的知识与能力一样。相反，我对于中国一些言必称自由、却对异见毫不宽容的学者们有了别样的认识。

可以坦言，作为弱者的声音，韩德强的书对全球化进程的速度没有实质性影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脚步也不会有任何阻碍作用。这一点，似乎也注定了这种声音将很快被淹没于历史前进的车轮声中。所以，在逻辑与现实的较量中，韩德强将注定是个失败者，而我们那些鼓吹全球化论者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但我也认为，即使全球化论者道出了全球化九十九个优点，而忽略了其中一个缺点——往往这个缺点也是最致命的。所以有一位长者对我说过，最高明的骗子就是靠讲九十九句真理然后在最紧要处将其谬误推销给受骗者让受骗者浑然不觉的——而这个缺点又恰巧被许多个韩德强一样的学者点到，且最终使清醒了的弱者接受，并联合起来向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强者们要价，那么，“弱者”与“强者”在此都获得了新的意义。我也高兴地看到，当刚过去不久的上世纪末美国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在世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界各地的新左派的抗议声中无果而终，以至于使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也为此大惑不解时；当刚迎来不久的新世纪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与会者不约而同地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作为主要话题时，韩德强以及诸多与韩德强类似的学者的努力已经有了现实的回报。韩德强本人，作为一个高扬人文主义的经济学者，也因此实现了他以弱者的身份“为弱者说话”的理想。

2000 年 3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

杨斌先生：

大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中国改革陷阱》已经拜读。现遵意谈点自己的浅见。

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有影响的大国，其间的恩怨是非，一直是学界讨论得很热烈的一个话题。总的潮流我们都看得很明白。二十多年前，在我的印象中，美国几乎等同于日本，也被民间贬以“鬼子”的称谓，学界中人则将其视为“万恶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忙于批其腐朽性和没落性。而二十多年后，稍有些办法的中国人，都急于到美国去“淘淘金”，以至于我们的北大、清华被戏称为“留美预科班”，与此相对应，美国在我们一些学界精英那里，转而由“鬼子”的地位一跃成为“富裕之邦”与“真理之地”的化身。

尽管二十多年前与二十多年后，学界中人对待美国人态度截然不同，但在我看来，出发点与思维方式却都是相同的：总是将美国作为我们的参照系，要么敌，要么友。是敌人时，想着美国如何如何做，我们就不能这么做；是友人时，想着美国如何如何做，所以我们一定也要这么做。我们有了一点成绩，在过去是战胜敌人的结果，在现在则是改革开放后学了友邦的结果；账很少算到自己的头上而算到了别人的头上。

其实，美国人却未必是如此看待我们。他们看待我们现实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得多，也功利得多。美国人自己都从不讳言，一百年前，美国与其他七个盟国共同侵略中国，以武力迫使一个古老的帝国洞开自己的门户；一百年后，美国与中国在谈判桌上群枪舌箭，最后终于与中国达成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二者都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考量，而非为中国人着想。也就是说，美国始终在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当年的侵略也好，现在的协议也好，都是出于利己而非利他的目的。

所以，美国人往往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观照他国，而中国人往往是站在他国的立场上观照自身。再扯远点，中国圣人曾说过的“求诸己”的精神，现在在中国人那里，成了凡事求诸于人；而美国人倒把中国人“求诸己”的精神拣过去了。在美国学者费正清那里，没有一个泛泛的所谓“中国问题”，而只有“美国的中国问题”；而在我们学界精英这里，除了过去热衷于批美国如何如何腐朽没落阶级矛盾如何尖锐的泛泛的“美国的美国问题”之外，也几近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来看“中国问题”。特别是当下，中国学界多少精英的眼里的所谓“中国问题”，不是从美国的标准推导出甚至干脆直接从美国人学舌而来的呢？

正是出于对“两极思维”的检讨，在看待所有的关于中美关系的著述时，我自己都有一个标准：是否以平常之心对待中美关系。如果某个学者某种著述，是立足于中国人的立场看美国，美国是敌也好，是友也好，都将美国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决定性的“外生变量”，而非决定中国发展的“内生变量”，我就基本会持赞同态度。相反，将中国的发展维系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恶意还是善意，维系于中国多大程度上“美国化”了，这都是我所不能苟同的。

也是从我自身的标准出发，我同意您的书中的绝大多数立论。正如上面所讲的，当下的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主流已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经将美国视为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他们给当下的中国号脉,往往都遵循一个"美国标准",所以诊断的结果自然与美国人给中国人下的结论相同;这样轮到他们给中国开药方时,则更看重直接是美国人推荐给中国人的药方,而无视"美国标准"与"美国药方"后潜存的美国历史与现实、潜存的美国国家利益及资本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后者,即"美国药方"后潜存的国家利益与资本集团的利益。从当初马克思的世界体系理论——"资本将按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自身的世界",到后来的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思想——"目前,资本主义正重振全球化的旗鼓",再到美国国内著名学者华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关系的论述,都无不揭示出,美国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竭尽全力地推销它的以完全市场化、完全自由化、完全私有化为基本特点的"美国药方",目的在于将全球整合进它所愿望的由它主宰的秩序之内,以维持并延续美国资本集团的高额利润。以至于真吃了它的药方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依附的命运;而恰恰美国就从来没有"舍己为人"过。当这些陷入依附的国家危机蔓延最需要它们所倚重的美国为它们做点什么的时候,美国人带去的方案所附加的条件令任何一个受援国即使最后不得已接受但也不得不踌躇再三再四。这正是您所谓的美国对他国发动的"软战争"。

说到这里,我仍要提及上次我们见面时我说过的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繁荣,在于其政策上至今仍在延续的凯恩斯主义,而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我有一个也许很幼稚的想法。战后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始终是主要作为在野的力量在起一种纠偏与制衡作用。尤其是两年前,克林顿提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布莱尔提出"走第三条道路",更证明这些国家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社会保障、社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会公平，也正因为主导这些国家政策的主要是凯恩斯主义，且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凯恩斯主义越来越得到应用与强化，也因此，也越来越反衬出作为其制衡面的在野的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其作用。在这种情势下，才有了表面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回潮"的现象。我反复申论这一点，目的在于说明，美国向他国推销的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他自己其实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或者说，是已经在三十年代大危机中证明过期了的药方。这一点，左大培先生一席话说得极是："美国自己从来没有做的却推荐给苏联人做中国人做；西德从来没有做的结果在东德做了。"

指出美国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真的出于什么对"自由"的向往，对他国发动经济"软战争"这一点，说来其实也不过是道出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连美国的盟友欧洲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艾玛·波尼诺女士都批评过美国对外政策太过势利（参见波尼诺《为了结束双重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信使》1999 年第 1 期）。这也就是您在书的开头讲过的，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压倒了经济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因此请恕我直言，我不太同意韩德强先生所说，您指出美国在对中国发动软战争是"石破天惊"之语。但我仍很钦佩您指出这一点时所体现出的勇气与魄力。因为在我们看来是常识的东西今天在不少学界精英那里成了谬论。一些对"阶级斗争新动向"很敏感的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们，即使不看您的书，只要看一看您的书名，也会认为您又是一个新左派加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国家仍是族人利益的基本载体时，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无视学理与历史及现实之间紧张关系，如此轻率地将一个偌大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从来就没有共产主义品格"的美国身上，而您的《陷阱》一书面对这些人的话语霸权，深刻地指出了美国的另一面也许是最真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实的一面，这无啻于在大家都在作着“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太平梦时您再度发出“狼来了”的叫喊。或许，您的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此。

但同时，还是从我的标准出发，您书中有一个逻辑我只能同意一半。在书的前言中，您说，正如在一桩谋杀案中，我们只能责备谋杀者的凶残，而不能责备被谋杀者疏忽大意一样，我们应该谴责发动软战争者。但我以为，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在一个盛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如果被谋杀者生前就知道谋杀者在蓄意要谋杀自己，结果还是不幸被谋杀了，这时我们在谴责谋杀者、在哀悼被谋杀者时，是否还应该怒被谋杀者的不争呢？回到中美关系上。美国骨子里头对现在的中国怀有敌意，上至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下至美国学者，都在多种场合明确地说就是要用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破坏中国的现有的秩序。这时的我们，是急于去谴责美国有多么多么坏，还是应该冷静地思考自己如何自处呢？我以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看重此书的，是面对“狼来了”，书中提出了以“识别圈套”、重大决策程序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民主之路、如何做到人世不入套以及团结各国共同反霸的对策。您似乎也最看重此也想着力在此，惜乎这些对策我看后觉得与全书揭露美国真面目的力度、篇幅、深度相比，显得太过单薄，所以总让我有“不过瘾”或“隔靴搔痒”的感觉。

因此，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国家发展的步伐万一不幸地遭到挫折甚至停顿，即使是因为中了美国“软战争”的圈套，还只能怪我们自己不争气。而不能怪、更没有办法去惩罚人家美国人。我们应该清楚，即使美国再如何如何好，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即使美国再如何如何使坏，我们自己做好了自己的事也就无所畏惧。用《国际歌》的一句词讲，“从来就没有什么救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

陋见不当之处,还望海涵并指正。

顺祝

研安

卢周来

2000 年 7 月 17 日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何处是归程
——读汪丁丁《回家的路》

既然汪丁丁说他的文字是试图填补“当代经济学和哲学之间沉默距离”的一种努力，那么，我可以认为汪丁丁也在为经济学寻找一条“回家的路”。

从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算起，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不过是二百多年前的事。而在此之前，它还是与哲学、伦理学和历史学融合在一起。只是因为市场制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需要有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承担解释这种制度如何解决人类生存之谜时，它才从上述诸学科中挣脱出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与家园。

但与人类成长的历程一样，经济学刚独立之初，其实并未完全割舍其与孕育了它的母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写作了《国富论》的斯密仍是在其道德哲学中讲授经济学；同时，在经济研究中丝毫不放弃他对历史的意趣与天才般的理解，正如长期从事斯密研究的另一位大学者加辛所言：“不管斯密所讨论的是什么问题，他总会把他的目光返回到历史，他又会赖着思想所置放在他手中的火炬的帮助，阐释着各种问题。他的原理不仅为将来开辟道路，而且使历史新生。如此陈述斯密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实嫌不足，我们必需补充的，就是他具有真正的历史精神。”与斯密类似的还有经济学独立初期其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他大经济学家，如杜尔阁、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以及稍后的穆勒父子、马克思等，无不是身兼经济学家、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为一体，这都反映了经济学成长初期其与母学科之间密切的关系。

然而，当经济学终于羽毛渐丰时，它还是动了彻底切断与母学科之间关系的念头，想独自外出闯天下。萨伊在论述经济学发展前景时就放言："一个科学的历史，对我们究竟有何用呢？当我们已完全了解社会整体的公共经济时，我们没有必要去发掘历史。尤其是没有必要去探知我们祖先在这个问题上的幻想与错误，因为这对我们无多大关系。错误应该被忘记，而不是被学习。"这番话无疑是宣告经济学与历史学及历史主义的破裂；熊彼特则在阐释经济分析史时说："谈到经济学，我认为哲学的外衣也是可以脱掉的"，"对于任何技术意义上的哲学本质上不能影响经济分析、实质上也没有影响过经济分析；哲学对于经济学没有任何意义，却能把科学观念的源流弄得无影无踪。"在此，熊彼特就不仅仅在宣布经济学与哲学的破裂，还对哲学对经济学的曾有的母性关怀表示出明显的反抗与嫌恶。还有罗宾斯，他宣称"经济学要保持价值中立"，宣告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道扬镳。

无论如何，经济学终于彻底地出走了。它朝着与其原来的母学科不同的方向行进，朝着一种力图精确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在由金钱与城市铸就的现代性社会中，精明的经济学日益成为显学，日益享受着比它原来的母学科多得多的荣光。

但缺乏智慧的支撑，经济学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解释总是有局限性，因而，其出走也注定了是行之弗远的。自本世纪三十年代罗宾斯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算起，经济学家日益感到智慧的不足，日益感到可供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现代性资源已几尽枯竭，日益感到"缺乏历史与哲学阳光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映射，经济学仅呈现为一种漂白色的植物了”，日益感到纯粹数理化其实是经济学在“错把它乡当故乡”，因而，自五十年代制度学派倡导经济分析的“整体分析与历史分析”始，就开始了力图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重新结合的历史。

经济学整体主义运动的高潮无疑是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科斯以及福格尔等人相继登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宝座；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研究发展与贫困问题的阿马蒂亚森捧走，更是标志着经济学在回归古典。在此情势下，一些本来就已经具备良好的哲学与历史学素养的东西方经济学家便借势使力，汪丁丁就是其中的一员。从当初的《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后来的《永远的徘徊》再到今天《回家的路》，汪丁丁都在不遗余力地做着使经济学与其他诸母学科结合的工作，力图在形而上的层次阐释“万殊”的经济学现象背后潜存的“一本”，并力图以其他诸学科的发展来为经济学的方向定规。一句话，汪丁丁的确是想为经济学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然而，这条路有吗？经济学真能循此路回家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按新制度学派“路径依赖”理论，经济学其实自出走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它踏上的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任何力量也许只能使其顺这条路滑行的速度放慢，却改变不了它前进的方向。现实的历史已经验证了这种逻辑。其实自经济学跨出母学科大门那一刻，总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种出走表示怀疑甚至反抗，但这种怀疑与反抗整体上是无关宏旨的。甚至历史主义与整体分析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复归，至多只能算是历经了在现代性社会中跋涉后的困顿与迷茫后，经济学及经济学家暂时停下来，回望遥远的放园，以求得心灵的一个短暂的栖息之所。

其实汪丁丁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在书中他坦言：其实我们无家可归。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是的，我们的确无家可归，经济学也一样无家可归。多少年前，中国诗人就有这么两句诗，描述了我们这种无家可归的宿命。诗曰："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1999 年 6 月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后　记

收入这本小书中的文字，是我自前年以来写作的部分经济学札记。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过，有不少文字除被一些学术媒体转载外，还被转载于《读者》、《报刊文摘》等多种大众媒体。为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据此我对我的这些小文字于读者的亲和力建立了一种信心。也正是这种信心，促使我一直将写这种小文字作为一种正业，不敢稍有懈怠。

但我的文字也自然招致了许多非议。有的人说，其实写这种东西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恰恰是不务正业，尤其是搞国防经济学的专门家，更是有些过分了；还有人说，不仅写这些东西是不务正业，而且这些东西本身也不全是经济学的；即使是经济学的，因为其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判断，也有违经济学家的职业本性。对于这种批评，说我完全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我总有另外两方面的考虑：一者，经济学在中国如此年轻，通过写这些小文字，可以帮助这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走向普通民众，也凭此可以打破国人中对于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在中国与其地位及贡献不相称的一种迷信；二者，的确，包括著名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都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该告诉人们孰好孰坏，不能够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做什么，经济学家只能揭示各种不同变量的成本与收益，以便使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因此理论上讲，我是不适宜在经济分析中糅进个人的价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值判断。但我又想，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很不均衡，以致即使是通过民主程序也无法充分反映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我不能只做一个纯粹的经济专门家，而要利用我仅有的一点话语空间，为社会中的底层百姓说说话。

也因为我基于以上思考后表现出的倔强，我很清楚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的精英经济学家们对我的态度。也因此，在以精英经济学家们为主组成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大家庭中，我是一个“搅梦者”。也许我如果稍微圆滑一些，出生与背景再雄厚一些，不定也能像某些同样被指称为“新左派”经济学家那样左右逢源，但可惜这又有违我的本性。于是，也就认了自己的边缘位置。这也是我为什么将几年前一篇读后感《何处是归程》作为本书结束篇的原因。

但我不是没有同道者。这些同道者，除了认可我文字的读者以外，也还有许多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人士及媒体编辑。在写作这些文字过程中，崔之元、王绍光、温铁军、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王小东、房宁、韩少功、韩毓海、程晓农、何清涟等等都给予过或多或少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不是完全同意我文字中表达出的倾向；《经济学茶座》的詹小洪，《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赵明、陈大均、张剑荆、徐冰等，《中国改革报》的袁喜清，《深圳特区报》的毕敏，《博览群书》杂志社常大林、李炎，《粤海风》杂志社的徐南铁，以及《科学时报·读书》的王卉、傅婷等，《湘声报》的向继东，还有约请我为“经济茶座”专栏作家的《中国产经新闻报》的徐瑗与《惠州房地产》的何华，我要十分感谢他们对我的这些原本就无甚高论的文字的看重，我的文字大多见于他们编辑的版面。我更要感谢《书屋》原主编周实先生，哪怕是在自己因为维系一份知识界杂志而十分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是始终不忘记表现出对我这个其实至今也未谋过面的作者的厚爱与支持。没有他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

的督促及力荐，我是无法完成这本集子的。最后，还要向为此书的出版与编辑付出极大心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赵南荣先生表达谢意。

卢周来

2002 年 4 月 20 日于北京

地信网论坛
BBS.3S001.COM